

作为媒体人的普希金

耿海英

(上海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44)

摘要:普希金的媒体人活动大体可以分为:30年代以前作为报刊撰稿人时期,30年代作为《北方之花》和《文学报》的编辑、出版人时期,以及独立创办《现代人》时期三个阶段。其媒体人身份,首先是一种政论活动。他利用各种文学手段和化名,曲折地进行“政治写作”。在期刊文章及刊物活动中,赋予新闻业公民性、道德性和独立性。他创造了一种“完美的”论争体裁,反对在批评与争论中的“礼貌”和“良善”,要求“智慧”“有效”“鲜活”“尖锐”的争论,从而一反学界塑造的普希金和谐、温暖、甜蜜的化身的印象。普希金逐渐成为俄国文化的象征之后,这种印象就越来越占主流地位,这正是我们要深入研究其媒体人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普希金;媒体人;论争体裁;尖锐论争者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01-10

一、普希金的《现代人》时期俄国新闻出版业概况

在讨论作为媒体人的普希金之前,也许简单了解一下他同期的新闻业状况是必要的。普希金开始创作的时期,俄国新闻出版业还不是一种社会力量,这是一个先进的贵族文化传统(爱国传统、公民传统)积极发展的时期。这里的“先进”,是指在民族意识觉醒、启蒙意识强烈、针对俄国农奴制度追求人的自由意义上的“先进”。新闻出版业还不像后来五六十年代那样新闻工作者可以勇敢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官僚体系的弊病,刊物编辑和政论家的矛头常常可以直接针对政府;新闻业的典型特征是社会政治生活。而普希金时代,可以说,新闻出版业还只是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职业,它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领域,只是作为一种大众信息活动,还只是奠定了出版新闻的基础:比如与大众和读者的交流方式,完善收集信息的方法,进行新闻劳动的细化分工,逐渐提高信息质量等。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全俄发行的报纸有两种,

外省的和专业的出版物刚刚开始出现。但这时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现了一些百科全书特征的大型杂志,如波列沃伊的《莫斯科电讯》、纳杰日金的《望远镜》、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先科夫斯基的《读者文库》,以及波戈金的《莫斯科新闻》、基里耶夫斯基的《欧洲人》、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格列齐的《祖国之子》等。诚然,许多杂志很快就被关闭了,照例是按照最高人物的“命令”。

1825年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声称:“革命就在俄国的门槛。不过,我发誓,只要我一息尚存,它就不会进入俄国。”^{[1]149}这可以理解为尼古拉统治的纲领。我们只要了解十二月党人革命是尼古拉一世初出统治就遭遇的一场怎样巨大的挑战,就可以知道他坚决遏制革命及其后来实施绝对高压统治决心的基础。政府的所有行为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绝不允许枢密院广场的事件再次发生。1826年尼古拉命令加强对思想界倾向的监控。众所周知,随后成立了第三厅,并委命本肯多夫为其头目。审查官们得到指示,“严格监控,以使在俄国出

收稿日期:2020-0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与翻译30余年。

版的任何一份报纸上,绝不出现含有论断陛下政治形象内容的文章”^{[1]149},只允许转载来自《彼得堡新闻》和《彼得堡报》的以法语发表的政治性消息。

禁止谈论政治和当下政府政策,使得科学和文学旨趣成为19世纪尼古拉一世时代新闻刊物的首要内容。俄国的新闻媒体人,波列沃伊、普希金、别林斯基等人需要表现出足够敏锐的才智,以避免书刊审查而涉及内政问题。这一时期在新闻实践中广泛流行各种政治暗示、曲笔,也就是“伊索寓言式的语言”手段,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1830年法国和比利时发生革命,波兰开始起义,随后波及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俄国本身也不平静——各地因霍乱引起的骚乱,塞瓦斯多波尔的军事起义,高加索地区与沙皇的政治入侵进行的斗争,诺夫哥罗德军事定居点工人的起义,等等。政府担心这些问题被新闻界在期刊上发酵,颁发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新闻业的决定。按照本肯多夫的要求,从1830年起,所有在俄出版的刊物都必须向第三厅提交副本以备后续额外审查。审查制度出台,出版人遭受各种指控和告密。1830年底杰利维格的《文学报》暂停,1832年基里耶夫斯基的《欧洲人》遭禁,1834年波列沃伊的《莫斯科电讯》、1836年纳杰日金的刊物《望远镜》和报纸《杂谈》均被停刊。1837年至1848年只出现了四种新刊物,性质类似,其中三种都是宣扬官方民族性的:《灯塔》《莫斯科人》《俄国导报》(于1841年复刊),第四种《芬兰导报》(1845—1847)的出版只是允许作为一份专门关注芬兰问题的刊物,该刊的功绩在于他们巧妙地超越狭窄的界限范围,而涵盖了俄国社会生活问题。

政府鼓励官办科学—文学出版物的出版,以期与私人刊物竞争,创办了《莫斯科大学学术会刊》(1833)、《国民教育部杂志》(1834)及其他一些刊物,不过在读者中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1830年代外省报刊开始多起来,当然也都具有官方性质,如《敖德萨新闻》(1828)、《第比利斯消息》(1828)、《立陶宛新闻》(1834)、《高加索新闻》(1837)、《波兰王国官方报》(1838)等。

出版私人报纸和刊物(且是专业的而非百科的),需沙皇本人许可。社会—文学或科学—文学刊物的出版权,只是例外地给予那些表明了自己政治“可靠性”的人士。例如,所有私人刊物一律禁止涉及政治问题,但布尔加林的报纸《北方蜜蜂》例外,这是一份1825年开始出版的政治和文学报纸。布尔加林1826年成为第三厅的眼线,是所有出版人中唯一获得在自己的报纸中刊登政治消息权利的人

士,因而也引起其他杂志人和文学人的愤慨。

1825年后,起主要作用的报刊已经不是彼得堡的而是莫斯科的。这一点当时的很多人都有提及。普希金在《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旅行》(1833—1835)中就写道:“彼得堡的文人大部分已经不是文人,而是企业家和精明的文学买办。渊博的学识,对艺术的热爱,还有众多天才,无可争辩地集中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刊物打败了彼得堡的刊物。”^{[2]252}果戈理在《1836年的彼得堡笔记》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莫斯科杂志谈论康德、谢林等;圣彼得堡杂志只谈论公众和良好的愿望。在莫斯科,杂志与时代同步,但刊物总是拖期;在圣彼得堡,杂志与时代没有同步,却按时按点出版。莫斯科文人是在花钱(生活),彼得堡文人是在挣钱(发财)。”^{[3]109}

在十二月党人时期至别林斯基从事杂志活动开始这一时段,最有影响的杂志应该是波列沃伊的《莫斯科电讯》(1825—1834),被别林斯基称为自有新闻业以来最好的刊物。《莫斯科电讯》有广泛的读者受众,遍布俄罗斯。按照赫尔岑的说法,“伴随着《电讯》,杂志开始在俄国文学占据统治地位”^[4]。此外,别林斯基30—40年代在莫斯科的杂志《望远镜》和副刊《杂谈》,以及在《莫斯科观察家》中的活动也具有重要意义。

与波列沃伊和别林斯基在莫斯科从事杂志事业的同时,在彼得堡垄断新闻业的是布尔加林和格列齐,他们在十二月党人被挫败之后告别自己往昔的自由主义立场。他们掌控的杂志有《祖国之子》《北方档案》和报纸《北方蜜蜂》(该报1825—1830年布尔加林单独执掌,1831年之后与格列齐共同操办)。到了1834年,这一阵营的力量又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先科夫斯基的《读者文库》杂志开始出版。这样,在30年代中期,彼得堡新闻业形成了三巨头《祖国之子》《北方蜜蜂》《读者文库》,也通常被称为是“反动”三刊物,分别由布尔加林、格列齐、先科夫斯基掌控。

给彼得堡的新闻业带来新鲜气息的正是这一时期与普希金的名字相联系的两份刊物《文学报》和《现代人》杂志。不过普希金及其圈子的处境十分艰难:《文学报》由于审查的规定只能谈论文学美学问题,而《现代人》只被允许作为一份文学集刊,一年出四期。尽管如此,他们也对“反动”刊物造成重大冲击,形成另一种力量。

1839年秋别林斯基来到彼得堡,成为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的主要合作人和实际的主编。从这时起,彼得堡的杂志重新在俄国期刊中取得引

领作用。

二、作为报刊撰稿人的普希金

研究《现代人》，不可回避的领域必然是作为媒体人的普希金。普希金作为大诗人的名头不必多说，但他作为热忱而天才的媒体人我们却极少关注。这里说的媒体人，包含他作为报刊撰稿人、编辑和出版人三种身份。在他独立出版《现代人》杂志之前，就曾给多个杂志撰稿，也直接参与《北方之花》《文学报》的编辑出版，为其后来的《现代人》杂志活动奠定了基础。因此，普希金的媒体人活动大体可以分为30年代以前作为报刊撰稿人时期，30年代作为《北方之花》和《文学报》的编辑、出版人时期，以及独立创办《现代人》时期三个阶段。

普希金非常关注新闻期刊的发展，相当了解过去及当下的新闻业：在他的藏书中，有30多种杂志，他高度尊重媒体人这一职业，强调说：“媒体人是国家人才的苗圃。”^{[5]161}他较早指出了杂志和文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异见人士，并确认这是一个“重要标志”，“必将对以后产生重要影响”^{[6]229}。

普希金密切关注新闻业中出现的新现象，如关注到别林斯基在新闻业的出现，在他的藏书中保存着那些只剪下了别林斯基文章的《望远镜》剪报。据巴纳耶夫回忆，“似乎只有普希金一人默默地意识到这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将在某个时刻占有俄国文学史的荣耀位置……他知道谢普金与别林斯基关系近，就请他转交别林斯基自己刚开始发行的第一期《现代人》”^{[7]334}。1836年普希金开始与别林斯基接近，只是他的去世妨碍了他们合作的实现。

现在很难说普希金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的报刊撰稿人身份与文学创作分割开来。有生之年他在刊物上发表过50余篇文章和札记，还有同样数量的手稿没有发表。这些发表与未发表的文章和札记，有关于文学史和理论的，文学体裁和文学语言的；还有关于俄国国内外作家的创作或单独作品的文章、评论、书评，对于时下各种文集的评述，对于众多杂志人和批评家的点评，还有政论文章，报纸、杂志编辑出版的信息和各种争论性文章。体裁多种多样：讽刺文章和小品、对话、人物剪影、笑话、戏仿作品等。大致上，这些报刊撰稿分三个方向：文学批评、论争和政论。一般理论性的和文学批评类的文章大部分生前都没有发表。在论争文章的体裁方面，他几乎就是别林斯基的前辈。在他的许多文章、札记和书信中保留有许多关于论争方法和技巧的文字。诗人

毫不留情地反对在批评与争论中的“礼貌”和“良善”。他要求智慧、有效同时又是鲜活、尖锐的争论；认为当下的论争者“令人苦恼和可笑”^{[8]183}。普希金指出了论争文章的一些修辞原则，这些原则后来在别林斯基、赫尔岑和60年代新闻业中得到发展。其中之一，就是模仿对手的语言和风格特点，通过戏仿性“保护”对手思想和行为来揭露对手，塑造一个虚拟的形象（面具）以掩盖自己的立场。笔者认为，这一文体与修辞方法，不仅在新闻业的政论文中，后来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许多俄国经典作家的修辞与文体，都受到普希金的这一引导。这是另一个研究话题，这里暂时不论。

普希金的刊物文章类型取决于其艺术手法的特点及其读者对象。普希金的文学批评和政论明显地倾向于短小的形式，除小册子之外，普希金的文章通常体量不大，从杂志页面的三五页到几行字；有的甚至称不上文章，只是札记而已。在1822年的一篇《论散文》中，普希金写道：“准确和简短——这是散文的首要品质。它要求思想、思想——没有它们，光鲜的句子何用。”^{[9]12}这种言简意赅的风格不仅是其艺术作品的特点，也是其刊物文章的特点。普希金并没有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使他的期刊文章成为大众化的。他主要属于小众的读者圈——有足够的积淀和学识，有教养的公众。因此普希金区别于别林斯基，别林斯基的读者完全是另一种；普希金完全不需要为自己的论点详细据实地引证论据，而别林斯基的文章几乎是在普及文学史知识，因而显得冗长和细碎（只要读读他的那些年度文学概述就知道了），甚至这一点也曾遭到同时代人的诟病。言简意赅却表达充分在普希金是可能的，还因为他是一位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同时代人认为，普希金在批评和图书简讯中开创了一种手法，一如作为不同寻常的诗人在诗歌中那样。

普希金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就是“涉足政治散文”^{[10]214}。1830年3月16日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他写道：“皇上走时，在莫斯科留下了一个新机构的规划，这是一个反对彼得革命的机构^①。于是你偶然写的政治性抨击文章甚至得以发表，是因为政府实施或有意实施欧洲意义上的启蒙。限制贵族，遏制官僚作风，市民与农奴的新权利——这都是大事件，你怎么样？我想涉足政治性散文。”^{[10]214}但严苛的审查制度不允许他公开发表纯政论文章，不过政论性气息还是渗透了诗人的整个创作——抒情诗、艺术散文、历史题材的作品、报纸和杂志文章。有时在一些看似非政论性作品中也具有这种政论

性。如1833年普希金开始写作的长文《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的旅行》，就是意欲补充由于审查从拉吉舍夫的作品中删去的内容；最后由于这些内容被禁止发表，妨碍了普希金完成全文。而他的文章《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原准备在《现代人》第三期发表，尽管普希金比起前文已经弱化了许多，依然没有通过审查，因为在其中找到了“不合时宜的和完全多余的唤起人们对已经忘却且应该忘却的拉吉舍夫及其作品的记忆”^{[11]507}。

通常认为普希金的媒体生涯是从参与《文学报》开始的。这其实给人某种错觉，因为普希金来到《文学报》前已经是作为批评家和锐利的论战者、有经验的媒体人了。

早在1824—1825年，普希金进入媒体领域，其诗歌、政论作品发表在《祖国之子》《莫斯科电讯》《北极星》《望远镜》上。作为杂志撰稿人，他的第一篇期刊文章发表于1824年。该年度5月的第18期《祖国之子》上，出现了一篇寄自敖德萨的带有争论性的札记，即是他的《给〈祖国之子〉出版人的一封信》，此应是他与不同立场的刊物进行论争的开端，即指向卡切诺夫斯基的《欧洲导报》及其主要批评家米·德米特里耶夫。1825年维亚泽姆斯基邀普希金给尼·波列沃伊的《莫斯科电讯》撰稿，他最为尖锐的作品即为讽刺诗《活着，活着，烟鬼！》，也指向《欧洲导报》，只是没有被审查通过。同时普希金还在《莫斯科电讯》上发表有多篇讽刺文章。1825—1930年，普希金在集刊《北方之花》上发表作品，1830—1831年在《文学报》上发表作品；并参与了这两份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最后，得到许可出版自己的刊物《现代人》。无论是撰稿，参与编辑出版，还是独立办刊，普希金都着意唤醒同僚意识到新闻出版职业的责任性，要能辨认出“经典作家”的存在——他们实现着自己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启蒙（或教育）的普及作用。这是他赋予文学的最高要求：公民性，道德原则性，独立见解性——独立于资助人。

当莫斯科传来普希金死亡悲剧的消息时，《莫斯科观察家》主编瓦·彼·安德罗索夫^②1837年2月3日给在彼得堡的克拉耶夫斯基写信道：“普希金未必不是因为媒体人的身份而遭受厄运。”^{[12]287}他这样说，是有相当充分的依据的。例如普希金在我们上面提到的《给〈祖国之子〉出版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最近四年我成了杂志舆论的对象。常常是不公正的，常常是卑鄙无耻的，有些丝毫不值得理睬，另一些从远方回应又不可能。委屈的作者自爱

的辩护不可能引起公众的兴味。我宁愿默默地在新版中纠正那些无论什么方式向我指出的不足……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出于对我的友善出版《巴赫奇萨拉的喷泉》，并附上一篇《出版者与反浪漫主义者的谈话》……该谈话令我们的一位文学裁判官不高兴，他在《欧洲导报》第5期上刊登了第二份谈话——出版者与古典主义者之间的谈话……在俄国，浪漫主义者的反对者相当弱和不起眼，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地回击。我不想也无权以另一种态度抱怨，并心悦诚服接受不知姓名的批评家的赞美。”^{[13]7-8}当然，这里“赞美”是反讽的修辞色彩。

普希金不仅是媒体舆论的对象，他也主动参与到媒体事件中。例如，1828年年中《欧洲导报》每况愈下，卡切诺夫斯基在发布第二年的征订时，向读者保证他将使杂志重新复活。“然而长期关注自己同行文学活动的波列沃伊先生却不相信《欧洲导报》的承诺，他在《莫斯科电讯》1828年第20卷发表文章，对可敬的《欧洲导报》的编辑发动猛烈攻击。”^{[14]26}波列沃伊在文中写到，卡切诺夫斯基没有发表过任何有价值的作品，总是去维护过时的见解，也无能为力使杂志复活。“作为《欧洲导报》的出版人，觉得受到侮辱的卡切诺夫斯基先生以编内教授、五等文官和勋章获得者的身份要求法律保护，上诉至书刊审查委员会，控告审查官通过波列沃伊的文章。”^{[14]28}当时人们都知道卡切诺夫斯基与《莫斯科电讯》的官司，普希金主动对此作出反应，他发表讽刺短诗《受到杂志侮辱的人……》，刊登在波列沃伊的杂志上（1829年第7期）。接下来一期，普希金又发表另一首讽刺短诗《古代卡切尔科夫斯基所在之处……》，其中嘲笑卡切诺夫斯基企图使杂志复活的徒劳。这些嘲笑诗引起的喧嚣还没有平息，在《北方之花》上就又出现了普希金的《文学编年史片段》。在这个“片段”中，普希金第一次采用了论争手法，这一手法对于作为讽刺文作者的普希金来讲是非常典型的——假装与对手意见一致，但这是为了“从内部”摧毁对手的立场。普希金表面好像同情地引用卡切诺夫斯基的话，但立刻就可以感觉到隐秘的讽刺。他对波列沃伊进行评判，希望表面上反驳《莫斯科电讯》出版人，但他自己给予卡切诺夫斯基以更严厉的评判。该文在同时代人那里产生了深刻印象。别林斯基将该文称为“极为完美”的论争文。由此，普希金热心并善于论争，且犀利与不妥协形象可见一斑。

三、作为编辑和出版人的普希金

从本文第一部分中我们可以得知，普希金属于

那个年代彼得堡的第二支媒体力量,称他是主要的媒体人应当还够不上,不过他却是一位个性鲜明、引人注目的媒体人。在独立创办《现代人》之前,在《北方之花》和《文学报》的编辑和出版活动为其提供了先期媒体实践的空间。笔者在文章《普希金的〈现代人〉杂志研究》中简略介绍了他在《北方之花》和《文学报》的活动,这里将其纳入作为媒体人的普希金的整个活动中再次考察,并在前文基础上予以补充。

1824年12月下旬,安·安·杰利维格和奥·米·索莫夫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不定期集刊《北方之花》(1825—1832,普希金主编和出版1832年号丛刊),其作者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圈子。在《文学报》创办之前,《北方之花》是唯一在彼得堡与布尔加林和格列齐的刊物对阵,多少有某种影响力的刊物。但毕竟《北方之花》期数少,因而在参与《北方之花》的同时,普希金期望在彼得堡创立一个可以日常对抗布尔加林和格列齐的刊物,期望文学能审视时代的社会问题,涉足政论和社会批评。这就产生了创办一份新报纸的想法,这就是《文学报》的诞生。但普希金也明白,无论是他还是维亚泽姆斯基都不会被政府允许办那样一个刊物,于是他委托杰利维格来操办,因为杰利维格暂时还没有成为政府紧盯的对象。结果杰利维格成功地使检查机关允许自己出版没有任何政治杂质的《文学报》。在《文学报》发行的过程中,普希金依然为争取报纸完全独立的权力而奔波,请求放宽限制,允许开辟政治版块。1830年5月2日,在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关于《文学报》他说道:“请支持它,暂时我们没有别的刊物。如果还不如布尔加林,那真是丢人……难道就让布尔加林垄断政治新闻?难道除了《北方蜜蜂》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份杂志敢于报道墨西哥地震了而议员们的相机在9月前就关闭了?难道就得不到这种许可?去找找那些年轻的部长,甚至是本肯多夫本人。这里不涉及政治意见,只是纯粹传达所发生的事件。而且政府缔结联盟是不体面的——是在和谁缔结呀?是和布尔加林和格列齐!”^{[15]222-223}在同一封信中普希金还预先告知维亚泽姆斯基,让他避开所有人,“暗中”进行这些活动,“如果布尔加林知道了,按他的一贯行径,又要去污蔑诽谤了——你就什么也搞不成”^{[15]223}。维亚泽姆斯基的奔波也毫无结果,他们所有的努力都落空。

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尽管政治栏目不被允许,《文学报》的所有同仁,尤其是普希金,寻找特殊的方式在批评文章、评论和争论中涉及当代

政治问题。报纸出版伊始就表露了自己的立场和情绪,带上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这样,它以其发表的作品区别于趋于保守和主张“纯艺术(无涉政治)”的刊物,如布尔加林的报纸《北方蜜蜂》(1825—1865),米·彼·波戈金的杂志《莫斯科新闻》(1827—1830)和尼·阿·波列伏伊的杂志《莫斯科电讯》(1825—1834)。

关于报纸的目的,编辑部声明:“该报的目的在于,给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读者介绍最新的欧洲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作品。”^{[16]5}报纸在强调自己的文学性质的同时,也强调自己的主要对象是针对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读者。同时声明:“报纸将不给谩骂式批评以版面;对于批评家们,将不以个人关系,而是本着有利于某种科学或艺术,满怀感激地接纳《文学报》……而一切合乎报纸目的的文章都将不胜感激地予以采用。”^{[16]5}关于供稿作者,编辑部在自己的公告中说道:“六年来那些在《北方之花》上发表自己作品的作者都会经常为《文学报》撰稿(当然,两位杂志出版人,忙于自己的刊物,将不成为该报的撰稿人)。”^{[16]5}这两位先生指的是布尔加林和格列奇。在《北方之花》所有撰稿人中,唯有他们两位拥有自己的刊物。这样,《文学报》立即就将自己置于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和格列奇的《祖国之子》(1812—1852)的对立面了。

《文学报》主编杰利维格办了两期之后,就因事暂时离开彼得堡而把报纸交给了普希金两个月,因而普希金成为接下来的十期的实际主编,他和索莫夫一起出版了第3—12期。《文学报》辟有散文、诗歌、国内外图书、学术资讯、杂俎五个栏目。诗歌版块允许普希金畅通无阻地发表自己的诗歌作品,报纸第一期就刊登了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八章片段。诗歌栏目还发表过主编杰利维格本人的诗歌,以及维亚泽姆斯基、巴拉津斯基、费·尼·格林卡、阿·瓦·科利佐夫、杰尼斯·达维多夫及其他诗人的作品。此外,报纸还匿名发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阿·阿·别斯图热夫和维·卡·曲谢尔贝克尔的作品。散文部分给读者提供了各类作家的文章。这里发表了俄国著名的散文作品和戏剧作品,如阿·阿·沙霍夫斯科伊的《斯摩尔陵斯克人在1611年》,果戈理最早的未完成小说的两章《可怕的野猪》,普希金的《阿尔兹鲁姆旅行》片段和《彼得大帝的黑奴》片段。散文作家中还有安·波戈列利斯基的小说节选《修道院附属女子学堂女学生》,冯维辛的讽刺作品《在哈尔金娜公主那里的谈话》,以及沙莫夫、安·波多林斯基、尼·斯坦凯维

奇、阿·霍米亚科夫等的旅行记和随笔。外国文学有司各特、霍夫曼、梅里美、司汤达、雨果、曼佐尼、欧文的作品翻译。

《文学报》的各类批评文章 also 具有重要意义。批评部分聚集了俄国当时最卓越的作者和思想家,发表严肃的文学理论的学术文章,毫不留情地解剖和评析当时那些最主要的作品。如卡捷宁的《思考与评判》系列文章,批评了浪漫主义的极端性;维亚泽姆斯基的文章《论拉马丁及当代法国诗歌》,《冯维辛生平片段》,当然也有普希金的评论、随笔和观察。还有翻译文章,如雨果的论当代文学的文章《论拜伦及其对待新文学的态度》,威廉·华兹华斯的《当代英国文学》等。评论文章作者中还有索莫夫、瓦·柳比奇-罗曼诺夫斯基(历史学家、文学家、果戈理的中学同学),甚至有流放中的维·卡·曲谢尔贝克尔(其《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思考》)等。还有一些历史、教育、哲学、医学、自然科学的文章也引人注目。如马克西莫维奇的《论花》《论自然界物质的多样性和唯一性》,果戈理的《关于教授孩子地理的一些想法》等。

普希金也积极投入图书栏目的工作,1830年他在《文学报》上发表20多篇书评等文章,还有十多篇完成但未及发表。其中短文《论杂志上的批评》(1830年第3期)对于确定《文学报》在图书评论方面的立场至为重要。他指出:“我们杂志上的批评,要么局限于枯燥的图书资讯,也有多少尖锐些的讽刺性评论,但普遍是友好的赞美;要么成为出版人与撰稿人之间的家常书信。”^{[17]33}他认为,不仅需要关注那些“明显有价值的”作品,“另一些作品本身看似无足轻重,但其自身的成就和影响不容忽视,这里道德观察要比文学道德重要得多”^{[17]33}。“我们的《文学报》与其说对于公众是需要的,不如说对于一些作家是需要的,因为他们的署名文章无法出现在任何一份彼得堡或莫斯科的刊物上。”^{[17]33}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赋予文学以道德原则性和独立见解性的原因。

在学术资讯栏目经常发表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的短文。杂俎栏目提供各种文学的和接近文学的文章,包括发表过亚当·密支凯维奇的书信选,回忆艺术家、回忆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文章。

几乎《文学报》的所有参与者当时多少都与十二月党人有联系,因此《文学报》被同时代人以及政府认为是一个还没有与十二月党人革命失去联系的俄国开明贵族的机构,一个政治上反政府的机构。这也就解释,为什么在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

上,以及在他给本肯多夫的许多报告中经常出现许多暗示,指向《文学报》没有足够的政治善意,指向他的参与人,特别是普希金的自由思想。如1830年第30期的《北方蜜蜂》,以一则像是从英国杂志上拿来的“笑话”为掩护,布尔加林将个人侮辱与政治指控其自由思想掺和在一起。除了政治目的,布尔加林还有个人目的,因为,他将《文学报》视为《北方蜜蜂》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因为在当时的杂志圈中,普希金是唯一揭露布尔加林是第三厅在出版物审查事务上的帮办和特务的人。因而布尔加林也一直伺机毁誉普希金。他在评论《奥涅金》第七章时(《北方蜜蜂》1830年第35、39期)称普希金的天才“完全没落”了,“我们首先认为这是一部恶作剧,简直就是笑品或滑稽作品。书商不确认时,简直不敢相信这第七章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作者的作品。两个小印张的第七章完全被那些诗句和玩笑破坏了,甚至《叶甫盖尼·韦利斯基》与它们比较起来还真有点像呢。在这个空洞无物的第七章,没有任何思想,任何情感,任何画面,任何值得称道的见解。完全没落了!完全失败了!(法语:chute complete!)因此我们的希望落空了”^{[18]232}。布尔加林还指责普希金曾到过高加索,却没有歌颂俄国军队,并且在谈卫国战争时,似乎毫无敬意地谈论俄罗斯:“《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作者渴望到高加索,被崇高的诗意滋养一下,丰富一下新的印象,在甜美的歌声中向年轻一代转达俄国当代英雄们的伟大功绩。我们原认为,东方的伟大事件^③,令世界惊奇不已,获得了俄罗斯所有有教养人的尊重,必定会唤醒我们诗人们的天赋——但我们错了!”^{[18]232}“整个导言和插笔,所有外部不相干事物的那些描写毫无意义,以至于我们不愿相信这些蝇头小作还可以发表!自然,像在先前几章那样,在本章中作者也常常诉说自己的苦闷、厌倦和自己心灵的死亡,似乎一切都陷入黑暗云云。”^{[18]233}“整个第七章除了第36、37诗节,没有任何闪光的诗句。”^{[18]235}我们知道,第36、37诗节是对莫斯科的描写,却又被布尔加林指为是对《智慧的痛苦》的模仿、剽窃。在布尔加林看来,这唯一闪光的诗句又是模仿,就更是无不讽刺与贬损普希金的意味。

杰利维格和普希金在《文学报》上同时反驳布尔加林。就布尔加林的剽窃一说,杰利维格于1830年4月立即在《文学报》做出反击,捍卫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以自己的优美比一切捍卫者都更好地捍卫了自己。除了《北方蜜蜂》外,没有人在对莫斯科的描写中找出对《智慧的痛苦》

的模仿”^{[19]236}。普希金则发表了一篇讽刺文章,是以介绍一本法国警察头子维多克的《回忆录》的形式写成的,其履历与布尔加林有某些类似(从军队开小差,喜欢诽谤,欺瞒等)。读者立刻就明白,文章指向布尔加林。讽刺文获得了巨大成功,政府立刻出面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代理人:禁止谈论和发表关于维多克的东西。维多克的《回忆录》,甚至凡有其照片的印刷物都被禁售。

此次事件之后,两个刊物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布尔加林开始对《文学报》进行告密,第三厅也开始更加严密地监视《文学报》。1830年10月28日第61期《文学报》上,引用了卡·杰拉韦温献给1830年七月革命牺牲者纪念碑揭幕的四行诗,招致了《文学报》不可避免的厄运:杰利维格遭到第三厅的传讯;到11月12日第64期《文学报》被迫停止。过了一个月,与《文学报》的很多作者都熟知的内务部助理波鲁多夫成功使《文学报》复刊,但杰利维格被免去报纸编审,主编换成索莫夫。1831年1月杰利维格去世。在如此强力的审查下,普希金和维亚泽姆斯基不再在上面发表作品,索莫夫恐惧于第三厅的干预,在报纸上发表的基本都是青年作者无关紧要的作品,报纸订量日益下降,直到只有100多份,终于在1831年6月底,索莫夫停止了报纸的出版。

作为反对派的活动,在当时沙皇专制制度下不可能持续太久。《文学报》总共出版了一年半,对于一份报纸来讲实在是太短暂了,而且在同时代人中并没有广泛的受众和太高的知名度,仅限于社会很小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但是,它对于俄罗斯文学和艺术性政论的发展,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和重要阶段。

1831年1月杰利维格病逝,他坚持多年的《北方之花》也在本月出版^④。为了纪念诗人,他的朋友们决定再出一集“1832年号”。普希金主持并编辑了该期,发表了杰利维格生前未被发表的作品及朋友们悼念诗人的作品。

《文学报》停刊后,普希金继续在纳杰日金的《望远镜》上与布尔加林和格列奇对阵,这时他常以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⑤的化名出现,将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扮为被布尔加林和格列奇常常搞得异常兴奋、陶醉不已的人。由于普希金的文章,常使得布尔加林怕得不敢出门——大家都朝他伸“小指头”嘲讽他。而这“小指头”是有番典故的。

1829年布尔加林的小说《伊万·维日金》问世,在被格列齐及作者本人在《北方蜜蜂》和《祖国之

子》上的大肆吹嘘下,其发行量达到了7000份。因为布尔加林在小说中表达的“忠诚”,他被皇后赐予一枚金环。1830年底他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彼得·伊万内奇·维日金》,这一次是尼古拉一世赐予他一枚金环。一位三流作家奥尔廖夫^⑥准备靠着布尔加林的官方成就捞点外快,于是就在莫斯科市场上推出自己关于“维日金家族”的小说。1831年年初的几个月,他接连推出几部小说:《赫雷诺夫斯基草原居民伊格纳特和西多尔,或伊万·维日金的孩子》《赫雷诺夫斯基草原居民伊格纳特和西多尔的婚礼,或伊万·维日金的孩子们的婚礼》和《伊万·维日金之死》《伊万·维日金的亲戚,万卡—卡因的儿子,他的家族,侄子及叔叔婶婶,岳父及所有分支。道德讽刺小说》。

《望远镜》主编纳杰日金在1831年第9期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分析了所有关于维日金的小说——布尔加林的和奥尔廖夫的。他赞扬罢布尔加林的政治正确,尖锐讽刺布尔加林。格列齐则出面为自己的朋友站台,宣称布尔加林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不惧怕批评家们的任何意见:“它的一个小手指头的才智和天分都比许多批评家的头脑要多得多!”^{[20]84}这就是普希金后来的讽刺文章《略谈布尔加林的小指头及其他》的由来,也成就了“小指头”的典故。格列齐还认为,奥尔廖夫应当受到谴责,他胆敢侵占布尔加林的主人公,从而给评论家以口实,将布尔加林与他、奥尔廖夫相提并论,这简直就是亵渎布尔加林的天才。

读罢这一番辩护,普希金在《望远镜》第13期上发表短文《友谊的胜利,或有根据的阿·安·奥尔廖夫》,署名即是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正如在《文学编年史片段》中一样,普希金在这篇短文中用了明、暗两种方法与对手斗争。首先,他揭露布尔加林作为诽谤者、举报者、背叛者、善变之人的行径。普希金完全直截了当地讲,布尔加林在自己出版的杂志上自我吹嘘,赠送未来的文评者、包括外国人大量礼物,将波兰诗人叶热夫斯基给贺拉斯颂歌的注解安到自己身上;知晓了普希金的《鲍里斯·格都诺夫》手稿内容后,从中窃取某些情节为自己的《伪德米特里》所用。这是普希金真实的声音。不过在文中还有一个人物的声音,即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友谊的胜利》就以他的口气写成。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的形象是和善、值得信赖、在文学上还很稚嫩,这使得普希金使用的这种写法成为一种幽默和讽刺而彻底摧毁对手。科西奇金为格列齐和布尔加林的友谊而高兴,对布尔加林和奥

尔廖夫的小说喜欢得不得了,不过,根据他所表述的阅读印象,读者可以明显感到他的赞美之词反而具有一种讽刺意味。普希金就这样以科西奇金的“学者”批评之名,将布尔加林和奥尔廖夫——“这两位我们文学耀眼的太阳”^{[21]79}匹配在一起,对布尔加林的小说做了致命的讽刺。

作为对科西奇金文章的回应,在《北方蜜蜂》上布尔加林加强了对普希金和纳杰日金的攻击,而格列奇则再次攻击奥尔廖夫;普希金一科西奇金则在《望远镜》第15期上发表他著名的短文《略谈布尔加林的小指头及其他》,针对格列奇文章中的“傻里傻气奥尔廖夫”一词,普希金愤怒地质问:“什么叫傻里傻气的奥尔廖夫?哦!当然,如果傻里傻气意味着精神的安宁,不为任何嫉妒、贪欲烦恼;良心纯洁,不为任何流氓行为、任何谎言的告密所玷污……那么善良且并不富裕的奥尔廖夫是傻里傻气,也不会嫉妒任何骗子的财富,恶棍的官阶,招摇撞骗者的声誉。”^{[20]86-87}在文章末尾,科西奇金宣布他写了一部小说《真正的维日金》,题注为一部“19世纪历史—道德—讽刺小说”^{[20]88},并列出其主要内容,也就是章节目录。当然,这是讽刺布尔加林,其所有可耻的个人和社会活动的主要事实都被呈现在18个章节的标题中:“第1章.维日金出生的那个库德拉什金家的狗窝。上帝保佑,教育。第2章.维日金的第一份诽谤—告密书。服役。第3章.在酒吧打架。大人!让我喝点解醒酒吧。第4章.与叶夫谢耶夫的友谊。有饰边的外套。盗窃。开小差。第5章.哪里好,哪里就是家乡(拉丁语:Ubi bene, ibi patria.)。第6章.莫斯科大火。维日金抢劫莫斯科。第7章.维日金逃窜(叛逃)。第8章.没有一块面包的维日金。告密者—维日金。唯利是图者—维日金。第9章.赌博者—维日金。维日金和退伍人。第10章.维日金与维苏辛的相遇。第11章.快乐的一对儿。一节奇妙的诗和一封给一位大人物的匿名信。第12章.丹塔。维日金成了傻瓜。第13章.维日金的婚礼。可怜的侄子!哎叔叔呀!第14章.维日金先生和维日金太太用劳动所得购买田庄并怀着感激之情向可敬的读者通告此事。第15章.家庭问题。维日金在缪斯的谈话中寻求安慰并写下诽谤和告密书。第16章.眼线,或者扯下面具!第17章.维日金悔过,成了一位正派人。第18章.即最后一章。奶酪中的耗子。”^{[20]88}

普希金在文中通过这部臆想的小说的章节目录的列举,毫不留情、痛快淋漓地对布尔加林进行了揭露与讽刺。其实,在文章一开始,普希金就开诚布公

地讲:“我不属于那类不爱记仇的文人:相互公开对骂,随后又当众拥抱……不,我一旦生气,会生很久,在用尽一切令人难堪的注释、双关语、国外笑话诸如此类的储备之前我绝不会平静下来。”^{[20]84}确实如此!普希金在假称写好的这部小说中,几乎是把“维日金—布尔加林”标写为一出生就会告密诽谤了(第2章)。第3、4章写他1808年在雷瓦尔(塔林的旧称)偷了军官的差役的大衣并把它剪得粉碎。第5、6、7章写他双面人的背叛行径。第10章所称的“维日金与维苏辛的相遇”是指他与格列奇的相识(“格列奇”的俄语意思是“荒地里长出的荞麦”)。第13章讲的是一个传闻:枢密院广场起义后布尔加林向警察告密自己的侄子伊斯科里茨基与“反叛者”有染。第15、16章揭开维日金—布尔加林作为第三厅代办的嘴脸。在文中普希金还讽刺性地模仿格列奇教训人的、语法上“正确”的诗句,它们毫不掩饰地狎昵献媚和自我吹嘘,这些也都是布尔加林的文章所具有的。普希金的文章在读者中赢得一片叫好。

1831年普希金在思考俄国新闻业的状况时,对《北方蜜蜂》不断增强的垄断性感到焦虑。他认为,如果政府更宽松地允许出版社会政治报刊的话,那么,《北方蜜蜂》就会经不起竞争,因为它仅是靠自己的政治消息专有刊登权吸引读者的。

1832年的时候,普希金还获得许可出版政治报纸《日报》,这主要有赖于布罗多夫的支持,他希望把《日报》办成内务部的机关报。但是普希金并没有着手出版这份报纸,因为他明白,就报纸成熟的条件看,他的《日报》与《北方蜜蜂》毫无区别,他不愿意扮演一个半官方新闻人的角色,宁愿拒绝这份报纸。

不过,无论是《文学报》《北方之花》《望远镜》,还是《日报》,这些刊物活动,都不能满足普希金真正的杂志情怀。事实上他一直在不断努力,要创办一份自己的刊物。又过了三年他才成功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自己的刊物《现代人》的主人。《现代人》杂志的活动是普希金独立的媒体人活动,其中实现着自己的办刊宗旨,同时也成为其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在笔者的《普希金〈现代人〉杂志研究》一文中已有论述,可作为本文的续篇,这里不再赘述。

普希金的媒体人身份,首先是一种政论活动。他投入了最大热情,利用各种文学手段和化名,以便揭露他的对手,也以便深刻同时也讽刺地分析国内外所发生的事件。普希金与许多杂志的合作都富有

成效,但同时也期望开办自己的杂志,当然他无不艰难地实现了这一愿望。尽管他的许多文章都未得许可发表,他自己也始终处于政府的严密监视下,但他在与布尔加林的对立中从来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公民立场;他们的对立,引发了不少尖锐、精彩的政论文章和讽刺作品,当然也带来后续不少麻烦。普希金关心文学理论问题,但他同时总是将之付诸自己的创作实践。捍卫一方,讽刺一方,为纯洁的俄语、文理通顺、教育的普及而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他看来,杂志人不仅应当传播信息,而且应当是具有道德原则、与自己的主人公感同受的人。没有一颗热忱的心和清醒的思考力,就无法将尖锐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诉诸笔端。

从诸多媒体事件、争论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犀利、不妥协的媒体人普希金,从而一反我们现在总是将普希金视为和谐、温暖、甜蜜的化身的印象。普希金逐渐成为俄国文化的象征之后,这种印象就越来越占主流地位,也许这正是我们要深入研究其媒体人身份的重要原因之一。普希金更为丰富的一面应当被揭示。

注释:

- ①普希金第一个称彼得的“改革”为“革命”,他对其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并赞成后来尼古拉一世对彼得改革的反拨。见: ОТНОШЕНИЕ ПУШКИНА К СОВЕРШЕННОЙ ПЕТРОМ I РЕВОЛЮЦИИ // Борис Башил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масонства. 网络版: <http://www.bibliotekar.ru/rusMassonstvo/index.htm>.
- ②В. П. Андронов (1803—1841), 统计学家,《莫斯科导报》合作者,后来为《莫斯科观察家》主编(1835—1837)。
- ③指 1826—1828 年俄国对波斯的战争,俄国取胜。布尔加林这里有指责普希金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他曾写道:“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荣光,英勇的战争和著名的和约,没有令任何一位诗人兴奋,都在哭泣和忧郁,时而为过去,时而为未来,常常为些不存在的东西……”(《北方蜜蜂》1830 年第 5 期,1 月 11 日)
- ④《北方之花》是当时坚持时间最长的不定期期刊,持续了 8 年,从 1824 年到 1832 年,共出了 8 期。
- ⑤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普希金喜欢用的一个戏谑的笔名。见: Псевдонимы Александра Сергеевича Пушкина: <https://propsevd.ru/name.php?id=71>.
- ⑥阿·安·奥尔廖夫(Ор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нфимович, 1791—1840), 1830 年代平民作家,一生与贫困作斗争。他在 30 年代最著名的事件是与布尔加林的敌对,对后者的作品进行了恶意的模仿。对于当代研究者来说,布尔加林和奥尔廖夫的文学产品,在社会意义上接近和同源,在思想和形式上,只是布尔加林的比奥阿廖夫的更文学一些

更有文化一些。引自: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 11 т.), М., 1929—1939.

参考文献:

- [1] Западов А. 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XVIII – XIX веков [М]. М. 1973.
- [2] 普希金. 普希金文集(文学论文) [М]. 冯春,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这里引文根据原文笔者进行了重译)
- [3] 果戈理. 果戈理全集(第六卷) [М]. 冯春,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这里引文根据原文笔者进行了重译)
- [4] Герцен А.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после 14 декабря 1825 года [М]// В. К. Кантор, А. Л. Осповат, Рус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40—5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82. 见网络版: http://az.lib.ru/g/hercen_a_i/text_0320.shtml.
- [5] Пушкин А. С. Обзорение обзоров [М]//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 —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77—1979. —Т. 7. Критик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1978.
- [6] Пушкин А. С.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Москвы в Петербург: Черновая редакция [М]//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6 т. М.; Л.: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37—1959. —Т. 11. Критик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1819—1834). 1949.
- [7] Панаев 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М]. Москва, 1988.
- [8] Пушкин А. С. Письмо Погодину М. П., 31 августа 1827 г. Из Михайловского в Москву [М]//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 —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77—1979. —Т. 10. Письма. 1979.
- [9] Пушкин А. С. О прозе [М]//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 —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77—1979. —Т. 7. Критик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1978.
- [10] Пушкин А. С. Письмо Вяземскому П. А., 16 марта 1830 г. Из Москвы в Петербург [М]//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 —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77—1979. —Т. 10. Письма. 1979.
- [11] Оксман Ю. Примечания Ю. Оксмана [М]// А. С. Пушк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М.: ГИХЛ, 1959—1962. —Том 6. Критик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见网络版: <https://rvb.ru/pushkin/02comm/0970.htm>.
- [12] Березина В. Г.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Пушкина [М]// Пушк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М. — Л., 1956.

- [13] А. С. Пушкин. ПИСЬМО К ИЗДАТЕЛЮ СЫНА ОТЕЧЕСТВА[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М. : ГИХЛ, 1959—1962. —Том 6. Статьи и заметки 1824—1836, Публикации 1824—1830 гг. 见网络版: http://www.rvb.ru/pushkin/01text/07criticism/01criticism/0124_30/0912.htm.
- [14] А. С. Пушкин. ОТРЫВОК ИЗ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ЛЕТОПИСЕЙ [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М. : ГИХЛ, 1959—1962. —Том 6. Статьи и заметки 1824—1836, Публикации 1824—1830 гг. 见网络版: https://rvb.ru/pushkin/01text/07criticism/01criticism/0124_30/0916.htm.
- [15] Пушкин А. С. Письмо Вяземскому П. А. , 2 мая 1830 г. Из Москвы в Петербург[М]// Пушкин А.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 — Л. :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еление, 1977—1979. —Т. 10. Письма. 1979.
- [16] Касаткина В. 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А. С. Пушкина и А. А. Дельвига. 1830 год (№ 1 - 13) [J]. М. :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8.
- [17] А. С. Пушкин. О ЖУРНАЛЬНОЙ КРИТИКЕ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М. : ГИХЛ, 1959—1962. —Том 6. Статьи и заметки 1824—1836, Публикаци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азете (1830—1831). 见网络版: https://rvb.ru/pushkin/01text/07criticism/01criticism/0230_31lg/0921.htm.
- [18] Ф. В. Булгарин.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роман в стихах, Глава VII. Сочинен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М]// 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 1828—1830 . СПб. , 2001.
- [19] А. А. Дельвиг. В 39 – м No “Северной пчелы” помещено окончание статьи [М]// Пушкин в прижизненной критике: 1828—1830 . СПб. , 2001.
- [20] А. С. Пушкин.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МИЗИНЦЕ Г. БУЛГАРИНА И О ПРОЧЕМ[М]// Собр. соч. в 10 тт. ,—Т. 6, Статьи и заметки 1824—1836, Публикации 1831—1833 гг. 网络版见: https://rvb.ru/pushkin/01text/07criticism/01criticism/0331_33/0942.htm.
- [21] А. С. Пушкин. ТОРЖЕСТВО ДРУЖБЫ, ИЛИ ОПРАВДАНЫЙ АЛЕКСАНДР АНФИМОВИЧ ОРЛОВ[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М. : ГИХЛ, 1959—1962. —Том 6. Статьи и заметки 1824—1836, Публикации 1831—1833 гг. 见网络版: https://rvb.ru/pushkin/01text/07criticism/01criticism/0331_33/0941.htm.

(责任编辑 刘海燕)

Pushkin as the Journalist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As a journalist, Pushkin's activiti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more or less: he was a writer for newspapers before the thirties; he serves editor and publisher as *Northern Flowers* and *The Literary Gazette*, and independently establishes *The Contemporary* during the thirties. His identity as journalist is a political comment activity firstly. He takes advantage of all kinds of literary means and pseudonyms, circuitously engaging in “political writing”. In journal articles and publication activities, he endows journalism with citizenship, morality and independence. Meanwhile, he creates a “perfect” polemic genre, opposing “politeness” and “goodness” in criticisms and arguments, requiring “intelligent”, “efficient”, “vivid” and “incisive” arguments, thus changing the impression which the academic circle shaped – Pushkin is the embodiment of harmony, warmth and sweetness. After Pushkin increasingly becomes the symbol of Russian culture, the impression dominates more and more the mainstream position. It is one of important reasons why we deeply study his identity as a journalist.

Key words: Pushkin; journalist; polemic genre; incisive debater

在历史情境中寻找唐诗真相

——以贺知章《回乡偶书》、王维《酬张少府》等为例

黄理兵

(北京语言大学 评价院, 北京 100083)

摘要:一、根据贺知章《回乡偶书》的写作背景,并考察汉语史上“相见”一词的意义,认为诗人是荣归故里,“儿童”是与他在正式场合行相见礼,诗中没有悲凉情绪,只有开心和满足。二、在王维《酬张少府》中,张少府可能并非王维的朋友,他问了王维很多问题,该诗是对这些问题逐一作答,诗中没有牢骚苦闷、消极避世的思想内容,而只有高冷,符合晚年王维“诗佛”的心态。三、结合李白、孟浩然、王维、刘长卿等人的诗歌,讨论“隐士”主题存在的悖论,认为真正的隐士不可能被人通过语言文字而了解。

关键词:历史情境;唐诗真相;《回乡偶书》;《酬张少府》;隐士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02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11-06

一、千年不识好儿童:贺知章《回乡偶书》

有的唐诗,明白如话,似乎用不着解释,谁都能读懂。而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我们很可能理解错了。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七言绝句之一: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语文》课本中,这个“衰”不能读“shuāi”(衰弱,衰老),而是要读“cuī”,意思是“疏落,减少”。其他部分看起来不用多解释了。多数人都把诗的内容想象成一个画面感很强的故事:一位老者(作者贺知章)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他还说着地道的家乡话,可是鬓角的毛发已经很稀少了。在村口,他遇到几个儿童,向他们问路,孩子们当然都不认识他,他们嘻嘻笑着问他道: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听到孩子们把自己当成客人,贺知章心里有些悲凉。

我以前就是这么理解的。

最近我对这种理解产生了怀疑。我仔细地揣摩

字句,想象诗中所写的情景,又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这首诗应该有另外一种解读。

第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涉及一些背景材料,先介绍一下。贺知章公元659年生于越州永兴(现在的杭州市萧山区),早年移居山阴(现在的绍兴市)。永兴、山阴同属越州,两地方言差别不大,不过贺知章的“乡音”应该是山阴话。他最晚是在695年36岁时到了首都长安,因为这一年他相继考中了进士、状元,然后当了官。根据诗中所写,他似乎在此之前更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但是我们没有查到相应的资料。从那年之后,贺知章一直在长安为官。直到744年,有一阵他忽然精神恍惚,体力不济,觉得干不动了,于是向皇上请求回家乡去当道士。唐玄宗知道他这么大了年纪了是要叶落归根,爽快地答应了他。然后。唐玄宗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率文武百官为他饯行,还专门为他写了诗,用“岂不惜贤达,其如高尚心”等语表示惜别和褒扬(《送贺知章归四明》)。这么说来,他这次回老家属于衣锦还乡,自是风光无限。他回到山阴,住在五云

收稿日期:2020-08-2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诗词的语言艺术原理及其历史生成机制研究”(18JZD021)

作者简介:黄理兵(1967—),男,湖北恩施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评价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现代汉语语法、唐诗鉴赏。

门外道士庄的千秋观,其实就是他们家的宅子改的。安顿下来之后,他写了《回乡偶书》二首。当年他就去世了,享年86岁(虚岁)——这没有什么遗憾的,在唐朝能够活到这个岁数,简直是个奇迹了。

第二句中的“乡音无改”是说自己的家乡话还很纯正。我们应该知道,口音是否纯正,自己根本没有发言权。口音要是变得不纯正了,自己是听不出来的;要是能听出来,不就自己纠正过来了吗?所以,在我看来,“乡音无改”这四个字,是贺知章跟老家亲戚朋友见了面之后,大家当面夸奖他说出来的。贺知章携家带口、荣归故里,家乡的官吏、宗亲、故旧想必会远道相迎,根本不可能出现他一个人孤零零到村头向几个小孩子问路的场景——就算问路也不应该问小孩子,贺知章活了八十多岁还不懂这个道理吗?只能是热热闹闹地抵达,亲亲热热地会面,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贺知章在外学习工作几十年,跟五湖四海、南腔北调的各路人等打交道,他可能会有意识地操共同语(汉语从先秦开始就有共同语了),或者受到各地同学、同事、朋友的影响,无意识地在他的方言之中混杂了外地口音。不过回到家乡之后,按照人之常情,他一定会尽量跟大家说家乡话。大家多半也会夸他乡音无改,以证明他没有忘本。可是实际情况却是,一个人少小离家,长期在外地谋生,乍回老家,他的家乡话肯定不那么地道了,老家人是听得出来的。所以,“乡音无改”并不是一个客观、公允、准确的评价,而是家乡亲友当着他的面恭维他时说的客套话。这话听着暖心,贺知章可以因此而自得,但是我们后世读者不可完全相信。

正因为是在这种场合,大家也会仔细端详他,然后谈论一下他的外貌。这时候依然要拣好听的说,比如“气色好,看上去哪像耄耋老人”。实际上,贺知章的外貌跟青少年时期离开家乡时相比,变化一定是相当巨大的,翩翩风度早已被龙钟的老态取代。但没人会说那么直接,那样就太不识趣了。这是在社交场合,大家不可能当着他的面实事求是地总结这几十年的岁月对他的外貌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只能避重就轻地说说鬓角的毛发。其实鬓毛多一点儿少点儿跟岁月没什么关系,有的人年纪轻轻就没多少鬓毛,而关羽的鬓毛是越年长越浓密。如果真的想表达“岁月不饶人”这个意思,人们大致会说:哎呀呀头发全白了,牙齿掉光了,口眼喎斜,皮肤皱褶,腰背佝偻,步履蹒跚,等等。考虑到这是写诗,那也应该写“面如灰”“目光呆”“顶毛秃”之类,而不是轻飘飘不得要领的一个“鬓毛衰”。所以,诗句中的“鬓毛衰”,应该是记录大家对他相貌变化的善意品评,而不是贺知章本人揽镜自视、顾影自怜。

第三、四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顺理成章的解释是:亲朋故旧纷纷赶来与贺知章见面,有的人是带着小儿孙来的;成人寒暄过后,有的人就会把带来的儿童从身后拽出来向贺知章请安,告诉孩子“这是你的太姥爷/表姑爷爷/舅曾祖父”之类;这孩子呢,按大人教的称呼恭恭敬敬地向贺知章行礼、问安,然后他还自由发挥了一下,面带笑容地问了一句:请问贵客,您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

我之所以提出这种解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那就是对于“相见”的理解。按照以往的解释,贺知章是走到村口见到了几个(或者一个)小孩子。实际上,这种“见到”,并不等于诗中所写的“相见”。“见到”是无计划的事件,是不期而遇。而“相见”是当事双方都主动参与的一种正式的社交活动。《礼记·王制》说:“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1]这里的“冠”即成人礼,“昏”即婚礼,“乡”包括乡饮酒和乡射。在古代,“相见”是与婚礼、丧葬礼、祭祀等同样重要的一种礼仪活动。相见的双方根据地位的不同,需要行各种不同的礼节,如趋、拜、拱手、作揖、唱喏、鞠躬、长跪,等等,还需要相互寒暄,问候对方家人。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相见的礼俗形式有所变化,“相见”一词的意思也越来越宽泛。在唐朝,这个词有时候也可以表示“看见、遇到”,比如薛能的诗歌《丁巳上元日放三雉》:“无心期尔报,相见莫惊飞。”这两句是诗人对放生的三只野鸡说:“我并没有期待你们的报答,只是希望你们以后见到我了不要惊恐飞走。”但是这样的例子极少(而且这个“相见”也可以解释成正式见面)。我们大致考察了一下隋唐五代的语料,发现多数情况下,“相见”并不表示“看见、遇到”,而是表示“互相见面”,尽管见面时礼节不一定有《礼记》时代的“相见”那么复杂。例如李白的《送贺宾客归越》(“贺宾客”就是贺知章,“归越”就是这次回山阴):

镜湖流水漾清波,
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
应写黄庭换白鹅。

王维的《崔九弟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

城隅一分手,几日还相见。
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杜荀鹤的《观棋》:

对面不相见,用心同用兵。

上例最能说明问题——下围棋的两个人对面坐着,他们不可能没有遇到对方,而只是省略了那些见面的礼节,直接在棋盘上捉对厮杀。

再如王定保的《唐摭言》:

昔辟阳侯欲与朱建相知，建不与相见。^[2]

《敦煌变文集》卷八《搜神记》：

女郎是谁家之女，姓何字谁，何时更来相见？^[3]

根据上面的分析，《回乡偶书》诗中写的这个亲友家的小孩子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儿童（也不排除是好几个，为了方便，我们按一个来说）。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虽然年幼，却既有教养又聪明。有教养指的是：他彬彬有礼，举止得体，大人教的那些与尊长相见的固定礼节他都顺利完成了；聪明指的是：除了固定的礼节，他还知道与贺知章拉家常，问他是从哪里来的。另一方面，他毕竟是个孩子，又有一些孩子独有的天真烂漫。他从来没见过贺知章，记不住大人对他的介绍，搞不清那么复杂的亲戚关系，不知道贺知章并非来走亲戚的客人，而是本地人叶落归根。他也听不懂大人们说“乡音无改”表明这位“客人”就是本地人，“鬓毛衰”表明他离开家乡很多年了，所以他提出的“客从何处来”这个问题的预设不成立，在当下的语境中并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好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大人们一阵错愕，随即又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贺知章在跟大家一起笑过之后，自然会对这个孩子连声夸赞。

可惜，这么多年来，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老年回乡的贺知章身上，而没有注意到贺知章在写自己回乡见闻的时候，以充满爱怜的笔墨，描写了这么一个资质非凡的小小少年。

读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提出疑问：照你这么一解释，诗中流露的那种久客伤老、反主为宾的微妙情绪哪去了？那种悲凉的美感哪里去了？

我的回答是：那种东西本来就没有。《回乡偶书》跟汉乐府民歌《十五从军征》不一样，自号“四明狂客”、嗜酒如命的贺知章是一个乐观旷达、心里充满阳光的人瑞。他在人生最成功的顶峰荣归故里，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他喜欢看到喜欢听到的，《回乡偶书》里面只有开心和满足，根本就没有任何悲凉。

二、我们是否懂王维：王维《酬张少府》

让我们说说王维的一首著名的五言律诗《酬张少府》。在我看来，很多人对这首诗有误读，我想解读一下。诗曰：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有几处文字我们先作些解释。“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是说：我看看自己也没什么大的本事，

只好回到原来隐居待过的林子。“松风吹解带”的“带”指的是衣带。“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是说：您问我关于仕途得失的道理？您听那渔歌声进入水边的深远处去了。

现在来看看人们对这首诗的误读。

第一，这首诗是写给什么人的？

大家都说这首诗是王维与朋友酬和而作，比如：

本诗题为“酬”张少府，便知是一首赠友诗，张少府应是王维的一位朋友，曾写诗与王维，因而王维写诗回赠。^[4]

在我看来，根据一个“酬”字就判断张少府是王维的朋友，并进一步断言对方也曾写诗给王维，这个根据不够充足。酬就是酬答、应对，“酬”的对象，可能是朋友，也可能只是一般的社交对象。至于王维以诗的形式来酬答，是否因为对方写了诗，那也不一定。王维是个诗人，对方写给王维的就算是一封普通书信，他也可能把回信写成诗。唐诗当中，题中有“酬”字的，酬答原因很多，对方可能先有赠诗，也可能是有来信，或赠送了礼物，甚至只是请教了什么问题，还有一些不明的原因。

张少府到底是什么人，很可惜我们查不到任何文献资料。有人猜测说张少府是张九龄，这首诗作于741年。这就不对了。张九龄比王维大20多岁，公元740年就去世了，享年62岁，这一年王维才40来岁，不属“晚年”；而且张九龄从来没当过少府。

我推测，这个姓张的少府多半不是王维的朋友。

少府就是县尉，在唐朝时属于基层公务员，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唐朝也有不少名人是从县尉干起（如白居易、柳宗元），也有不少名人曾经被贬官当了县尉（如温庭筠、王昌龄、刘长卿、元稹）。王维曾经担任过吏部给事中、尚书右丞，相当于省部级领导。在他面前，县尉只是一个区区小吏，晚年半官半隐的王维没什么必要去跟他来往，除非他俩原来就是好友。醉心于“山月照弹琴”“深林人不知”的王维，不会热衷于结交太多的朋友，尤其是对王维的志趣完全不了解，开口闭口要谈穷通之理的朋友。所以，这个张少府并不是王维的朋友，两人没有深交。他给王维写信或者写诗（写诗的可能要小一些），问了一些问题，王维出于礼貌写了这么一首诗作为回复。由于王维太有才了，就这么一个回复，就成了文学史上的佳作。

第二，张少府问了王维什么问题？

诗的字面上只谈到一问：“君问穷通理。”很多人以为张少府只问这一个问题。其实张问了很多，“穷通理”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但王维并没有如实说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是语带机锋，如同偈语。

既然如此闪烁其词,惜字如金,就不可能还需要前面先写六句作为铺垫,唠唠叨叨白送这么些废话。所以我认为,张问了很多问题,王诗的前面六句是用来回答张的其他问题。整首诗都是答语,并非王维主动说起;但却写得飘逸跳脱,散淡不羁,显得王维的态度并非十分严谨有耐心。

张提出的很多问题在王维眼里都毫无价值。他懒得回答,就推说自己上了年纪,不爱凑热闹,你提到的那些人和事我都不关心、不了解、不清楚。“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这两句不咸不淡,不冷不热,把少不更事的张少府用来活跃气氛、联络感情的八卦问题全都挡了回去。

为了能赢得王维的好感,尽快地熟络起来,张应该还恭维过王维。王维这个人什么人没见过,什么话没听过,就不爱听不熟悉的人拍自己的马屁。所以他说:“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这两句把自己说得既没本事又没见识,根本一无是处,张的那些恭维全都成了自讨没趣。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这两句也是针对张提出的某些问题,但我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两句写得很通脱,不像是针对任何问题的正面回答。张可能邀请王维去县城热闹的地方玩几天,还可能提议说:听说你弹琴弹得不错,我打算把我们县里几个著名的古琴表演艺术家召集到一起开个会,你也来参加吧,大家交流切磋一下,以琴会友。王维对张的这些问题已经有些反感了,所以他说,我弹琴不需要有听众,只喜欢自己在山中月光下弹着玩;而且我过得很自在,你看我一个人在松树林中,穿衣服也不仔细系衣带,一阵风吹来就把我的衣服掀开了……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没什么更多好说的了,所以王维直接说破:至于您最关心的穷困与通达的道理,这个嘛,呵呵,水岸深处的渔歌替我回答你了。

最后这句话相当于卖了一个关子,因为他说到渔歌,有点像是答非所问。不过,张少府只要不是太笨,就应该知道王维多半是在用屈原的一段故事来点化他。《楚辞·渔父》中有这样几句:“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在这个故事中,渔父曾经劝屈原随遇而安、随波逐流来着(也不知道是真劝还是假意试探),结果屈原不肯,渔父就呵呵一笑,不再劝他,一边唱着歌一边划船走了。渔父给了屈原一个笑而不语,王维用这个典故,意思也是笑而不语。

第三,王维在这首诗里面表现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有人说他表面上万事不关心,显得很达观,实际上却有一些不满甚至苦闷。比如:

实际上,不是我无长策,而是我之长策不能为世所用,有志不获聘,也就只好“返旧林”隐居了。这里显然有着壮志难酬的苦闷和牢骚……王维不仅自己企图避世,而且劝张少府归隐,这种逃避现实、洁身自好的思想,无疑是消极的软弱的表现。^[5]

在我看来,这么去解释王维,是根本没有理解王维。王维的心理调适能力很强,就算他真的遇到什么不顺,他也总有办法去寻找平衡,不会有那么多苦闷牢骚。更何况一个消极软弱、逃避现实的人,不会有兴趣劝说别人跟他一样消极软弱、逃避现实。

满不是那么回事。晚年的王维就是一个万事看淡、行止由心的老知识分子,他早就参禅悟道、见性成佛,所以才被后人称为“诗佛”。壮志难酬、苦闷牢骚,这些俗世的执念,不应该在王维身上找。

这首诗里面,只有遮掩不住的高冷。

首联,有些鄙夷。颌联,有些冷淡。接下来的颈联,稍微有点轻慢。但尾联又往回收了点儿,看似故作高深,实则倒有一丁点儿温暖。为什么这么说呢?毕竟直接引用了张本人提出的问题,后面的答案虽说是闪烁其词、答非所问,但也可看作是一种略带悲悯的棒喝,就像菩提老祖在孙悟空头上敲的那三下,能让他受宠若惊,若他有慧根,也能就此顿悟。

上面三个问题,讨论的都是现代人对王维这首诗的误读。出现这些误读,主要是由于人们不仔细分析和推敲文本,很多理解都是出于想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古代那些读懂了王维的人,没有好好把诗解释清楚,害得我们胡乱理解。

比如明代李沂如此评价这首诗:“意思闲畅,笔端高妙,此是右丞第一等诗,不当于一字一句求之。”^[6]你既然知道这是第一等,它到底好在哪里,你为什么不一字一句地解释清楚呢?

又比如,明代的钟惺跟谭元春合编了一部《唐诗归》,在点评这首诗时,谭元春说的是:“妙绝。”^[7]这哪里像是点评?不过是最简单的点赞,而不是评论。钟惺多写了几个字,他写的是:“妙在酬答,只似一首闲居诗,然右丞庙堂诗亦皆是闲居。”^[7]这也让大家不得要领。

有意思的是,钟惺的点评,后来有明末清初唐汝询的跟帖,是跟他叫板的。唐汝询在《汇编唐诗十集》中说:“庙堂酬答亦多不切闲居者,钟自不采耳。”^[8]

明朝这几位先生,只说这首诗好,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它怎么个好法。至于清朝黄周星,他说的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可解不可解,正是妙处。”^[9]我怀疑黄周星是王维的脑残粉,他根本就没读懂这首诗嘛——凡说“可解不可解”的,应多是自己解释不清楚。

三、隐士出悖论：关于归隐的口是心非

有一种东西，你不说，它在；你一说，它就没了。这种东西，叫作“沉默”。

这是一个悖论：它在，你不能说，可是你不说，别人又怎么知道它在？当你提醒别人注意它，或者想证明它的存在时，你需要说话，而你一说话，它就不在了。

有一种人，和沉默类似，那就是“隐士”。

隐士都是本事很大的人，一般都是士人。但是他们要躲起来，不在社会上招摇，以免爱才的明君或者野心家请他们当大臣或者当谋士。你要真的躲得好，人们就不知道你是个隐士，也就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本事，那就没法证明你是个隐士了。你既然躲着，又想让别人知道你本事大，那就不是真躲，也就不算真的隐士。所以，你躲得好不算隐士，躲得不好更不是隐士。

这就是隐士的悖论：凡是真正的隐士，我们都不知道他；凡是我们知道的，都不是真正的隐士。

要当真隐士，其实是很寂寞的，一般人都不愿意真的得到那个结果。但是有本事的人又太多，千军万马都想通过科举考试这个独木桥去谋功名，竞争激烈、残酷。那么，当隐士也算别出心裁，另辟蹊径，所以被人们称为“终南捷径”。可以推知，隐士这个群体当中，有不少人其实是待价而沽、口是心非的，他们并非真的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

大诗人李白就有点口是心非。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下这样的豪言壮语：

别君去兮何时还？
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就让人误以为他跟陶渊明一样，原本在官场上并没有多大的追求，只想挣钱养家糊口，一旦发现还需要在上级面前低眉顺目，立马就下决心丢下那五斗米归去来兮，彻底断了升官发财的念想。

事实上，李白并不是这样洁净的人，他一直想当官。刚开始，他向本州地方官自荐，被拒。随即去投靠宰相，并想办法巴结宰相的儿子，结果又没成功，这才跑到终南山去“隐居”。隐居中，他还隔三岔五地去拜访各种权贵望族，但都没听见个响声。隐居这条路没走通，他又跑到长安，却同样没有任何机会，于是自暴自弃，成了一个问题青年。年岁渐长，变成了问题中年。然后，他又在都市和乡下折腾了好几次，直到后来找机会向玉真公主献了一首拍马屁的诗，并且滴水穿石，接近了贺知章。获得公主和

贺知章的推荐，他才有了命运的转机。当他终于得到人生中第一次当官的机会时，他手舞足蹈，轻薄张狂，却说自己的老婆跟汉代朱买臣的蠢婆娘一样，看不出自己的丈夫是晚成之大器，因此李白很快丢下她，去都城长安实现自己的大唐梦：

会稽愚妇轻买臣，
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李白毕竟是诗仙，本事大，本事大的人有更多理由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包容，因此也就往往我行我素，言行乖张。

我们再来看看那些低调诗人的作品。

王维、孟浩然是唐代两位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们的诗中都描写了田园隐居生活的闲适、自得。孟浩然一辈子没当官，可以说一直都在隐居。他的《过故人庄》有陶渊明的遗风：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但是孟浩然并不是心甘情愿当隐士。他一直想入仕，只是运气比李白差，一次也没成功而已。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后面四句，证明了他希望得到当权者的特殊照顾，走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王维跟孟浩然不同。他总是有各种机会当官，只是在当官的间隙有些隐居的经历。这或许正好解释了，隐士就是候任的官员，官员就是跳槽的隐士。不过王维的那些反映隐居生活的诗，还真的有淡泊宁静、远离尘世喧嚣的感觉。明朝胡应麟特别推崇王维的下面两首诗，说它们“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一是《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一是《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我喜欢孟浩然、王维的诗，佩服他们的才能，但我不同意胡应麟对王维的盲目拔高。他推崇的这两首诗，的确写得非常好，但要说是“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还真不是那么回事。真的要忘掉，要沉寂的话，就不应该在写纯自然景观的时候，对“人”

念念不忘。哪怕“人闲”只是一个背景，一个坐标，哪怕诗中说的是“无人”，但毕竟，提到什么，就说明心中有什么。他的另外两首代表作也有同样的问题。一首是《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第二首是《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这两首诗实际上暴露了王维的心理，并不是那么四大皆空，了无挂碍。虽然眼前空无人，可是耳朵里人声扰攘；虽然独坐而弹琴，实际上却操心着没有听众欣赏这琴声。深夜长啸，莫非也是为了让空山中那个不见之人能够“但闻”一下？

有人夸王维的诗有禅意。的确是有。但只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神秀）的境界，还没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的最高境界。要做真的隐士，可弹琴，可长啸，但不要有表演欲，不要有舞台感，不要假想着听众。

话说回来，王维虽然没达到最高境界，却也轻灵飘逸，有神仙气。刘长卿的两首诗就要重浊一些。一首是《听弹琴》：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你自爱古调，这是多高的境界！可是你何必惦记别人弹不弹？一下子把境界降下来了。

另一首是《送上人》：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

莫买沃州山，时人已知处。

这后一首好像是刘长卿看出了我们提到的这个悖论，所以拿它来提醒或者揶揄他送别的“上人”。但在我看来，上人未必有凡心，倒是刘长卿凡心太重，暴露了自己：左一个“人间”，右一个“时人”，一首诗二十个字，“人”倒占了两个；上人来去自如，随处可隐，就像老和尚虽有戒律，却可以坦然背妇女过河，过了河就放下；倒是你这个小小和尚，身体不近女色，心里却一直惦记着，离河几十里了还在琢磨师傅做得对不对。难怪你当不了上人。“看破不说破”，刘长卿看起来是说破了隐士的悖论，但他“说破”的方式过于直白粗浅，使得我们怀疑他本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看破”。

参考文献：

- [1]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上)[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35.
- [2] 王定保. 唐摭言[C].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31.
- [3] 王重民, 王庆菽, 向达, 等. 搜神记[C]//敦煌变文集(下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873.
- [4] 唐国忠. 自我的度化[J]. 名作欣赏, 2007(9).
- [5] 张忠纲. “词不迫切而味甚长”: 王维《酬张少府》赏析[J]. 文史知识, 1994(12).
- [6] 李沂. 唐诗援[C]. 刻本. 1632(明崇祯五年).
- [7] 钟惺, 谭元春. 唐诗归[C]//诗归.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 [8] 唐汝询. 汇编唐诗十集[C]. 刻本. 1623(明天启三年).
- [9] 黄周星. 唐诗快[C]. 刻本. 1693(清康熙三十二年).

(责任编辑 刘海燕)

Looking for the Truth of Tang Poetry in Historical Context

——Take He Zhizhang's *Return to Hometown*, Wang Wei's *Reply to Zhang Shaofu* and Others as Examples

HUANG Libing

(EP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First, According to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He Zhizhang's *Return to Hometown*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xiangjia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oet was with honor in returning to his hometown, and the “child” saluted him on formal occasions. There is no sadness in the poem, only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Second, in Wang Wei's *Reply to Zhang Shaofu*, Zhang Shaofu may not be Wang Wei's friend. He has asked Wang Wei a lot of questions. The poem answers these questions one by one. There were no complaining and depressing thoughts in the poem, but only arrogance and indifference, which was in line with Wang Wei's “Poet Buddha” mentality in his later years. Third, based on the poems of Li Bai, Meng Haoran, Wang Wei, Liu Zhangq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radox of the “hermits” theme, and holds that the real hermit can not be understood by people through language.

Key words: historical situation; the truth of Tang Poetry; *Return to Hometown*; *Reply to Zhang Shaofu*; hermit

试论道具在《长生殿》结构线索中的叙事功能

张 为

(中央戏剧学院 戏剧文学系, 北京 102209)

摘 要:在《长生殿》爱情与政治双线并行的叙事架构中,道具在其间起着诸多叙事功能。在爱情线中,道具起着引发情感、穿针引线、情节铺垫、串联剧情、丰富意境、前后照应等诸多叙事功能。在政治线中,道具起着“戏眼”的作用,戏本中政治讽谏方面的艺术叙事,都是通过道具实现的。

关键词:《长生殿》;结构线索;道具;叙事功能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03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17-04

清人梁清标称《长生殿》“乃一部闹热《牡丹亭》”^{[1]13},洪昇引为知己之言。这是因为《牡丹亭》重抒情轻叙事,人物少、情节简单,因而显得相对寂寥。《长生殿》则不然,该剧以事彰情,抒情、叙事并重,篇幅宏大,情节丰富,通过明、暗两条线索叙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长生殿》的“闹热”是通过何种叙事方式实现的?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让《长生殿》“闹热”起来的秘密便是人们习焉不察的“道具”;洪昇在剧中通过多种道具来关联人物、掌控情节,从而使《长生殿》的叙事容量得以扩充、情节得以丰富、剧情得以“闹热”。

一、道具在爱情线中的叙事功能

《长生殿》第1出《传概》发明题旨,谓“臣忠子孝,总由情至”,是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作为全剧的明线,也是主线。这一主线主要是由部分道具来贯穿的。明清传奇篇幅较长,欲使剧本结构完整,头绪清晰,“密针线”就显得尤为重要。李渔提出“编戏有如裁衣”,把诸多片段串联“全在针线紧密”^{[2]26}。《长生殿》的针线就是道具,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长生殿》对道具的使用频率之高,在其回目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如《献发》的“头发”、《进果》的“荔枝”、《哭像》的“雕像”、《看袜》的“袜子”等。此外,故事中还有许多有头有尾,前后互相照应的道

具线索,如《舞盘》《尸解》《改葬》中杨贵妃的香囊、《偷曲》《骂贼》《弹词》中雷海青、李龟年的琵琶。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又被称为“钗盒情缘”,《长生殿》更是把体现女性用物特征的“钗盒”作为贯穿全剧始终的道具。唐明皇在第2出《定情》的结尾,以“金钗钿盒”相赠杨贵妃,情因此而起,亦因此而定。在此后的戏中,钗盒在杨贵妃生前以明线形式出现过两次,一是第19出《絮阁》,一是第25出《埋玉》。在《絮阁》中,唐明皇幽会私幸梅妃江采萍,杨贵妃对此醋意大发,伤心哭泣;唐明皇顾左右而言他,企图蒙混过去。杨贵妃以退为进,表示愿退出情场,并把自己当初与唐明皇定情时明皇所赠钗、盒奉还于他:“这钗、盒是陛下定情时所赐,今日将来交还陛下。把、把、把、把深情蜜意从头缴。”^{[3]85}唐明皇见状立刻道歉认错,并请杨贵妃收回定情信物,矛盾至此得以解决。在《埋玉》一出结尾,六军兵变,杀死杨国忠,逼迫唐明皇赐死杨贵妃,唐明皇对此痛不欲生,只能迁怒于物,怪“钗和盒,是祸根芽”。

“钗盒”道具在《长生殿》中不仅是化解唐明皇、杨贵妃矛盾的中介,还是二人爱情故事走向高潮(第22出《密誓》)的情感引线。在《密誓》这出戏中,钗盒虽然没有以道具的方式出现,却通过杨贵妃所唱“愿钗盒情缘长久订”^{[3]96},与第2出《定情》所

收稿日期:2020-08-10

作者简介:张为(1997—),男,河南商丘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戏曲史论。

唱“惟愿取情似金坚，钗不单分盒永完”^{[3]9}遥相呼应，仍然起到了结构上穿针引线的作用。

按常理，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的“情缘”故事在杨贵妃殒命后便应结束，但洪昇为了表达二人爱情之深，继续以“钗盒”这一道具安排剧情、布置角色、选择宫调，从而使二人情缘从人间延续至天界，使剧情扩大了一倍却又情节紧凑，令人不觉其长。例如在第40出《仙忆》中，杨贵妃在仙界再次取出了钗盒，感叹：“死和生割不断情肠绊，空堆积恨如山。他那里思牵旧缘愁不了，俺这里泪滴残魂血未干。空嗟叹。〔三学士〕不成比目先遭难，拆鸳鸯甚仙班。（出钗盒看介）看了这金钗钿盒情犹在，早难道地久天长盟竟寒。〔急三枪〕何时得，青鸾便，把缘重续，人重会，两下诉愁烦！”^{[3]175}

此时的杨贵妃已经升入天界，位列仙班，但她仍对旧日情感念念不忘。在第47出《补恨》中，杨贵妃与织女说起自己的尘世情缘，无论如何也无法“忘得定情钗盒那根节”，并拿出金钗、钿盒给织女看，说自把它们“携入蓬莱，朝夕佩玩，思量再续前缘”，强调自己虽已成仙，却“梦不离唐宫阙，千回万转情难灭”，“倘得情丝再续，情愿滴下仙班”，“又何惜人间再受罚折”^{[3]204}。这就将杨贵妃的痴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长生殿》演出使用的道具之中，“钗盒”起到了“主道具”的作用：毕竟该剧的创作主旨是“钗盒情缘”，因而“钗盒”在全剧剧情叙事中贯穿始终。除了前面提到的数出戏，其他如27出《冥追》、第30出《情悔》、第32出《哭像》、第37出《尸解》、第40出《仙忆》、第41出《见月》、第43出《改葬》、第47出《补恨》、第48出《寄情》、第49出《得信》、第50出《重圆》等剧中，也曾出现或通过人物之口反复提及。仅从次数而言，钗、盒二物在杨贵妃死后出现的频率高于其生前，其联通故事、勾串情节的作用十分明显：睹物则必思人，人虽逝而物不能空。

在爱情线中，同样体现女性用物特征的香囊的叙事作用也不容小觑。在第16出《舞盘》的结尾，李隆基为表示对杨贵妃霓裳羽衣曲舞的赞赏，将自己佩带的“瑞龙脑八宝锦香囊”赠之。在第37出《尸解》结尾，杨贵妃面对自己肉身尸解，想到以后明皇回銮对之改葬须有信物，遂将胸前所佩香囊解下交与土地神，嘱其“放在冢内”。第43出《改葬》，唐明皇“回銮”至此，果然要为杨贵妃改葬，因杨贵妃肉体尸解飞升，挖开的坟墓仅剩一个香囊，唐明皇伤悼不已，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将香囊裹以珠襦依礼安葬。香囊的叙事功能至此并未结束，因为该出戏

中香囊的出现引发了新的故事情节：面对没有受被尸解仪式影响的香囊，唐明皇认定杨贵妃已经飞升成仙，接下来第46出《觅魂》中临邛道士杨通幽的出现便顺理成章，并为故事尾声作了合理铺垫。

《长生殿》中，对唐明皇感情的叙事，也同样通过运用相关的道具来表现。较早使用道具表现唐明皇感情的是第29出《闻铃》中的铃铎。在《闻铃》中，唐明皇行至剑阁，凄风苦雨和着檐前铃铎高响低鸣，令他顿感情恸心惊，而他“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的唱词，更是让人觉得肝肠寸断。洪昇的好友吴舒凫对此点评说：“缠绵哀怨，一往而深，又应转铃声，点染阁道，凄然欲绝。”^{[4]697}单是一出“闻铃”，还不足以显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一往情深，故而该剧在第32出《哭像》中以木像道具为中介，进一步表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悼之情。在《哭像》一出中，唐明皇因十分思念杨贵妃，选名匠为杨贵妃制作一尊木像，迎进宫中，由此演绎出“迎像”与“哭像”两部分剧情。“迎像”部分通过唐明皇唱词，表达其受不住变兵被迫敕杀爱妃的“悔恨”；“哭像”部分通过唐明皇唱词，突出其对杨贵妃始终难以割舍的思念之情。

“木像”道具在《长生殿》情节叙事中的作用有诸多方面。首先，杨贵妃在马嵬坡自缢后，其在鬼、仙两界的剧情要靠木像联结推动——毕竟鬼神难测，虚者须以实者来表现，否则剧情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其次，若无木像这一实体道具，唐明皇的一往情深就无法得到更深层次的表现；而有了木像这个道具，情节展开就有了依托，许多故事就可以劈空结撰。比如杨贵妃感明皇情感之诚，就让木像“流出泪来”“满面泪痕”作为回应，从而使剧情变得摇曳生姿。洪昇的好友吴舒凫（吴人）在评价木像在剧情叙事中的作用时写道：“木人下泪最妙，若无此一番情感，则一块顽香叫呼不应，了无意致矣。”^{[4]705-706}

洪昇让剧中“木像”落泪实有深意在焉：木像而能落泪，这不但验证了前人所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古话，而且在情节上与第1出《传概》中的“感金石，回天地”相照应，这就使得全剧虽然绵长却又不枝蔓。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哭像》一出中的“木像”道具在剧情叙事中的作用绝对不低于金钗钿盒。

二、道具在政治线中的讽谏作用

《长生殿》明写男女之情，实则写忠孝之义，其写作目标不是向世人展示娱乐意义上的男欢女爱，而是“垂戒来世”的政治和伦理目标。与“情缘”这条主线相比，“政事”是该剧组织剧情的副线。这条副线同样是由一应道具支撑着，比如该剧的主道具

钗、盒，戏本一方面用它们作为表达唐明皇和杨贵妃之间情感的介质，另一方面又用它们暗示相关的政治评价。例如在第30出《情悔》中，杨贵妃魂游故地，看到自己的陪葬品，感慨万千，一方面悲悼“生遭惨毒，死抱沉冤”，另一方面也反思自己“在生所为，那一桩不是罪案。况且弟兄姊妹，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总皆由我，如何忏悔得尽”^{[3]131}，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唐玄宗当政时“开元盛世”光鲜的外表下，权贵阶层特权横行、无恶不作的腐败一面。就政治伦理而言，这样的剧情无疑具有政治讽谏作用。

在《长生殿》剧本中，有关政治讽谏的具体回目有很多，如《疑讖》《进果》《献饭》《看袜》《弹词》等出。从上述回目的标题上看，“果”“饭”“袜”等道具都是剧中的戏眼，戏本中相关的政治小插曲，均是通过道具展开叙述的。

第15出《进果》就内容来说显然并非表现“果”，因为作为贡品的鲜果荔枝并没有像钗盒、木像那样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只是有“末扮使臣持竿、挑荔枝篮，作鞭马急上”“副净扮使臣持荔枝篮、鞭马急上”的舞台说明。在表演处理上，此出戏以道具“果篮”代替了实物水果“荔枝”，这表明“进果”一出中“果”——荔枝的实际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为该出戏的目的不是以水果为中介表现男欢女爱，而是为了通过水果进贡行为寄托政治讽谏寓意。在这种情况下，代替荔枝存在的果篮道具与并未实际出现的荔枝共同成为引导剧情发展的符号化存在，作者通过果篮这种符号化的道具，明表唐明皇过度宠幸杨贵妃，暗讽最高统治者穷奢极侈。吴舒凫点评本出戏时说：“此折备写贡使之劳，驿骚之苦，并伤残人命，蹂躏田禾，以见一骑红尘，足为千古炯戒。”^{[4]651}可谓一语中的。

《进果》这出戏，李、杨之爱其线为“明”，其情为“虚”；极权弊政之线为“暗”，其理为“实”。换句话说，贡果荔枝在戏中作为一个非实存的象征性道具，其作用就是调动人马表演进贡贡果的情节，并让观众由此情节的艰辛了解统治者如何穷奢极欲、靡费民力，进而让人们理解何以在“盛世”之景下会爆发“安史之乱”那样的政治危机。洪昇将此出安排在《偷曲》之后、《舞盘》之前，一曲霓裳羽衣的背后，有着十分令人心酸的场景，足见作者在戏剧结构安排上的苦心孤诣。

与《进果》相映成趣的是《献饭》一出。这两出的道具都是吃的东西，前者是宫廷权贵喜食的远方水果，后者是底层百姓聊以果腹的粗粝，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故事讲述野老郭从谨为习惯了锦衣玉食的

皇帝进献民间食物，并向皇帝表达了民间对于安史之乱的看法，字字针砭，令人深感其痛：“那杨国忠呵，【前腔】〔换头〕猖狂，倚恃国亲，纳贿招权，流毒天壤。他与安禄山，十年构畔，一旦里兵戈起自渔阳。”^{[3]116}

听罢郭从谨的一番话后，唐明皇幡然醒悟，检讨政事过失，安抚众军。在洪昇所处的时代，文字狱开始盛行，知识分子对政治发表意见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利用艺术再现历史往事，借批评历史人物影射现实，既降低了相应的政治风险，又能达政治讽谏之意。

吃、穿是人日常生活中最为常态的因素，与“吃”相对的自然是“穿”，因此，洪昇在剧情设计中，把杨贵妃所穿的“袜子”作为道具看点十分合乎情理。以“袜子”而不是衣服或头巾作为道具，是因为作者想以此暗示统治者的奢侈用品不过是“遗臭”之物，不值得追求。

《看袜》一出主要讲述马嵬坡下一个开酒店的老太太王嬷嬷，在驿站梨树之下拾得杨贵妃的一只锦袜，远近人家听说此事的，都来店中喝酒，趁机要求看袜。该出戏安排了三个看客，分别代表三种类型的人（有闲阶层、底层民众、出世之人），他们因生活处境不同，对袜子的看法在价值取向上也大相径庭。

京城士子李谟，听说马嵬坡下王嬷嬷的酒店中藏有贵妃锦袜一只，出于好奇前来求观。士子衣食无忧，闲极无聊，自然四处寻找刺激；所以李谟看到贵妃遗袜后竟觉“光艳犹存，异香未散。真非人间之物”，并由此生出怜香惜玉之叹：“可惜了绝代佳人绝代冤，空留得千古芳踪千古传。”^{[3]154}

老农郭从谨对士子求袜观看很是不解，甚至感到愤怒，直言“官人，看他则甚！我想天宝皇帝，只为宠爱了贵妃娘娘，朝欢暮乐，弄坏朝纲。致使干戈四起，生民涂炭。老汉残年向尽，遭此乱离。今日见了这锦袜，好不痛恨”，并由此袜主人与明皇享乐无度“惹非灾，万民遭害”、令人“痛哀”，斥责“这样遗臭之物，要他何用？”^{[3]156}

金陵道姑观看此袜后生出物是人非、人生无常之感：“你看琐翠钩红，叶子花儿犹自工。不见双趺莹，一只留孤凤。空流落，恨何穷。马嵬残梦，倾国倾城，幻影成何用。莫对残丝忆旧踪，须信繁华逐晓风。”^{[3]156}

从全剧内容来看，袜子道具引发的三种看法之中，后两者是重点，也是该剧的寓意所在。作者以锦袜为引线，借老农之口，指斥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为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给民众带来不幸和痛苦，并借道姑之口告诫后世统治者：过度享乐不过是黄粱一梦、人生幻影，实在毫无意义。

现代戏剧理论认为,舞台道具“具有极强的意指功能”^[5],中国古代剧作家已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骂贼》《弹词》两出,作者安排了雷海青与李龟年携带同样的琵琶道具出场,从时间上看,两出都系安史之乱所引发马嵬兵变之后发生,但戏剧情境不尽相同,琵琶的意指也不尽相同。《骂贼》写雷海青在凝碧池大宴中痛斥安禄山,并向其怒掷琵琶,其后惨遭杀害。《弹词》写李龟年流落江南,于青溪鹫峰寺抱琵琶卖艺,将李杨爱情故事以弹词的形式唱出。

雷海青之琵琶的意指是一种激愤的情感,也象征着他梨园乐工的身份。身为梨园乐工,看到满朝文武向安禄山卑躬屈膝,不甘与之同流合污。他的定场诗末两句是“纲常留在梨园内,那惜伶公命一条”^{[1]70},彰显了他必死的志向与决心;中间又唱道“但得纲常无缺,须眉无愧,便九死也心甘”^{[1]71}。值得注意的是,纵览全剧,“纲常”二字仅出现两次,全在雷海青的唱念之中。面对统治秩序的崩塌,雷海青主动担负起了重整纲常的责任。在该剧当中,以郭子仪为代表的武官队伍以军事力量努力恢复纲常,文官队伍却缺少一位像“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英雄形象。尽管他将琵琶砸向贼首安禄山的行为无异于飞蛾扑火,但这一举动无疑弥补了文官队伍中无人作为的缺失。雷海青身为乐工,却能有“可不枉了戴发含牙人是俺”^{[1]71}的觉悟,四伪官在雷海青死后却评价他“一个忠臣值甚钱,未戴乌纱见识浅”^{[1]73},不光加重了雷海青身死的悲剧意义,也是对座中头戴乌纱的文官无能、无忠、无义的一种讽刺。

李龟年之琵琶的意指是一种凄怆悲凉的情感,象征着天宝遗事亲历者的身份。《弹词》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南吕·一枝花〕中唱道:“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1]96}吴人专就琵琶这一乐器

用了一处有趣的类比,“美人之镜,侠客之剑,伶公之琵琶,于失意时留得,尚可抵一知己”^{[1]97}。毫无疑问,此时失意的李龟年已然不是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乐工李龟年,唐王朝的衰落直接影响到了李龟年的个人命运。李龟年抱琵琶,从李、杨初识唱到长安满目疮痍,蕴个人命运无常于对时代的慨叹之中。洪昇特别安插了李谟这一形象与李龟年进行问答,在〔九转〕中,一句“这琵琶曾供奉开元皇帝”揭示了李龟年作为亲历者的身份,其后李谟反复追问李龟年姓甚名谁,猜到雷海青时,李龟年表示否定:“我虽是弄琵琶却不姓雷,他呵骂逆贼久已身死名垂。”吴人认为:“雷老独标其骂贼事,是史家笔法。”^{[1]100}其实这不仅是史家笔法,也是对使用同一种乐器的雷海青的一种回应,暗示着两种琵琶的不同意指。

梁廷柟在《藤花亭曲话》中对《长生殿》评价甚高,尤其是谈及《弹词》一出:“读至弹词第六、七、八、九转,铁拨琵琶,悲凉慷慨,字字倾珠落玉而出,虽铁石人能不为之断肠,不为之下泪!笔墨之妙,其感人一至于此,真观止矣!”^{[6]406}吴人则把雷海青比作击筑刺秦的高渐离,认为其烈性千古足矣。二人琵琶同为讽刺,犯而不犯,是非常微妙的道具使用手法。

参考文献:

- [1] 洪昇. 长生殿[M]. 吴人, 评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2] 李渔. 闲情偶寄[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3] 洪昇. 长生殿[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 [4] 王季思.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 [5] 胡妙胜. 演剧符号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6] 梁廷柟. 藤花亭曲话[C]// 陈多, 叶长海. 中国历代剧论选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刘海燕)

On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Props in the Structural Clue of *The Palace of Longevity*

ZHANG Wei

(Department of Drama Literature,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Beijing 102209, China)

Abstract: I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love and politics in *The Palace of Longevity*, props play many narrative functions. In the part of love story, props play roles in arousing emotion and stabilizing the structure. In the part of political story, props play the role of “drama core”, the artistic narration of political satire and admonition in the play is realized through props.

Key words: *The Palace of Longevity*; structural clues; props; narrative function

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效应研究

张艳平

(黄淮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以河南省2002—2018年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为例,借助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度系数,研究了河南省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问题。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效率对金融发展水平的贡献尤为突出,产业结构高效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高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河南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较高,但耦合协调度在逐步下降,近两年呈现勉强协调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其一,金融发展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由规模拉动向效率拉动转变的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求;其二,对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发投入不足。未来应关注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匹配状况,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供给结构的多样化,通过加大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高级化和高效化进程。

关键词: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04

中图分类号:F269.24;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21-06

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经济增速减缓的新形势下,中央适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任务。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则是顺利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和重要手段之一。在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过程中,金融通过两种途径作用于实体经济:一是促进资本积累,扩张产业规模;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部门效率。依据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发展需经历由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再到创新驱动的三个阶段。对我国而言,目前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过渡阶段,这就更需要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支持服务,以激发潜在的技术研发要素,进而实现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壮大,金融化程度逐步提高,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业发展初期,金融为其提供了规模扩张所需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随着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转为效率驱动、再到创新

驱动时,需要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支持,如果此时的金融支持依旧停留在规模扩张上,就不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导致产业升级速度减缓。因此,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需是否相匹配,是影响金融支持效果的关键所在。当前研究两者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可全面把握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为调整和完善金融政策进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对金融业相对落后的河南省而言,这一研究主题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金融支持和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主题。普遍的观点认为:金融通过改变居民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调整其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通过对融资渠道的创新和资本的动态配置,实现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低效益产业向高效益产业转移和集中,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

收稿日期:2020-08-17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研究”(18A630036);2017年度河南省教育厅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2017GGJS173);2017年度黄淮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2017HHGG12);2020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2400410079)

作者简介:张艳平(1978—),女,河南孟州人,博士,黄淮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投融资研究。

金融支持,金融要不断创新,特别是融资渠道的创新才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一部分研究集中在探讨金融支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拉动或者抑制,效应高还是低,并在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完善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的对策及建议。这部分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诸如孙秀梅、蔡继虎^[1](2015),黄蓉^[2](2013),李剑^[3](2013)。

一部分研究考察了金融、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的区域效应。田地^[4](2017)分析了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对经济增长互动的内在机制,并从区域角度总结了三者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利用我国31个省份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借助一般经济模型,剖析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化原因。研究认为三者尚未形成高效稳定的内在机制,与东部相比,中西部的传导机制不够畅通,金融体系亟待完善。习羿晖、段新锋、刘振^[5](2016)构建了中部六省1994—2013年的PVAR模型,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一部分研究基于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两者的协调视角展开。郭露、丁峰^[6](2015)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比较了该区16个地市产业结构与金融支持的协调程度,研究认为区域间的分异情况较为明显。刘沛、韦菲^[7](2017)则以广东省为例,研究了相同的问题。吴爱东、刘东阁^[8](2018)也从协调视角研究了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问题,研究表明,当前两者的协调度较低,提升金融支持效应的关键是寻找两者良性互动的路径。魏丽莉、杨颖^[9](2019)以西北地区为样本,从时间和空间两维度研究了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西北地区的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从拮抗阶段逐步转向磨合阶段,耦合程度也从中度向高度转变,而两者的耦合程度尚处于较低水平。贾洪文等^[10](2019)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减贫效应三者之间的发展状况,实证结果显示,样本区域耦合关联度较低,属于中度失调衰退状态。范文祥等^[11](2019)则剖析了影响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阶段性最优耦合的因素,研究发现高新技术研发企业比率、市场经营环境优劣度等因素对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耦合性具有差异性影响。

上述研究结果大部分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程度较低,说明两者之间需要优化完善,同时几乎没有研究以河南省为样本。基于上述考虑,同时鉴于两者协调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过程中的重要性,本文将立足河南现状,定量研究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以便于清楚把握金融与产业结构

升级两者之间的现状,为进一步实现两者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一)模型构建

1. 耦合度模型

为清楚反映金融支持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需要构建两者的数量模型。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借用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的定义以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对包含金融支持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系统而言,相应的耦合度模型可构建为:

$$C = 2 \sqrt{U_1 \times U_2} / (U_1 + U_2) \quad (1)$$

其中, C 为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 U_1 表示金融支持系统的贡献函数, U_2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系统的贡献函数。

2. 耦合协调度系数

耦合度在一定程度上衡量金融支持系统与产业结构升级系统的耦合程度,但要测度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则需要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反映,耦合协调度系数 D 的计算公式为:

$$\begin{cases} D = \sqrt{C \times T} \\ T = \alpha U_1 + \beta U_2 \end{cases} \quad (2)$$

其中, D 为金融支持系统与产业结构升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T 表示两个系统协同效应的综合指数; α 和 β 分别表示金融支持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在整个系统中的重要程度。

(3) 子系统各级指标的标准化

将金融支持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的序列分别记为 U_1 和 U_2 ,各系统中均包含不同指标,将第 i 个子系统的第 j 个一级指标的第 k 个二级指标的观察值记为 x_{ijk} ,考虑到各个 x_{ijk} 的量纲不同,为消除量纲的影响,需将各个指标标准化。标准化的公式为:

$$U_{ijk} = [\max(x_{ijk}) - x_{ijk}] / [\max(x_{ijk}) - \min(x_{ijk})] \quad (3)$$

其中, $\max(x_{ijk})$, $\min(x_{ijk})$ 分别表示 x_{ijk} 序列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U 的取值范围介于0~1之间,该值越大表示其对应序列对子系统的贡献越大。

(4) 各级指标的权重及子系统的贡献函数

各项指标对子系统的贡献用权重来表示,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这种方法充分考虑了各指标的差异性,依据各指标间的关联度和重要性来计算权重,可有效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① 确定指标的数值权重 p_{ij}

$$p_{ij} = \frac{x_{ijk}}{\sum_i x_{ijk}} \quad (4)$$

② 确定熵值 E_i

$$E_i = \frac{\sum_i^n p_{ij} \ln p_{ij}}{\ln n} \quad (5)$$

其中, n 为系统中包含的指标个数。

③ 计算各指标的效用值 d_i

$$d_i = 1 - E_i \quad (6)$$

④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ω_i

$$\omega_i = \frac{d_i}{\sum_i^n d_i} \quad (7)$$

⑤ 各系统的贡献函数

$$U_i = \sum_1^n \varpi_{ij} U_{ij} \quad (8)$$

(二) 指标选取

1. 金融支持指标

金融支持指标体系包括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发展结构指标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三个方面。

其一,金融发展规模。金融业增加值和社会融资规模反映了金融发展规模,2012 年河南省初次公

布该指标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采用金融业增加值来反映金融业的整体发展规模。

其二,金融发展结构。金融发展结构主要包括融资结构和总量结构,前者采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 DIR 反映,即 A 股筹资额与银行贷款增加额之比表示;后者采用金融相关比率 FIR 反映, FIR 这一指标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提出的,通常用一国或者一地区的全部金融资产价值和经济活动总量之比来表示,这里综合考虑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用金融系统存贷款余额、A 股上市公司流通股市价总值和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综合占 GDP 的比重表示。

其三,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效率采用 3 个指标来反映:用存贷比来衡量银行业效率,用上市公司流通 A 股总市值占 GDP 的比率来衡量证券业效率,用保险深度 = 保费收入/GDP 来衡量保险业效率。

2. 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产业结构由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和高效化三个方面体现。

表 1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一览表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金融支持	金融发展规模	金融业增加值	
		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 DIR	A 股筹资额/银行贷款增加额
	金融发展结构	金融相关比率 FIR	(金融系统存贷款余额 + A 股上市公司流通股市价总值 + 保险公司保费收入)/GDP
		银行业效率—存贷比 LDR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金融机构存款总额
	金融发展效率	证券业效率	上市公司流通 A 股总市值 /GDP
		保险业效率	保费收入/GDP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二、三产业比重 技术密集型产业贡献率	(第二产业增加值 +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 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结构合理化	三次产业结构比	(第一产业增加值 + 第二产业增加值 +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结构高效化	研发投入 R&D 占 GDP 的比例	研发投入 R&D/GDP

其一,产业结构高级化。克拉克定律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度量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指标,一般采用第二、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的比重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贡献率(即知识密集型产业)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是由要素驱动向技术驱动转移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第一、二产业逐步向第三产业过渡。

其二,产业结构合理化。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主要是看其是否能够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源,推动社会各部门持续协调发展,立足本国实际,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 and 科技进步。国民经济各部门间要实现协调发展,需要其按照产业结构发展规律,维持内在合理比率,这正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具体要求。因此,可以采用三次产业结构比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

其三,产业结构高效化。高效化是指产业内部生产效率的提高,此处采用研发投入比来表示。上述指标体系可详见表 1。

(三) 样本选取、数据来源及计算过程

基于河南省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展开研究,相应指标样本数据由 2003—2019 历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河南省金融运行报告》整理而来,所有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所以可以利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进行相应实证研究。

表 1 中 10 个二级指标量纲不尽相同,因此首先要对原序列按照公式(3)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按照公式(4)—(8)确定权重的熵值赋权,依次得到了金融发展结构子系统、金融发展效率子系统的贡献函数,

同理再得到金融支持子系统的贡献函数 U_1 和产业结构升级子系统的贡献函数 U_2 ,最后由公式(1)和公式(2)分别得到两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三、实证结论

(一) 各级指标权重分析

依据上述熵值赋权法公式,可计算出各级子系统的权重^①,各权重平均值呈现如下规律:

1. 金融支持子系统的各级指标权重分析

图1显示了金融支持子系统各一级指标平均权重的历年变化情况,其中,金融发展规模的平均权重为0.3259,金融发展结构的平均权重为0.3265,金融发展效率的平均权重为0.3476。

其一,金融发展规模的各级指标。金融发展规模仅选择了金融业增加值这一指标,从历年变化值来看,2009年之前基本趋于平稳,2009年之后有下跌趋势,尤其是2013年以后下跌速度增加。这说明金融支持的力度不再仅仅依靠规模增加而拉动,更为关注发展结构优化和金融发展效率。

其二,金融发展结构的各级指标。金融发展结构中,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间接市场融资比重DIR的权重为0.5157,金融相关比率FIR的权重为0.4843。对于上述两个二级指标而言,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重相对高些,很大部分原因是资本市场的逐步发展与完善,使得直接融资的比重不断上升。

其三,金融发展效率的各级指标。金融发展效率中,金融市场发展效率LDR的权重为0.3378,证券市场发展效率的权重为0.3331,保险市场发展效率的权重为0.3291。三大金融行业的效率比重基本一致,相差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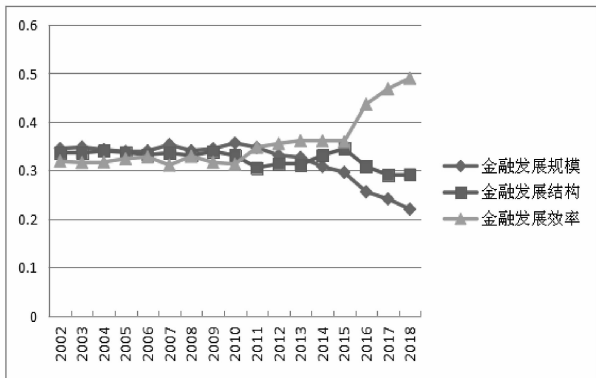


图1 金融支持子系统各一级指标平均权重的历年变化趋势图

由图1中2002—2018年数据可以看出,2010年之前,金融支持系统中各一级指标的权重基本是按照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和金融发展效率

的顺序依次降低;2010年之后,上述三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发生变化,发展规模逐步下降,发展结构和发展效率逐步提高,尤其是金融发展效率在近两年更是具有明显的上涨趋势;这说明金融发展初期是靠规模驱动的,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机制完善,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思考这场危机之后,金融效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5年后金融发展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重要性更为突出。2015年在需求刺激经济增速效果甚微背景下党中央指明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银行业适时调整了发展战略,从根本上扭转了金融资本盲目扩张、影子银行风险持续加重的局面,大步推进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步伐。2017至2019年间,银行业减少了资本扩张,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入,资产年均增速仅为7.7%,而同时期向实体经济提供的信贷资金年均增速达12.1%,债券投资年平均增速则高达13.9%。保险业改变投资理财型业务的高速发展,寿险业务的中短期保费占比从31%的历史高点降至4%。

2. 产业结构升级子系统的各级指标权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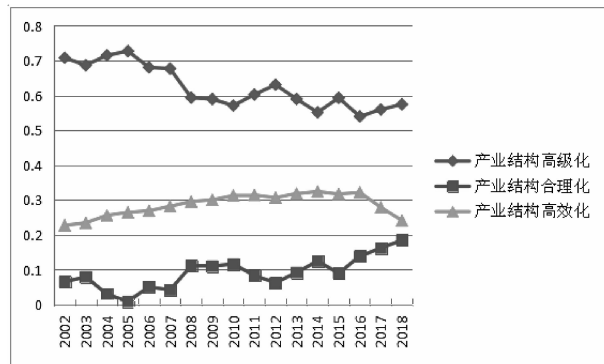


图2 产业结构升级子系统各一级指标平均权重的历年变化趋势图

图2展示了产业结构升级子系统各一级指标平均权重的历年变化情况,从2002—2018年3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变化可以看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权重最高,基本保持在一半以上,其次是产业结构高效化,其对产业结构升级贡献的权重基本维持在0.2861的水平,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权重仅仅为0.0911。从权重间的差距来看,在产业结构升级变化过程中,高效化的作用在逐渐增加,这应该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导致的。

(二) 耦合协调度分析

表2给出了河南省2002—2018年金融支持系统与产业结构升级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度量结果。

时间	耦合度 C	耦合发展程度	耦合协调度 D	协调程度
2002	0.9999	高度耦合	0.9300	良好
2003	0.9902	高度耦合	0.8566	良好
2004	0.9674	高度耦合	0.8303	良好
2005	0.9355	高度耦合	0.7991	中度
2006	0.9576	高度耦合	0.8168	良好
2007	0.9341	高度耦合	0.7190	中度
2008	0.9088	高度耦合	0.7189	中度
2009	0.9998	高度耦合	0.8489	良好
2010	0.9504	高度耦合	0.6483	中度
2011	0.9686	高度耦合	0.6648	中度
2012	0.9997	高度耦合	0.7665	中度
2013	0.9991	高度耦合	0.5690	勉强
2014	0.9988	高度耦合	0.5620	勉强
2015	0.9461	高度耦合	0.5330	勉强
2016	0.8346	高度耦合	0.5012	勉强
2017	0.8279	高度耦合	0.4922	勉强
2018	0.8194	高度耦合	0.5198	勉强

按照耦合度的经验解释: C 值越大,耦合度越高; $C=1$,两系统完全耦合,实现最佳良性互动; $C=0$,耦合程度最低,两系统之间可视为不相关; $0 < C \leq 0.3$,低度耦合; $0.3 < C \leq 0.5$,两系统处于互相抗衡阶段; $0.5 < C \leq 0.8$,两系统处于磨合阶段; $0.8 < C < 1$,两系统高度耦合。可得到各时间段的耦合发展程度,如表 2 所示。

同理,按照协调度的经验解释: D 值越大,系统的协调性越高; $D=1$,两系统完全协调,达到耦合协调最优; $D=0$,子系统之间无协调; $0 < D \leq 0.2$,系统间严重失调; $0.2 < D \leq 0.4$,轻度失调; $0.4 < D \leq 0.5$,濒临失调; $0.5 < D \leq 0.6$,勉强协调; $0.6 < D \leq 0.8$,中度协调; $0.8 < D < 1$,良好协调。可得到各时间段耦合协调程度,结果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结果来看,总体上讲,金融支持子系统和产业结构升级子系统的耦合系数基本维持在 0.9 左右,两系统之间高度耦合;期间存在小幅下降,2008 年存在一个下降点,2015—2018 年处于下降趋势,2015 年我国已经迈入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共存的“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产业结构与金融支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因此耦合系数出现了下跌;从协调度来看,两者的协调度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逐步从良好协调变化为勉强协调,最高时达到 0.9300,最低时仅仅为 0.4922,2009 和 2012 年虽然有上涨趋势,但最终还是未能实现成功翻转。

耦合度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子系统的相关性,耦合协调度则反映了子系统间的互动程度。上述结果表明,2002—2018 年期间,河南省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联度很高,但却没能形成良好的协调互动状态,协同发展机制并不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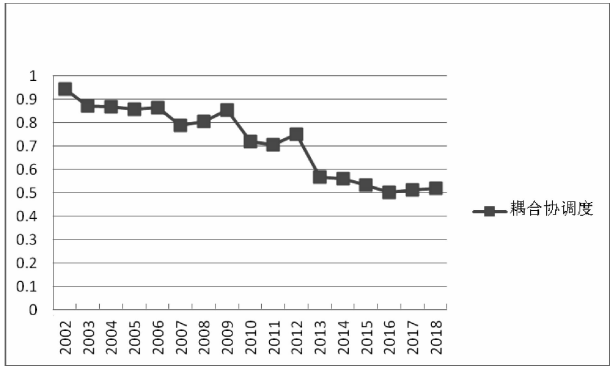


图 3 2002—2018 河南省“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系统耦合协调度变化轨迹

耦合协调度系数是由产业结构升级和金融支持两个子系统耦合而来,从数值上来看,导致该系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金融支持系统^②序列出现的波动和下降导致的。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均有了较大提升,此时的经济发展尚处于要素驱动阶段,难以应对以高附加值和高技术为主的国外同行的冲击,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序列出现下降趋势;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带来了较大冲击,此时中国经济处于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过渡期,金融支持子系统不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2009 年之后,中国经济整体上进入效率驱动阶段,此时的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更为多样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和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但金融支持无法跟上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上述原因导致了耦合协调系数如图 3 的变化趋势。

四、政策启示

文章借助耦合模型和耦合协调度系数,研究了河南省 2002—2018 年期间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状况,结果显示金融支持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度极高,但耦合协调度却很低,近年来处于勉强协调的状态。相关研究结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

其一,衡量任何系统的发展状况,不能单以规模为标准,要综合考虑其规模、效率以及与其他相关系统的耦合协调情况。

其二,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并不是决定整体耦合协调度的核心因素,比如本研究中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提升并不意味着两者耦合协调度的提升,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匹配程度才是影响耦合协调度的本质所在。

其三,目前河南省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程度较低,主要是因为金融发展不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多样化多角度的金融需求,未能完全发挥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

其四,河南省金融业发展水平亟待提高,在保持规模适度扩张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其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优化融资结构,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注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合理搭配。

其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规范金融发展,放宽融资门槛,推动金融供给结构多元化,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多层次金融需求。

其六,加大对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发投入,构建技术创新的长效机制,以推动产业高级化和高效化的进程。

注释:

- ①此处各指标的最终权重是由样本区间 2002—2018 年历年权重值平均而来。
- ②篇幅所限,文章未报告出金融支持序列的具体数值。

参考文献:

- [1] 孙秀梅,蔡继虎.金融支持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情况调查:以赤峰市为例[J].北方金融,2015(3):102-103.
- [2] 黄蓉.金融聚集、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总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J].经济问题,2013(11):58-62,99.
- [3] 李剑.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东部地区数据的面板 VAR 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3(9):20-25.

- [4] 田地.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7.
- [5] 习羿晖,段新锋,刘振.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探索,2016(4):23-30.
- [6] 郭露,丁峰.产业结构、金融集聚与协调发展:长三角地区 16 个地市 1994—2013 的实证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5(5):59-65.
- [7] 刘沛,韦菲.广东金融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耦合效应[J].发展改革理论与实践,2017(12):8-16.
- [8] 吴爱东,刘东阁.中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J].南方金融,2017(3):28-36.
- [9] 魏丽莉,杨颖.西北地区绿色金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的历史演进: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7(5):24-35.
- [10] 贾洪文,李学敏,谢卓军.金融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深度贫困地区减贫效应耦合协调:基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实证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6(5):38-45.
- [11] 范文祥,李将军.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阶段性最优耦合的因素分析: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J].上海金融,2019(8):59-63,8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Effect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ZHANG Yanpi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Henan 4630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Henan province's 2002—2016 financial support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nancial suppor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Henan Province based on coupling degree mod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coeffici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contribute to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the contribution of high-efficiency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higher than that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upgrading of Henan Provinc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high coupling degree, bu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decreased gradually, the last two years showed barely coordination situa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main reason for these problems is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n not meet the diversified and multi-level financial nee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scale driven to efficiency drive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insufficient for R&D investment in the third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the futu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matching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rough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upply, through the increase of the third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to promote the industry advanced and efficient process.

Key words: financial suppor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coupling; coordinate

商贸流通业发展与中国产业高质量升级

——基于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数据

郑浦阳¹,牛 君^{2*}

(1. 华东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0;

2. 甘肃政法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基于2007—2019年28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商贸流通业集聚和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并没发挥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而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则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第二,与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相比,东部地区和70个大中城市的商贸流通业集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集聚则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由此可知,商贸流通业发展未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抑制效应所致。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抑制效应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05

中图分类号:F269.24;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27-05

随着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历史上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由资源依赖型逐渐调整为技术依赖型。利用40年的时间,中国建立了完备的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也逐渐向欧美发达国家看齐,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出现,中国创造逐渐走向世界。然而,面临“中兴事件”和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又显得十分乏力。40年过去了,中国产业仍然处于“大而不强”的尴尬境地,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价值链低端位置,呈现出“低端锁定”之困境。针对当前我国产业规模巨大高端产业核心竞争力缺乏,科技附加值含量低的问题,怎样提升科技实力、打破价值链低端的困境,实现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关系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成与败,也关系到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商贸流通业是经济的基础产业,是消费与生产之间重要的纽带。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实

现生产端和消费端的有机匹配,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效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流通理论实现了由“无流通论”到“流通先导产业论”的转变,体现了商贸流通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商贸流通业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因此,部分学者实证研究指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可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然而,已有文献考察在产业升级时,仅限于量的度量,而缺乏质的考量,即忽视产业生产率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同时,假如商贸流通业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升级,那么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也会面临着同步升级的困境。因此,有必要考察商贸流通业发展与中国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之间的真实关系。

纵观已有文献,很少有学者深入分析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过程中商贸流通业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2007—2019年28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影响。

收稿日期:2020-08-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生理论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模式与路径研究”(17ZDA047)

作者简介:郑浦阳(1989—),男,福建漳州人,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统计、消费者行为。

通信作者:牛君(1971—),男,甘肃会宁人,博士,甘肃政法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一、实证模型

(一) 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模型主要考察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产生的影响,基本回归方程如下:

$$Indstruc_{i,t} = \alpha_0 + \alpha_1 Circulation_{i,t} + \sum \beta Control_{i,t} + \lambda_i + \zeta_i + \xi_{i,t} \quad (1)$$

公式(1)代表了在控制一系列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商贸流通业发展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影响。 $Indstruc_{i,t}$ 为被解释变量,对特定城市产业升级指标进行表示, $Circulation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i*城市*t*年份商贸流通业发展情况。 $Control_{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λ_i 代表的是个体效应, ζ_i 代表的是时间效应,随机变量由 $\xi_{i,t}$ 表示。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采用产业高级化指标衡量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但是,当前计算产业高级化方法主要考察的是产业结构转变的结果,即采用产值比进行衡量。本文借鉴刘伟等^[1]的做法,将劳动生产率纳入产业升级中,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本质上是劳动生产率的变迁,而非简单的量变。因此,只有充分考虑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升级,才能有效体现产业升级的基本变迁特征,其既可以刻画产业结构的量变,又可以刻画产业结构的质变,表现为一种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特性。具体计算过程如下:以产业劳动生产率作为权重,以产业增加值比重作为基准,最终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公式为:

$$Indsturtc_{i,t} = \sum_{n=1}^3 Structure_{i,n,t} \times \overline{lp}_{i,n,t}, n = 1, 2, 3 \quad (2)$$

其中, $Structure_{i,n,t}$ 表示城市*i*第*n*产业在*t*年份的增加值比重, $\overline{lp}_{i,n,t}$ 表示城市*i*第*n*产业在*t*年份的标准化劳动生产率。非标准化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如下:

$$lp_{i,n,t} = \frac{Y_{i,n,t}}{L_{i,n,t}} \quad (3)$$

其中, $Y_{i,n,t}$ 表示城市*i*第*n*产业在*t*年份的增加值, $L_{i,n,t}$ 表示城市*i*第*n*产业在*t*年份的就业人员。由于劳动生产率存在量纲,采用无量纲化处理。

2. 核心解释变量

商贸流通业发展采用商贸流通业集聚指数进行衡量,包括商贸流通业集聚指数和商贸流通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数两个方面。具体计算过程如下:首先,以当前文献为基础,给出区位熵公式:

$$cir_lq_{i,t}^j = \frac{q_{i,j,t}/q_{i,t}}{q_{j,t}/q_t} \quad (4)$$

$cir_lq_{i,t}^j$ 表示*i*省份*j*产业区位熵指数, $q_{i,j}$ 表示*i*省份*j*产业的就业人数; q_j 表示*i*省份全部就业人数($i = 1, 2, \dots, 30$), q_i 表示全国*j*产业的就业人数, q 表示全国就业人数。

其次,计算协同集聚指数。借鉴张虎等^[2]的方法,构建商贸流通业与其他产业协同集聚指数。根据公式(5)得到区位熵指数,利用公式(6)计算得到每两个产业间劳动力就业协同集聚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cir_coagg_lq_{i,t}^{j-k} = \left(1 - \frac{|cir_lq_{i,t}^j - qt_lq_{i,t}^k|}{cir_lq_{i,t}^j + qt_lq_{i,t}^k} \right) + (cir_lq_{i,t}^j + qt_lq_{i,t}^k) \quad (5)$$

其中, $cir_coagg_lq_{i,t}^{j-k}$ 表示*j*产业与*k*产业劳动力协同集聚指数, $cir_lq_{i,t}^j$ 表示*j*产业集聚指数, $cir_lq_{i,t}^k$ 表示*k*产业集聚指数。以上公式中第一项和第二项所表示的分别是协同集聚指数的质量与深度,而两项相加得到的则是对应的劳动力协同程度,当数值越高的情况下表示质量与深度相应越高。

本文采用宋则、赵凯^[3]研究报告中明确的商贸流通产业的内容,即通过仓储、交通、电子信息等方式进行零售或者批发的产业,该产业必须具备商品的流通性。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标准,公共性服务的内容较为广泛,有文旅产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产业、环境保护与治理、教育教学产业等。

3. 控制变量

在模型中融入控制标量,主要目的在于能够合理地估计偏差进行调整。经济水平由人均GDP来表示。以固定资产投资额/GDP来表示投资率,代表国内投资状况。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代表国外投资状况。政府干预,采用财政预算支出/GDP,代表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财政自由度,采用(财政支出-土地出售收入)/财政收入,代表政府预算收支关系。土地财政,采用土地出售收入/财政收入,代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07—2019年期间28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以当年的《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为准。表1表示的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结果

(一) 基准检验

按照前文(1)所给的方程进行计算得出表2的结果。文中以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为基础,目的在于能够对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进行合理化消除。表2

第1—2列表示商贸流通业集聚指数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影响。从估计结果来看,商贸流通业集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商贸流通业集聚并没有发挥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表2第3—4列显示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并未发挥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表2第5—6列说明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

务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发挥了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最后,表2第7—8列将三个指标同时放入估计方程,估计结果显示,商贸流通业集聚指数、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公共性服务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因此,综合表2的估计结果可知,商贸流通业集聚和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并没发挥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而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则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升级(indstruc)	3,694	0.145	0.110	0.0000246	0.997
商贸流通业集聚(lq_cir)	3,718	0.801	0.380	0.0167	4.327
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lq_man_cir)	3,718	2.379	0.600	0.519	4.858
公共性服务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lq_cir_gov)	3,718	2.765	0.540	0.544	6.131
人均实际GDP(lnpergdp)	3,718	9.963	0.897	6.944	13.09
投资率(inv_ratio)	3,357	0.598	0.246	0.0872	2.169
外商直接投资率(fdi_ratio)	3,562	0.0218	0.0238	0.264	0.376
财政自由度(gov_free)	3,720	0.564	4.658	-188.3	36.75
财政支出比(gov_ratio)	3,718	0.0618	0.0394	0.00697	0.467
土地财政(gov_land)	3,720	1.686	4.413	0.00127	191.2

表 2 基准检验

	(1)	(2)	(3)	(4)	(5)	(6)	(7)	(8)
lq_cir	-0.0270*** (0.006)	-0.0271*** (0.006)					-0.1065*** (0.009)	-0.1145*** (0.011)
lq_man_cir			-0.0420*** (0.004)	-0.0405*** (0.005)			-0.0270*** (0.005)	-0.0222*** (0.006)
lq_cir_gov					0.0294*** (0.006)	0.0313*** (0.007)	0.1109*** (0.008)	0.1118*** (0.010)
lnpergdp		0.0575*** (0.010)		0.0569*** (0.009)		0.0554*** (0.009)		0.0520*** (0.009)
inv_ratio		0.0423*** (0.011)		0.0398*** (0.011)		0.0408*** (0.011)		0.0225** (0.010)
fdi_ratio		0.2916*** (0.113)		0.1631 (0.104)		0.2506** (0.101)		0.0920 (0.091)
gov_free		0.0019 (0.001)		0.0015 (0.001)		0.0017 (0.001)		0.0008 (0.001)
gov_rate		-0.0031 (0.079)		0.0023 (0.077)		-0.0147 (0.077)		0.0003 (0.070)
gov_land		0.0021 (0.001)		0.0018 (0.001)		0.0019 (0.001)		0.0010 (0.001)
常数项	0.1837*** (0.007)	-0.3652*** (0.088)	0.2604*** (0.012)	-0.2811*** (0.088)	0.0764*** (0.017)	-0.4568*** (0.089)	0.0006 (0.019)	-0.4890*** (0.085)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694	3,199	3,694	3,199	3,694	3,199	3,694	3,199
R ²	0.7704	0.7980	0.7797	0.8056	0.7725	0.8006	0.8090	0.8318

注:圆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二)空间异质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析基准检验结果形成原因,本部分基于空间异质性的角度进行考察。基于已有文献的做法,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将全样本分成东部—中西部、70个大中城市—小城市等4个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和不同行政层级的空间。

首先,表3显示商贸流通业集聚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从表3的估计结果来看,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地区的商贸流通业集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东部地区和70个大中城市的商贸流通业集聚指数估计系数均不显著。由此说明,全样本中呈现的商贸流通业集聚抑制产业

结构高质量升级之现象,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行政层级相对较低区域的抑制效应所致。

表3 商贸流通业集聚与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空间异质性

	(1)	(2)	(3)	(4)
	东部	中西部	70 个大中城市	小城市
lq_cir	-0.0081 (0.018)	-0.0387 *** (0.009)	-0.0129 (0.009)	-0.0339 *** (0.01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4279 *** (0.320)	-0.1629 * (0.093)	-0.4091 *** (0.141)	-0.3322 ** (0.136)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177	2,022	807	2,392
R ²	0.8436	0.7791	0.8156	0.8002

注:圆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其次,表 4 显示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从表 4 的估计结果来看,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地区的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东部地区和 70 个大中城市的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由此说明,全样本估计结果中呈现的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抑制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之现象,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行政层级相对较低区域的抑制效应所致。相反的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

表4 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与
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空间异质性

	(1)	(2)	(3)	(4)
	东部	中西部	70 个大中城市	小城市
lq_man_cir	0.0287 * * (0.014)	-0.0406 *** (0.007)	0.0208 * * (0.008)	-0.0459 *** (0.00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2503 *** (0.376)	-0.1121 (0.094)	-0.3580 ** (0.141)	-0.2433 * (0.136)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177	2,022	807	2,392
R ²	0.8479	0.7834	0.8179	0.8090

注:圆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最后,表 5 显示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从表 5 的估计结果来看,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地区的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不显著,而东部地区和 70 个大中城市的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由此说明,全样本估计结果中呈现的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之现象,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行政层级相对较高区域的促进效应所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不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

表5 公共性服务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与
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空间异质性

	(1)	(2)	(3)	(4)
	东部	中西部	70 个大中城市	小城市
lq_cir_gov	0.0423 ** (0.018)	0.0151 (0.010)	0.0317 ** (0.014)	0.0115 (0.01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1.4792 *** (0.303)	-0.2305 ** (0.101)	-0.4905 *** (0.135)	-0.4253 *** (0.140)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1,177	2,022	807	2,392
R ²	0.8520	0.7719	0.8216	0.8016

注:圆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表6 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产业升级			
	(1)	(2)	(3)	(4)
lq_cir	-0.0203 ** (0.008)			-0.0997 *** (0.016)
lq_man_cir		-0.0310 *** (0.007)		-0.0159 ** (0.007)
lq_cir_gov			0.0270 *** (0.009)	0.0905 *** (0.0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1822 *** (0.064)	-0.1483 ** (0.065)	-0.2309 *** (0.064)	-0.2658 *** (0.062)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199	3,199	3,199	3,199
AR(2)	0.43 [0.670]	0.32 [0.747]	0.65 [0.517]	-1.43 [0.153]
Hansen J	4.00 [1.000]	1.76 [1.000]	5.39 [1.000]	102.48 [0.282]

注:圆括号内数据为聚类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数据为 P 值。***、**、*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三) 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基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需要考虑商贸流通业发展与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之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引起的联立性偏误。为了克服联立性偏误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助系统广义矩 (SYS – GMM) 方法,由于计算过程中有处在内生性偏差,为了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运用了内生变量的滞后项。在实际计算中,采用商贸流通业 3 个指标的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AR(2) 统计量的结果显示,模型估计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Hansen J 统计量的结果显示,模型估计中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因此,模型设定合理。根据表 6 的估计结果可知,商贸流通业集聚、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而商贸流通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由此可知,

表2中所得到的结果可靠性较强。同时为了能够更好地保证SYS-GMM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本文估算中采用的工具变量为内生变量的更高阶滞后项,通过实际的分析,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商贸流通业的集聚发展并没有发挥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而公共性服务业—商贸流通业协同集聚则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这一结论在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分析以后,稳健性依旧明显。第二,与中西部地区和小城市相比,东部地区和70个大中城市的商贸流通业集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集聚则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由此可知,商贸流通业发展未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抑制效应所致。

新时代下如何有效发挥商贸流通业对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是实现商贸流通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目的,也是实现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重要手段。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得如下启示:

第一,发挥经济集聚效应,实现商贸流通业的集聚与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空间异质性估计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可以发挥促进产业结构高质量升级的作用,尤其是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因此,需要通过促进要素流动,实现要素集聚,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和大

中城市的经济集聚效应,实现商贸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高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

第二,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需要良好的产业氛围和较强的经济实力作为保障。对于我国东南沿海而言,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总量可观,生产和消费规模较大,产业层次高,商贸流动应该向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提高商贸流通业与现代化产业发展相适应。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生产和消费规模有限,产业结构偏向于低层次,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应在实现特色化经营的前提下,推进区域合作,促进商贸流通业的合作化经营。同时也有必要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机遇,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跨区域合作经营。

参考文献:

[1] 刘伟,张辉,黄泽华.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J]. 经济学动态,2008(11):4-8.
[2] 张虎,韩爱华,杨青龙. 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2):3-20.
[3] 宋则,赵凯. 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外延界定和影响力研究内容梳理[J]. 经济研究参考,2009(31):9-1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Commercial Circul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China Industry High Quality Upgrade

—Based o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Above

ZHENG Puyang¹, NIU Ju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1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ansu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is essay, based on panel data of 28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above from 2017 to 2019, focuses on empirical survey on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i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on China industry structure upgrade.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commercial circulation industry cluster or collaborative cluster wi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idn't effectively promote China industry structure high quality upgrade; secondly, contrary with mid-west areas and minor cities, commercial circulation industry cluster or collaborative cluster with other industries in east area and 70 large & medium-sized cities significantly promote. It shows that commercial circulation industry fail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industry structure high quality upgrade, mainly because the inhibiting effect by economic backward areas.

Key words: commercial circulation industry; industry structure high quality upgrade; inhibiting effect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一项基于2008—2018年CSSCI数据的文献计量分析

毛现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城市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通过中国知网(CNKI)平台,借助于文献计量学和数理统计法,对2008—2018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文献的年发文量分布情况、文献被引量、核心作者、研究机构、研究主题等指标进行了整理、归纳和述评,在此基础上发现国内新型城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性构思其发展趋势,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现状;趋势;文献计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06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32-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口的流动日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我国城镇人口数量由1978年的1.7亿增加到2018年的8.1亿;与此同时,我国的城镇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8年的58.5%。对此,不少学者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发展最大的潜力所在。城镇化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改善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及环境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未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加速城镇化^[1-2]。但是,我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给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一些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这为我国城镇化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方向。随后,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战略部署,政策的出台大大激

发了学界研究新型城镇化的热潮,催生了一大批富有见地的新型城镇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科研成果。本文利用中国知网(CNKI)平台,借助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近十年来的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并揭示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探讨并分析当前新型城镇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以期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地把握国内新型城镇化的研究进展,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及启示。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该研究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1)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近十年研究状况如何?2)近十年来,有哪些重要的研究方面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领域的关注点?3)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哪些突出问题以及可行性的对策有哪些?

收稿日期:2020-02-20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双一流’背景下省属普通本科高校科研育人机制研究”(2019-JKGYB-0086);2019年度河南省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省新型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2019SJGLX309);2019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省属普通本科高校科研育人机制研究”(2019GGJS125)

作者简介:毛现桩(1981—),男,河南平顶山人,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城镇化中的教育经济研究、高等教育管理。

(二)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中国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的截至撰文前的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主题的CSSCI 期刊文献。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方法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法是一种在分析文献研究中使用比较普遍的方法,它是一种以各种文献外部特征为研究对象的量化分析方法,是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描述、分析、研究,从而导出其概念规律性(即统计规律),进一步解释文献的数据特征和变化规律,分析背后的原因。

二、数据的筛选与处理

(一) 数据来源与方法

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前提条件是获取准确与完整的数据,这也是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了充分了解我国新型城镇化研究的现实状况,分析存在问题,展望发展趋势,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于2019年1月30日对新型城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

表1 CSSCI 期刊文献发表年份分布比

发表年份	CSSCI 发文量	百分比(%)
2008	1	0.05
2009	1	0.05
2010	6	0.33
2011	8	0.44
2012	26	1.43
2013	235	12.91
2014	445	24.45
2015	357	19.62
2016	343	18.85
2017	252	13.85
2018	146	8.02
总计	1820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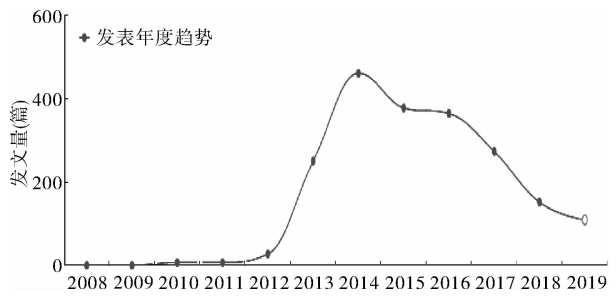


图1 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我们在中国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检索项为“主题”,输入“新型城镇化发展”,来源类别选择“CSSCI”,匹配方式选择“模糊”,时间截至2018年,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923篇文献。其次,我们运用人工筛选方式排除重复发表、会议通知与报道、专家访谈、会议综

述、征文启事、政策纲要发布、主持人语等非学术性文献以及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相关度不大的文献共103篇,得到纳入分析的文献1820篇。

(二) 数据总体性描述

根据检索结果,在检索处理过的1820篇文献中,第一篇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主题的文献发表于2008年。文献发表的分年度结果与发表年度趋势图分别见表1与图1。2008年和2009年检索到的文献分别都是1篇,2010年6篇,2011年8篇,2012年26篇,2013年235篇,2014年445篇,2015年357篇,2016年343篇,2017年252篇,2018年146篇。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2014年为此文献分析的重要年份,该年的CSSCI发文量达到了峰值。2012—2014年的3年间,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主题的文献发文量急剧增长,然而,从2014年开始,发文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且有趋于平缓之势。

三、结果与分析

(一) 发文量年份分布分析

研究文献的分布年份可以清晰地了解该研究领域在某时段内的研究状况,进而分析影响因素。在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主题的文献搜索中,最早出现的一篇文献为2008年发表于《求是》上的一篇文章,其题为《推进新型城镇化 实现崛起新跨越》。该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江西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的模式。自此之后,国内学界才缓慢开始了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关的研究。但直到2012年,5年间国内研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文献共有42篇。此后,从2013年起,新型城镇化研究的发文量猛速增长,2013年的研究文献为235篇,较2012年增长了80.38倍。2014年的研究文献已经达到445篇,较2013年又增长了89.4%,成为历年之最。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考察2012—2013年我国政策出台与经济发展情况得出其中原因。在党的十八大报告(2012)中,“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被重点提了出来,而且还提出了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紧接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决定》具体阐释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出了新要求,明确了我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说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学界的研究转向有重大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与党和政府的战略指向和政策引导紧密相关。

表2 “新型城镇化发展”被引量排名前十位的期刊文献

编号	作者	篇名	引用 次数	发表 年份	期刊名
1	单卓然、黄亚平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	937	2013	城市规划学刊
2	张占斌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	866	2013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3	倪鹏飞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	565	2013	江海学刊
4	彭红碧、杨峰	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466	2010	理论探索
5	沈清基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	412	2013	城市规划学刊
6	吴江、王斌、申丽娟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318	2009	中国行政管理
7	蓝庆新、陈超凡	新型城镇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	247	2013	财经研究
8	黄震方、陆林、苏勤、章锦河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	245	2015	地理研究
9	张占仓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	243	2010	经济地理
10	王素斋	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内涵、目标与路径	212	2013	理论月刊

（二）被引量分析

文献的被引次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衡量一篇文章在该领域的价值,被该领域其他研究机构或同行认可的程度,是指示论文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表2是“新型城镇化发展”被引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文献。

从表2可以看出,被引次数排名前十的文献中,大部分是关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性研究,涉及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意义、目标、策略、路径、模式^[3-5],其他是应用型研究,涉及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及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与反思^[6-7]。被引次数最多的一篇文献是《“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单卓然、黄亚平,2013)。该文章虽然不是国内第一篇谈及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文献,但是它是第一篇系统论述“新型城镇化”的文献,包括科学界定了新时期“新型城镇化”概念,指出了新型城镇化的3大内涵,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6大核心目标,概括了新型城镇化的4项重点内容,阐述了新型城镇化4类规划策略,并且指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存在的6大可预见性认知误区。^[3]5年间,该文献的被引次数达到了近千次,成为学界研究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篇标杆与奠基之作。另外,在被引次数排名靠前的10篇文献中,共有6篇文献是发表于2013年,且前3篇文献都是发表于该年份。结合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在提高城镇化质量上下功夫,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重要事实,再次说明了学术研究要紧贴国家政策,为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智囊,服务国家经济发展。

（三）文献作者及研究机构分析

核心作者是文献计量学中衡量某学科领域内具有不可替代和突出影响力的作者的一个概念。文献计量学中界定核心作者通常采用普莱斯定律(Price Law)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为:

$$M_p=0.749\sqrt{Np_{\max}} \quad (1)$$

其中 M_p 表示核心作者最少发文量, $\sqrt{Np_{\max}}$ 表示搜索文献中发文量最多作者的文献数。2008—2018年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中以第一作者(包含独立作者)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刘国斌,发文量为13篇,通过公式计算得到值为2.70。

$$M_p=0.749\sqrt{Np_{\max}}=0.749\sqrt{13}=0.749\times 3.605=2.70 \quad (2)$$

在选择过程中,按照取整的原则,以第一作者(含独立作者)身份发表3篇及以上研究论文者方可入选为核心作者。据此,我们对该领域的核心作者进行统计,得出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共28位,发表论文133篇,占文献总量的7.31%。这说明近年来国内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还有待进一步形成。紧接着,笔者又对高产核心作者(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做了数学统计(见表3),吉林大学的刘国斌教授作为第一作者发文13篇,为高产核心作者的榜首,其次是东南大学的赵永平教授发文9篇。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国内新型城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为该领域研究的持续深入做了重要的推动工作。

表3 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的高产核心作者

序号	作者	篇数	单位	序号	作者	篇数	单位
1	刘国斌	13	吉林大学	8	徐君	5	河南理工大学
2	赵永平	9	东南大学	9	任远	5	复旦大学
3	张明斗	6	东北财经大学	10	倪鹏飞	5	中国社科院大学
4	田鹏	6	河海大学	11	李国平	5	北京大学
5	胡若痴	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2	贾康	5	财政部
6	辜胜阻	6	武汉大学	13	吴业苗	5	南京师范大学
7	柳建文	5	南开大学	14	张鸿雁	5	南京大学

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依托,研究机构为学者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研平台,其中那些科研产出量大质优的核心研究机构在领域内更是具有晴雨表和风向标的作用,对该领域内的其他研究学者具有

极强的带动效果。我们对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主题发文量在 10 篇及以上的核心研究机构做一统计(见表 4),中国人民大学以发文量 47 篇成为该领域核心研究机构之首,其次是南京大学发文 41 篇,吉林大学 34 篇。其他院校作为该领域的研究机构,其发文量与之有着明显差距。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国内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主要依托平台还是国内各大高水平高校,其他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专职研究机构虽有参与,但并不是主力军,然而政府部门(如国务院研究中心、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的参与有限或者没有。

表 4 发文量在 10 篇及以上的核心研究机构

序号	单位	篇数	序号	单位	篇数
1	中国人民大学	47	17	湖南大学	16
2	南京大学	41	18	复旦大学	16
3	吉林大学	34	19	苏州大学	16
4	中国科学院	26	20	华中科技大学	15
5	北京大学	24	21	兰州大学	14
6	北京师范大学	23	22	河海大学	14
7	四川大学	22	23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4
8	华东师范大学	20	24	华东理工大学	14
9	武汉大学	19	25	西南大学	13
10	东北财经大学	18	26	南昌大学	11
11	西南财经大学	18	27	西安交通大学	11
12	华中师范大学	18	28	山东大学	11
13	南开大学	17	29	国家行政学院	11
14	东北师范大学	17	30	中央财经大学	10
15	东南大学	16	31	北京交通大学	10
16	清华大学	16	3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0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战略部署的深入实施,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不仅需要像高校这样的纯科研机构的持续深入研究,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探索,还需要有政府研究中心、决策部门等的参与,促进实践探索可行的理论、模式、路径尽快推广,指导更多的建设实践。

(四)文献内容分析

研究主题是一篇研究文献具体内容的集中呈现,是高度浓缩的研究精华。研究主题可通过高被引文献和高频关键词来反映。^[3]通过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高被引文献的考察和对所有文献的关键词处理,我们对近十年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文献主题进行了提取和凝练。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近十年来主要关注点在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内涵界定与评价体系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及其市民化,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新四化”

关系,以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等几个方面。

1. 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界定与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新型城镇化”其实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由来已久。它伴随着党的十二大(2002)提出建设新型工业化战略而出现,但人们真正熟悉它却是党的十八大报告(2012)以及同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生态理念融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将新型城镇化建设确定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方式。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是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其核心目标是追求平等、幸福、绿色、健康和集约,重点内容是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3]。也有学者指出,新型城镇化最早来自对中国特色城镇化的相关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实质上就是人口城镇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步向前的新型城镇化^[8]。与传统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是一场深刻革命,它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具有以人为核心、可持续发展等内涵,核心目标是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3,6]。沿袭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规范界定,学者们接下来相继开展了对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的研究,研究多以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并且选取省、市数据为实证检验和评价的对象^[9]。有学者在分析城市发展结构的基础上,借用植物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理论来分析城市化发展中各发展主体及其关系的协调,从而建立新型城镇化的“城市树”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10]。

2. 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研究

在厘清新型城镇化科学内涵、确立城镇化评价体系的同时,有关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模式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在路径选择上,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智慧城镇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的不二选择^[4-5]。具体而言,倪鹏飞(2013)认为“可持续城镇化”是总体路径,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以人为本,依靠创新驱动,结合本土实情,加强政府引导,形成产城互动的格局。沈清基(2013)指出城镇化发展要以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基础的系统和要素群。城镇化要以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为基准,以此“审核”和调控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发展速度,以及发展的价值观。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已越过中期,现在处于攻坚阶段,眼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将原有粗放的城镇化模式转变为能承载生态文明

转型的“智慧式城镇化”,城镇化建设要从数字化管理升级到智慧管理、生态管理和创新管理。(仇保兴,2013)

3.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

人口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精髓,加快居住人口的城镇化,重点是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1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带来的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形成的二元经济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由此导致了农民工问题的产生。由于城市在多方面优于农村,吸引了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但进城后的农民并没有融入城市生活,没有享受到传统市民所拥有的各项权益,但这些农民又不愿返乡,从而造成了新时期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这成为制约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顽症^[12]。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要求以“权利公平”为核心重构“居住地”相关而非“户籍”相关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政策治理水平和制度管理效率,增强信息宣传与沟通,推动农民工权利融合和能力融合的实现^[13]。此外,城镇化过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14-15]。

4.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关系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促进“四化”良性互动、协调同步发展。学界敏锐地捕捉到了国家政策的指挥性,迅速展开了对“新四化”关系的研究讨论^[16]。但在“四化”关系中,学界最早开始研究,而且产生成果最多的领域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研究^[17]。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协调,发展上明显滞后。因此,应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使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18-19]。关于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的协同关系,学者则是近几年才开始关注并展开研究的。这是因为“信息化”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及,上升为国家战略时间尚短。国内学者对于“新四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者内在关联机制和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四化同步发展的初步测度和发展评价上^[16,20-21]。

5.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已进入新常态时期,当前既面临着传统城镇化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也有一些新问题不断涌现出来。总结起来,主要问题有:城镇化的驱动力减弱、“半城镇化”问题、土地和户籍

问题、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城市病”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社会保障制度障碍问题等。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靠土地扩张的粗放式、低质量的城镇化道路,目前我国土地城镇化程度远远高于人口、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城镇化程度,而新型城镇化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模式。那么,政府怎么“引导”,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如何定位,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要在各种法律、制度和政策的指导下,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信息等市场要素的集聚和提升,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22-23]。“半城镇化”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土地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村与城镇之间长期处于尴尬的“两栖”状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问题既不利于推行城镇化,也不利于发展现代农业。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规划创新与管理创新等形式来解决户籍问题、城市融入问题、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农地问题、融资问题^[23-24]。除此之外,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推动经济带发展既有利于优化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又有利于激活投资和潜在的消费需求,不失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

四、结论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是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转型所具有的重要特征。本文从2008—2018年CSSCI来源期刊的文献入手,运用基于数理统计的文献计量法分析了国内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态势。基本结论如下:从文献发表的年份分布来看,2012年之后发表的研究文献呈现出井喷态势,这一现象说明党和政府关于新型城镇化的一些政策和战略指向对该领域研究影响较大。从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方面来看,核心研究作者只有28人,人数和研究产出占比较小,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主要平台以各大高校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政府部门的参与不足。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内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主要关注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内涵与评价体系,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及其市民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新四化”关系等。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城镇化的驱动力不足、“半城镇化”问题、土地和户籍问题、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保障问题等。对此,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规划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手段,深化学科间融合,突出

问题导向,建设现代化都市圈,走出一条以人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参考文献:

- [1] 胡鞍钢. 城市化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6): 1-7.
- [2] 辜胜阻, 武兢. 城镇化的战略意义与实施路径[J]. 求是, 2011(5): 27-29.
- [3] 单卓然, 黄亚平. “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2): 16-22.
- [4] 倪鹏飞.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J]. 江海学刊, 2013(1): 87-94.
- [5] 申清基. 论基于生态文明的新型城镇化[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1): 29-36.
- [6] 吴江, 王斌, 申丽娟.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09(3): 88-91.
- [7] 蓝庆新, 陈超凡. 新型城镇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了: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J]. 财经研究, 2013(12): 57-71.
- [8] 冯尚春.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与产业结构升级[J]. 吉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5(5): 128-132.
- [9] 涂建军, 何海林.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测度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J]. 西南大学学报, 2014(6): 128-134.
- [10] 温廷新, 王冉, 李印超, 等. 新型城镇化的“城市树”模型及其评价体系研究[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6(4): 390-393.
- [11] 宋娟. 农民工市民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J]. 河南社会科学, 2016(9): 11-12.
- [12] 方辉振, 黄科.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求是实现人的城镇化[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3(4): 63-68.

- [13] 陈静, 柳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江苏省13地市的实证调查[J]. 农村经济, 2018(4): 111-116.
- [14] 李冬晓. 人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新生代农民工本位观察[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8): 153-156.
- [15] 魏三姗, 崔娟. 正视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民分层现象[J]. 人民论坛, 2017(7): 56-57.
- [16] 胡若痴.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J]. 科学社会主义, 2014(4): 134-137.
- [17] 申丽娟, 谢佳, 丁恩俊. 国内新型城镇化研究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J]. 西南大学学报, 2015(11): 163-169.
- [18] 周兵, 高君希, 吕斐. 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基于重庆市的实证[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2): 105-109.
- [19] 何海林, 涂建军, 林曦, 等. 基于VAR模型的城镇化、工业化对城乡统筹的影响分析: 重庆市的实证[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10): 69-76.
- [20] 蓝庆新, 彭一然. 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关联机制和发展策略[J]. 理论学刊, 2013(5): 35-41.
- [21] 徐维祥, 舒季君, 唐根年. 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测定[J]. 经济地理, 2014(9): 1-6.
- [22] 邱爱军, 郑明媚, 白玮, 等. 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及其消解[J]. 工程研究, 2011(3): 211-221.
- [23] 朱鹏华, 刘学侠. 新型城镇化: 基础、问题与路径[J]. 中共党校学报, 2017(2): 114-122.
- [24] 李枝秀.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愁符号”的保护与传承[J]. 江西社会科学, 2014(9): 254-25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Publications with CSSCI Journals in Latest Decade

MAO Xianzhuang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New urban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choice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marke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CNKI data, the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bibliometric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review the publications with the CSSCI journals between 2008 and 2018. Some problems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study are thus detected, and its tendency of further development is discussed. It is hoped that the discussion made herein will provide possible insights for future studie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statusquo; trend; bibliometrics

赠与人损害赔偿赔偿责任适用研究

——以《民法典》658条、660条为逻辑起点

裴丽萍, 胡芳媛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民法典》将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限定于特殊赠与合同,而对于实践中常见的普通赠与合同,受赠人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未明确。从解释论角度,将赠与关系分为不同阶段,分析相应阶段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及相应请求权基础,再从信赖利益角度论证受赠人请求损害赔偿的合理性,实现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关键词:赠与合同;损害赔偿赔偿责任;任意撤销权;信赖利益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07

中图分类号:DF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38-05

一、提出问题

赠与合同作为合同法的组成部分,具有合同的一般性特征,但又具有特殊属性——单务性和无偿性,使得赠与合同在《合同法》规范中显得“特立独行”。然而针对这一特殊制度的存在,学术界对其研究似乎并不热衷,目前理论上对无偿赠与合同的研究甚少,赠与合同损害赔偿问题更是少有学者深究。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在2020年5月28日正式颁布,其中对赠与合同的修改也属于一大亮点。理论和实务上对现行《合同法》第186条和189条讨论不断,原因在于《合同法》第186条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在满足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的条件时,可行使权利撤销赠与,同时第189条也并未限定赠与人与损害赔偿责任的产生阶段,即赠与人损害赔偿赔偿责任与任意撤销权存在同时适用的可能。据此认为,赠与人完全可以利用任意撤销权来规避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赔偿责任,使得第189条的规定流于形式,受赠人的损害赔偿得不到相应的保护,规范目的落空。

《民法典》第658条将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予以保留,并通过第660条对赠与人损害赔偿赔偿责任进行

限定,明确赠与人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针对公证以及依法不得撤销的赠与合同。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的颁行,使得现行《合同法》189条与186条可能出现的困境得以避免。理由在于:依据现行《合同法》186条与189条的规定,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赠与物毁损,为了避免承担损害赔偿赔偿责任,赠与人可能行使撤销权,使得受赠人丧失权利基础。但依据修改后的《民法典》规定,仅承认特殊赠与的损害赔偿赔偿责任,故对于普通赠与而言,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毁损赠与物并不产生相应的损害赔偿赔偿责任,那么赠与人行使撤销权也无意义。该观点逻辑自洽的前提在于普通赠与关系中,因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赠与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而这一观点很难得以认同。

根据赠与目的不同,赠与合同可分为特殊赠与合同和普通赠与合同。相比于普通赠与合同,特殊赠与合同主要包括具有公益目的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其本身被赋予了较高的社会价值,法律也对受赠人进行倾斜性保护,“剥夺”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同时赋予赠与人损害赔偿赔偿责任,使得特殊赠与合同的适用问题并不存在疑问。相比于特殊赠与合

收稿日期:2020-06-22

基金项目: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森林可持续经营理念下的林权法律制度研究”(2014AA015)

作者简介:裴丽萍(1965—),女,湖北随州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

同,普通赠与合同既保留了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又未明确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当赠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受赠人的损害又当如何救济?例如:甲将自己的一辆汽车赠与乙,并约定一个月后交付给乙,乙因信赖该赠与协议而花费5万元建造车库,后甲故意或重大过失将赠与的汽车损毁而难以交付,此时乙的损失是否能够得到赔偿?换言之,依据《民法典》关于普通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人故意毁损赠与标的物后,受赠人是否有权向赠与人请求损害赔偿?相应的请求权基础类型为何?文章试从解释论角度分析,以《民法典》关于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为逻辑起点,探究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适用,为司法实务中相关问题提供法律指引。

二、《民法典》第658条、660条解释论分析

从表面上理解,《民法典》避免了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和损害赔偿责任同时适用的情形,然而对于普通赠与合同而言,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赠与物毁损灭失的法律后果,则并未予以明确。故赠与人过错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受赠人是否有权向赠与人请求损害赔偿是首要厘清的问题。

赠与物发生毁损灭失的情形可能发生在赠与过程的多个阶段,故从解释论角度分析,将赠与过程分为赠与合同成立之前、赠与合同成立后但赠与财产权利尚未发生转移以及赠与财产权利已经发生转移三个阶段。

(一)赠与合同尚未成立之前

当赠与合同尚未成立时,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并无明确的法律关系,任意撤销权尚无适用余地,赠与人为标的物所有权人,标的物权利与受赠人无关。因此,受赠人作为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对于赠与标的物毁损灭失,则无权向受赠人请求损害赔偿。

(二)赠与合同成立但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

财产权利发生转移是物权行为实现的必然结果。当赠与合同成立但赠与财产权利尚未发生转移,意味着赠与物权行为并未完全实现,即动产未交付、不动产未完成登记。如果赠与合同已经成立但赠与财产尚未发生转移,受赠人仅依合同享有债权而非物权,则受赠人能否主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致使赠与物毁损、灭失,侵害其债权而主张侵权责任?民法理论上认为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而承担侵权责任,这里的权利并不包括债权,受赠人以侵犯债权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并无理由。^[1]与前述阶段相比,该阶段满足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的条件,此时赠与人有权行使任意撤销权,可能产生开篇所提及的赠与人损害赔偿责任与任意撤销权的适用

困境,回归于现行《合同法》规范路径。但问题在于,即使认为赠与人在该阶段行使任意撤销权,是否即意味着受赠人不得向赠与人请求损害赔偿,该观点则有待商榷。在此条件下,由于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赠与标的物毁损、灭失,赠与合同目的难以实现,此时受赠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否实现,则需要考虑赠与财产是否完成了交付行为。

1.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

赠与人约定期限或某种条件,当期限或条件满足时将赠与标的物交付受赠人。例如,甲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赠与乙,并约定一个月之后交付。此时因赠与人过错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赠与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赠与人构成预期违约,但赠与人是否因此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尚存在疑问。

一般地,预期违约是为了避免合同履行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而设立的,使得非违约方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行使不安抗辩权或解除合同,降低损失,故该制度在双务有偿合同中作用更加明显。但赠与合同本身单务、无偿的特殊属性,使得其在成立要件、责任承担以及利益平衡角度等方面,与有偿合同的制度设计存在差异。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言:“合同的订立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同等价值的交换,另一种则是一方的慷慨行为使得另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增加。”明显地,赠与即是“慷慨德行”在合同法上的具体践行。在赠与合同中,除特殊情况外,赠与使得受赠人一方获益,赠与人一方利益相应减少,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以及倡导乐善好施、社会公益角度出发,法律理应侧重保护,不过多地为赠与人设定限制负担,而赠与人撤销权则是以此为目的的制度设计。^[2]在赠与成立但标的物权利尚未转移且未交付时,赠与人完全有权撤销赠与,受赠人仅依据赠与合同而产生的信赖程度并不高,因此主张损害赔偿,则不合理加重了赠与人的负担,与赠与合同自身性质以及撤销权制度设计的初衷不符。同时,如果将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财产毁损理解为赠与人不愿将财产赠与受赠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赠与人与过错导致的赠与物毁损,与撤销权有相同目的,若赠与人为了取消赠与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免有失公允。^[3]因此,当赠与人的过错致使标的物毁损、灭失,无论是基于赠与行为的特殊性考虑,还是从保持任意撤销权制度适用的合理性角度分析,在满足赠与合同成立但赠与财产尚未交付的情况下,赠与人无须承担民事责任。

2. 赠与财产已经交付

该情形下,赠与不动产已经交付使用,但尚未办

理房屋登记,权利尚未发生转移;至于动产,如赠与
人甲与受赠人乙在成立赠与合同之前,甲将标的物
汽车已经交付于乙使用,但依照合同约定,甲仍为汽
车的所有权人。有观点认为,该情形下赠与财产权
利并未发生移转,赠与人仍为所有权人,与赠与财产
尚未交付的行为性质无本质区别,产生的法律效果
也应该相同。然而这一观点并未考虑标的物的交付
与否对交易双方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因赠与合
同的无偿性,有理由减轻对赠与人的约束或者对其
责任的承担限制诸多条件,例如赠与人任意撤销权
以及附义务的瑕疵担保责任等。然而,从比较法而
言,不同于欧洲国家对赠与进行的“形式主义”设计
(即赠与须经公证等特殊形式才可成立生效),我国
赠与制度在制定之初便采用“契约观”,经要约和承
诺赠与即可成立,赠与也自然成为典型合同的一种。
那么,过度强调赠与人的权利而否认相应的责任承
担,也进一步削弱了赠与合同的价值。事实上,在赠
与合同中,当财产权利发生转移之前,受赠人有权行
使任意撤销权,使得合同归于消灭,合同的不确定性
也抑制了受赠人对合同履行的信赖,而交付标的物
则是缓解赠与合同不确定重要方式。不难理解,
当受赠人接受赠与人交付的财产标的物时,会因交
付行为产生更多的信赖,受赠人也有理由相信赠与
承诺,并为受领赠与标的物而进行准备行为。若此
时由于赠与人的过错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赠与
合同难以继续履行,受赠人因准备行为而产生的实
际损失,赠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此时,无论赠
与人是否行使撤销权,造成的损害既已成事实,相
应的责任承担不可避免,但具体受赠人请求损害赔
偿的路径,下文再详细论述。

(三) 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后

在赠与标的物完成交付或者登记之后,即受赠
人成为赠与财产的所有权人,此时赠与人故意或重
大过失损害标的物,受赠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
也应该单独讨论。

1. 赠与财产已经交付

赠与合同成立生效后,赠与人履行合同义务,向
受赠人交付约定的赠与财产,根据物权变动效力,受
赠人成为赠与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若赠与人的行为
导致赠与财产毁损、灭失,且能够证明其主观上存在
故意或重大过失,符合构成侵权行为的主客观要件,
则受赠人有权依据侵权责任向赠与人请求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2.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

实践中也存在赠与财产权利已经转移,但是赠

与标的物尚未交付的情形:如甲将自己的房屋赠与
乙,并办理了过户登记,另甲和乙约定该房屋仍由甲
居住,不动产完成了转移登记,物权发生变动。此
时,受赠人虽未直接占有赠与财产,但事实上仍为赠
与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赠与人故意毁损、灭失标的
物,损害受赠人的财产权利,赠与人承担侵权责任并
无疑问。但进一步思考,赠与财产权利已经转移,多
数情况下受赠人和赠与人之间已经就赠与标的物的
占有问题达成新的合意,受赠人也即具有相应的保
管义务,此时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赠与标的
物毁损的,则可能成立违约行为。再者,即使受赠人
与赠与人未对标的物的占有问题达成协议,此时赠
与人在占有标的物期间可能后悔赠与行为(因标的
物已经完成权利转移,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而故
意或重大过失致使标的物毁损,受赠人也完全可以
依据侵权责任请求损害赔偿。因此,当赠与财产权
利发生转移之后,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标的
物毁损、灭失,赠与人或承担侵权责任或承担违约
责任或承担侵权与违约责任的竞合。

三、受赠人请求损害赔偿保护的路径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知:当赠与合同尚未成立,以及赠
与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且赠与财产未交付时,赠
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赠与标的物毁损,赠与人
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当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后,无
论赠与标的物是否交付,赠与人或承担侵权责任或
违约责任或侵权与违约责任的竞合。只有当赠与财
产权利未转移之前,且赠与标的物已经交付时,赠
与人理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问题前文已论述。但
在该情形下,如何理解受赠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
以及损害赔偿的范围,这是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

合同法上损害赔偿的利益构造,不同法系对其
理论上的研究存在差异。在合同利益的问题上,大
陆法系的研究对象包括履行利益、信赖利益以及固
有利益;而英美法系则从期待利益、信赖利益以及返
还利益角度来理解。两大法系比较而言,大陆法系
的履行利益与英美法系的期待利益相似,通过追求
合同完全履行的状态,来实现对当事人的救济;而两
大法系的信赖利益都是使当事人最终获得救济的效
果为未曾信赖合同有效成立的状态。

(一) 受赠人信赖利益保护

赠与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其单务性和无偿性,无
偿性也使得不能将赠与合同与其他有偿合同等量齐
观,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也正是为弥补这种非平等的
对价关系而产生的,更侧重于对赠与人的保护,法理
与情理上都具有合理性。^[4]但并不能仅以不存在合同

上的合理对价而否认受赠人的权利,赠与合同仍然是合同的一种,在侧重保护赠与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受让人的利益诉求仍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公平规制双方的权利义务才是合同法的意义所在。而对于受赠人的权益救济途径,多数学者主张信赖利益保护。

信赖利益保护是在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上,对经济交往过程中的行为进行限制和保护,已经成为现代司法的基本共识。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对赠与人的意思表示产生信赖,并为受领赠与财产而做出必要准备,即产生信赖利益。^[5]传统理论上认为,赠与合同与一般双务合同在信赖利益的保护上应当区别对待。理由在于:一般地,赠与合同具有单务性和无偿性,受赠人在赠与合同中不承担义务,那么依据合同法权利义务对应性原则,对于受赠人的权利也应当予以限制。故有学者提出,除了对于公益目的等特殊赠与合同保留给付请求权以外,受赠人的权利仅限于给付受领权。该观点虽充分考虑到赠与合同的特殊属性,但并未全面考虑受赠人在赠与过程中的损益,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赠与合同中,受赠人的信赖利益被损害时,善意受赠人应该得到法律的救济,具体表现为信赖利益请求权。理论上对于受赠人的信赖利益保护并未引起较大的争议,但具体如何保护则存在不同认识,具体表现为英美法系的信赖法则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规则可供适用。^[6]

英美法系的信赖法则以法律强制力使原本无效的行为产生相应的合同效力,通过追求合同完全履行的状态,对受赠人所造成的信赖利益损害以期待利益予以救济。而缔约过失规则尊重法律对行为效力的认定,仅对因信赖法律行为而产生的损害加以补偿,进而实现赠与人与受赠人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7]首先,从一般合同意义上理解,当合同自始履行不能或因某种不可预见的事由使合同的履行已经毫无意义的情况下,最明智的决定应该是,免除当事人履行合同的义务及责任,即不要求期待利益,而要求其在返还依据合同所受领利益的同时,责令另一方当事人予以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即采用缔约过失规则。其次,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来分析,如果依据英美法系的信赖法则来实现对受赠人的彻底保护,使法律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形同虚设,赠与合同与普通合同在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上并无实质性差别,那么,对于赠与合同也无特殊规定的必要,这与现行法的立法目的不相适应。最后,考虑到赠与合同的特殊意义,该种规则方式更不利于鼓励赠与人的“无偿、慷慨”行为,存在以保护“受赠人的公

平”而牺牲“赠与人的公平”的嫌疑。

综上所述,当赠与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且赠与标的物已经交付时,对受赠人的信赖利益保护具有合理性,赠与人理应依据缔约过失规则承担损害赔偿赔偿责任。

(二) 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民事立法上并未对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理论上一般认为其责任构成要件主要包括:

第一,赠与合同已经成立。只有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双方当事人才有理由依据合同内容产生信赖而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故赠与合同成立是请求信赖利益保护的逻辑前提。需要强调的是,赠与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在理论上已经得到多数认可,我国“契约和非要式定性,辅之任意撤销权”的赠与与理论设计^[4]: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成立,同时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以实现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我国立法上也予以确认。

第二,非为不可撤销的赠与合同。无论是现行《合同法》还是新颁布的《民法典》都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公益性质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任意撤销权。对于特殊目的而排除撤销权的行使,赠与人拒不交付或者由于自身过错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

第三,赠与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且赠与标的物已经交付。在赠与合同中,其本身的单务性、无偿性特征使得对赠与人的侧重保护具有合理性,合同成立产生的效力不足以使受赠人完全信赖,故赠与财产是否已经交付对受赠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赠与人的行为造成了受赠人的实际损失。赠与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一定的行为之后必须对受赠人造成了实质的损害,否则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赠与人的行为未对受赠人造成实际上的损害,但仍以信赖利益主张权利,无异于使得受赠人获益,同时也加重了赠与人的负担。

第五,赠与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一般而言,学术主流观点认为合同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并不要求主观上存在过错。但由于赠与合同中权利义务不对等,若一味扩大赠与人的责任范围,则会导致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故当赠与人因主观上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受赠人实际损害时,适用信赖利益保护予以救济。

第六,受赠人善意且无过错。无论是赠与合同抑或是其他合同,依据信赖利益请求损害赔偿的一方当事人都应当是善意。在赠与合同中“善意”一

方面体现在受赠人基于对合同的信赖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在信赖的前提下进行的必要且合理的准备。受赠人只有在满足善意无过错的要求下才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基于对赠与合同的信赖而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并为此付出一定的财产利益,但由于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赠与物毁损,受赠人仍然可以依据信赖利益主张损害赔偿。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仅支持受赠人基于对赠与的信赖,而为接受该赠与付出了经济上花费的情况;对于受赠人并未付出相应经济支出的情况,基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性和无偿性以及赠与人受赠人双方利益平衡的角度来看,即使因赠与人的过错使得财产毁损、灭失,受赠人也未有其他财产利益的损害,缔约过失责任所保护的信赖利益,目的在于弥补损失而非使得受赠人获得其他利益,故受赠人无权主张损害赔偿。因此,只有当赠与合同成立生效后,受赠人因信赖赠与合同能够履行而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相应的利息损害,由赠与人承担损害赔偿赔偿责任,且赔偿数额以赠与标的物的价值为限。^[8]

四、结论

对于普通赠与合同而言,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赠与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是复杂的。因此,对于《民法典》将损害赔偿责任限定在特殊赠与合同的理解,不能认为直接否认了普通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而应当根据赠与财产权利是否转移以及赠与财产是否交付的实际情况而区别适用。

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所承担的损害赔偿或为侵权责任或为违约责任抑或是侵权与违约责任的竞合。特殊地,当赠与合同成立赠与财产权利尚未转移,且赠与财产已经交付时,因赠与人的过错导致标的物毁损,对受赠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能够通过对受赠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得以实现。而赠与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范围,也仅包括受赠人因信赖赠与合同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及利息。

参考文献:

[1] 王泽鉴. 债法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9.
[2] 宁红丽. 赠与人“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02-108.
[3] 宋崧. 因赠与人过错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的民事责任:析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九条之不足及其完善[J]. 人民司法,2010(13):76-80.
[4] 王文军. 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J]. 法学论坛,2010,25(6):142-147.
[5] 李永军. “契约+非要式+任意撤销权”:赠与的理论模式与规范分析[J]. 中国法学,2018(4):160-177.
[6] 王利明. 违约中的信赖利益赔偿[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报),2019,37(6):120-130.
[7] 尚连杰. 信赖利益赔偿以履行利益为限:从一般命题到局部经验[J]. 政治与法律,2017(11):117-127.
[8] 徐建刚. 违约中落空费用的性质及赔偿:基于信赖与信赖利益的区分视角[J]. 法学,2020(2):54-6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ability for Damages of the Giver

——Taking Article 658 and Article 660 of *The Civil Code (Draft)*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PEI Liping, HU Fangyuan

(Department of Law,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Civil Code (Draft)* limits the scope of the giver's liability for damages to the special gift contract, but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donee enjoys the right of claim for damages in the common ordinary gift contract in practice. From an explanatory perspective, the gift relationship is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tages, the nature of the donator's liability for damages in the corresponding stage and the basis of the claim right are analyzed,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ecipient's claim for damages is demonstrated from the view of reliance interests, so as to realize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donator and the grantor.

Key words: donation contract; the liability for damage; the right of withdrawing the contract at will; the reliance interest

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及解纷模式

张娜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00)

摘要:PPP模式是“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在实践中的典型运用,是公共服务领域行之有效的公私合作新形式,但长期以来存在的对PPP协议之法律性质及解纷模式的争议与误读严重影响了制度实效。对此,应当紧扣PPP模式的制度要义,准确把握政府在PPP模式中具有的“合作者”与“监管者”之双重角色,在此基础上,将PPP协议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民行混合合同”,并进一步推导出“行政+民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这一相对适宜的PPP协议解纷模式。

关键词:PPP;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08

中图分类号:D923.6;D922.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43-05

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规范性文件的不断出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在我国遍地开花,其中尤以公共服务领域为盛。在一般意义上,PPP模式是指“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1]。

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PPP模式自产生以来就不断被赋予新的功能期待,甚至一度陷入被“美化”“泛化”“金融化”“神化”的实践误区。^[2]地方实践错意中央精神的内在原因,在于对PPP协议之法律性质及解纷模式的误读,有鉴于此,本文拟从PPP模式中政府的双重角色出发,剖析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及应然的解纷模式,以期对PPP制度的功能实现有所助益。

一、PPP模式中的政府角色

理论基础是进行制度设计的元点,因此在分析PPP模式中的政府角色之前,有必要先对PPP模式的理论基础予以把握。由于PPP模式不仅具备传统的公法色彩,还因其关涉政府与市场、公益与私益、集体与个人等多重范畴而具备相当程度的私法魅力,是故,在传统公共物品理论上嬗变出的“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3]可以视为对PPP模式之理论基础的最

佳解读。该理论认为,提供公共物品的目的在于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PPP模式的本质在于政府资源与市场资源在数量、禀赋上的优势互补,并特别强调共赢理念、公平公正及风险共担,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各自的优势”^[4]。换言之,PPP模式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了公共服务领域,有效避免了公共物品垄断供给的风险,是对既有资源进行最优化利用的结果。

文归正题,作为涉及多领域、多行业、多方参与的复杂交易模式,PPP模式中的主体间关系也是多面的,主要表现为政府兼具“合作者”与“监管者”的双重角色:在横向层面,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受PPP协议约束;在纵向层面,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是监管与被监管的行政法律关系,法规政策成为政府的主要行为依据。也就是说,PPP协议中实际上存在双重法律关系:既包含着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平等买卖合同关系,又包含着双方分别作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监督管理者、生产经营者而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一)作为合作者的政府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一个核心的社会治理矛盾,即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接不够顺畅,也不够匹配,许多政府部门尤其是部分政府官员,固守着

收稿日期:2020-08-28

作者简介:张娜(1996—),女,江西上饶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治理思路。这种“事必亲为、权必包揽”的传统管理机制在面对信息化的社会治理时必然显得力不从心,具体到公共服务领域,一方面表现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高成本低效率,过度分散有限的公共管理资源;另一方面表现为民间潜伏的多股专业力量虽蠢蠢欲动,但始终没有足够的渠道通向公共服务领域,进而导致民间力量长期处于休眠状态,其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也始终不为社会公众所广泛享用。

对上述经验教训的反思催生了 PPP 模式。不同于政府单方面发布的“红头文件”,PPP 协议是意思自治的结果,要求双方在平等协商、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形成合意、订立合同,并秉承着法律意识、契约意识和信用意识严格执行合同,无故违约必须承担相应责任。因此,PPP 模式在诸多方面是对传统治理体制与模式的改造甚至颠覆:其一,在治理理念上,PPP 要求政府部门放低准入门槛、政府官员节制领导欲望,敢于和乐于通过 PPP 协议实现适度分权,并恪守契约精神以确保分权的顺利实现;其二,在工作原则上,PPP 要求政府遵循合作原则,尊重社会资本方的平等伙伴地位,与之共担风险、互相配合、平等协商、真诚合作,以最大程度落实 PPP 协议的各项约定,推动 PPP 项目的顺利开展;其三,在权责分配上,PPP 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切实履行对 PPP 项目的保障职责,例如构建制度完善机制,营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培育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市场,加大财税、价格、土地、金融方面的扶持力度,等等。

不过,在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平等伙伴关系以及政府对 PPP 项目的保障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不能因为强调合作而使公私两者责任不明、界限不清,否则必然导致制度设计的目的逐步落空,甚至为私人利益侵蚀公共利益大开方便之门。

(二)作为监管者的政府

虽然相较于其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PPP 模式更强调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平等伙伴关系,但“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代言人的身份没有转变、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实现公共福祉的责任没有转变、政府为保障公共利益而自然产生的权力没有转变”^[5]，“处变”与“求常”实际上兼容于 PPP 模式之中。

由于 PPP 项目往往生命周期长、涉及领域广、复杂程度高、专业性强,且关乎重大公共利益,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外部监管机制,即由政府基于“监管者”的身份,对 PPP 项目有关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行业标准、产品或服务技术规范等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并依法加强项目合同审核与管理,健全财政

支出责任监测和风险预警机制。按照项目的推进阶段,PPP 项目中的政府监管主要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其一,项目合作方选择时期的准入监管。由于政府的专长在于管理而非经营,其通常并不参与 PPP 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因此对作为项目实际执行人的社会资本方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准入监管的目的,即在于筛选出在资质、业务、给付能力与信誉等方面均符合标准的最佳合作者。其二,项目建设时期的绩效监管。为防止社会资本方偷工减料、畸形追求利润,政府有义务借助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运营管理、资金使用、公共服务质量、公众满意度等重要指标,对 PPP 项目的质量、价格、财务等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其三,项目结束时期的退出监管。在 PPP 项目如约终止或是因不可抗力或违约事件等原因而被迫提前终止时,政府应当对项目成果和附属设施的验收、估值、补偿、购买、移交等活动进行退出监管。

二、PPP 协议的法律性质

PPP 协议的法律性质会深刻影响 PPP 模式的制度设计与发展走向,尤其是其直接决定了对 PPP 协议解纷模式的选择,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于此存在“民事合同论”“行政合同论”“混合合同论”等不同观点。数往知来,对上述学术观点的概括梳理有助于更准确全面地把握 PPP 协议的法律性质。

(一)民事合同论

民事合同论者侧重于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平等伙伴关系,强调政府在 PPP 模式中的“合作者”身份,因而该观点主张 PPP 协议应当属于民事合同。主要论据有二:

其一,PPP 协议的签订符合私法自治原则。论者认为 PPP 协议中的社会资本方合作者虽然是通过招投标等行政程序产生,而非普通民事合同遵循的“要约+承诺”的形式,但招标投标程序只是价格产生方式,社会资本方仍然有权选择是否参与投标、是否签订合同,并有权与政府协商合同中利益相关条款。换言之,社会资本方主体在 PPP 协议的签订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合同最终签订仍然是协商一致的结果,总体上体现了私法合同平等自愿原则。

其二,PPP 模式中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对等。论者主张在 PPP 中,政府并非以行政主体身份,而是以民事主体身份与社会资本方进行合作,即便其间存在一定的政府干预,也不会影响到 PPP 作为市场交易行为的本质。因此,二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同时,双方的权利义务主要来自合意签订的 PPP 协议,各条款均是双方意

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因此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基本是对等的。

(二)行政合同论

与民事合同论者相反,行政合同论者更为关注政府在PPP模式中的“监管者”角色以及据此享有的各项监管职权。论据有二:

其一,从政府对PPP项目的监管职责看:所谓民事合同,核心在于双方地位平等、权利对等,但在PPP项目中,政府发挥作用主要表现在监管职权的行使,这种监管权深入PPP项目的各个阶段,早已超脱了民事合同论者主张的“不影响协议性质的适度的政府干预”的程度。换言之,政府监管权的存在决定了政府与社会资本方之间必然是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作为权责分配重要依托的PPP协议自然不可能是民事合同。

其二,从法规政策的角度看:根据《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工作导则》,PPP模式主要包括特许经营和政府购买服务两类,而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已被《行政诉讼法》第12条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宁唯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1款进一步说明,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1项规定的行政协议,而作为PPP协议之典型代表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则是公认的最为常见的行政协议。

(三)混合合同论

混合合同论者主张,PPP协议兼具公法与私法性质,因此非属于民事合同或行政合同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一种混合合同。这同时也是本文意图阐明的立场。“混合合同论”作为PPP协议之法律性质的比较优势在于:更全面,更实用。具体而言:

其一,混合合同论更全面。虽然PPP模式中存在政府与社会资本的长期合作关系,但合作只是手段,公益最大化才是目的。换言之,“公私合作协议中,公共利益是首要的,是目的性质的;社会资本方合作者的利益是次要的,是手段性质的”^[6]。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激发社会资本通过PPP项目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事业的内生动力,是灌注在制度设计中的互利共赢理念,PPP模式在秉持“公益为本”理念的同时,还必须兼顾私人利益的实现。然而,“公益为本,兼顾私益”的双重任务在实践中却常常演化为“公益牵制私利、私利‘锁定’公益”的冲突与博弈,“过于强化私法容易导致公共利益的削弱,而偏

重公法又无法调动私人资本参与公共项目建设和公共服务的积极性”^[7]。而这正是片面强调PPP协议的民事合同属性或行政合同属性所隐含的制度危机。相反,混合合同论对PPP协议的公私法特征表现出了足够的包容,其既强调在PPP协议的制定、修改及权责分配中贯穿公益至上理念,又要求政府通过合理确定投资回报率、适度保证市场需求、公平设置价格机制等方式,对私利予以充分的尊重与保护。对PPP协议的此种定位,既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又能防范政府过度让利与非法利益输送,因此更为全面。

其二,混合合同论更实用。从实践角度,“无救济不权利”,对PPP协议之法律性质的定位必须服务于争端解决,在PPP模式已被推广到教、科、文、卫等诸多公共服务领域的既定现实面前,单一的民事合同论或行政合同论显然无力应对纷繁复杂的PPP协议争端。具体而言,PPP协议根本区别于传统的民商事合同和行政协议,“在物理形态上,PPP协议囊括PPP项目实施中多种合同,具有合同群的属性;在法律关系上,PPP协议所涉法律关系既包括民商事法律关系也包括行政法律关系”^[8]。因此,PPP协议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子协议在法律性质上,既可能是平等交易的民事合同,也可能是涉及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合同;所牵涉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和社会资本方,还可能存在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社会公众、PPP项目的建设者、运营者、投融资主体等利益相关方;相应地,主体间产生的权利义务纠纷,既可能属于民事争议,也可能属于行政争议。这种复杂特质决定了由单纯的民事合同论或行政合同论引申出的单一救济途径是远不能完成定分止争的艰巨任务的,必须通过混合合同性质方能推导出合理的解纷机制。

三、PPP协议的解纷模式

正如有关PPP协议之法律性质的民行之辩一样,PPP协议的解纷机制也存在民事途径抑或行政途径的激烈争论。于此,学界主要存在两种立场,一是整体解决说,二是区别解决说,且两种立场之下,又可细分出多个不同的具体路径。

(一)PPP协议解纷模式述评

1. 整体解决说

整体解决说主张解纷模式的选择取决于PPP协议中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若为行政纠纷,则采整体行政救济模式;若为民事纠纷,则采整体民事救济模式。其又可细分为整体行政救济论和整体民事救济论。前者认为PPP模式中蕴含的“行政”因素

是选择解纷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即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并非平权关系,而是纵向的行政监管关系,因此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只能诉诸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途径;后者认为将 PPP 协议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均难以自恰,而民事救济无论在救济力度还是救济经验上均更有利于市场主体的权利保护,是故应当采用整体民事救济的方法解决 PPP 协议纠纷。

2. 区别解决说

即“民事+行政”二分法,认为无论是民事救济还是行政救济,在 PPP 协议争端解决中均有适用空间,应当区分情况分别适用。区别解决说又可分为双阶理论与区别行为说两种具体路径:前者主张将 PPP 协议的签订时间作为区分节点——签订之前发生的争议通过行政诉讼方式解决,而签订之后的履约争议则应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后者则主张将行政行为的作出与否作为区分标准——非因行政行为而是因协议本身产生的纠纷,采民事救济;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采行政救济。

本文认为,以上解纷模式各有优缺,在 PPP 协议争端解决中均不能独挑大梁。首先,整体解决说不够全面,也不够适用,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 PPP 实践。因此,区别解决说应当成为考虑 PPP 协议解纷机制的大方向。但双阶理论与区别行为说同样存在一定适用难题。就双阶理论而言,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机械地以协议签订时间为界区分救济类型,这将人为割裂实体法律关系和救济程序;就区别行为说而言,由于“PPP 协议实际上是交叉交叉式结构,横向层面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法律纠纷,纵向层面有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行政法律纠纷,但是在中间尚存民商事和行政纠纷混合的形态,无法从根本上区分开来”^[9]。这就要求 PPP 协议解纷机制的制度设计中应当包含针对民行混合纠纷的可行方案,而这正是区别行为说的力所不能及之处。综上,本文认为,应当遵循区别行为说的整体思路,并纳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作为补充,进而建立“行政+民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多元解纷机制。

(二)“行政+民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之解纷模式的具体实现路径

PPP 协议解纷机制的目标,应当是尽可能使所有类型的纠纷均有相对应的解决渠道,各种权利救济途径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既无“叠床架屋”之累,又无“百密一疏”之忧。而“行政+民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之多元解纷机制在应然层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靠近这一制度目标。这一模式展开而言,涵盖

五种解纷途径,分别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仲裁、民事诉讼,以及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区分各种途径的标准,取决于争议本身的性质,而争议的性质又主要看是不是政府行为的性质,即行为是不是基于行政职权而作出的行政行为。

首先,若争议内容性质单一,则区分采用民事救济或行政救济。根据《行政复议法》第 1 条和《行政诉讼法》第 12 条,行政复议的对象,应当是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的对象,应当是侵犯私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也就是说,非行政行为不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之列。具体到 PPP 领域,若争议起因于政府基于规划、许可、管理、监督、强制、处罚等行政职能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诉讼法》第 12 条所指出的“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之典型情形,则属于行政争议,应当走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若争议内容并不涉及行政权力的行使,而是在 PPP 协议的履行、变更、解除、违约责任等方面存在意见分歧,“常见的包括土地使用权的取得、项目产权的归属、项目收益的分配、项目公司融资、项目担保、工程建设、项目收益权抵押、项目回购、税费负担、违约责任等”^[10],则应当属于民事争议,走仲裁或民事诉讼途径。

其次,若争议内容为民行混合纠纷,难以分辨或分解各行为的公私法属性,则适宜通过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予以解决。此处所谓的“难分性”,大致区分为两种形态:一是“实体难分性”,即“有关民事权利义务的约定与行政权利义务的约定相互交织、难以完全分离”;二是“程序难分性”,即某些 PPP 协议纠纷的内容较为复杂,难于判断案涉行为的属性,则在实践中可能导致纠纷的实体内容虽然相同,但最终选择的诉讼类型却因不同法院或法官的审判风格和价值判断而截然不同,以至于造成程序上的自相矛盾。

同时需要注意,“如果合同内容本身已经复合了行政权力行使的后果并以平等合同的形式确定为合同内容,对该合同内容引发的争议不应排除作为民事纠纷进行处理。而对合同之外的行政行为,仍可由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并按照行政诉讼处理”^[11]。此处所谓“合同之外的行政行为”,主要指合同履行过程中,政府另以积极的行政行为推翻了 PPP 协议中已承诺或认可的意思表示,则此时不应当再被视为单纯的民事违约,而是应当看纠纷是否仅由该新作出的行政行为引起,若是,则走行政途径;若否,则走民事途径。

此类民行混合纠纷选择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优势在于:第一,能够在定分止争的同时维护公共利益。由于案涉纠纷具有公私法混合属性,此时秉承“公益至上”的制度设计理念,应当优选行政诉讼作为主导,即由行政庭来主持审判。这种发生于行政庭内部的“行政诉讼+民事诉讼”解决方式,既避免了案件在不同诉讼类型与审判庭之间的频繁切换和跳跃,又方便了审判法官全面审查、通盘考虑,进而一体适用相关的民事与行政法规,更有利于妥善解决争议,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实现平衡。第二,符合“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的根本理念。如前所述,“交易成本公共物品理论”是 PPP 模式的理论基础,其旨在“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区别于大刀阔斧新设“特殊纠纷解决机制”的方案,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最大化现有资源利用率的结果,能够维护三大诉讼体制的既有框架,不至于付出伤筋动骨的代价。换言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能够实现立法成本最小化,降低 PPP 模式的总体成本。

四、余论

PPP 模式虽然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但也因其属于新生事物而面临诸多未知性与不确定性。在既有制度供给不足以解决 PPP 模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时,应当从目的论的角度去寻求思路。质言之,一切旨在解决制度难题的方案,都应当回归制度目标本身,至于 PPP 模式,制度设计的目标即是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应当紧紧把握政府在作为“合作者”与“监管者”时分别享有哪些权

利义务、辨明 PPP 协议纠纷的产生机制和内在原因,唯其如此,方能在应对各类新型矛盾时找到符合设计者初衷的最佳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EB/OL]. [2020-08-16]. http://www.gov.cn/zhengce/2016-05/22/content_5075602.htm.
[2] 喻文光. PPP 规制中的立法问题研究:基于法政策学的视角[J]. 当代法学,2016(2):77-91.
[3] 邢会强. 走向规则的经济法原理[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65-66.
[4] 邢会强. PPP 模式中的政府定位[J]. 法学,2015(11):17-23.
[5] 刘力. PPP 项目合同性质证伪与补正[J]. 时代法学,2019(2):87-94.
[6] 梁风云. 公私合作协议的公法属性及其法律救济[J]. 中国法律评论,2018(4):180-189.
[7] 胡改蓉. PPP 模式中公私利益的冲突与协调[J]. 法学,2015(11):30-40.
[8] 邢昕,沈思达. 民事抑或行政诉讼:进退维谷间的 PPP 协议纠纷[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5):149-158.
[9] 尹少成. PPP 模式下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的挑战及应对[J]. 行政法学研究,2017(6):114-124.
[10] 潘军锋.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法律疑难问题研究[J]. 法律适用,2017(17):73-78.
[11] 焦洪宝.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争议的解决方式[J]. 政法论丛,2018(4):115-12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Legal Nature and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odel of the PPP Agreement

ZHANG Na

(Faculty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PPP model is a typical application of “transaction cost public goods theory” in practice, and it is a new form of effective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public services. However, the long-standing disput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related to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PPP agreement and the dispute resolution model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closely follow the essentials of the PPP model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dual roles of the “cooperator” and “regulator”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PPP model. On this basis,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PPP agreement is defined as a “civil-bank mixed contract”, and a relatively suitable PPP agreement resolution model of “administrative+civil+administrative incidental civil litigation” is further derived.

Key words: PPP; transaction cost public goods theory; administrative incidental civil litigation

新时代民俗剪纸的创新与传承研究

张朝晖

(河南大学 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民俗剪纸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新时代民俗剪纸发展面临生存空间被挤压、题材内容陈旧、技艺传承不畅、市场转化困难等种种问题。在对非遗传承保护高度重视的当下,创新是民俗剪纸发展的关键,题材上的推陈出新、内涵主题上与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契合、技艺上的提升、风格上的时尚化与个性化审美熔铸是民俗剪纸满足新时代社会需求与消费偏好的现实出路。拓展民俗剪纸的生存空间、着力活态传承、开展剪纸进课堂活动、开发文创产品、塑造剪纸文化品牌是创造性传承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新时代;民俗剪纸;创新与传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09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48-05

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剪纸是诞生于我国古代民间最质朴最富有艺术气息和东方韵味的造型艺术。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群体文化记忆和精神的象征。在民俗生态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民俗剪纸的生存、发展与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挑战。民俗剪纸如何创新发展,不仅是事关民众文化生活与民众审美教育的问题,还关切到传统优秀文化的弘扬和民族文化心理认同,也是非遗民俗剪纸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看,以往学者对剪纸艺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剪纸渊源、发展历程等的溯源式的历时研究,以及对剪纸艺术的工艺、造型、风格、题材、传承与保护等某一方面的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研究成果也极为丰硕,尤其是史论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①这些研究为剪纸艺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并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发意义。但从整体上看,当前研究视角单一、分散,多以区域剪纸为主,缺乏系统整体的考察,对新时期剪纸艺术的创新发展研究力度不够,创造性传承方面也缺乏清晰的路径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新时期民俗剪纸的发展创新与创造性传承做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希望本研究能为新时代民俗剪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一、非遗民俗剪纸的生存困境与发展契机

生态环境巨变下传统剪纸艺术的生存现状堪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剪纸艺术诞生于我国古代农耕社会、依托各种民俗活动而存在,是民众社会生活和精神需求的艺术表达方式,农耕社会的经济土壤和社会组织结构滋养了剪纸特有的内涵和表现特征。但近现代以来,随着小农经济的解体和社会的转型,在价值多元化、时尚化和文化商品化的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信仰和审美情趣发生了重大转变,传统剪纸赖以生存的民俗空间被严重挤压,民俗剪纸自身所蕴含的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心理需求差别较大,传统的剪纸题材内容、功能与新时代多元化的诉求不相契合,剪纸艺人逐年减少,剪纸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这些问题反映着民俗剪纸在当下的生存面临诸多困境和考验,这一切表明:民俗剪纸自身要发展就

收稿日期:2020-04-15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剪纸艺术与节日习俗研究”(2020-ZZJH-081)

作者简介:张朝晖(1971—),男,河南通许人,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剪纸艺术的创作、教学和研究工作。

必须有所突破,民俗剪纸的题材、内涵和功能都需要提升、转变。新时代环境下民俗剪纸如何与时俱进起到文化和价值引领作用,剪纸内容如何创新以满足现代人的消费心理,剪纸题材如何突破以满足日益凸显的个性化需求,剪纸技艺如何提高以满足民众不断变化的审美需要,剪纸艺人逐年减少与剪纸传承后备生力军不足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剪纸创作、运营如何与市场高度融合,等等,这些不仅是剪纸创作和保护的实践问题,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复兴的重要问题。

民俗剪纸的发展虽然遇到了种种问题,但也面临转型发展的重大契机。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非遗民俗剪纸的保护和传承,通过大量的调研、访谈,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出台了诸多相关扶持政策,立法部门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也采取了种种切实可行的挽救和保护措施。早在1979年,中国文联、国家民委、原国家文化部等部门就联合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民间文化艺术的普查与调研工作。1997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保护传统工艺美术条例》,明确了国家以及各级政府在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中的责任和义务,剪纸艺术也在保护之列。2003年原国家文化部正式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民间剪纸位列其中,成为中国民间十大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之一。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十一次会议批准了2003年11月3日在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9年9月30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审批,中国剪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第四批。2011年2月第十一届人大十九次会议又通过并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特别是2015年“十三五规划”将“振兴传统工艺”首次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之中,2019年1月,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同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调研时指出,党中央支持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培养好传承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同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说,“非遗”保护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为新时期非遗民俗剪纸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剪纸艺术传承与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我们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高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非遗民俗剪纸的发展也应该乘上改革发展深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东风,充分发挥剪纸艺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华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提高民众审美情趣,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提高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着手,建立起以剪纸技艺传承、工艺创新、内涵提升为关键的适合民众文化生活和审美心理需求的保障和创新机制,为剪纸艺术的未来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简而言之,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机遇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艺术的生存现状、困境、传承、创新和发展出路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提出有建设性的行之有效的发展和保护措施,以指导剪纸艺术创作活动的实践极为重要,也势在必行。

二、新时期民俗剪纸的创新发展指向

新时代民俗剪纸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必须立足于民俗剪纸生存环境的变化和市场需求,在新的文化语境和当下民众的心理与审美需求下,紧紧围绕剪纸的题材突破、内涵主旨创新和剪纸技艺提升等创作的实践出发,进行系统分析和探讨,才能厘清民俗剪纸发展的内在理路,从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创新发展路径,推动民俗剪纸的可持续发展。

1. 剪纸题材创新:时代性与先进性。题材是表现作品主题思想的素材,是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剪纸题材是经过剪纸艺人集中、取舍、提炼来表达生活感受、社会认知和审美诉求的主题元素,与艺人的生活环境、地域习俗和时代风情有关,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民俗剪纸作为农耕时代诞生的民间艺术形式,其题材打上了农耕社会特有的深深的烙印。因此,传统民俗剪纸的题材多与农耕生活、风俗礼仪、神话故事等有关,表现元素多以民间喜闻乐见的花草虫鱼、家禽瑞兽、戏曲或神话人物等为主。这些题材在今天的剪纸作品中仍然十分常见,民众虽然也十分喜欢,但这些传统题材毕竟与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兴趣爱好有一定的距离,难以产生时代共鸣和心理回响。因此,民俗剪纸在题材上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在题材选取上应遵循“不泥于古、不背乎今”的原则:一方

面可仍然选取经典优秀传统题材进行创作,比如《清明上河图》《八十七神仙卷》《百子图》《穆桂英挂帅》《老鼠娶亲》《嫦娥奔月》等大型传统题材作品和吉祥如意的节日剪纸以及窗花等小型传统题材作品,丰富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满足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唤起民族群体文化记忆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探索创作全新的题材,体现时代性和先进性。比如,剪纸艺人可创作反映新时代新生活新风俗的剪纸作品,如环保题材、文明婚丧题材等;或创作合乎社会提倡的公序良俗题材的剪纸作品,如尊老爱幼题材、孝亲题材等;或创作符合年轻人口味的时尚前卫题材的剪纸,如个性化的人物剪影、游戏人物题材等。剪纸题材创新的关键是要与时俱进、符合社会发展和多层次需求,紧贴时代发展和民众生活与心理需要,并与民族精神传承相一致,从文化记忆与价值引领方面,发挥民俗剪纸的文化功能。

2. 剪纸内涵出新:思想性与价值引领。剪纸的主题与寓意在剪纸创新发展中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那些主题明确、内涵丰富的剪纸作品总是深受民众的喜爱。剪纸的内涵及其象征意义是人们接受和喜爱它的重要因素和文化符码,因此,新时代的剪纸创作在这方面要特别重视。剪纸内涵的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借鉴和保持传统剪纸艺术最擅长的纳吉、祈福、祛邪、除恶、劝勉、警戒、趣味等主题寓意表现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创作体验,继续创作出民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题材剪纸作品,或新旧元素融合,将民众新的期盼、美好祝愿融入传统剪纸作品之中。二是契合时代所需,创作出富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教育性的剪纸精品,使其成为时代价值的重要载体。思想性体现在主题突出,符合时代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反映国家民主、富强、文明、公正、廉洁、诚信、友善等主旋律题材的新时代剪纸作品,宣扬真善美等美好事物和情感,潜移默化,起到价值引领作用。如:可剪刻出《焦裕禄》《反腐倡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等富含正能量的剪纸作品,以弘扬新时代发展的主流价值观。剪纸的艺术性是剪纸深受喜爱的重要因素,剪纸艺人不仅要注重理论素养的吸取,更要注重艺术本身“妙在自然,贵在天真”的艺术本质要求。形式上新颖,内涵上丰富,艺术上道法自然,能给予人产生发自内心的呼唤与观者产生共鸣的作品,即为好作品。教育性体现在剪纸作品内涵可以起到教化引导,传达更多的正能量和科学艺术知识,与人们追求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相一致。剪纸艺人可以将中国梦、讲好中国故事和科学

文教知识等内涵融入剪纸创作中,培养民众的艺术感受能力和民族凝聚力,起到文化引导和科普教育的作用。

3. 剪纸技艺提升:守正创新与审美指向。民间剪纸是造型艺术,构图、用色、刀法等构成剪纸技法的重要几环,剪纸技法的提升就需要从这几个方面下功夫。从用色上来讲,传统剪纸多为单色单层剪纸,新时期此方面技法的突破原则上是守正创新,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适当地探索多层多色,目的是丰富剪纸艺术的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使剪纸作者内心的思想表达更充分,人民大众更喜欢、更乐于接受。在刀法或剪法上,传统剪纸有阴刻、阳刻或阴剪、阳剪之分,阳刻(阳剪)的特点是“线线相连”,镂空雕刻,南方剪纸多善用,使用阳刻(阳剪)技法的剪纸作品其线条清秀、细腻。阴刻(阴剪)多见于北方剪纸,特点是“线线相断”,阴刻(阴剪)技法的剪纸作品风格质朴、粗放,线条感强。也有阴阳剪法(刻法)同时使用在一张剪纸作品上的,但难度较大,这种混合技法的提升空间还很大。新时期在剪纸技法的使用上,一方面可以保持以阴刻(阴剪)为主或以阳刻(阳剪)为主的单独技法来表现,另一方面可以在阴阳剪的结合上寻求技术突破。阴阳剪法的结合,表现力更强、更丰富,更能体现均衡对称、虚实相济、疏密有致的和谐流畅之感,装饰效果更强,也能满足人们不断变迁的审美需求问题。此外,还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和电脑设备来创作以提高技艺,如:可利用电脑三维技术使剪纸人物线条更流畅,表现更丰富,造型更立体,细节性更强。这些新的技法既注重传统审美和意象性特征,又满足现代审美对时尚、前卫等的文化需求和消费偏好。剪纸技法的提升能够使这一古老的民俗传统获得现代原创力和生命活力。

4. 剪纸风格独特:时尚化与个性化。剪纸艺术作为一种造型艺术有其独特的风格。由于受使用材料(纸张)和剪法技艺的不同、地域风俗的异同以及剪纸艺人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每幅剪纸作品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或浑厚繁复,或清新淳朴,或简洁明快,或夸张变形,各有特点。但文化商业化的今天,剪纸艺术在适应市场化的同时如何保持其天然独特的风格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新时代传统剪纸如何平衡艺术水平与文化工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民俗剪纸发展创新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传统剪纸是一代一代民间剪纸艺术家纯手工匠心制作出来的,赏心悦目,艺术价值高。但发展传承缓慢,形不成规模效益。现代大批量工业化生产的

剪纸作品传播广,发展快,但失去了原有的那份天真自然和淳朴,艺术性差,追求量的结果可能会毁掉传统艺术的韵味和魅力,使人们失去对剪纸艺术的兴趣。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把握好度,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须切记不要一味地迎合市场口味,使其成为过度市场化和碎片化的粗制滥造的文化。在消费时代价值追求多元化的背景下,剪纸要发展还需要契合消费者的个性化、时尚化诉求,在造型和装饰风格上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如:可将传统的窗花改成大型屏风满足一般消费者的家装需求,还可创意性地剪成《梅兰竹菊》《春夏秋冬》《四季平安》等四条屏挂轴,更好地满足文人雅士的喜好。剪纸装裱方面,在保持原有装裱形式的基础上应尝试采用新形式、新材料、新方法,使剪纸的装饰性、艺术性、审美性得以更好地展现。

三、新时期民俗剪纸的传承路径

上述所谈的剪纸创新属于剪纸发展的内生性生存能力,创造性传承则可以为剪纸持续性发展赢得活力和生命力,这需要借助于保护机制和外部推动力量,使创新发展与创造性传承相辅相成。新时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政策引领下,开辟出民俗剪纸的创造性传承路径显得极为重要。

1. 搭建各种活动平台,拓展剪纸生存空间。由于民俗剪纸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农耕社会结构的解体、民俗社会生活事项及节日礼俗活动的减少与淡化,使得民俗剪纸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剪纸艺人减少,剪纸艺术的传承举步维艰,新时期剪纸艺术发展的空间亟待拓展。剪纸艺术生存空间的拓展需要紧紧围绕剪纸依存的社会基础、市场需求等民俗活动和民众生活的切实需要,从更深层的视角探讨拓展的可行性和方法措施。一方面,利用好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弘扬和保护传承民间剪纸艺术的政策支持和专项资金的扶持,从实际出发下大力气切实推动剪纸的发展,这是剪纸传承的有力保障和发展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借助于政府、民间等多方力量,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剪纸展览、学术交流活动,开设民间剪纸艺术博物馆,建数字化剪纸纹样题材技艺数据库,借助节日庆典举办民间剪纸比赛,等等,为剪纸艺术创造一个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些举措不仅能激发剪纸艺人的创作激情,对剪纸艺术创新也起到推动作用,而且通过营造剪纸文化生存的空间,使剪纸艺术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使其独特的审美情趣重新为人们所接受和喜爱,使剪纸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

2. 着力活态传承,打造剪纸体验场馆。“活态

传承”是近几年关涉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提的最响亮的一个词,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发展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护和传承,是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进行传承与发展的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方式能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活态传承也是剪纸艺术传承的关键,要着重于剪纸生产和制作的技艺展示和体验,激活传承过程中的活力和动力,扩大社会影响。与物质遗产或自然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的是它的非物质性和人的主体作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剪纸艺术,它的主体和核心是剪纸艺人和剪纸技艺,因此,非遗剪纸艺术的活化策略就是围绕着人和技艺做文章,运用新媒介技术将剪纸技术数字化、影像化,或者打造“传统剪纸技艺展示体验中心”或“传统剪纸技艺工作坊”等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让人们切身感受和体验剪纸的制作技艺,领悟剪纸艺术的创作之美和劳动人民的智慧,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的追求。活态传承,不失为剪纸艺术在新时代发展的新路子和新方向。

3. 剪纸走进课堂,发挥教育传承功能。传统剪纸技艺多以家庭传承和师徒传承为主,伴有集体社会传承。新时期剪纸艺术的普及与传承需要更多的传承方式和更多人的参与。虽然全国各地曾实施过剪纸艺术研培计划,如2019年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支持下,各地依托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剪纸类),开展技能培训多期,组织大家学习、研讨、交流,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影响面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稳定而又持久的措施是让剪纸艺术走进大中专和中小学的课堂,实施从理论到实践更系统的传授,普及率会更大。目前已经有一些有条件的中小学将剪纸艺术引入到传统文化教育的课堂,如在四川泸县海潮镇学校、浙江海盐石泉小学、江西抚州市东乡区的学校等都开展有剪纸艺术课程。一些大学也越来越多地重视包括剪纸艺术在内的民间艺术教育,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全国首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地,该校就开设有专门的剪纸课程,并邀请著名的南京剪纸国家级传承人张方林到剪纸课堂授课,深受学生的喜爱。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也特邀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剪纸艺术家叶松清先生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全体学生开展剪纸课堂教育。作为剪纸艺术教育者和研究者,本人近几年来一直在河南大学文旅学院文化产业、国际汉学院国际教育和文学院对外汉语等专业尝试课堂剪纸教学,收效显著。非遗剪纸进校园这种教育传承方式,不仅可以达到对新生代剪纸艺术的知识传承和文化认同

能力的培养。还可优化剪纸传承方式,推动中小学和高校作为剪纸文化新的增长空间,提高剪纸艺术创作与传承的能力。

4. 开发剪纸文创产品,塑造剪纸文化品牌。剪纸艺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创意转化。从目前的情况看,剪纸艺术的创意转化非常薄弱,这就需要借鉴故宫文创的成功经验,从文化与商业结合的角度,将现代品质和生活情趣融入剪纸的设计创新之中,并重视剪纸艺术与其他文化品牌的跨界合作,将剪纸艺术变成可携带的文化符号,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创造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实现剪纸文化消费的升级。在新时代还需借助新媒体技术,重视剪纸文化资源挖掘与流量转化,将剪纸内容生产与平台机遇结合,借助新一轮地方消费转型的时机和潮流,将民俗剪纸打造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民族文化品牌。例如 2018 年天猫出海中的“非遗”扶植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and 发展的契机。2018 年 4 月,天猫对外宣布“天猫中国匠人计划”全面升级,要孵化至少 20 个千万级年产值的中国匠人天猫店铺,并推动优秀非遗文化产品通过天猫海外平台行销全球。优秀的非遗剪纸文化品牌就可以借机通过匠人入住、流量、创新再造等天猫平台全链路的支持实现海外行销,并借此平台,使非遗剪纸品牌自身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成为沟通和连接中国文化与海外华人的情感纽带,还可以在文旅深度融合语境下将非遗民俗剪纸产品转

化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创产品,如 2019 年 6 月“中国非遗文旅执行”项目中由去哪儿网推出的“非遗非常潮”百条旅游专线便是一种尝试,沿线的剪纸艺人就可以借此契机创造和设计出具有民族特色和现代时尚感强的剪纸文创产品,使其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潮品”,成为文旅市场靓丽的文化名片。文化与经济结合,能够使民俗剪纸在保护和开发的矛盾之间获得一条可行路径,既是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传承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种重要方式。

四、结束语

创新发展与创造性传承是民俗剪纸艺术发展永恒的命题。本研究力图从内部内生性创新与外部生存空间拓展两个方面去探究,构建出一条新时代剪纸艺术创新发展和传承的新路径。希望这一探讨能抛砖引玉,推动剪纸艺术与民俗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为剪纸艺术的发展开出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新路子,促进剪纸文化传统的当代传承。

注释:

①王树村《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年版;陈竟《中国民俗剪纸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吕胜中《中国民间剪纸(上、下)》,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 年版,等等,这些都是剪纸史论方面研究的力作。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Folk Paper – Cut in the New Era

ZHANG Zhaohui

(School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Folk paper – cut is an importa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China,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an important symbol of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paper – cut is faced with various problems, such as the extrusion of its living space, obsolete themes and contents, poor inheritance of skills, and difficulties in market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paper – cut at the moment when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heritance. The realistic way to meet the social needs and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in the new era is to bring forth new ideas in themes, to fit in with the mainstream values of the times in terms of connotation and theme, to enhance skills, to fashion in style and to create personalized aesthetics. The main paths of creative inheritance are to expand the living space of folk paper – cut, to carry out vivid inheritance, to carry out paper – cut classroom activities, to develop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o shape paper – cut cultural brand.

Key words: new era; folk paper – cut; innovation and inheritance

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徽州民谣数字化传承

赵 昕,陶 然

(安徽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摘 要:在信息化、全球化社会转型中,乡土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使得群体性“文化认同”与“场所精神”的危机日渐凸显,也造成了徽州民谣在传承中呈现出“理解有限、认同感低、推广困难”的现实困境。从文化认同理论出发,对徽州民谣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等方面进行规划和重构,以数字技术与视觉设计相结合,将徽州民谣传统表现形式“听、唱”与增强现实技术下的“视、触”相融合,形成多感官交互体验的“数字场域”,并通过数字化应用成果的构建,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扩宽其文化认同体系,在吸引公众参与体验的过程中,由点到面的提升徽州人民的文化认同感。

关键词:设计艺术学;新媒介;文化遗产保护;民俗符号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10

中图分类号:J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53-05

一、徽州民谣研究面临的困境

徽州民谣在古徽州“一府六县”范围内产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的徽州“环境母体”下呈现出的艺术表征。其内容反映了徽州人生产、生活和精神领域活动的大量信息,具有极高的艺术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史学等学术价值。

但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网络文化的冲击下,依赖独特地缘文化、口头传颂、技艺型传承的徽州民谣,面临着“理解有限、认同感低、推广困难”的现实困境。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由于方言吟诵的特点,徽州民谣的传播仅限于发源地及其周边,而其他地缘文化下的公众对其吟唱的内容理解有较大难度,不利于徽州民谣跨地域跨文化的传播;徽州民谣属于口头化的遗产,其表现形式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且相关文献记述非常零散,导致可供参考的资料较少。笔者在与安徽省博物馆、档案馆、收集整理者(当地的退休教师、乡镇村干部或文化爱好者、高校研究者)交谈中,常感到他们对徽州民谣传承深深的担忧;徽州民谣这一文化类别的产生,通常需要经历长久的认同积累与渐变发展过程,并随着时代文化语

境的更替,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曲调与唱词。但当下年轻人甚至都不知当地有民谣,更无法去创造新时代的徽州民谣,因此本课题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二、数字化技术在徽州民谣传承中的理论框架研究

我国关于非遗领域数字化研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已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轨道,一些问题也逐渐地显化:民族文化基因在非遗数字化传承中信息量有限,当下非遗数字化传承多通过商业途径得到发展,民族文化信息的寄载性并不强且同质化现象严重,公众只见其“形”而不见其“神”,无法建立文化认同感;非遗数字化传承载体单一,数字化保护与有效传承主要是寻求合适的载体进行转化。目前比较主流的载体形式是物质载体、空间载体、数字载体,但呈现出重实体轻虚体的发展趋势,例如大力兴建博物馆、艺术馆、博览园、民俗文化村等,而忽略了其背后“人”与“文化”的存在,呈现出见“物”不见“人”的势态;对非遗文化内容诠释深度与广度不够,片段式采用单一化的文化载体,例如照片、视频、

收稿日期:2020-0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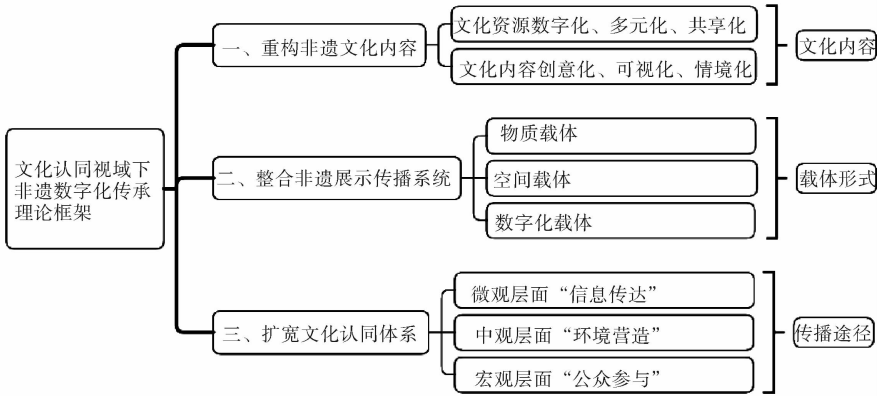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科学研究项目“5G时代视域下徽州非遗舞蹈艺术的数字化传承”(SK2020A0037);安徽财经大学“新媒介互动性绘本应用研究——以安徽二十四节气民俗绘本为例”(ACKYC19076)

作者简介:赵昕(1988—),女,安徽蚌埠人,硕士,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新媒介与非遗文化创新设计。

文创产品等,缺乏全方位的对其背后“文化母体”与发展脉络的诠释;参与反馈距离较远,接近与参与是影响反馈行为最重要的因素,在非遗展示中多是将信息转化为图片、电子解说、视频等形式,公众被迫静态化、孤岛式的欣赏,体验反馈与二次传播的参与性较弱,无法形成完整的传播链条。

针对上述问题,通过对文化内容、载体形式、传播途径三方面的分析与论证,提出了数字化技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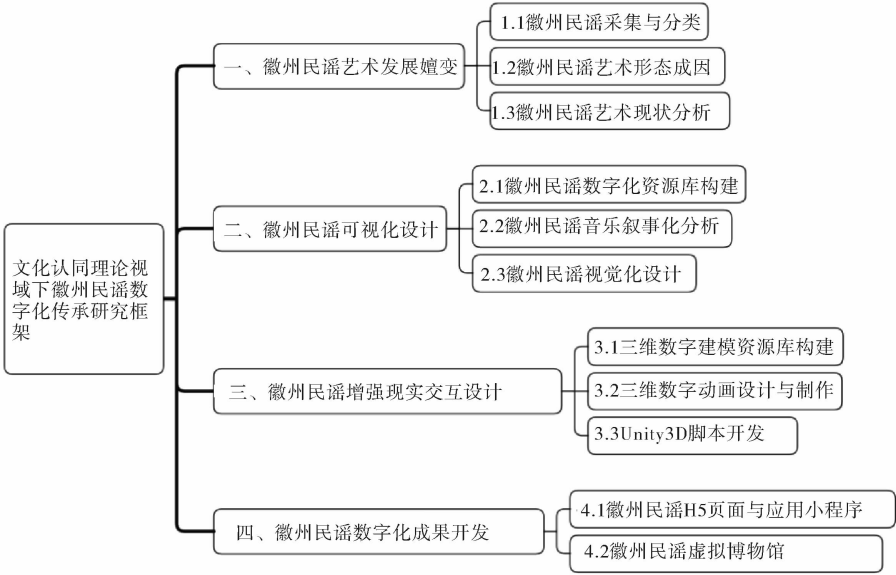
徽州民谣传承中理论框架研究框架。其内容有:对徽州民谣文化内容进行视觉重构,形成数字化植入客体;整合徽州民谣展示传播主体系统,在传播系统中实现非遗内容的文化着床;扩宽文化认同体系,通过数字化应用为媒介,吸引公众主动式传播。以期为非遗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与参照,具体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三、数字化技术下徽州民谣传承路径研究

基于数字化技术在徽州民谣传承理论框架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数字动画等现代前沿技术为手段。结合实地调查,分析其艺术发展嬗变,总结出相关文字、图像、视频、音频、实物资料的研究资料。对徽州民

谣符号的研究与视觉化设计,设计出一套增强现实技术下的实践体系,同时在移动智能终端平台上进行测试,给出相关的实验测试结果。并通过构建数字化应用成果,在吸引公众参与体验传播的过程中由点到面的提升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具体研究流程(如图2所示)。



(一)徽州民谣艺术发展嬗变分析研究

徽州民谣是在古徽州“一府六县”范围内产生,从地理区域上来划分,有歙县、绩溪、婺源、黟县、休宁、祁门等自成一派发展的地方性民谣,从文化内容

上来划分,有吟诵采茶、种植、编织的劳动类民谣,同时也有吟诵爱情、评论时政、歌颂大好河山的生活类民谣。

笔者在调研中总结其有如下特点:首先,原生态

性保存完整,徽州古邑地理环境特殊,形成了封闭式发展的文化场域。《新安志》中有记载:“徽州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因此在徽州民谣的传承上也保留了传播的真实性与地域的唯一性;其次,地域特色明显,主要体现在徽州方言因地理空间的封闭而差异明显,《嘉靖徽州府志》中总结其特点是“六邑之语不能相通,非若吴地,其方言大抵相类也。”陈瑶也提出:“徽州方言复杂难懂、分歧大、通话程度低著称。”^[1]例如绩溪在地理空间上以徽岭为界,形成岭北、岭南两个区域,在其方言、风俗、习惯上均有不同,因此在民谣的表现形式上相同题材也会出现多个方言版本。例如《推车谣》的岭南版与岭北版虽在文化内容上一致,但语言描述上有极大的不同;第三,以个体情感抒发为主,徽州民谣多是由徽州人民在劳作生活中有感而发的吟唱,代表的是其在生活中的感悟与情感,例如《三早歌》描写的是徽州人民早起劳作的情景,《金打铁、银打铁》从一个铁匠的视角描述了一年中的民俗节庆,并在代代流传中不断完善,潜移默化的吟唱中构建文化认同;第四,表现形式多样,徽州民谣中有大量的对唱、合唱、猜谜、对话、借问等,综合形成节奏明快、朗朗上口的曲风曲调;第五,韵散结合,徽州民谣是在古诗词语中发展起来的,以七字与五字成句且韵脚为方言音,但并不拘泥于规则,形成朗朗上口的曲音曲调。综上所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徽州民谣是在口耳相传中传承至今,代表了徽州人民的自我认同与历史根基。

(二)徽州民谣可视化设计研究

“曲合曰歌,徒歌曰谣”,在以往的非遗民谣保护和传承中,录制音频是主流方法。但由于徽州民谣方言吟诵的特点,例如在《采茶谣》中“姆儿乖乖宝,娘去摘茶草,姆儿乖乖宝,娘去赚茶银。摘茶草,赚茶银,用来供大供细供成人”^[2]中“细”在绩溪方言中代表“小”,这里指代小孩,因此公众仅通过音频对其内容的理解有较大难度。针对这类问题,对民谣进行数字化、叙事化、视觉化设计,例如在这首民谣中加入孩子慢慢长大的动态化视频,并结合增强现实技术去多维化展示,相对于音乐语音语调,加入图像更能意境传达,也易于理解与传播。

1. 徽州民谣数字化转存

通过田野调查和对传承人的访谈形式,以地域和村落为圆心点对徽州民谣收集整理研究。在收集中采用录音和文字记录结合的方式,对音频中出现的方言语句用文字上加以注释或注音,形成各地的方言统计表(如表1所示)。在采集中力求保持真实性与原生态方言特色,并对于流传甚广的徽州民谣标

注了主旋律音符,以便后期传播推广。通过录音转存后构建徽州民谣的数字化资源库,以期使之从主体性、专有性转向多元性、数字性、视觉性、共享性。

表1 徽州民谣文字注释及方言语意统计表

歌曲	方言	指代意思	民谣种类
《瞎女嫁娘》	老倌老娘	老公老婆	绩溪民谣
《看花灯》	俺、尔、渠	我,你,他	绩溪民谣
《前世不修》	细鬼	小孩	绩溪民谣
《金叫叫 金喇叭》	砰啪	爆竹拟声词	绩溪民谣

2. 徽州民谣信息化传达设计

信息传达的过程是将源信息通过语言、图片、文字等符号系统编码并解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信息的传达依靠于传播者与受传者是否共享符号的意义。徽州民谣“理解不了”的现实困境也是因单一化的编码方式与当下多维化的解码方式不相匹配,因此需要采用数字技术与设计介入的方式对徽州民谣进行重新编码、重构和阐释,有如下重点:

第一,编码的增幅化。在海德格尔所预言的“世界被发展为图像化”^[3]的今天,人类观看世界的方式也变得愈加丰富多彩。而视觉与听觉是人的感官中决定认知性的感官,因此采用数字化音频与视觉设计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公众文化认同感高、蕴含优秀传统文化、有代表性的民谣歌曲,例如《蜘蛛吊水》《庙山情歌》《萤火虫啊低低飞》等,将民谣转述为叙事化、情境化的数字动画影像。首先采用音乐叙事学进行研究,徽州民谣的叙事性强,每一首民谣都在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富含大量的民俗信息。例如绩溪民谣《月亮升起》:“月亮升起,捉贼偷米。聋子听见,哑巴叫起。跛子抓着,瞎子认米。前呼后拥,送到衙里。瞎子县官来审理,毛贼原是宝贝弟。”^[4]叙事完整、风趣幽默,对于视觉表现提供了可行性。其次构建徽州民谣的可视化脚本(如表2所示)。根据脚本信息对人物设定、主题要素、场景布局进行设计,加入图形、三维模型、动画、影像等视觉符号,强调内容、创意、表达与视觉化的融合。在传统的徽州民谣单一性的“唱”“听”基础上,加入“视”的多感官化传达,以期让公众主动建立文化认同并传播,实现对徽州民谣信息内容的再次解读。

第二,编码的重构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需要保护更要运用现代性话语体系对其重新解读与诠释,赋予新的文化意涵,使之与现代生活相关联。笔者考察了徽州文化审美特点,将徽州民谣背后展现的文化、艺术与哲学符号置入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使其既保有徽州民谣独特的文化审美特征,又形成可理解、易传播的现代视觉符号。例如在《十二月采茶歌》中“三月采茶桃花红,手拿长枪赵子

龙。百万军中救阿斗，万人头上逞英雄。四月采茶做菜忙，把守三关杨六郎”，在角色设定中，赵子龙、杨六郎的形象都汲取了徽州三雕中的视觉元素与艺术特性，在借鉴其线性语言与写意风格基础上，加入

现代设计的审美特征进行“视觉重构”。场景设定中也融入了徽州特有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审美特点、民俗文化等，实现了信息的叙事性全方位展示设计。

表 2 徽州民谣的可视化脚本分析

歌曲名称及编码	歌词信息	内容描述	视觉化表现
B31 推磨歌	推呀磨，磨呀推，做挾保，打锅魁	农家小院子里，一对夫妻，男人在院内磨磨，女人在灶台边烤面饼。	徽派乡村建筑鸟瞰场景，徽州版画风格的夫妻角色设定。
B32 月亮下来看世界	月亮太太，拜尔三拜	夜晚，一个小男孩虔诚的对月亮跪拜。	萤火虫飞舞，徽州三雕风格的祠堂，阜阳剪纸风格的人物设定。

(三)增强现实技术下徽州民谣展示设计研究

展示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四个因素:信息、环境、媒介、人物(传播者、受传者),共存于叙事场景之中,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梅洛-庞蒂称之为“现象场”,即信息通过媒介在环境中形成有效传达的场域。构建非遗文化展示传播中的“现象场”是实现数字化传承的关键,因为非遗的传承需要在一定的地理区域或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场域中孕育发生,但随着非遗民谣生存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原生场域逐渐被压缩。因此需通过数字化打破传承中地缘与空间的局限性,扩宽其传播的场域,扩大其数字受众,实现文化全球化的发展。

在徽州民谣视觉化设计的基础上,与增强现实技术相结合,将徽州民谣传统表现形式“听、唱”与

增强现实技术下的“视、触”相融合。通过智能终端上的摄像头采集现实环境、识别文化标签跟踪定位,并运用三维建模、Unity3D 脚本开发、图形识别跟踪等技术的协调配合,把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的真实环境中,形成多感官交互体验的“数字场域”。步骤分为:第一步,真实场景的获取;第二步,虚拟对象注册信息的获取;第三步,虚拟对象数据库;第四步,3D 图像的变换与渲染;第五步,图像的虚实融合(如图 3 所示)。并以移动端应用为载体,让公众通过手机应用,更加直观地“触碰”和深入了解徽州民谣,引发公众在观看层面到心理层面再到反思观层面的体验与表达。将其由“物理形态”到“数字形态”再转化为凝聚人心的“数字回忆”,让公众在体验的过程中建立对徽州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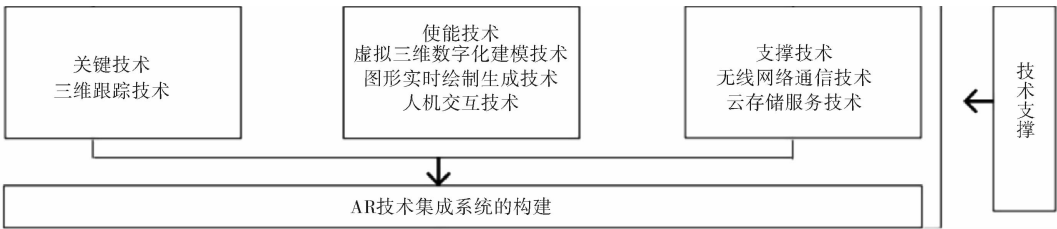


图 3 增强现实技术下徽州民谣展示技术支持

综上所述,民谣作为蕴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记录民间风俗的载体。需结合数字化技术与现代化文化语境对其进行设计重构,并运用创新思维提炼记忆点,对徽州民谣加入现代设计审美特征,通过将抽象性的音频符号转化为视觉符号注入场景中,形成“现象场”。对吸引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参与热情,实现永续发展才是非遗保护的核心。

四、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徽州民谣数字化传承

徽州民谣在传承中呈现出的社会背景与文化心态的变化、非遗人才断层、生存空间受到压缩、“流动记忆”面临消失、传播范围窄化等问题,究其根源是地域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带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与身份焦虑。通过整合徽州民谣的传播路径,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角度扩宽其文化认同体系,让公众在体

验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建立文化认同与自信。具体研究步骤为:

微观层面对徽州民谣的文化内容进行采集、整理、设计传达,以民谣为载体连接徽州人民认同感。例如在《摇篮谣》中:“我家小宝宝,睡在摇篮里,不哭也不闹哇,两眼笑咪咪。我家小宝宝,奶奶吃饱饱,觉也睡得好哇,妈妈好心疼。宝宝宝宝,快快地长大,进学堂呀,考个状元郎。有朝一日做了官,衣锦还乡回家里,为娘告诉你:村头河上造座桥,大家都欢喜。”^[6]可看出徽州人对知识的渴求、对入仕的追求、对家乡的热爱,都以民谣为透镜代代相传,成为徽州人民传统价值观最直观的表达。

中观层面对徽州民谣的传播媒介进行整合,利用数字化技术再现其“文化场域”。笔者将传播媒

介分为:静态化媒介,如图片、书籍等;动态化媒介,如视频、音频等;交互化媒介,如游戏、移动应用等。通过选取合适的媒介,使“看着不着,体验不了”无形文化转变为可视化、情境化的有形文化。笔者选择了H5 页面与小程序的媒介,利用短视频创作、H5 交互页面与应用小程序等新媒体技术,营造徽州民谣精神与认同的社会文化场域。

宏观层面“公众参与”,激发公众主体参与传播的热情。数字化成果为徽文化与徽州方言的推广提供了传播内容,吸引公众主动参与并传播。并通过数字化应用、体验工作坊等形式,促进不同的公众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引导新生代对以徽州民谣为范例的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学习,提升徽州人的文化自信与认同感。

五、结语

徽州民谣是徽州人民创作、方言吟诵、口传心记的原生态民间口头艺术,承载着徽州人对家乡的情感。从文化认同理论出发,利用数字技术给徽州民谣的传播带来可视化、交互性、多感官体验、场所感

等新的特征。构建徽州民谣数字化资源库、H5 交互页面与应用小程序、虚拟博物馆等应用研究,探索数字化技术下的徽州民谣展示与传承的创新模式,在吸引公众参与体验中,提升徽州民谣的“生命力”与文化认同感。

参考文献:

[1]陈瑶. 徽州方言音韵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 2009.

[2]方静. 徽州民谣[M].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3]海德格尔. 世界图像时代[M]//海德格尔选集.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899.

[4]江声皖. 徽州方言探秘[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6.

[5]孟庆惠. 徽州民间歌谣的押韵特征[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1):12-18.

[6]周宪. 视觉文化的历史叙事[J]. 艺术百家,2007(1):5.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Digital Inheritance of Huizhou Folk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ZHAO Xin,TAO Ran

(Art Colleg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00, China)

Abstract: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globalization society, the loss of local cultural diversity makes the crisis of group “cultural identity” and “place spirit” increasingly outstanding. It also causes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limited understanding, low sense of identity, and difficult promotion” in the inheritance of Huizhou Folk Song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identity, this paper plans and reconstructs the main body, content and channel of Huizhou Folk Song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visual design,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Huizhou Folk Songs “listening and singing” and “seeing and touching” under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are integrated to form a “digital field” of multi – sensory interactive experienc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application results, from the micro, meso, macro three angles to expand its cultural identity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attrac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experienc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Huizhou people will be improved from point to point.

Key words:artistdesign; new media;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folk symbols

媒介技术变革下的网络文化建设研究

周华连

(中共贵阳市乌当区委党校,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要: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社会结构和认知理念的转型升级,网络文化作为对文化发展不同形态的扩充,在打破过去舆论文化单向传播的同时,其传播方式从传统的垂直、封闭、沉默、单向、大一统向扁平化、开放、活跃、互动、多元化发展。尽管网络文化具有民族性、标签化等特征,但在内容建设上也相对出现了一些媚俗化、娱乐化、价值观功利化等问题。因此,加快我国网络文化的建设需要提升网络文化内容建设和阵地建设,在内容上下功夫,强调文化与内涵协同发展,在不断借鉴国际经验和借助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引入社会监督与舆论引导,强化线上治理与线下监管相结合,促进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网络文化;文化变迁;舆论引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11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58-06

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了社会结构和认知理念的转型升级,互联网作为新时代媒介技术变革的硕果让人们的沟通从原本的纸质媒介转变为网络信息化的即时沟通。信息传递方式在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同时,同样也影响着人们文化传播的方式和理念。媒介技术的不断创新在给人们带来技术理念变革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多渠道的“发声”使得传统媒体话语体系相对变弱,过去的单向传播已然受到威胁,传播方式从传统的垂直、封闭、沉默、单向、大一统向扁平化、开放、活跃、互动、多元化发展。

一、网络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一)网络文化的内涵

随着网络技术在文化领域的不断应用和深入,媒介技术的快速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舆论中技术环境的现状,使之作用于社会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而产生连锁效应,新的文化形式即网络文化开始出现并得到不断发展。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网络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载体,各种文化活动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实现跨地区跨群体的快速

传播,打破了原本信息传播受时间、地点等因素制约,各群体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多形式的互动和评论,让即时交流成为现实。总体而言,网络文化可以理解为网络参与各群体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实现信息跨地区跨群体快速传播、交流、互动的一种文化形式。

任何文化的创造和传播都是人类社会长期实践和发展的产物。社会环境受到技术环境的影响后往往会做出积极抑或是消极的反馈,影响和制约着技术环境下一步是否继续开展新的技术创新。^[1]在网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人是其参与的主体,网络文化随着参与主体交往的不断加深和参与数量的不断增多,带来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与发展。网络文化作为文化观念和文化活动的集合体,方式多样、参与多元的网络文化是信息时代文化多样发展的形式之一。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用户人群的日益增多,根据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C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用户达到9.04亿,手机网络用户达到8.97亿。网络用户数量的剧增和自媒体可移动网络终端的大面积覆盖

收稿日期:2020-07-21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青年项目“贵州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研究”(18GZQN33)

作者简介:周华连(1989—),女,湖南衡阳人,硕士,中共贵阳市乌当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让原本的网络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文化主体从单个个人的双向互动变为社会组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机构或组织的共同参与,由于受到从事行业和职能属性限制,网络文化主体在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发展需要上都存在一定的不同。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生活应用将社会推入信息化时代,数据化、符号化、即时化的信息交流和文化传播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利润,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予网络强大的生命力。学界有学者将网络文化定义为“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融合为物质基础,以发送和接收信息为核心的一种崭新文化。这是一种与现实社会文化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2]。这种新兴文化有其作为新兴事物的特质,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管制和束缚实现信息资源的即时共享,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准确性。

(二)网络文化的特征

1. 网络文化的互联特性

网络文化带有虚拟化的特点。虚拟空间一方面尽可能还原社会真实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极力弱化现实社会的制约。虚拟空间中的身份、职业、教育学学历等不同社会属性都是可以调整和改变的标签,人们通过借助互联网的交流会将自身的社会背景、社会属性淡化或是刻意隐藏。正是因为虚拟空间中网络文化形成的基础自身带有一定的虚拟性,网络文化也就天然地带有其虚拟的特性。与此同时,网络文化具有时事共享的特点。虽然网络用户在沟通交流时会刻意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使其具有一定的匿名性,但其沟通交流产生的信息会以数据化的形式储存在网络空间中使之成为互联网记忆,这些记忆能够被互联网的用户获得许可后使用。当前信息技术的变革能让网络用户迅速获取语言、文字、信息、位置、存储等数据,用户之间能够实现快捷的即时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传统信息传递的印刷、传递、中转等环节,大大缩短了信息传递的时间,节约了成本,提高了信息共享的速度和效率。

不仅如此,网络文化还能缩短网络主体之间的差异。网络文化在兴起之初活跃在网络中的用户主要是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社会精英阶层,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用户群体不断扩大,其形成的网络文化也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互联网的开放性让网络文化不再拘泥于文字,它可以是动态的视频、静态的图片等,通过新的媒介技术传播方式将信息的交流变得平等、自由,任何网络用户可以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抑或是创造者。不同网络主体之间能够在网络空间

中基于自身的兴趣爱好、个人偏好、生活体验等构建一些对话平台,进而创造沟通、互动的机会,他们创造出的精华与糟粕也一并共存于同一个载体中,人们既能够在网络中观看精品教育课程,体验丰富的游戏,也会碰到媚俗、价值扭曲、颠倒黑白的文学作品,甚至是各类事件的不同视角报道。

2. 网络文化的民族属性

互联网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通道,各个地方的信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尽管会带来很大的便捷,但在传播的这一过程中往往会有不同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在同一事件中发生碰撞与交融,我国网络文化一直与世界文化保持较好沟通,尽管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种文化的交融并不影响我国传统文化作为网络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根基。我国的网络文化虽然是伴随着我国互联网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相对而言时间并不算长,但其传承的内容却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并没有因为互联网数据化的传承方式被其他文化所同化,反而在虚拟空间中各种异质文化经过碰撞、交流后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一方面,传承的内容数据化能将传统文化面向更多的人传播开,受制于传统的传承方式,我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已经湮没,但结合网络新生代的生活习惯,经过数据化处理的传统文化以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宣传能激发网络用户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进而吸引到更多的认同者和传承者。另一方面,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决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保存问题则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互联网将这些风格迥异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转变为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借助网络的快速传播和人们的文化认同心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传统文化的行动中来,让民族传统文化更鲜明。

3. 网络文化中网络个体的标签化

在互联网的平台中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差异往往会被同时展现在同一个信息共享的环境平台里,但同样,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让网络参与者很容易以不同的标签再塑造一个新的身份存在和存活于虚拟世界中。互联网媒介为网络用户个体开辟属于自己专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其个人形象通过网络用户的精心策划、设计进而展示出与自身渴望一样的“自我”进而向其他受众展示,例如:QQ空间、朋友圈、社交签名、生活动态,等等。但在虚拟空间中代表不同兴趣爱好的标签也能成为不同人群相互区分和提升认同的标识,如“嘻哈圈”“古风圈”“电影圈”“文艺圈”等。这些标签带有专属、排他的

特点,通过这些标签能迅速找到网络用户趣味相投抑或是其群体专属的网络部落。

二、媒介技术变革下网络文化的发展与困境

(一) 网络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文化系统中,网络文化中各参与主体包括文化的生产者、分解者和消费者,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三者之间互为关联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换,新时代的媒介技术发展推动了网络文化的“去中心化”,网络文化中党政媒体、商业媒体和日渐壮大的自媒体都成为网络文化信息的生产者、消费者抑或是分解者,这就使得网络文化展现出越发多元的格局。网络文化的多元化格局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不同群体不断发展和分化的结果,网络文化参与群体的多样化造就了网络文化关注焦点、意见表达、群体认同的多样化。网络文化涵盖了群体中个人意见的表达和彰显,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倾向和各自的利益诉求。传统文化传播方式主要表现为单向传播,在内容的审核上层层把关,而网络文化传播中,其传播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是相对独立的,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网络文化传播中各角色之间的多元互动已经成为可能。移动式、可视化、社交化、人性化的媒介技术给予我们接受信息更多的便利,同时也将传统信息文化传播的方式从直线模式延伸为一对多的互动模式。^[3]

尽管媒介技术的变革看似给了人们网络参与和意见表达的机会,但其传播信息来源的不确定和参与群体意见的多样性也造成了网络信息的相对不稳定,很多信息经网络传播后会裹挟着某些参与者的主观色彩,使得部分网络参与成员不能公正、理性地看待各种公共诉求或事件,未能理性分析这其中的内因,没有形成能够还原客观事实的舆论导向。李普曼在《大众舆论》一书中指出,大众媒体是通过不同媒介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却是信息传播者主观意识加工后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图像”,并不能真正做到客观认识的百分百还原,所以人们接触到的舆论信息是有选择、经过加工、组织后重新构成的拟态环境。^[4]媒介技术的变革能够给予人们一个民意反馈平台,但这个平台中信息在“大数据+”的技术背景下能快速经过发酵成为新的舆情,然而信息来源的不确定性、虚假性等问题让舆情演变为具有攻击性、不理智的线上线下行动。与此同时,参与主体中的个人也很容易受舆论的影响,在网络弥漫的集体渲染中失去其个人的理性判断,公开以个人的呼声对抗集体的舆论往往会造成“沉默螺旋”^[5]的

困境,最终出现“多数人的暴政”——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 媒介技术变革下网络文化发展的困境

网络文化由成千上万的网络信息所组成,其庞杂的信息中往往会折射出信息生产者对现实社会各式问题的看法与认知。不可否认,各种问题也会在他们的表达中有所感知,这些问题并不因虚拟空间的虚拟性而变得淡化,反而因其传播的特性进而真切地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欲望。随着网络群体的不断增多,网络表达更多的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价值取向的体现,多样化的网络需求和价值表达在传递正向文化的同时也出现媚俗化、娱乐化、价值观功利化等问题。

1. 网络文化的媚俗化

前文说到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给予网络文化较强的变革性,如果单纯以攫取市场利益为网络文化发展的最终目标就会出现为了迎合市场的媚俗化的网络文化。这些网络文化一方面是创造形式上的粗制滥造,另一方面在文学艺术、审美上与人们的价值追求不符。为获取大量的关注度并将这些曝光率折换为利益,一些网站、自媒体、网络用户炮制各种夺人眼球的新闻,甚至更有网站抢注他人用户名以发布最新新闻来获取所谓的关注,例如某网站抢注章子欣父亲的账号发布信息,捏造事实以博人眼球。或者是运用春秋笔法将真实事件直接篡写为是非颠倒的新闻报道,如重庆公交车坠桥事件,在事故车辆还未打捞出来的情况下网络上就已经有多家媒体、网站对该事件中无辜的女司机口诛笔伐。出于追名逐利的目的,一些公众号利用人们阅读的特性,卖丑、突破世俗禁忌、刻意放大社会矛盾、制造社会话题达到高阅读量量的目的。如坐拥上千万粉丝的微信公众号“咪蒙”以售卖焦虑、迎合大众负面情绪为主要卖点发表不当言论,甚至发表一些三观扭曲的文章。这些文章往往以猎奇口吻迎合群体需求进而拥有大量的关注度和阅读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认知。当文化沦为利益驱使的工具时,它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过分地追求市场利益就会将网络文化与经济利益之间的位置发生扭转,最终损害人们自身的价值认知。

2. 娱乐至死的快餐网络文化

网络除了满足人们的社交、工作、学习之外,还能带给人们不同的娱乐享受模式。第45次中国互联网信息统计发展报告中五种娱乐应用软件具体包括: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直播,其用户规模均在4.5亿以上,纵观这些应用我

们发现,其共同特点是这些应用软件更为直观地将文字、图片、声音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在虚拟空间中所追求的刺激。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网络娱乐文化夹杂着放纵、恶搞、拜金、浮夸的价值观念,这些负面的价值观念经过社交平台的传播、混合、拼凑,对人们宣扬低俗、粗陋的快餐文化,甚至是扭曲的社会价值观念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尼尔·波兹曼曾就指出,一切公众话语,包括政治的、宗教的、体育的、新闻的、教育的和商业的等,都以日渐娱乐的方式出现,使我们成为娱乐的附庸,而这种“娱乐”则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被发挥到极致。^[6]

3. 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碰撞

传统价值观念对于人们的生活言行具有一定的束缚力,但价值观的约束在信息碎片化、虚拟化的互联网空间中被极大的弱化。加之互联网信息的传递跨越了时空,将不同的价值观念一同呈现在虚拟空间里,与此同时,西方“普世价值”被某些群体所认可,这就使得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网络空间中更加凸显。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方普世价值观”等不同的价值观念通过互联网的虚拟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对同一事件进行评价时往往会碰撞、发生融合,而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不断发生激烈的碰撞会让人们在看待同一个问题时基于不同的立场而产生不同的评价观点。这些消极的价值观点没有明确的界限区分,它们形成模糊不清的意见集合,加之互联网的主体越来越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如果不及时制止网络文化中这些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民粹主义等背离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潮,任由这些消极社会价值观冲击或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后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带来青年一代集体观念、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危机。

三、媒介技术变革下的网络文化建设

网络舆论中舆论主体、价值观念、沟通方式的多元化加剧了我国社会转型的因素变化,治理网络舆论生态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网络文化的建设问题。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工业革命引发的旧媒体时期使得大众文化成功替代了精英文化,那么新媒体时期因媒介技术变革引发的后果则是快餐文化充斥了现代社会文明。^[7]值得深思的是,我国作为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明的需求在日益增长,如何通过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以满足十几亿人口的精神文明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提升网络文化内容建设

网络文化作为包容了社会不同思想、价值观念的载体,是意识形态阵地中最不容忽视的部分,开展网络文化建设也就是着手解决网络舆论的治理问题。打造良好的虚拟空间需要借助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网络文化内容进行建设,对人们互联网信息平台中的文字、声音、图片等信息加以监管、引导,形成社会各方的文化共识。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网络文化建设中,多方式、多渠道创新方式方法,让网络文化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输入我国文化的自信与底蕴,让我国网络文化在世界的平台上不畏惧来自其他国家网络文化的攻击,展现我国民族文化的风采。与此同时,在我国网络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需要创设一个好的网络空间、舆论氛围,明确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吸收新时代优秀文化发展的成果,其本身应是一个健康向上、与世界交融、有血有肉、立体有内涵的文化。

(二)加强网络文化阵地建设

网络文化的建设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技术产业交叉结合的成果,要将这项成果继续壮大发展需要开展网络文化阵地建设。首先,要不断地纳入优秀的人才使其投身到网络文化建设的工作中。培养一批立场坚定的人才队伍不仅是为了保持网络文化内容的主流价值引导,更能激发人才发展方向,使其创设新颖、有文化、有内涵,通过他们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宣传,让人们能够明辨负面、消极的舆论信息进而获取正能量的网络文化。其次,在体制机制上为网络文化产业的孵化创设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良好的社会发展条件,保证网络文化能够真正融入虚拟空间中的不同行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最后,弘扬文化主旋律,多渠道、多方式开展网络宣传,结合当前青年一代网络参与的应用偏好,适时推出百姓喜闻乐见的正能量宣传,强化价值认同和家国情怀,提升民族凝聚力。

(三)借鉴国际经验

自古以来我国文化对外来文化都是秉持开放的态度,对于网络文化也应当如此。我国网络文化晚于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在网络文化的引导和治理问题上抑或是网络文化建设经验上都是可以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经验为己所用。例如英国,在强化网络国家认同的同时强化法律约束和舆论治理,尤其是网络中谣言的治理是社会危机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英国的很多地方都有为民众答疑解惑的公民咨询局,市民一旦发现不良的社会问题,就会立即向就近的公民咨询局

寻求帮助,有效地解决了各种猜疑和扩大化等社会问题,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韩国从 2008 年开始,其立法机关针对各种虚假舆论加强了监管和处罚力度,规定运用电子通信等设备散播虚假消息的将被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5000 万韩元以下罚款,在强调全民监督的同时强化国家监管,建立网络安全国家应急机制。在美国,针对网络共有约一百多项相关法律及法规予以约束,如《电脑犯罪法》《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且这些法律条文都被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审核通过,其目的在于对网络上的各种谣言加以管制,通过对网络信息的分级监管和用户管理,进而对其受众和网络内容进行积极引导和规范,从而净化网络环境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

面对新发展、新现象、新问题,新时期网络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过去的传统文化、传统经验来应对,更应当博采众长积极寻求解决措施,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妄自菲薄,切实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很多西方国家在网络治理、内容建设、文化培育等方面有其自身的成功之处,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就能适应这样的“洋方子”,针对我们国家多民族的文化特点以及当前网络文化中出现的不同问题,这就需要在相关制度的制定和价值引导上经过仔细斟酌后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取舍,进而汲取西方网络建设以及网络文化的培育和引导等方面长期积累经验中的可取之处,促进我国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四)强化线上治理与线下监管相结合

网络拓宽了人们的社交范围,但失去限制的自由没有法律作为约束而仅仅依靠人们的个人道德素养来规范虚拟的网络空间显然是不可能的。网络文化成长于多群体参与和融入的公共虚拟空间,在此空间中,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加速了各种问题凸显,受各种负面情绪、负面信息的影响,网络文化中展现出的各种社会问题很容易受到煽动、挑拨甚至走向极端。

在网络文化的发展建设过程中,由于道德的约束力远远达不到有效地制约虚拟空间秩序的作用,尽管网络空间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是负面的舆论以及消极的网络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一批“网络毒瘤”。部分不法分子通过运用线上信息传递的隐蔽性、匿名性等特点开展各类犯罪活动,其犯罪手法可谓十分多样,部分网络用户利用网络空间的漏洞在线上进行高智商犯罪,甚至破坏网络安全。有些群体经过线上网络信息的秘密传递,线上组织

通过谋划开展线下违法犯罪活动,或是线下违法犯罪组织以线上联络的方式秘密实行违法犯罪行为,等等。有的线上网络活动出现极端化时往往使民意被挟持,有的则是以少数人的观点制造出热点舆论信息进而带动多数不知道事件真相的群众开展网络活动,等等。例如网络活动中演艺人员的粉丝会自发地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喜欢的演艺人员,民众在社会事件还未明朗时围攻官方主体账号,甚至是围攻国家司法行政主体等不理智行为,这些网络行为的发生我们很难追查背后是否有网络推手借助舆论的力量打乱虚拟空间秩序,但是我们有必要针对网络文化和网络舆论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引导对策和监督体系。线上网络文化的治理不能生硬地将过去的管理模式生搬硬套地运用在现有的虚拟空间上,强硬的缩小虚拟空间给予人们的自由范围有可能会带来民意的反弹。线上的网络治理需要人们树立起正确的是非观,使其能够理智地看待舆论,政府部门要积极站在舆论的中心点,抓住网络问题的关键所在引导人们参与到网络治理的活动中来。经过长时间的引导,培养人们遵循虚拟空间舆论传播的规范和习惯。与此同时,线下加大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进而维护网络环境的气朗风清。在国家政府层面、社区基层管理中都要建立起针对网络治理的事前、事中、事后的预防和监管的体制机制,把网络法律制度从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层层落实到现实社会中去,促进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和有效治理。

总之,我们既不故步自封将网络文化固守在现有的发展阶段上,同时,要积极寻找新的路径发展我国网络文化。在学习借鉴上我们对所有经验都不是单向的全盘接收,而是有针对性地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发展人才队伍建设,在吸收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抓好网络社会治理,进而促进我国网络文化和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互联网作为 21 世纪人类科技进步的重要成果,是时代发展的关键点,互联网改写了人类社会信息传递的方式,将舆论传播从传统媒体带入互联网时代,将文化产业从过去的新闻出版、电视广播的形式升级为新时代的文化产业网络多渠道参与、多群体融入、多元互动模式。一方面,网络作为新时代文明传承的载体包罗万象的同时降低了普通人接触更多文化资源的门槛,促进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和资源的多渠道流动,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网络作为一把双刃剑,给人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新的危机。我国作为正在转型中的

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提高对意识形态渗透的警惕,对网络文化中存在的价值导向问题、娱乐化、媚俗化等问题都要加强预防和适时引导。面对新挑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将网络文化一并禁止,而是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其中,有效地利用网络监督 and 舆论导向的力量引导正能量建设,促进民众参与和民族团结,在强化民族认同的同时提升民族凝聚力,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成振珂. 传播学十二讲[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 139.
[2] 王振营. 交易经济学原理[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184-187.

[3] 匡文波. 论网络文化[J]. 图书馆,1999(3):16-17.
[4] 李普曼. 公众舆论[M]. 阎克文,江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6-42.
[5]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1.
[6] 谢金林. 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内在机理及其治理研究:以网络政治舆论为分析视角[J]. 上海学院学报,2013(4): 90-101.
[7] 罗佳. 话语权力与情感密码:网络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审思[J]. 理论与改革,2019(5):61-7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ulture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ZHOU Hualian

(Party School of Wudang District Committee of Guiyang City CPC, Guiyang, Guizhou 550018,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has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cognitive concepts. As an expans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network culture has broken the one-way communication of public opinion culture in the past, while its communication mode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vertical, closed, silent, one-way and unified to flat, open, active, interactive and diversified. Although the network cultur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ity and labeling,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such as kitsch, entertainment and utilitarian values. Therefore,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ulture in our country, we need to improve the content construction and position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ulture. We should work hard on content and emphas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connot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stantly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e would actively introduce social supervision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governance and offline supervisio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nline culture.

Key words: network culture; cultural changes;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互联网+”时代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创新探析

丁忠华

(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上购书已经成为大众购书的一种习惯,传统出版社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通过论述“互联网+”时代大学出版社传统营销模式存在的主要弊端,分析“互联网+”时代对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的影响,指出传统出版社要想得到生存和发展,必须改变传统观念,变被动为主动,以读者为中心,从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营销模式向以读者需求为中心的新型数据服务模式转型。大学出版社不仅要了解读者需求,还要创造读者需求,引导读者需求,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结合出版社实际情况,勇于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对传统的营销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和突破,积极推行互联网营销战略,形成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和适合大学出版社发展的营销管理体系,建立适合市场发展的创新型营销模式。

关键词:“互联网+”;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创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12

中图分类号:G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64-04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上购书已成为大众购书的一种习惯,越来越多的读者不但开始在網上购买图书,而且还参与图书的评论,互联网成为集读书、购书、评书于一体的图书互动平台,传统阅读渐渐远离我们,上网购书已成为许多读者青睐的消费方式,网上传播图书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互联网+”时代,网络的方便和快捷改变了人们传统的购书习惯,实体书店受到网络书店的严峻挑战。而实体书店作为传统大学出版社的主要营销渠道之一,对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传统大学出版社认清形势,改变观念,创新营销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探索图书出版的新技术、新渠道、新载体和新业态,积极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一、大学出版社传统营销模式存在的主要弊端

(一)单一化的传统图书营销模式无法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

大学出版社传统营销模式一般是根据读者需求确定目标市场和营销策略,依托出版社自身优势资源制定出营销方案,尽量满足读者的需求。但随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市场变化快,消费者目标不明确,读者需求不断改变,出版社营销模式落后,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没有及时制定出适合形势的图书营销新模式,无法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

(二)固定化的传统图书营销模式无法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我国的传统图书市场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分布较分散。受到地理条件和交通工具的限制,建立营销发行渠道比较困难。而大学出版社的传统图书营销比较固定,一般情况都是先选准目标市场,再以比较低的发行渠道成本获得比较大的销售收入,这在实际销售中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出版社为了能增加销量,只得加大投入,尽可能建立多网点进行销售,而现代图书市场中,产品多样化、需求个性化趋势不断加强,就需要图书营销模式差异化,导致传统图书营销模式投入成本高,方式不灵活,无法满足读者对个性化图书的需求。

(三)滞后化的传统营销模式无法满足读者的及时性需求

大学出版社传统图书的营销模式是先进行市场

收稿日期:2020-09-10

作者简介:丁忠华(1972—),女,河南新密人,硕士,郑州大学出版社编辑。

调查,形成营销方案,召集相关部门开会讨论确定营销计划,然后通过各种发行渠道进行销售。这种传统的营销模式是通过满足读者的需求而实现出版价值,以读者满意为原则,周期长、速度慢、模式滞后。而现在的市场竞争激烈,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的速度快谁就抓住先机,占领市场,谁就抓住了读者需求。因此传统营销模式已无法满足读者的及时性需求的。

二、“互联网+”时代对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的影响

(一)营销理念市场化

大学出版社传统的营销理念是以出版社的主动推销为主,读者是被动地接受。进入“互联网+”时代,出版社在营销中不再处于主体,图书不再由出版社通过传统模式进行发行,特别是大学出版社,教材是出版社的主要产品,但现在的读者在营销中是主体,读者已经不再被动地单向地接受出版社的促销信息,而会主动地搜索获取所需图书信息,从内容到使用反馈等有关图书的多种信息,出版社按照读者的实际需求出版图书。如今,读者通过互联网和出版社进行互动,出版社通过网络营销模式,以读者为中心,出版社提供优质服务,使读者得到自己想要的图书,这种模式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联系,增进了二者的互动性,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种角色的转变对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的影响是巨大的。互联网的低成本互动性,使得出版社制定营销模式要更加系统化、市场化,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二)营销战略多样化

大学出版社传统的营销渠道比较单一,有传统的发行渠道,主要是选定目标市场、制定营销方案,选择经销商和零售商销售出版社的图书,不直接面对读者。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学出版社开始采用网络营销等多种模式,直接面对读者销售图书,根据读者的特定需求制定多样化的相关战略,提高图书的覆盖范围,此外,为实现信息的相互传递,大学出版社向读者及时传递图书信息,读者通过大学出版社网站平台反馈读后评价以及服务需求,这样既保证了大学出版社与读者之间信息的顺利传输,也保证了读者的书评信息得到更大的推广。

(三)营销服务个性化

大学出版社传统营销手段比较僵硬,营销策略往往基于产品的内容宣传和价格优惠来开展,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关系非常僵化,甚至于一些传统的营销模式给读者带来很多不便利,这也不利于出版

社长期发展。“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带来的海量免费知识对传统出版营销没有太多的价值,出版社的功能不能仅仅局限于给读者提供知识,还需要为不同需求的读者提供个性化的知识内容和服务。差异化的需求和个性化的服务需要基于用户消费行为的数据分析。传统出版营销中出版社也会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但往往是片面和过时的,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为个性化营销提供了保障,使读者能够不限时间和地点,更加准确地了解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吸引更多的人来进行购买,同时大学出版社也可以根据网络上的数据信息制定更加有效的图书宣传及推广策略,满足读者不断变化的需求。

三、面对挑战,主动定位,构建适合出版社发展的互联网营销新模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大学出版社新的营销模式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关注。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技术,颠覆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节奏,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也改变了传统的图书营销模式,网络化营销的好处就是出版社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为读者提供全天候的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减少中间商环节。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传统的图书营销模式是以作者为中心,是被动的跟从。进入“互联网+”时代,图书营销模式从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营销模式向以读者需求为中心的新型数据服务模式转型,在互联网技术的推进下,新的图书营销模式是以读者为中心,是主动地融入,这样出版社不仅能了解读者需求,还能创造读者需求,引导读者需求。

(一)创新图书营销方式,制定准确定位读者目标的营销战略

传统图书营销是发书讯、征订等模式,如今要转变为全方位立体式网络营销。营销定位因书而异,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读者群体目标进行定位营销,大学出版社要根据出版社特色,准确定位读者群体目标,在教育领域定位读者,制定长期而具有特色的创新营销战略。

在实体书店,图书一般都是原价出售,除非书店活动打折,进入“互联网+”时代,“打折大战”已经成为传统出版社的致命打击,面对这种困境,大学出版社要认清形势,针对市场变化,改变传统图书营销方式。首先,应依靠互联网技术,寻求适合自己的营销方式,吸引读者眼球,在市场细分中充分发挥大学出版社的优势,寻找固定的读者,并给读者提供高水准高质量的图书,并通过定期回访以巩固出版社与读者的供求关系。其次,根据出版社实际情况,测算

互联网营销实施的投入成本和收益,深入调研之后再决定是否采用互联网营销,如何进行互联网营销,避免这传统营销模式的弊端,真正实现创新性营销,让传统大学出版社在“互联网+”时代得到好的发展。

(二)创新图书营销理念,建立适合市场需求的营销渠道

传统大学出版社的营销理念是以读者的需求为导向,根据读者需求制定营销方案,作为出版社是被动的,只是给读者提供他们认为读者需求的图书,而这些图书可能并不是读者真正的所求,读者并不满足这种被动的提供。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书店占据图书市场,传统出版社的营销模式被架空,发行渠道被堵塞,这对于传统出版社而言意味着将会失去很多读者。因此,作为传统大学出版社必须改变传统的营销观念,以市场为导向,深刻地认识和了解读者的需求,变被动为主动,真正地满足读者的需求,给读者提供适合市场、服务读者的图书,努力实现图书自我销售模式。

互联网的出现,让读者在图书营销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读者可以选择多渠道购买图书,这就要求传统出版社改变营销思维,创新图书营销理念,开展创新的互联网营销模式,加强与读者沟通,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各种渠道为读者服务。首先,通过网络平台,大学出版社可以不断更新图书的新信息,加快信息更新的速度,刺激读者,激发读者对图书的购买欲;其次,出版社可以对网络进行合理而有效地运用,让读者能够与出版社进行充分的交流,使出版社可以真正满足读者的需求;再次,出版社可以创立自己的品牌,与读者很好地互动,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创新图书营销策略,制定全过程策划的营销体系

影响大学出版社图书营销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原因还是出版社的市场定位模糊,组织机制存在缺陷,图书营销策划中宣传模式老化,营销管理体系不够完善。因此,大学出版社要突破困境,走出阴霾,就要创新图书营销策略,制定适合大学出版社发展的营销管理体系,建立出版、策划、营销相结合的图书营销策略,创建全程策划体制,对选题、出版、市场进行全程的策划、控制和监督实施策划。比如某本图书的营销全过程从市场信息—选题策划—图书出版—宣传广告—人员促销—市场组织—图书销售的全过程营销策划由一个“全能”型高素质的策划人负责,控制和监督营销全过程,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运作机制和适合大学出版社发展的营销管理体

系。

(四)创新图书营销手段,建立依据读者需求定制营销方式

作为传统的大学出版社,为教育服务是我们的根本,我们应该去研究的真正课题是如何利用互联网策划新的图书,如何利用互联网提高出版社的效率,如何利用互联网为我们的读者进行定制服务。传统出版社图书营销手段单一,营销人员与读者缺乏沟通,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无法直接参与图书的出版过程,因此为读者服务只是一句空话。“互联网+”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逐渐改变,需求也变得多样化和个性化,再加上图书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满足读者的需求已经成为出版社创新图书营销手段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于是,出现了定制服务,互联网技术给定制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定制服务的出现,加强了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联系,使出版社和读者的交流更加快捷,更加明确。比如通过互联网技术,整合读者资源,推送活动优惠信息或者他们喜欢的图书内容,让他们关注出版社;进行线上线下渠道创新、注重读者价值以及打造产品品牌;出版社建设网站,建立微信公众账号、微博、抖音等形式进行营销;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一些读者活动,比如分享交流会、读者见面会等,逐渐形成一个固定的消费群。

四、抓住机遇,勇于创新,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长期以来,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的发展一直延续着传统的发行方式和管理模式,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出版社不堪重负,图书销售量日益下降。“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带给传统大学出版社极大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传统出版需要互联网,需要新技术,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使传统出版社在“互联网+”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互联网”。大学出版社要转变营销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尽快研究和探索大学出版社传统营销模式向现代营销模式转变的渠道,提出更加有效的图书营销方式,构建更具发展潜力和可持续性的图书营销体系,创新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互联网+”时代,大学出版社面对困境,要对同行业领先的竞争者进行详细的了解分析,找出自己与领先的竞争者的差距在哪里,对自己出版社的营销模式进行了解分析,取长补短,吸取成功者的经验,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创新图书营销模式,根据市场需求,结合出版社实际,制定发展方案,迎接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大学出版社想要得到好的发展,要在当今社会中立足,就必须坚持走创新化的道路,并且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出版社的创新道路,要对营销模式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开发出适合出版社发展的互联网营销模式,提高传统大学出版社营销创新能力;策划出适合读者阅读的名优品牌,提升大学出版社知名度、影响力和竞争力;培养出有知识、懂营销、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营销业务员,提高大学出版社经营水平;组建出服务大学教育的专业营销队伍,提高大学出版社服务能力,形成极具特色、具有新理念、新方法、可持续发展的营销模式。这样,传统大学出版社面对“互联网+”时代,在图书营销上才能够走上一条创新的道路,并在国际图书市场上占据一定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余晓灵. 大数据时代图书网络营销的困境及出路[J]. 现

代营销(经营版),2018(7):91.
[2] 高浩杰. 浅谈我国图书网络营销的现状[J]. 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17(1):45-47.
[3] 曹晓虹. 图书网络营销策略之我见[J].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5-108.
[4] 余燕东. 互联网时代营销模式创新的途径与对策研究[J]. 市场营销与技巧,2015(1):56-57.
[5] 汪桥. 新时期大学出版社发行渠道及营销模式探析[J]. 编辑之友,2013(3):52-54.
[6] 丁忠华. 图书出版业创新模式的历史演进与趋势研究[D]. 郑州:郑州大学,2010.
[7] 谈新敏,丁忠华. 浅谈创新思维对发展图书出版业的重要性[J]. 法制与社会,2010(1):213.
[8] 李治堂,张志成. 中国出版业创新与发展[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谢春红)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University PublishingHouseMarketing Model in the “Internet +” Era

DING Zhonghua

(Zhengzhou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Zhengzhou, Henan 45005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 era, online book purchasing has become a habit of the public to purchase books, and traditional publishing hous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crises and challenges. Via discuss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traditional marketing model of university publishing in the “Internet +” era, the main drawbacks of the “Internet +” era are analyzed on the impact of the marketing model of university presses, an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f traditional publishing houses want to survive and develop, they must change traditional concepts from passive to active. The traditional marketing model is transformed from taking authors as the center to a new data service model centered on readers’ requirements.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s should not only understand readers’ requirements, but also create and guide readers’ requirements, make full us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combine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s ought to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 innovate and make continuous breakthrough of the traditional marketing model,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rnet marketing strategy, the formation of the mature market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system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press marketing, establish innovative marketing model suitable for market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ernet +”;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marketing model; innovation

南盘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化与精准脱贫契合发展研究

彭建兵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 贵州 兴义 562400)

摘要:南盘江流域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任务十分繁重。该地区富集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助力精准脱贫的重要元素。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从产业扶贫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南盘江区域经济协同联动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从文化迁移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的文化搬迁密切联系起来。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文化扶贫;精准脱贫;南盘江流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13

中图分类号:C95-05;F1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68-05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当前,贫困问题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短板’,脱贫攻坚形势复杂严峻。……实现到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时间特别紧迫,任务特别艰巨。”^[1]贫困问题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南盘江流域位于珠江上游,地处滇黔桂石漠化区,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着贵州省望谟县、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县、云南省砚山县等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市)。而南盘江流域地域文化特征明显,布依族、苗族、彝族、壮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保存良好。凭借绿色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南盘江流域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将在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过程中获得。

一、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与根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凝心聚力奔小康的精神内核,是提振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的有力措施。地处滇黔桂石漠化区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南

盘江流域,可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精准脱贫、同步小康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以实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之间的相融共生发展。

(一)可以深刻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对于精准脱贫的贡献作用

南盘江流域蕴含丰富的布依族、苗族、壮族、彝族、回族等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勤劳朴实、开拓进取、向往小康的南盘江流域各族人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用实干加苦干的奋进精神,努力走出一条实现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经持续多年的努力拼搏,南盘江流域脱贫攻坚工作虽然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是任务仍然艰巨,已经到了攻坚拔寨、“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南盘江流域地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国家脱贫攻坚重点区域,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市)与深度贫困乡镇、村寨较多,贫困人口众多。该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精准扶贫中的扶志、扶智因素相结合,客观上可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从而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创造条件。

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乡土”即故园、家园,是人们赖以生存、发

收稿日期:2020-09-10

基金项目: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布依史)”

作者简介:彭建兵(1972—),男,湖南益阳人,硕士,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区域历史研究。

展的基础,是令游子魂牵梦绕的地方。“乡土社会的基本形制是村落,即通常所说的‘家园’,它成为最为重要的乡土景观。”^[3]乡土与家园确实令人难以忘怀。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已消逝于历史的烟云中,但可用艺术的、复古的手段介入其中,使之恢复从前所具有的生机与魅力,从而创造出可以令人们怀旧情愫得以抒发的心灵天堂——美丽乡村。中国的乡村是蕴含中国文化之根的宝地,是人类社会再次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的、一块包含农业文明智慧的生态之地。^[4]但美丽乡村建设,目前面临一些困难或者问题。如何改造、如何发展,以及与人民增收、精准脱贫相结合的问题值得思考。美丽乡村之“美”,不仅在于它能使人们获得心理层面的美感,还在于能使人们获得居游于此的安逸。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物质条件的改善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手段的充分介入,从生活质量的层面,反映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社会事实。贵州省兴义市南龙布依古寨、云南省罗平县腊者布依寨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艺术的形式改造布依族干栏式建筑等传统民居,达到了以艺术形式创造美丽乡村的目的。以上民族村寨大多被列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或“中国传统村落”,以民族文化艺术修复、改造的方式,打造出一处处心灵净土,从而为旅游精准扶贫村寨的建设提供了样板。

(二)可以将精准扶贫与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充分融合

绿色发展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是绿色发展的基本保证。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讲发展、求发展,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融共生的必然选择。中国重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以有力的政策、措施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即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基础上凝练出来的、生态文化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全新观点。生态意义上的环境,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又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的自然文化环境,如传统村落文化环境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自信,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基本要求。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点。南盘江流域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云南省曲靖市辖3区6县,其中2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文山州辖1市7县,均系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黔西南州辖1市7县,其中7个县为国家级贫困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辖1市10县,均为贫困县,其中9个为国家级特困县、2个为自治区贫

困县。即便如此,也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利益。南盘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建设,可以与绿色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态园区或者民族特色村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南盘江流域具有浓郁特色的布依族、苗族、壮族、彝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文化,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是留住乡愁、乡情的重要场所。贞丰县纳孔布依族古寨、兴义市鲤鱼坝苗族村寨、册亨县大寨村、望谟甘菜村等是“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或“中国传统村落”,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大有可为。布依族八音坐唱、彝族阿妹戚托、苗族生态民歌、壮族歌圩文化等一大批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泛存在于南盘江流域广大民族山寨中。苗族“八月八”、布依族“三月三”“六月六”和彝族火把节等民族节庆文化已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对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从产业扶贫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南盘江区域经济协同联动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精准脱贫,只有目标精准、任务精准,才能保证成效精准,以实现点面结合的全面脱贫。要想农村贫困人口早日脱贫,产业开发是一条好路子。

(一)区域经济协作是南盘江流域产业扶贫的理想选择

产业开发一直以来是贫困村寨发展的瓶颈。产业扶贫是村寨精准脱贫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产业扶贫有两种具体模式,即分别由政府、企业主导的产业扶贫模式。^[5]无论采取何种产业扶贫模式,均应能使贫困村寨获得自我发展方面的“造血”功能,以达到增强脱贫攻坚实力,实现家乡美、百姓富的理想目的。产业扶贫项目的选择可以根据村寨实际情况来确定,以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为直接目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切勿盲目跟风。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南盘江流域区域经济协作发展准备了理论基础。南盘江流域一衣带水的袍泽关系,把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地区的联动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根据民族地区的生态优势和在全国的生态地位,以稀缺的生态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现代商业模式为载体、以社会资本为驱动力,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工业),使生态经济成为贫困人口增收的重要来源。”^[6]南盘江流域脱贫攻坚的发展道路,可以选择绿色、可持续的生态扶贫发展之路。“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还积极推动

山区沼气池和能源滋养水源建设,恢复森林和植被,并探索出了一套‘沼泽—庄稼—饲养’三者之间的可持续循环方式,从而成功实现了保护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7]地区内部的生态扶贫模式同样适用于区域之间。区域间在生态保护、经济联动、文化协同等多方面的合作,将为南盘江流域有关地区共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南盘江流域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协作,整合发展合力,将为区域精准脱贫提供新型动力支撑。

(二)区域联盟发展是南盘江流域旅游产业扶贫的可行路径

在城镇旅游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对美好田园生活的怀恋与向往使乡村旅游在新时代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从而为乡村振兴创造了条件。乡村振兴是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农村生态环境的不断向好联系在一起,也深刻影响着乡村的可持续生计。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思路。“发展乡村旅游,要充分挖掘本土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把乡村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紧密结合起来。”^[8]乡村旅游影响着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变化与发展,于南盘江流域民族地区贫困乡村而言,就是通过对其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生态资源的开发,以实现当地居民的脱贫致富。有的民族村寨文化古迹遗产较多,就可以走旅游精准扶贫之路,以乡村旅游为载体,重点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南盘江流域喀斯特地貌的典型性、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多元性、自然世界的生物多样性等良好条件是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比较优势。区域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将使多方共赢。乡村旅游是与全域旅游密切联系的。南盘江流域由于适宜山地旅游发展的生态文化背景,在区域乡村旅游发展方面可以充分协调。从经济层面看全域旅游更加强调“旅游+”功能,使旅游产业与关联产业融合发展,为区域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实现产业提质增效。^[9]南盘江流域民族生态旅游事业的发展,可以走联盟发展的道路,以实现滇黔桂结合部在全域旅游、民族特色村寨旅游等方面的联合开发、联动发展,以形成有影响的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度,通过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产业集聚效应,能够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协调发展,增加区域经济总量,促进社会就业和社会公平,提升地方知名度、影响度和美誉度,促进文化发展与繁荣,改善生态环境。”^[10]为促进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区域经济社会的联动发展,可以由三省区有关部门协调,以旅游企业的市场化运作为主体,

充分发挥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主体性作用,用心打造三省区民族村寨乡村体验游精品线路,以实现文化事业与旅游经济联动发展的共同目标。

(三)区域优势产业是南盘江流域产业扶贫的重点方向

南盘江流域众多村寨虽然具有一定民族文化特色,但并不怎么突出,就不能依靠旅游产业推进脱贫攻坚而实现同步小康,应在充分分析乡村情况及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经济或民族轻工产业等优势产业。南盘江流域诸多少数民族村寨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应选择这样的致富路径,建立规模效益的农林牧业特色产业基地,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可以“结合国家实施‘一村一品’帮扶计划,建设一批贫困人口参与的农业基地。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化政策为收益,使贫困户尽快享受到政策导致的发展成就”^[11]。产业的选择及产业体系的形成,要选择适合村情且能持久发力的产业经济,在实际上能为当地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发挥重要作用。

“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最终还是需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来保障,这样脱贫和减贫才具有可持续性。”^[12]南盘江流域少数民族村寨的产业脱贫,应首先开展理性分析,采取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相结合的可行性路径予以推进。在传统种养业产业的发展上,接受新型科学技术,整合资源与力量,适当扩大规模,以农业合作社等集体经济形态及公司市场化运作模式,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主动接轨,以获得最大经济效益。贵州省黔东南州兴义市屯更生态板栗、南盘江镇一带布依古法制糖、黄草坝铁皮石斛及晴隆县、兴仁市一带薏仁米,兴义市及普安县、晴隆县、望谟县种茶业,册亨县、望谟县、兴义市一带野生茶籽油,贞丰县顶坛花椒;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生态菜籽油与黄山羊,富源县大河乌猪、魔芋,陆良县滇陆猪,师宗县薏仁米及黑尔糯米,会泽县火红黑山羊及大洋芋,马龙县苹果,宣威市板栗,沾益县黄山羊、当归;文山州三七,丘北县辣椒,富宁县八角,砚山县小粒花生、马关县板栗、西畴县山地乌骨鸡、广南县黄牛、麻栗坡县小粒咖啡;云南省昆明市圭山山羊,禄劝县撒坝猪。红河州蒙自市石榴、弥勒市葡萄。玉溪市华宁柑橘、元江鲤;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芒果,凌云县白毫茶、牛心李,西林县水牛、麻鸭,靖西市大麻鸭、香糯,田东县七里香猪、丁香鸡,德保县山楂、矮马,隆林县黄牛、板栗,平果县火龙果,田林县罗汉果、者化火鸡,那坡县糖梨、红茶,右江区鹅、山茶油,田阳县香芒、土狗,乐业县猕猴桃、野生刺梨,等等。这些都是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农林

牧渔业经济方面品牌,但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可与适当的升级模式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助力精准脱贫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产业扶贫、精准脱贫的实践道路上,可以切实增收、实现脱贫、防止返贫、同步小康为目标,落实开发式扶贫要求,扎实做好产业精准扶贫工作。近年,云南省禄劝县积极探索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坚持产业驱动,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标准,建立‘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的产业扶贫模式,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5个,免费发放可以种植12000亩的核桃苗、600亩的黄金梨苗、1967亩的魔芋苗;发放种猪350头、种牛140头、种羊1538只,扶持农户种中药材重楼50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13]但是,在产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不要一窝蜂地搞同质化建设,结果会浪费资源,不但目标无法实现,反而适得其反,挫伤人民群众精准脱贫的自信心与积极性。

三、从文化迁移的角度,精准脱贫可与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的文化搬迁密切联系起来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作为脱贫攻坚战略性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及有效路径,发挥着积极作用。“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新一轮脱贫攻坚工程的超常规举措,是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最为直接有效的扶贫开发方式。”^[14]恶劣的地理环境对贫困的发生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特殊的生态贫困。“典型的区域区位决定了特殊的生态环境,而特殊的生态环境又直接制约着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特殊的生态贫困。”^[15]挪穷窝,拔穷根,把贫困村寨、贫困群众迁移到发展条件比较好、能有效脱贫致富的地方,使之摆脱制约其发展而致贫的恶劣生态环境及生存条件。各贫困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易地扶贫搬迁具体地点,有的与特色小镇建设相结合进行统筹规划,收到良好效果。以贵州省黔西南州为例,晴隆三宝彝族乡整体搬迁,阿妹戚托特色小镇已经建成。普安县茶源小镇、安龙县中国蘑菇特色小镇,兴仁市薏品田园生态小镇、贞丰县三岔河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册亨县纳福手绣小镇、望谟县蔗香滨湖康养小镇、兴义市乌沙黔龙古镇、义龙新区鲁屯古镇等融合贫困人口易地搬迁的特色小城镇正加紧建设。南盘江流域诸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稳步推进,但还存在许多现实困难与问题。该地区为布依族,苗族,壮族,彝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少数民族村寨。这些地方也是深度贫困地区,对深度贫困乡村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工作中的一个系统而重

点的工程。文化建设很重要,深度贫困地区乡镇、村寨的整体搬迁应当包括文化搬迁。

(一)易地扶贫搬迁之前,做好文化普查工作

搬迁不但是简单地挪穷窝,而是要带走乡土文化。乡土文化是留住人们心灵净土的主要元素。首先,由县级有关单位具体要求,对文化普查工作进行统一部署,制定调查制度,配备专门人员,加强业务培训,为易地扶贫搬迁地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化搬迁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其次,由乡镇干部会同村组干部对反映当地风土民情的民族文化实地踏勘,以召开群众大会、走访调查等形式,多与人民群众协商,逐步解决有关民族文化实物的迁移问题。在此过程中,县乡村组各级干部按照民族文化调查要求,对有关实体进行全面的追溯、多媒体数据输入,保持其存在的真实性及历史的连续性,从而为永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条件。最后,将民族文化普查有关资料、影像、数据等材料汇总,交文化、档案等部门妥善保管,以留存历史记忆。

(二)易地扶贫搬迁时,保护好民族文化迁移载体

易地扶贫搬迁是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离原来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迁移,其中包括民族文化的转移。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人口文化形式上的迁移,对于民族凝聚力的稳固发挥着重要作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促使搬迁贫困人口保质保量搬迁,尽快尽早脱贫,对于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16]可以对民族村寨整体搬迁,使之维持历史发展过程上的延续性。可以将民族村寨中的少数民族居民搬迁到民族成分相同的村寨。搬迁群众与迁入地百姓由于文化上的认同,利于民族文化相融共生。近年,兴义市万峰湖畔的布依村寨人民搬迁到了万峰林街道办事处等布依村寨中,安龙县岜皓布依族移民到了新桥镇等地,形成移民社区,使之逐渐融入当地布依族聚落社会之中。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有其特定的生态环境。它们一旦脱离原生文化环境,虽然存续一定时间,但是会无形削弱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因而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会出现文化变迁的状况。因此,消除文化搬迁中的不利因素,就要保存其文化存在的完整性及文化发展与新生环境之间的相融性。

(三)易地扶贫搬迁后,持续维护好民族文化典型元素

民族文化典型元素以实体或符号的形式呈现,这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少数民族节庆文化、服饰文化、民族歌舞等文化

形态的维持,对于迁移民族保存自身文化特色具有积极作用。“这些民族文化从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具体、生动、鲜活地表现着,被村落世代代的人们传承延续。”^[17]易地扶贫搬迁之后,民族特色元素即村落民间文化维持在一定范围内的独特性,将为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增强及新社区的和谐稳定发展作出应有的文化贡献。但也有可能由于过度自我封闭而陷入孤立的状态,使之难以融入迁移之地。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是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融洽的。被搬迁的民族村寨或贫困人口在维持自身民族文化特色,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同时,充分开展与迁移地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共处,共创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4.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

[3] 彭兆荣. 找回老家:乡土社会之家园景观[J]. 贵州社会科学,2008(2):25.

[4] 方李莉. 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J]. 民族艺术,2018(1):28.

[5] 蒋永甫, 龚丽华, 疏春晓. 产业扶贫: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J]. 贵州社会科学,2018(2):149.

[6] 郑长德. “五个发展”理念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研究[J]. 民族学刊,2017(1):16.

[7] CAI Dianxiong, ZHA Yan, PHILIP J B, 等. 中国生态扶贫战略研究[M]. 修订版. 唐小田, 李玮, 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19.

[8] 郭琰.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路径[J]. 中州大学学报,2020(2):25.

[9] 赵传松, 任建兰. 全域旅游视角下中国旅游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及预测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18(3):67.

[10] 钟晟.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武当山为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72.

[11] 保虎.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我国贫富差距缩小的理性审视与路径选择[J]. 贵州民族研究,2018(1):177.

[12] 北京师范大学绿色减贫指数课题组. 贵州省绿色减贫指数特点及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2014(11):156.

[13] 鲁可荣, 杨亮承, 朱启臻. 精准扶贫与乡村再造:基于云南禄劝实践的反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63.

[14] 黄承伟. 脱贫攻坚省级样本: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贵州模式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38-239.

[15] 李俊杰, 耿新. 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以“三区三州”为例[J]. 民族研究,2018(1):53.

[16] 杨秋宝. 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 公务员读本[M].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7:78.

[17] 王生鹏, 张静. 旅游开发与民族村落文化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Development Research on Minority Culture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anpanjiang River Basin Areas

PENG Jianb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gyi, Guizhou 562400, China)

Abstract: Nanpanjiang River basin is located in the border area of Yunnan, Guizhou provinces and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he tas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rduous. The rich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reg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helping to lift people out of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be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be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coordinated and interconnected development of Nanpanjiang region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igr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be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al relo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inhospitable areas.

Key words: minority culture; culture poverty allevi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Nanpanjiang River basin

战国秦汉时期黄河砥柱段漕运的经营

崔建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黄河砥柱段水文条件极其恶劣,秦昭王末年,为配合长平之战,秦国很可能已通过这段河道输送军需。为了更充分地发挥黄河砥柱段沟通关东与关西的功能,秦汉帝国在通道延伸线两端的蒙阳、华阴分别建设了敖仓、华仓等设施,在即将进入砥柱河段的新安县,也建设了大型仓储设施,便于漕船减载。至迟在西汉时期,砥柱河段的两岸崖壁上还修凿了栈道,便于组织人力挽船。由于砥柱段漕运代价过高,引起舆论的强烈批评,两汉有识者遂提出一些颇富空想色彩的替代措施。虽然大多遭遇失败,但恰恰反映了砥柱段漕运之艰所引起的焦虑与无奈。

关键词:漕运;砥柱;战国;秦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14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73-06

对于秦汉时代的国家形态,学界习惯称之为“帝国”。作为一种“高级政治体”,秦汉帝国自有其迥异于“战国模式”的运作特征,其中,超越单个诸侯国的地域局限性,在更为广阔的权力辐射范围内进行资源统筹,是极显著的一点。从这个视角出发,作为维持秦汉帝国运转的一项重要事务,黄河漕运可以说是认知帝国特性的重要线索之一,而在这条线索上,砥柱河段的漕运事业因其难度极高、投入巨大,尤其值得关注。

一、砥柱段黄河航运之艰险

“漕”,《说文》解作“水转谷也”^{[1]566},将运输对象限定于谷物。但曹魏如淳认为:“水转运曰漕。”^{[2]165}李贤注《后汉书》:“漕,水运也。”^{[3]136}《史记索隐》:“水运曰漕也。”^{[4]1422}也就是说,“漕”的定义仅取决于运输方式,与运输对象没有必然联系。简言之,漕运其实就是内河航运的代称。

在内河航运的意义上,漕运的历史并非始于秦朝。顾炎武曰:“因河以为漕者,禹也。”^{[5]742}观《禹贡》所载九州进献方物的路径,实际上就是对早期漕运事业的宏大构想。需要指出的是,《禹贡》展示的贡道在交通地理方面存在两个重要节点,一个在

河、洛交汇处,另一个在河、渭交汇处。冀州“入于河”,兖州、徐州“达于河”。青州虽是“达于济”,但古人认为济水属于黄河支流,“达于济”并非青州的最终目的,接下来尚需“达于河”。对于扬州,《禹贡》的描述是“达于淮、泗”,但从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的路径推断,扬州完成进贡也必须“达于河”。冀、兖、徐、青、扬皆“达于河”,这是《禹贡》对东方五州贡道的描述。至于南方的荆、扬二州,荆州“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为“浮于洛,达于河”,由此不难推知,东方五州与南方二州共同经过的水路枢纽为河、洛交汇处。余下的雍、梁二州,因处于西方,前者需“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后者需“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河、渭之交遂为二州贡道的交汇点。^{[6]146-150}《禹贡》擘画的漕运蓝图存在东西两个节点,如果蓝图能够变成现实的话,不难想象,东节点以东和西节点以西的黄河河道将是使者相望、极度繁忙的。相形之下,我们不禁要问,东西两个节点之间的通行情况怎样呢?

以现代政区言之,东节点在今河南省巩义市,西节点在陕西省潼关县。将两个节点之间的河道以洛阳为界,东段为当时河内、河南二郡的界河,西段则

收稿日期:2020-09-16

作者简介:崔建华(1981—),男,河南浉池人,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工作,研究方向涉及秦汉区域史、社会观念、政治秩序。

为河东郡与河南郡的界河,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砥柱河段”。就水文条件来说,东段航行难度较小,而西段的砥柱河道是不适宜通航的。对砥柱河道,酈道元曾做过非常形象的描述。酈氏提到,当黄河流经陕县时,“水涌起方数十丈”,人们普遍认为是“有物居水中”所致。至于何物,有人说是“铜翁仲”,也就是秦始皇时代所铸十二金人之一。还有人说是十六国时期“石虎载经于此沉没”,经书与金人“二物并存,水所以涌”。酈氏对这两种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鸿河巨渚,故应不为细梗蹶湍;长津硕浪,无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涛波者,盖《史记》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7]114-115}此说摒弃父老传言,转而向史籍所见山体崩塌的灾害记录索解,自有其过人之处。虽然酈说也有不周之处,比如未曾考虑山崩之后是否施行过应对措施,以减轻对河道的堰塞。但从《史记》山崩记载本身,以及包括酈氏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对黄河“水涌”所进行的各式解读,不难感知古人对黄河在陕县段恶劣水文的高度关注。不过,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由砥柱带来的苦难更甚于此。“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杰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浓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虽世代加功,水流湍湑,涛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踟蹰难济,故有众峡诸滩之言。”^{[7]116-118}

经历“世代加功”之后尚且令人“踟蹰难济”,更早时期的人们对这段河道的风涛险恶必定也有所体会。《晏子春秋》载著名的“二桃杀三士”故事,三士之一的古冶子在陈述自己争桃的合理性时说:“吾尝从君济于河,鼃御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鼃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鼃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鼃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8]165}这个故事应非一人独创,而是民众口耳相传的文化成果。饶有趣味的是,当这个故事在民间发酵时,人们为了使古冶子的壮勇气概能够得到更有力的表现,创设了一个特定情境,即“砥柱之流”。由故事来看,在先秦社会的普遍意识中,“砥柱之流”的显著特征便是神怪出没、风急浪高。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开展漕运的代价无疑将是极高的。

二、秦国东扩与砥柱段漕运发生的可能性

《禹贡》言大禹导山,其中说到“底柱、析城,至于王屋”^{[6]151}。山川本是隔限南北东西的地理存在,但大禹传说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对这种阻隔效应的诅咒,而是在承认山川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对它们为何存在做出神秘主义的解释。在此类解释中,客观上会带来困难的东西反倒变成了神圣人物给人类创造的福利。相似的情感还见于《墨子》:“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邸、噉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所谓“洒为底柱”,孙诒让注:“洒即谓分流也。”^{[9]107-108}按照墨子的看法,底柱矗立在河道中,是很值得感恩的事情。因为大禹凿之使河水分流,若非大禹,黄河水因底柱而壅塞,川壅而溃,必将使人类化为鱼鳖。

那么,人们对砥柱的赞美之情何以生成?笔者以为,一个重要前提是,人们虽已注意到砥柱河段凶险的水文实态,但这种已被认知的凶险又没有严重地影响到现实生活。换句话说,人们已知道它,但还没怎么计划着去利用它,也就谈不上怎么征服它。水运作为一种交通行为,往往受到外在条件的制约,尤其是在诸侯各自为政的分裂期。具体到魏国与黄河的关系,战国时期的黄河砥柱段并非魏国的内河,而是魏国与韩国的界河。魏国即便有循河上下的念头,现实中也很难操作,毕竟类似计划不是魏国一家的事情,还牵涉到韩国的水权问题。真正使砥柱河段成为内河的是秦国,据《史记·秦本纪》,秦国自惠文君以来在黄河南岸持续推进,至庄襄王元年,秦灭东周,“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至此,黄河南岸尽属秦。在黄河北岸,秦昭王十七年,得蒲阪、皮氏,至庄襄王三年,秦兵攻汲,“拔之”,从而基本控制了位于河东、河内地区的黄河北岸。也就是说,至迟在庄襄王时期,砥柱段黄河已完全成为秦国的内河,并且秦国还控制了洛阳以东的部分河道,从而具备了开展大规模、有组织航运的基本条件。而个别迹象表明,稍早于庄襄王的秦昭王末年,秦国很可能已尝试着在砥柱河道从事漕运。

《史记·赵世家》记载,长平之战前,韩国上党守献地于赵,赵国平阳君赵豹曰:“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句中的“秦以牛田之”,《正义》:“秦蚕食韩氏,国中断不通。夫牛耕田种谷,至秋则收之,成熟之义也。言秦伐韩上党,胜有日矣,若牛田之必冀收获矣。”据《正义》所言,所谓“以牛田之”,即借助畜力耕种。在此基础上,《正义》将紧随

其后的“水通粮”解作：“秦从渭水漕粮东入河、洛，军击韩上党也。”^{[4]1825}这也就意味着，长平之战前的秦国已通过砥柱河道向前线运粮。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文献所载秦国在长平之战前“水通粮”，目前来看，只有张守节《正义》认为是经由砥柱河道将粮食运至前线。不过，秦昭王四十三年“城河上广武”^{[4]2417}。广武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括地志》云其地在“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记》云“在敖仓西”。秦汉之际，刘邦曾“军广武，就敖仓食”，而项羽也曾“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4]327}。可见此地为理想的储粮之所，当初秦国于此筑城，筹划军需的意图应当是有的。而长平之战发生于秦国筑广武城后四年，史载，当“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之时，“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4]2334}。秦昭王认为“赵食道绝”是天赐良机，务必牢牢抓住，为此不惜“自之河内”，亲自进行全面的战争动员以及细致的军事部署。在此国运攸关的时刻，他不可能对秦国自身的军粮供给问题视若无睹，相反地，敌方的弱点恰恰会提醒秦昭王，粮食问题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在此观念主导下，于太行、崤函两个方向的艰苦陆运之外，另辟砥柱河道的水路运输，自然是一个可选项。

三、秦汉砥柱段漕运的展开及其基本保障

砥柱河道开通漕运的初期阶段，应当主要服务于秦国对东方的战争，这就意味着，漕运的基本方向是自西向东，将秦国本土的战略资源尽可能高效地输往前线。不过，当秦国在东方已经形成较为宽广的战略纵深，原先的单向输送势必有所变化，最终在统一局面形成后演化为西向输送为主。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关中作为国都所在，易于吸引周边人口；其次，北边防务也要求秦朝政府以空前的力度抽取关东的资源。统一后所面临的新问题，客观上将促使秦朝的砥柱段黄河漕运空前繁忙。

秦封泥可见“底柱丞印”，周晓陆等学者认为：“以底柱之险狭，似不能立县，底柱丞约为秦时‘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时，所在黄河祠祀底柱之官吏”^[10]。王辉对封泥的解读是：“底柱是传说中大禹治水所凿，其地势险要，时有怪物作祟，需河神镇守，或由力士铲除之。秦时于底柱设官，是为了祭祀河神、震慑异物，底柱丞殆治水官。”^[11]两说均注意到底柱的“险狭”“险要”，并且都认为封泥反映了秦朝政府对底柱的祭祀。最近，有学者根据秦印通例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果‘底柱丞’负责‘祭祀河神’，则印文应该出现‘祝’‘祠祀’等字样”，“底柱

丞印”既然不合印文惯例，那么，“‘底柱丞’可能是底柱县丞。其任职应当包括主持底柱附近‘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浓波怒溢’之航道的运输管理，可能也要担任克服底柱航段‘河阻’的修治工程的指挥”^[12]。而底柱设职管理的情形表明，至迟在秦代，官方或得到官方认可的砥柱段黄河航运已经常态化。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黄河砥柱段漕运，秦汉王朝对这段漕运通道延伸线两端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仓储设施颇多投入。首先是在洛阳以东修建了敖仓。敖仓大致位于今河南荥阳市西北的马沟、牛口峪一带^[13]，始建于秦。楚汉之际，酈食其说刘邦曰：“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谿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4]2694}由此可见，敖仓当时具有非比寻常的战略地位。不过，相比于秦朝时期，敖仓对刘邦阵营来说并不是集四方粟米以镇守东方的据点，在更大程度上，由于荥阳以东非刘邦所能控制，敖仓只能是刘邦收纳关中后方所输军粮的仓储。《史记·萧相国世家》：“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4]2016}所言正反映了自西向东的单向漕运模式。

待到天下重归一统，漕运的基本走向再次发生翻转。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打算定都洛阳时，张良认为定都关中更合适：“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4]2044}张良将漕运形势分作“安定”与“有变”两种，前者征天下已供京师，后者出京师以制天下。当然，对于建国不久的汉帝国而言，张良之言还是一种设想。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朝立国既久，关中人口持续增加，对匈奴的战争旷日持久，导致自东而西的逆向漕运压力倍增。据史家统计，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而到了武帝时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4]1418}。为配合天量漕粮的运输需求，朝廷在黄河航线的西端建设了华仓。考古发掘证实，华仓位于陕西省华阴市硤峪乡西泉店村南、段家城村北的瓦渣梁，总储能在百万石左右。^{[14]60,63}

在即将进入黄河砥柱段的地方也建造了规模巨大的仓储设施。20世纪末，为配合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建设，文物工作者在河南省新安县仓头乡盐东村发掘了一处建筑遗址。发掘者认为“该建筑是西汉时期国家管理的、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带有军事防御

性质的仓库建筑”。至于其具体功能,发掘简报指出:“从漕运的角度讲,由于黄河水运险恶,漕运在进入上游复杂的水路以前,应减载或转为陆运,八里胡同的一段峡谷即是进入险恶航程的标志。因此,在进入八里胡同以前,必须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筑码头和仓库,以做漕运物资中转之用。”^[15]

如果说仓储设施的建设尚属硬件投入的话,与漕运直接相关的政府机构设置以及人力资源配置则可视作软件投入。其实仓储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专业化的政府组织,它的运转离不开各层级的管理人员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河关的设置,也对相关吏员规定了具体的职责。张家山汉简有“丞相上备塞都尉书”,“请为夹溪河置关,诸漕上下河中者,皆发传,及令河北县为亭,与夹溪关相直”。如果有“阑出入、越之,及吏卒主者,皆比越塞阑关令”。简牍整理者注:“夹溪关在今陕县,位于黄河之南,其北为西汉河北县。”^{[16]38}也就是说,上述规定就是针对砥柱河段的航运活动而出台的。由于漕运的基本交通工具是舟船,汉朝还在河、渭交汇处设立了一个相当于县级政权的机构,即“船司空”,“本主船之官,遂以为县”^{[2]1543-1544}。从其名称来看,当地官员显然负有舟船建造、维护、调拨等职责。

《史记·平准书》载卜式事迹,其履历中有“迁为成皋令,将漕最”的记录,表明漕运所经之处的地方官负有“将漕”之责。此外还有“河师”。《后汉书·孝献皇帝纪》载汉献帝从长安东归洛阳,道经陕县,追兵甚急。有扈从者“欲令车驾御船过砥柱,出孟津”。宗正刘艾坚决反对:“臣前为陕令,知其险。旧故有河师,犹有倾危,况今无师。”^{[17]544}所谓“河师”,是指熟悉黄河水情的人。从刘艾之言可知,这批人在承平时期担当的社会角色应是黄河漕运的指导者、顾问。虽然他们很可能并非在政府的组织下开展工作,但由国家层面经营的漕运工作,无疑是他们活跃于黄河两岸的基础性因素。

四、秦汉砥柱段漕运的困境及其应对举措

沿河设仓、地方“将漕”、专业指导等行为往往是在尊重黄河河道自然形态的前提下进行的,很少涉及改善河道通行条件本身。然而,黄河漕运基本面貌,以及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在根本上其实都是恶劣的通行条件造成。比如河南省新安县的仓储设施,发掘者认为是为了便于漕船西行时减载,如果不这么做,很可能在砥柱河段的激流险滩中倾覆。但仓储也有其短板,减载固然提升了安全系数,与此相伴的是,单船运载量变小,停靠的时间成本也大幅增加。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输效率,更为切近的做法

还是对河道的通航条件进行优化。不过,以秦汉时代的技术水平,疏浚水下险滩的空间很小,通常情况下,只能将目光投向两岸的悬崖,开凿栈道以辅助行船。

1997年,河南省新安县八里胡同河段发现了栈道,由于石刻题记曰:“贺晃领师五千人修治此道。天大雨。正始九年正月造。”学者判断这段栈道“至迟在三国时期就已凿成”,“它的初创有可能在东汉时期”^{[18]65,76}。这样的判断不仅在逻辑上较为合理,而且也可与此前早已发现的题记相印证。20世纪5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三门之一的人门栈道上曾发现摩崖石刻,其中一处的文字是“和平元年六月十四日,平阴李兒□□造”,研究者认为刻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9]43}。此为黄河栈道开凿于东汉时期的确证。不过,桓帝时代已处于东汉后期,虽说按照普遍行为在前、点滴遗迹留后的一般规律,似可推论东汉前期很可能已开凿栈道,但尚缺乏实证。幸运的是,大约在发现八里胡同栈道的同期,山西考古工作者在垣曲县五福涧村栈道岩壁上又发现了建武十一年题记,分上下两段,上段刻“建武十一年□月□日官造□遣匠师专治□□〔积临水〕水□”,下段文字为“时遣石匠□〔赤〕□〔知〕石师千人”。考察人员经过论证之后,推断“建武十一年”指的应是东汉光武建武十一年。如此,黄河漕运栈道的始凿年代已可追溯到东汉初年甚至更早。垣曲栈道考察者即认为黄河栈道的历史可早至西汉。他们注意到《汉书·沟洫志》的一条记录:汉成帝鸿嘉四年,大臣杨焉建议:“从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镌广之。”“上从其言,使焉镌之。”进而就这条材料推论:“黄河栈道的始建时间当不晚于西汉。”^[20]

尽管汉代社会为提升漕运效能、改善通航条件投入很大,但漕运本身是一项极苦的差事,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汉代尤其是西汉时代不乏漕运的批评者。如盐铁会议时的儒生们,他们认为秦朝行商鞅残苛之政,致使“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不仁不义,终至于二世而亡。论史而及于现实,他们又指斥汉武帝“保胡、越,通四夷”,“与人以患”,导致了“甲士死于军旅,中士罢于转漕”的严重后果。此外,他们还认为汉武帝“泾、渭造渠以通漕运”,如同“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是“策诸利”的短视行为。^{[21]132,463}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从民本的道德立场出发对漕运进行挾伐。比较而言,务实的士大夫虽然承认漕运有伤人的一面,但往往对朝廷持有同情,强调漕运的不得已。他们声称“飭四境所以安中国也,发

戍漕所以审劳佚也”，实施漕运为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使“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灾”，皇帝于是“下诏令，减戍漕，宽徭役。初虽劳苦，卒获其庆”^{[21]489,520}。简单说，漕运可谓先苦后甘，体现了执政者的良苦用心。问题在于，解“圣人”心思者能有几人？为了应对批评的声音，为了实质性地减轻漕运带来的苦难，为砥柱河段的漕运找寻替代路径，自然成为有识之士的思考方向。

《史记·河渠书》载，汉武帝时，河东太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盖河壩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共，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4]1410}此说的意图是通过提升河东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以满足关中之需。番系设想的粮源尚局限于河东，而汉宣帝时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2]1141}显然已将筹粮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商业运作的色彩。

到了东汉时期，出于平定羌乱的需要，关中仍然需要东方的粮食供应。为此，朝廷甚至将目光投向了太行山以东。史载汉明帝永平年间“理滹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3]608}。滹沱河、石臼河在常山，羊肠仓在太原，明帝时期此项漕运工程显然是跨越太行山区的。其最终目的，酈道元认为并非止于“转山东之漕，自都虑至羊肠仓”，而是要进一步“凭汾水以漕太原，用实秦晋”^{[7]157}。然而，此次尝试也没有成功。“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章帝时期“遂罢其役。”^{[3]608}

除了翻越太行的设想，还有人瞄准秦岭，“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上书者认为：“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但这个想法实施后，“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仍以失败告终^{[4]1411}。

上述尝试都是在黄河以外索解漕运的困境，而最富于想象力的则是齐人延年的计策，他上书武帝曰：“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此功壹成，万世大利。”^{[2]1686}这个想法的核心内容是直接在上游施工，

使黄河改道。之所以能有此计策，学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汉武帝时代“许多布衣之士的上书往往更喜欢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人主之重视”^{[22]113}。学者所谓“惊人之语”，是对延年此计的恰当描述。的确，汉武帝览奏后耳目一新，“壮之”。但他的头脑仍保持清醒，报曰：“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22]116}这一次，汉武帝根本没有打算去尝试，他深知，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延年的计策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虽然汉人设想的替代路径没有一次是成功的，但他们的努力、执着与用心恰恰意味着，对于汉代社会而言，砥柱段漕运所带来的苦难不能不予以重视，可是又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对此，汉人是焦虑且又无可奈何的。

五、结语

表面上看，砥柱段只是数千公里黄河的小小一部分，但砥柱段黄河漕运既然在秦统一进程中发端，服务于秦兼天下的大事业，那么，它就天然地具有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历史意义。而这种全局性意义，在秦与西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无论是国家的持续建设、维护，还是批评者对民众苦难的痛心疾首，抑或是言事者寻找替代路径时的放眼四方，无不表明砥柱段漕运的全局性影响。这种全局层面上的影响力到东汉时代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统一战争的作战主轴线曾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由东汉之前的东西轴线转变为三国以降的南北轴线。”^{[23]132}与此相应，对迄于东汉时代的文化格局最为宏观的描述方式便是山东与山西或关东与关西的两分法。这样的东西轴线与东西两分，并没有因为东汉定都洛阳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时代仍然对砥柱段漕运通道持续修整。但是，与之前相比，这个时期的漕运对于帝国的意义毕竟已有所不同。在政治中心居于关中的秦与西汉，漕运不仅要服务于北边、西边军事活动，还要供应关中，维持帝国心脏的跳动。而到了东汉，定都洛阳使砥柱段的黄河漕运卸下了维护帝国中枢运转的沉重负担，角色逐步单一化，成为一条主要用来巩固西部边防的物资运输通道，而某些核心功能的剥离往往意味着历史地位的下降。中国历史再次进入分裂期后，砥柱漕运已不具备全局意义，直到唐代，随着关中再次成为政治中心，它才又一次书写了中国古代交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2]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5]黄汝成. 日知录集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6]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陈桥驿. 水经注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8]吴则虞. 晏子春秋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9]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0]周晓陆. 秦封泥再读[J]. 考古与文物,2002(5):68 - 75.
- [11]王辉.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秦封泥选释[J]. 文物,2001(12):66 - 70.
- [12]王子今. 说秦“底柱丞印”封泥[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9(3):12 - 17.
- [13]荆三林. 敖仓故址考[J]. 中原文物,1984(1):22 - 26.
- [1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汉京师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15]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黄河小浪底盐东村汉函谷关仓库建筑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2000(10):12 - 25.
- [16]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
- [17]张烈,点校. 两汉纪(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8]河南省文物管理局. 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集[M].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
- [1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三门峡漕运遗迹[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20]张庆捷,赵瑞民. 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J]. 文物,1998(8):48 - 58.
- [21]王利器. 盐铁论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2]宋超. 秦汉史论丛[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23]黄朴民. 秦汉统一战略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谢春红)

Management of Water Transport in the Mainstay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Warring State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CUI Jianhu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an extremely inconvenient hydrology in the Dizhu waterway of the Yellow River, due to failure to control all two sides of the Dizhu waterway, the kingdom of Wei was impossible to be the starter to transport through it. In late period of the king Qin Zhao Wang, for supporting the Changping Battle, the kingdom of Qin was very likely to use the Dizhu waterway to ship material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the mainstay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to communicate between Guandong and Guanxi, the Qin and Han empires built Aocang and Huacang facilities at both ends of the extension of the channel in Xingyang and Huayin. Xin'an County, which was about to enter the mainstay section, has also been built to facilitate the reduction of the load of the water tanker. In the later Western Han Dynasty, plank roads were also built on the cliffs on both sides of the mainstay section to facilitate the organization of manpower to pull the boat. The high cost of transporting through Dizhu waterway had resulted in strongly criticizing from the society, so that some smart people had proposed some substitutive measures with a little fancy. Although most of them had ended up with failures, these fantasies had just demonstrated anxiety and helplessness resulting from hardship of transporting through Dizhu waterway.

Key words: transporting through waterway; Dizhu;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dynasties

基于生态翻译学视域的中原典故英译研究

和 伟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 中原典故是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人们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进而形成的典章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博大精深的文字总结。探讨中原典故的英译策略,发掘和弘扬中原灿烂的历史文化,正确理解中国几千年的人文思想和价值观,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逐步扫清障碍,让世界倾听中原的声音。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视域;中原典故英译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15

中图分类号: H08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0)05-0079-04

一、中原典故

中原典故是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人们在日积月累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进而形成的典章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博大精深的文字总结。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地区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下来很多耳熟能详的典故,如守株待兔、愚公移山、众志成城、郑人买履、洛阳纸贵、定鼎中原、武丁中兴、楚河汉界、揭竿而起、朝三暮四等。这些典故有与历史发展规律有关、有与农耕社会劳动现象有关、也有与发生在中原地区的真实历史事件有关,每一个典故都有它自身蕴含的意义,从它产生到现在也都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字交往、书籍存备及许多地方的风土人情中。外国友人接触中华文明,难免会接触到中国的典故,因此典故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对外宣传的效果。基于这种背景,河南省教育厅2018年10月起举办了第一届“讲好河南故事”英语大赛,目的是用英语讲好“河南故事”,演“译”中原风采,更好地宣传河南、推广河南,传播好中国声音与河南声音,让河南真正走向世界。在比赛中,有不少选手选取河南历史典故进行了原创翻译,充分展示了河

南地方发展的风土人情、历史演变。但这些翻译作品的表达却良莠不齐,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存在,许多中原典故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这些不对等、不准确的中原典故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二、中原典故英译现状

笔者在中国知网的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对截止到2020年5月分别以“中原典故英译”“典故翻译”“中原典故翻译”“中原传统文化翻译”等相关字眼为主题或是关键词进行查阅,共搜索到相关论文60余篇。笔者对这60余篇有关中原典故英译的论文进行粗略分析,既有的研究存在以下特点:

(一)典故英译研究总体数量少

在文献查阅中发现,针对典故的英译研究整体数量少,只有几十篇。张英萍在“谈中文人名典故英译的异化与归化原则”一文中提出了中文人名典故的英译与归化原则,运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原则来讨论中文人名典故英译的技巧与方法^[1]。蔡文华以赵甄陶英译的《毛泽东诗词》版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毛泽东诗词中典故进行英译研究,其主要

收稿日期: 2020-09-10

基金项目: 2020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原典故英译研究”(SKL-2020-834);郑州市2020年度社会科学调研课题“基于生态翻译视角的黄河文化典故英译研究”(0861)

作者简介: 和伟(1972—),女,河南信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原因是典故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其背景蕴含了厚重的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得翻译研究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作者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分析、阐述该译本的翻译过程的适应性,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根据材料的可选性对材料进行加工、润色等的适应与选择^[2]。张薇在对中国古文化典籍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用对比分析的方法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的应用^[3]。

上述有关典故翻译的文章寥寥无几,而对中原典故的研究资料就更加缺乏,只有为数不多相近的几篇。刘立胜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地方高校典籍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如课程设置、就业去向等^[4]。宋海英则在研究生态翻译学的基础上对翻译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相应的解决方案^[5]。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原土地上发生了众多的历史事件,并且形成了璀璨的华夏文明,中原典故英译的研究对挖掘、传承中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典故性成语及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较多

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典故性成语的翻译研究,如段艾俐的硕士论文“汉语成语的英语层次观初探——以《红楼梦》300条成语英译为例”,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6]。李华发表了“文化语境下汉语典故性成语的英译”论文,强调了文化语境对典故性成语英译的影响,并提出用“归化”“异化”策略翻译典故性成语^[7]。但典故性成语只是众多典故的一部分,典故的翻译研究不仅涉及到典故成语的翻译,还包括对典故故事本身的翻译规律探讨。

很多研究涉及了文学作品中的典故翻译,如对唐宋诗词典故英译研究、《西游记》中的典故英译研究、《红楼梦》中的典故英译研究,对毛主席诗词中的典故翻译研究等。这些研究对丰富典故的英译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典故翻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百家争鸣的理论支撑局面

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理论支撑着翻译研究成果的实际进程与翻译结果。译者分别从归化、异化的角度对典故进行翻译,试图对中英语言背后的典故进行探讨。也有学者从目的论、文本类进行归纳。而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对于河南文化的翻译规律研究却少之又少,且大多聚焦在具有典型的河南旅游特征的事务上,如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翻译、河南省红色旅游文化的翻译。可以看出生态翻译学已经应用在很多翻译研究上,但对于典故翻译的研究却相对匮乏。

三、生态翻译理论与典故英译

所谓的生态翻译学是基于达尔文“适应与选择”学说,很多国外的语言学家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了翻译理论,其中,Peter Newmark认为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第一类就是生态学词汇^[8]。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提出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从生态角度研究翻译的规则与范式。它致力于从生态角度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9]。生态翻译学在重视文本重要性的同时,也重视译者与要翻译的文本、原文及翻译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只有翻译从业人员将这些因素协调好,并行之有效地应用到翻译文本中,这种翻译才能成为合格的生态翻译。

生态翻译学对翻译文本进行适合的选择性翻译,即以翻译文本的外部表现转化为内涵翻译为基础,保持文本的原有特征,将原文与译文进行动态对等,在翻译中根据译文对原文化进行重新组合,依据动态对等理论来指导原文的翻译,保证原文的内涵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故不仅为中国的文学艺术提供了素材,也早已渗入到中华民族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生活的各个领域。典故是中华文明的文字载体和一部分缩影,译者如果从生态翻译的角度来翻译,就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文本的语言、文本所处的文化、交际环境三个角度,即三维出发,在文本转换的翻译中进行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进而在原文本与翻译文本上达到有机统一,创造出“生态化”的翻译文本。

四、中原典故英译中出现的问题

(一)文化信息缺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各民族的语言虽然不尽相同,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也各有区别,但在沟通的时候总可以找到相应的媒介进行转换。人类的生活习性、衣食住行都是相通的,展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是有許多共相的。因此人民利用翻译来相通这些共相,进而达到交流、合作的目的。但由于中英文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典型的汉藏语系,汉语形象、直观达意,而英语属于印欧语系的日耳曼语,简单化、标准化且具有逻辑性。这些原因会导致中英文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出现信息缺失的现象。如源语中的词语没有一致性是导致文化信息缺失的一个原因,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具有典型中国传统文化语义的词汇的翻译,如旗袍、气功、乌纱帽等词在英语中就无法找到其对应的词汇。另外由于非语言障碍中的文化差异,中西方文化在观念上、价值观上有很多差异,表现在文化上就体现在文化信息的缺失

上。

（二）翻译直白化

翻译中最大的困难是无法翻译出根植于源语言中的抽象文化。汉语行文表达的随意性及螺旋形思维模式一直是很多英文译者在翻译时候的难题。为了忠于原著,很多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会直接译出字面意思,这样翻译的结果就是表意不清晰、表达不流畅又不地道。中文典故由于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及代表性,一直是英汉翻译的难题。人们往往在“忠实原文”与“改译版本”之间摇摆不定,这就造成了有些翻译只注重表层形式的对等,没有挖掘深刻的内涵,用直白的翻译手法将一个民族“了然于心”的典故呈现给读者,译文读者根本无法了解字面背后所隐藏的文化。

（三）译文冗长

很多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让读者更好的理解字词的含义而用太多的词汇来补充说明,从而造成译文过于冗长,读起来枯燥乏味,破坏了原文的趣味性和美感。英、汉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英语讲究结构美,主要特征是语法完整,逻辑外形标志明显,而汉语则讲究意境美,主要特征是流水句多,外形松散而内含逻辑关系。英文的行文表达是线性结构,喜欢直来直去,简单化但却有逻辑性;而汉语的螺旋式思维使得汉语的表达如九曲回廊式弯曲。换言之,汉语即使用简单的语言就可以构造出一句话,有时语法并不完整,但却不会削弱行文的艺术性与意境美。因此,过于冗长的翻译会使原文失去可读性,原文的文学价值也因冗长而遭破坏。

五、中原典故英译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生态翻译学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把译者放在中心位置,且处于翻译的主导地位。有些翻译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为译者没有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中国译者要说自己的话,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深入问题本身,深入时代现实,对自己的学问、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要翻译的作品有深厚的感情,才能在翻译作品中体现出历史感、现实感与使命感。如翻译“楚河汉界”这个中原典故时,如果不了解其历史背景,不了解春秋战国时期“楚”大约是指今湖北武汉一带,其译文就可能与原文的意思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因此译者需要发挥主体地位,对原文理解透彻,对译文再三斟酌,这样才能使原文内涵最大限度地被还原。

（二）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

在翻译原文本中,要依据文本特点选取适合其

内涵的翻译技巧与翻译方法。不同国家的文化会有差异,因此在对原文本进行翻译时,要首先对原文本的语境进行分析,准确把握原文文本所处的语言环境。另外要分析中英文的思维习惯,汉语是传统的顺向思维,而英语的思维习惯则是逆向思维。中原典故的翻译需要译者熟悉中西文化,熟练掌握中英两种语言。如描写西周时期经典文献《诗经》的开篇之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翻译的时候如果深入诗词的背景就会发现所谓的“河之洲”就在中原,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原地区最大的休闲岛屿。河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心灵故乡,另一首《卫风》里提到“淇水潺潺水悠悠,桧木作浆松作舟……”诗中所说“淇水”即今日的“淇河”,即《诗经》的故乡之河。如果译文能保证在这些诗词基本意义的基础上,加以修饰,就能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好的译文不仅能表情达意,还能使读者带着轻松的心情感受原文的思想、欣赏原文的意境。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就需要结合直译和意译的方法,有些古文字还要加上音译,才能准确展现古诗词的具体的意象美和悠远的意境美。

（三）灵活转换“三维”

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源根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和魂。为更好地展示河南,展示中原文化,促进全球语言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利用宏观生态观念来指导中原典故文化微观文本的生态翻译研究也势在必行。生态翻译其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在翻译的“三维”,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之间灵活转换。语言维的转换就是指译者在文本翻译的过程中对中英语言的适应性转换。语言是相通的,英语和汉语的词汇区分、句子成分、句型构成等都是相近或相同的,译者在翻译时可以根据两种语言的相同点来选择相似或近似的文本互译;语言维转换的目的是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以力求译文的可接受性。英语的语言大多由复杂句构成,并有很多逻辑连接词连接,是典型的树状结构的意合语言,而中文多是流水句式。尤其典故是中文语言简练的一个典型代表,短短的几个字就能表达出复杂的意思。如中原典故“守株待兔”只有短短的四个字,但在英文表达里却是长长的一句话,“Waiting for something to happen is different”;文化维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密切注意英语、汉语文化背景的建构与解读。如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中国四大爱情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

台》,如果只简单翻译出“*Butter - fly*”或者“*Liang-zhu*”,西方读者不知所云。而将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与西方的 *Romeo and Juliet* 联系起来,翻译成 *Chinese Version of Romeo and Juliet*,透过莎士比亚的名著 *Romeo and Juliet*,西方读者便能很快了解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背后的文化及其涵义;交际维转换就是指译者在翻译中英文时要试图找到的交际所用的方法、语言,进行适应性选择。交际维的转换目的是关注双语交际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典故是传播地区与国家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传承中原文化的中原典故在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原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译者在翻译河南文化典故时,在以译者为中心的基础上,熟悉原文思想,考虑原文产生的生态环境,从语言、文化、交际三维角度出发,多视角、多维度适应生态环境,并对译本做出适应性选择,反复推敲翻译文本的表达,使中原典故在西方语言环境中得到更充分的传播。

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只有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实力,才能积极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在中原典故的翻译中,我们要为外国游客展现最自然、最贴切的语言环境,讲好“中原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从而促进河南省对外传播、文化形象的塑造和生态文明和谐的建设,提升中

原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加速河南国际化进程,促进我国与世界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 [1] 张英萍. 谈中文人名典故英译的异化与归化原则[J]. 咸宁学院学报, 2007(2): 94 - 96.
- [2] 蔡文华. 生态翻译学观照下《毛泽东诗词》赵甄陶译本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7.
- [3] 张薇.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的现状和对策[J].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19(1): 95 - 97.
- [4] 刘立胜. 中原文化典籍英译与人才培养研究[J]. 中州大学学报, 2013(5): 76 - 79.
- [5] 宋海英.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中原传统文化典籍翻译现状及对策分析[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4(6): 89 - 92.
- [6] 段艾俐. 汉语成语的英译层次观初探: 以《红楼梦》300 条成语英译为例[D]. 重庆: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6.
- [7] 李华. 文化语境下汉语典故性成语的英译[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7(11): 100 - 102.
- [8] 杨牧之. 国家“软实力”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大中华文库》编辑出版启示[J]. 中国编辑, 2007(2): 22 - 27.
- [9]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 上海科技翻译, 2004(4): 1 - 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entral Plains Allus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co - Translatology

HE W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allusions of the Central Plains are the sum of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created, summarized and accumulated by people living in the Central Plains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n they further formed into a broad and profound text summary of law systems, historical or cultural tradi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the allusions of Central Plains into English to explore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lendid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with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thousands of years of humanistic ideas and values, clearing the way for the blending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letting the world listen to the voice of Central Plains.

Key words: eco - translatology; field of visi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entral plains allusions

基于主体自洽原则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隐喻翻译研究

宫宇航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教研室, 天津 300350)

摘要:党政文献中的隐喻是翻译文本中常见的部分,有效的隐喻翻译能较好地实现源语文学和文献价值的转换,在对外传播中国发展理念和方针政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基于王文斌教授提出的主体自洽原则,分析译者在翻译中遵循的认知机制,结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隐喻英译案例,研究主体自洽原则在隐喻翻译中的应用,摒弃长久以来通过隐喻翻译策略来决定翻译实践所造成的局限,以主体自洽所导致的异隐喻性为新的切入点展开研究,以期对党政文献的隐喻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党政文献;隐喻翻译;主体自洽;异隐喻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16

中图分类号:H0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83-05

一、引言

隐喻作为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政治论证上,其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拉近政治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政治家们通常喜欢借助隐喻来把复杂的、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从而生动有力地传达政治思想^[1]。作为传递党和国家信息和思想的重要途径,党政文献中也会使用大量的隐喻,其翻译在对外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和方针以及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丛书作为重要的党政文献,其英译本在对外传播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中国话语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其中文本和英译本中所使用的大量隐喻更值得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以下简称《治国理政 II》)的中文本和英译本为语料,对其中的隐喻翻译案例展开研究,以期对党政文献的隐喻翻译研究提供借鉴。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丛书的翻译研究概述

通过检索发现,近年来国内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丛书中隐喻翻译研究的论文,主要切入点为“概念隐喻”(6篇)、“修辞学”(2篇)、“语篇隐

喻”(1篇)、“语料库”(1篇)。如窦智^[3]以概念隐喻为研究视角,将《治国理政 II》中的隐喻分为旅行隐喻、工程隐喻、战争隐喻、疾病隐喻、家庭隐喻和动植物隐喻等,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方法,如译入相同或不同的概念隐喻、译入明喻、取消或添加概念隐喻;黄鹂鸣^[4]利用修辞学的理论分析《治国理政 II》中隐喻的修辞功能,并认为译者修辞意识主要体现在四个翻译策略中,即直译中西方共享的隐喻、将始源域替换为贴近西方受众的隐喻表达、省略始源域并辅以对原文的释义、保留始源域并增加相关解释;徐云秋^[5]运用语篇隐喻理论研究了语篇隐喻及其翻译,并基于隐喻构建主题话语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翻译原则和策略;陈国兴、营爱丽^[6]则通过自建语料库的方式,分析了科技隐喻的人文性及工作机制,探讨了科技隐喻的翻译策略。

这些研究均以成熟的理论为基础,提供了详细的数据与案例分析,丰富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丛书中的隐喻翻译方法和实践经验,然而这些方法其实仍没有离开直译法、套用法和意译法^[7]的范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丛书翻译团队中的译者们作为不同的认知主体,虽会在隐喻翻译中体现出不同的

收稿日期:2020-06-25

作者简介:宫宇航(1986—),男,黑龙江同江人,文学硕士,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外语教研室讲师,主要从事认知翻译学研究。

主体性,即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8],译者们却可以构建出合理且风格一致的译文,既没有过度改写也没有过度体现不同译者的主观意志,其原因在于,译者对于源语隐喻的解读与译文的构建并非恣意,而是受到某种内在机制或原则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译者处理隐喻过程中,会依据自身的经验、知识、社会习俗、政治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源语隐喻的可译性及译法做出自我协调,进而达到自我认同,这种认知机制正与主体自洽原则^{[9]86}如出一辙,那么主体自洽原则能否作为一种认知机制在《治国理政 II》的隐喻翻译中被使用?此外,上述研究中所提及的翻译策略都有着相似的内涵且都凸显了一个共性的现象,即译文隐喻和源语隐喻往往不是直接的词汇对应翻译,译者在目标语中可能采用不同的隐喻概念或作非隐喻性的意译,那么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基于王文斌教授提出的主体自洽原则,探讨该原则作为隐喻翻译的认知机制的可行性,以主体自洽所导致的异隐喻性为新的切入点,结合《治国理政 II》中的隐喻英译案例,尝试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三、主体自洽原则

主体自洽原则是在对概念合成理论的吸收与批判的基础之上生成的,认为虽然隐喻意义的实现是概念合成的结果,但一切的概念合成都是认知主体自洽的产物,是认知主体主观推理和主观判断的结果^{[9]115}。该原则主要用于对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的分析,而解读与构建恰是隐喻翻译必然涉及的流程。

隐喻构建与解读的总体主体自洽原则(下文简称为自洽原则):认知主体若想构建或解读一个隐喻,就需要推定隐喻中的始源域 A 与目标域 B 在内或外在的至少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点上具有相容性。若相容性这一条件得到满足,那么认知主体对隐喻的构建与解读便会自我允准,否则,便会自我否定^{[9]226}。主体自洽过程包含“连接”“冲洗”“合流”三个认知机制^{[9]115}，“连接”是人们凭借记忆中各种事物的特征来认识新事物的重要思维能力,是将各种具有不同特点而又具有共性的事物统一起来的手段,若没有“连接”思维,世间万物在人的头脑中将变成孤立的个体,因此,对于隐喻的构建和解读来说,认知主体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始源域 A 和目标域 B 这两个输入空间进行“连接”,依凭自身的世界知识、人生经验、记忆等因素在域间进行“冲洗”,对输入空间内的所有信息进行筛选,冲洗掉一切和隐喻无关的信息,认知主体会进行自我协商、自我核定等

一系列无意识的认知活动,淘检出被其认同的 A 和 B 之间共享的特征,从而实现自我满足和自我允准,这意味着“连接”成功,并进一步导致两个输入空间内共同点的“合流”,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合流”并非共同点的简单相加,而是认知主体的格式塔心理作用的结果,即把这些共同点整合并知觉为一个隐喻思想的整体。若经过“冲洗”后,没有发现域间的共享特征,则 A 和 B“连接”失败,且无法“合流”。

(一) 自洽原则与源语隐喻的解读

根据自洽原则,译者在翻译源语隐喻时,首先作为受喻者对该隐喻进行解读,依凭自己的世界知识、人生经验以及对源语文化和社会常规的把握等因素对隐喻所表达的概念进行揣摩,将始源域和目标域进行“连接”,通过“冲洗”来剔除一切无关信息,寻找始源域和目标域共享的特征,以期找到作者(施喻者)所认定的域间相容性,从而实现“合流”。基于心智的体验性原则^[10],隐喻之所以如桥梁一般将译者(受喻者)和作者连接起来,是因为二者对隐喻概念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体验,译者和作者才可达到思想的共鸣,隐喻的作用也因此得以实现。倘若译者在生活中对于该隐喻缺乏体验,必然会导致相关的人生经验和世界知识的缺乏,从而无法做出合理的解读,隐喻构建的意义及译文目的也就无法实现,译者极有可能在不影响译文功能及接受效果的前提下,对该隐喻省略不译,因此,源语隐喻的合理解读是译者成功构建目标语译文的首要条件。

(二) 自洽原则与目标语译文的构建

在对源语隐喻做出合理解读之后,译者将以目标语中施喻者的身份进行译文的构建,译者能否构建出相应的目标语隐喻,或构建出非隐喻性译文甚至省略不译,仍取决于译者的主体自洽。根据主体自洽原则,译者若要以目标语来表达自己对源语隐喻解读后的认识或思考 A,首先要通过自己的世界知识、对目标语文化中的社会常规的把握、人生经验等因素,在目标语中找到相对应的隐喻概念或有关联的概念范畴 B,并将 A 和 B“连接”到一起,译者经过自我协商和自我核定,“冲洗”掉所有关联性较小的旁枝末节,只留取 A 和 B 共享的又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从而达到自我满足和自我允准,A 和 B“连接”成功并进一步“合流”出整体的隐喻意义,若译者经过“连接”“冲洗”之后没有找出 A 和 B 间的共享特征,那么“连接”就会失败,A 和 B 就无法实现“合流”,译者此时很难再构建出隐喻性译文,而往往会选择解释性翻译或作明晰化处理。

四、自洽原则与《治国理政 II》中的隐喻翻译案例分析

(1) 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11]19}

译文: set the direction and steer the way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12]19}

在(1)中,译者首先作为受喻者对“发展航船”“掌好舵”进行解读,根据自洽原则把“发展”与“航船”作为两个输入空间进行“连接”。译者作为认知主体之所以可以将二者“连接”起来是因为人类对言语交际中的概念链具有连接贯通特性的预设性期望,这种期望正是空间连接的触发机制^{[9]194}。但是译者在“连接”之后可能发现二者存在语义概念上的冲突,因为“发展”与“航船”毕竟是两回事,然而,隐喻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语义冲突,它是隐喻产生的基本条件。语义冲突也可称为语义偏离,指在语言意义组合中违反语义选择限制或常理的现象^[13]。因此这种语义概念的冲突正是“发展航船”这个隐喻可以产生的基本要素,且关键在于译者对这两个空间的“冲洗”,译者依凭自己的世界知识、对社会常规的把握、人生经验等因素,对两个输入空间的全部信息进行筛选,冲洗掉一切不相关的旁枝末节,寻找共享的特征,最后发现“发展”是可以如同“航船”一样,为了达到目的,二者都需要有明确的方向,而控制方向的关键就在于“掌好舵”,随后译者便会对这个解读达到自我满足和自我允准,并合流出这个隐喻片段的解读意义:“发展”如“航船”一样,都需要“掌好舵”来控制方向。

在目标语译文构建中,译者身份将转变为“施喻者”,根据自洽原则,译者结合其解读意义,依凭自己的世界知识、对目标语文化中的社会常规的把握、人生经验等因素在目标语中快速寻找并认定两个输入空间: ship 和 development,考虑到目标语受众的理解程度,将其完善为 ship 和 national development,译者对其“连接”后进行“冲洗”,很快发现二者共享的特征为 direction 以及 need to be controlled,随后达到自我满足和自我允准并合流出目标语隐喻: the ship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而 steer 一词正好可表示: to control the direction in which something (such as a ship, car, or plane) moves。因此初步构建出译文: set the direction and steer the way for the ship of national development。由于 steer 本身具有为“船”掌舵之意,故为了避免同意重复,将译文优化为: set the direction and steer the way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一) 自洽原则与《治国理政 II》中的异隐喻性翻译情境

译者根据自洽原则进行源语隐喻解读与译文构建时,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同一个目标域往往会出现空间交替和视角转变的情况,且译者的世界知识、人生经验以及对社会常规的把握等因素在不同情况下可能会发挥不同的认知作用力,这必然会导致异隐喻性(heterometaphoricity)的产生,即施喻者心目中的隐喻与受喻者心目中的隐喻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关系^{[9]198},语际间隐喻翻译的差异也会由此出现。毕竟,(1)的翻译过程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过程,通过对比《治国理政 II》的中文本和英译本其他的隐喻案例,可以发现译文隐喻和源语隐喻往往不是直接的词汇对应翻译,而是采取语际间异隐喻性的翻译方式,笔者结合双语文本中隐喻的对比分析,发现在下面3种情境中,源语隐喻会被译为不同的隐喻或作非隐喻性翻译,有些非隐喻性文本也可能在译文中被隐喻化。

1. 译者作为受喻者在特定情况下,对同一个源语隐喻有可能形成与原义不同的解读意义,由此产生对同一个隐喻的不同的体验认知,译者在此通常会作出语境化处理之后进行自洽及译文构建。

(2)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 欲知方圆,则必规矩。^{[11]181}

译文: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regulations and rules.^{[12]198}

要对例2中的“准绳”“规矩”做出合理的隐喻解读,译者首先要凭借其世界知识来知晓句子原义: 要想知道平直与否,一定要依靠水准墨线; 要想知道方圆与否,一定要依靠圆规矩尺。在《吕氏春秋》中,作者实则想借此表达出“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的意义,译者根据自洽原则会将“准绳、规矩”与“直士”进行“连接”,依凭世界知识、人生经验和对社会常规的把握等因素“冲洗”掉一切无关信息之后发现共享的特征,“正直之士”如同“准绳、规矩”一样,可以使人发现自己是否正确或符合某种标准,随后“合流”出整体解读意义: “直士”之于“人主”如同“准绳”之于“平直”,“规矩”之于“方圆”。

然而“准绳、规矩”在此处并没有被译为 leveling instruments and compasses,是因为在《治国理政 II》中,习近平总书记想借此强调“纪律严明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在和重要保证”^{[11]181}。而且,当代语境下对典籍的阐释不能去政治化,而是应该赋予译本更强的意识形态意义^[14],因此,考虑到该隐喻的当代话语重建,译者根据自洽原则,将“准

绳、规矩(圆规矩尺)”与“纪律和规矩”进行“连接”,凭凭新语境下的人生经验、世界知识和对社会常规的把握等因素进行“冲洗”,随后发现二者共享的特征在于,它们都会对事物的发展起到规约作用,能及时发现产生错误的趋势并避免错误,于是“合流”出新的意义:纪律和规矩之于政党如同“准绳”之于“平直”,“规矩”之于“方圆”。在当代语境下强调政治纪律和规矩的重要性,译者选择弱化其原义理解及隐喻效果,故构建出译文: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regulations and rules.

2. 译者作为施喻者,经过自洽后发现源语隐喻不适合在目标语中使用,译者对同一个目标域,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可能构建出不同的始源域,由此造成语际间同一个目标域不同的隐喻性关照或非隐喻性解释。

(3) 不能做表面文章。^{[11]92}

译文:(We should not) pay lip service.^{[12]98}

党政文献的译者需要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以及对党政知识的掌握。根据自洽原则,译者应知晓“表面文章”出自邓小平在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意为“敷衍塞责,表里不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此用其来告诫党员干部,脱贫攻坚工作要实打实干,要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然而,译者并不会简单地采用字对字的翻译:superficial article,因为在其对目标语文化中的社会常规的把握进行自我协商之后发现,superficial article和“敷衍塞责,不切实际”之间并无典型的共享特征,无法进行成功“连接”,而lip service作为目标语中已存在的隐喻,恰可以表示support for someone or something that is expressed by someone in words but that is not shown in that person's actions。译者为了认定二者间存在共享的特征,将“表面文章”与“lip service”进行“连接”,凭借其已掌握的知识与理解,在“冲洗”之后发现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即只在言语层面有所表达,但未付诸实际有效的行动,lip service在目标语中的隐喻效果与“表面文章”在源语中的隐喻效果极为相似,因此在构建目标语译文时采用新的隐喻并得出译文:(We should not) pay lip service.

3. 译者作为施喻者,为补偿先前译文中隐喻性的缺失,结合目标语文化,自身的世界知识,经过自洽,对源语中非隐喻文本做出隐喻性翻译。Nida^[15]也曾指出,如果过多的修辞性表达变成了非修辞性,译文的影响力可能会被削弱或消失。为补偿译文修

辞性的缺失,一些源语中非修辞性表达可被译成修辞性,以达到语际间的平衡。

(4)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11]198}

译文:Green, circular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We have huge potential in this regard, which could give rise to many new engines of growth.^{[12]218}

考虑到译者之前对部分源语隐喻所作出的非隐喻性翻译,及可能导致的译文影响力的削弱或消失,故译者在此并没有将“经济增长点”译为new points of economic growth,而是在译文中加入了额外的隐喻。在源语的解读环节中,译者对文本进行分析后得出:在“相当大的潜力”基础上所形成的“点”必然会在其所属范围内(经济)提供动力或能量。因此在构建译文时,engine意为a machine that changes energy into mechanical motion,发现engine可为“增长”提供能量,隐喻因此被成功构建。此外,由于“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所形成的“增长点”可以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可涵盖其他方面,故译者为了表示自己的特定感情,而这种感情已不能依赖常规词语加以表达^[16]。engine本身具有energy source的属性,在译文中可以比point更直接、更形象地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重视,以及对“增长”的肯定与期待。

五、结语

《治国理政II》中的隐喻翻译方法是灵活多变的,然而隐喻如何被译以及是否可译并不能取决于一组抽象的规则,而是依赖于文本范围内特定隐喻的结构与功能,我们很难用有限的翻译方法去涵盖复杂多变的隐喻,赫曼斯也曾说过,翻译研究的基本任务,不是通过制定规则或规范来探求对翻译实践的直接介入,而是解释发生在翻译领域里的现象,包括人们看待翻译的诸多方式^[17]。毋庸置疑,译者在隐喻翻译中必然会受到某种认知机制的影响,对其展开研究有助于我们跳出固有翻译策略的局限,探索新的研究范式。本文基于主体自洽原则,探讨了该原则作为译者进行隐喻翻译时所遵循的认知机制的可行性,阐释了其所包含的三个认知机制,即“连接”“冲洗”“合流”在隐喻翻译中的作用,隐喻翻译的成功与否在于译者能否通过主体自洽对源语隐喻

作出合理解读并构建译文。结合《治国理政 II》中的隐喻英译案例,探索自洽原则在党政文献的隐喻翻译中的应用,以异隐喻性概念为新切入点,针对语际间隐喻翻译差异的情况,在《治国理政 II》的中英文本中找出 3 种异隐喻性翻译情景,并佐以案例,在分析具体翻译流程后发现,译者对输入空间的“连接”是多方向的,有的是语内的文本概念的“连接”,有的是语际间隐喻解读意义和译者选取的译文间的“连接”,只要在“冲洗”后得出共享特征,找到二者相容性,便可“合流”出合理的解读或构建意义,使译文产生相似的隐喻效果并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

参考文献:

[1] 卢卫中,李一,徐云秋,管琳. 中国政治话语隐喻及其翻译研究:以十九大报告为例[J]. 翻译论坛,2019(1): 12-18.

[2] 陈双双. 中央文献中的副文本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J]. 外国语言与文化,2018(4):108-115.

[3] 窦智. 概念隐喻视角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隐喻翻译研究[D].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

[4] 黄鹂鸣. 中国特色隐喻及其英译的修辞学解读: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为例[D]. 南宁:广西大学,2019.

[5] 徐云秋. 语篇隐喻与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为例[D]. 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9.

[6] 陈国兴,管爱丽. 政治语篇中的科技隐喻及其英译策略研究:基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平行语料库[J]. 外语

电化教学,2019(5):56-61.

[7] VAN Den B R. The Limits of Translatability Exemplified by Metaphor Translation [J]. Poetics Today, 1981(4): 73-87

[8] 仲伟合,周静. 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42-46.

[9] 王文斌. 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10]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2] XI Jinping.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7.

[13] 束定芳. 论隐喻的运作机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2):98-160.

[14] 李晶. 典籍名言英译的“再语境化”:以《习近平用典》为例[J]. 上海翻译,2017(4):62-95.

[15] NIDA E 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6] 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7] 克里斯蒂娜·谢芙娜. 翻译与规范[M]. 傅敬民,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Study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in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Based on the Self – Negotiation Principle

GONG Yuha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Office, Tianjin Light Industr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Metaphors in CPC literature are commonly seen in the study on translation works. Effective metaphor translation can better realize the literature value conversion from the SL text to the TL text and play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ng China’s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policies to the world. Based on the self – negotiation principle proposed by Professor Wang Wenbin, the present work analyze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that translators follow in translation. Taking some metaphor translation cases in *Xi Jinping: Governance of China II* for reference, we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elf – negotiation principle in metaphor translation in CPC literature. After abandoning the limitation of fact that translation methods are always determined by the types of metaphor, we adopt the heterometaphoricity caused by the self – negotiation as a new perspective to shed more light on the study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in CPC literature.

Key words: CPC literature; metaphor translation; self – negotiation; heterometaphoricity

社会实践网络视角下的政治隐喻翻译机制研究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行隐喻英译为例

梁 娜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应用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天津 300350;
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天津 300204)

摘 要:作为话语实践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政治隐喻翻译的语内维度和语际维度构成了其微观的社会实践网络。基于此理论框架,旨在探究政治隐喻的翻译机制,在语内维度上,剖析政治隐喻翻译之修辞的劝说性与亲和性、认知的规约性与民族性、话语的机构性与规范性;在语际维度上,探究政治隐喻翻译之语境的明示性与推理性、文化的通识性与空缺性、意识形态的杂糅性与互动性,以此为政治隐喻翻译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社会实践网络;政治隐喻;翻译机制;话语互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17

中图分类号:H0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88-06

一、引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下简称《治国理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主线和内容纲要,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读本。

作为带有中国印记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喻被频繁地应用于政治文本之中,帮助政治话语的参与者实现其政治交际目的。根据陈勇、王伟杰的观点,政治隐喻被界定为“政治话语参与者(如政治派别、政党、政治家)、政治事件、政治行为、政治话语(政治演讲、政治访谈、政党宣言、社论、政府新闻发布会、政治专栏和白皮书等)为了一定的政治交际目的(发布消息、维持秩序、施加影响或调控舆论等)所牵涉到的隐喻。”^[1]这些政治隐喻充斥在党政文献之中,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点,也是难点,为目的语读者了

解中国文化、倾听中国声音、解读中国方案提供了有力支撑和有效途径。

二、社会实践网络中的政治隐喻翻译

社会实践网络是话语研究的一个视角,其主要揭示的是话语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2],伯恩斯坦进一步提出了“纵向话语”和“横向话语”^[3]的概念,探究了话语中知识传播的路径与范式。在此基础上,田海龙^{[4]7-11}完善了社会实践网络研究的理论框架。具体说来,在社会生活中,一个领域的不同社会实践、以及不同领域的各种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彼此相互影响,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实践网络,包括横向(不同领域的社会实践)和纵向(同一领域的上位社会实践和下位社会实践)的关系构成。

将政治隐喻投射到社会实践网络之中,其翻译机制包括纵向的语内维度和横向的语际维度。在纵向的语内维度上,政治话语是上位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网络中,对居于下位的政治隐喻及其翻译具有

收稿日期:2020-09-15

基金项目:2019年度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社会实践网络视角下的政治隐喻翻译机制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为例”(2019YJSB135);2019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政治隐喻翻译机制与接受效果研究”(TJWW19-020)

作者简介:梁娜(1983—),女,天津人,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话语研究。

指导和规范作用。具体说来,在修辞功能上,政治隐喻要传递出政治话语的劝说性与亲和性;在认知功能上,政治隐喻要体现出政治话语的规约性与民族性;在话语功能上,政治隐喻要呈现出政治话语的机构性与规范性。这体现了纵向维度上政治话语对政治隐喻翻译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在横向的语际维度上,政治隐喻翻译涉及源语的政治话语与目的语的政治话语之间,源语政治话语中的政治隐喻与目的语政治话语中的政治隐喻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两种话语实践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政治隐喻翻译横向的语际维度。在微观翻译过程中,目的语与源语在语境、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政治隐喻翻译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两种话语实践互动、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一是基于语境的明示性与推理性,将源语语境通过再情景化移植到目的语语境中;二是根据文化的通识性与空缺性,利用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相似性,打通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性,从而再现政治隐喻的文化内涵与外延;三是通过内嵌在两种话语实践中的意识形态,考察源语中的政治隐喻与目的语中的政治隐喻之间的杂糅与互动。综上,政治隐喻翻译的语内维度与语际维度在社会实践网络上的纵横交织,体现了政治话语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本质特征,通过政治隐喻翻译实践呈递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助于目的语读者解读我国国家政策,与国家形象自塑密不可分。

三、《治国理政》(第二卷)旅行隐喻的识别、分类与特征

(一) 旅行隐喻的识别

在批评隐喻分析的理论框架下,综合运用 Charteris – Black^[5] 以及 Pragglejaz Group^[6] 提出的隐喻识别方法与操作程序,对《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行隐喻进行识别与数量统计。根据隐喻识别的三个标准,本研究确立了隐喻识别的三步操作程序:首先,通读全文,初步遴选出候选隐喻;其次,判断候选隐喻的用法是否构成跨域映射;最后,根据语境,判断该词汇单位的隐喻意义。根据隐喻识别标准与操作程序,遴选出《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潜在的旅行隐喻表达式,排除不符合条件的隐喻关键词,确定最终数据。

(二) 旅行隐喻的分类

作为政治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行隐喻类属于概念隐喻中的结构隐喻,用旅行的概念去建构另一概念,如人生旅程、事业征程、任务进程,等等。对政治隐喻而言,旅行隐喻源域中的实践经验,如旅行

的起点、终点、发起人、参与者、障碍物、收获、意义、进程等,被映射到目标域中,有助于受众理解陌生的、不易理解的政治概念、政治目标、政治路线、政治决策等。按照概念隐喻类型,结合《治国理政》(第二卷)^[7] 中旅行隐喻的分布特点,将其划分为陆、海、空三种旅行隐喻,并将它们的隐喻表达式分别进行汇总、分类(见表1)。

表1 旅行隐喻	
隐喻类型	隐喻表达式
旅行(陆)	道路、路线、进入、方位、出路、障碍、行百里者半九十、老路、邪路、路子、错路、轨道、征程、历程、进程、大门、在路上、前景、出发点、起点、终点、归宿、脚踏实地、轨道、新台阶、车之两轮、步伐、出发、滑坡、新天地、新台阶、强国之路、旗帜、新长征、“雪山”“草地”“娄山关”“腊子口”、千山万水、固步自封、接力赛、一棒接着一棒跑、冲刺、冲锋号、攻坚拔寨、缓冲、跟随者、引领者、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南辕北辙、铺路石、大脚掌、“两条腿”走路、走岔、走偏、抬轿子、吹喇叭、看齐、如临深渊、老牛爬坡、八府巡按、摸爬滚打、跑得快、陷阱、关口、壁垒、“三座大山”、高山、火山、旁门左道、歪门邪道、千里马、奔腾、“三个地带”、泥坑、强军之路、辟新径、坦途、登高望远、阔步前行、赛骆驼、快车道、快车、便车、顺风车、列车、馬拉松。
旅行(海)	航船、彼岸、引领、劈波斩浪、历史长河、航程、汪洋大海、游泳、溺水、呛水、旋涡、风浪、小湖泊、小河流、港湾、一石激起千层浪、压舱石、思想之舵、如履薄冰、回潮、潮流、领航者、避风港、惊涛骇浪、定海神针、彼岸、涉险滩、冰山、渠道、风雨同舟、破冰、深水区。
旅行(空)	领头雁。

(三) 旅行隐喻及其翻译特征

《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行隐喻具有规模大、分布广、数量多等特征。宏观上,旅行隐喻在目标域中主要映射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说来,《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行隐喻指涉的是当前我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所面临的一切工作,包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经济建设(世界经济的大海)、“一带一路”(同舟共济)、大国外交(登高望远、阔步前行),等等。旅行隐喻的工作机制是把对于道路的探索、选择、坚守和达到目的地等特征映射到国家建设、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道路的探索即社会制度、发展方向的探索;道路的选择即社会制度、方针政策的选择;道路的障碍即社会发展进程遇到的问题与诟病;道路的目的地即我国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总目标。

四、《治国理政》(第二卷)旅行隐喻翻译的语内维度

(一)修辞的劝说性与亲和性

隐喻研究经历了从修辞功能向认知功能的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否定或取代前者。传统的修辞功能仍然存在,并在政治话语中继续发挥其审美说服作用,隐喻的认知功能转向只代表研究视角的转移,并不能以否定隐喻的修辞功能为代价。一方面,修辞的劝说性主要指涉的是政治隐喻的概念传递与说服机制,反映了政治话语的真实诉求;另一方面,修辞的亲和性强调的是政治语言将抽象的概念与逻辑以亲民的方式进行传递,是政治话语参与社会实践的有效途径。

原文:只有这样,“一国两制”这艘航船才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7]411}

译文: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nsure tha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hip will maintain a steady course and reach its destination despite any rough seas.^{[8]340}

原文:不管两岸同胞经历过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7]404}

译文:No matter what ordeals we have experienced, or how long we have been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no force can pull us apart.^{[8]334}

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将“一国两制”比喻成航船(ship),也就是将海峡两岸的同胞比喻成了同舟共济的同路人,从而派生了两岸人民一家亲的形象,加之“劈波斩浪、行稳致远”(rough seas, steady course)利用哲学体验复制、启动人们的体验感官,将航行体验映射到政治领域,通过激活人们在非政治领域的知识和经验,渗透政治理念,传递政治思想,使两岸人民在“一国两制”、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上达成政治共识,体现了政治隐喻的真实诉求,即说服或劝说功能;另一方面,“风雨”指涉两岸关系中遇到的问题、共同经历的苦难(ordeal),通过“共经风雨、不能分离”的形象塑造,唤起受众的共鸣,实现政治隐喻的亲和功能。两段译文采用直译的方式,使源语与目标语的隐喻转换达到了的最大相似度,符合受众的思维习惯,易于理解与接受。

(二)认知的规约性与民族性

“隐喻无处不在,在我们的语言中、思想中。其实,我们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9]作为一种认知方式,政治隐喻与隐喻使用者的地理、文化、思维习惯、民俗风俗息息相关,体现了政治隐喻

认知的民族性。同时,“个性化的认知主体可能具有其不同标准和规范的认知系统,但最终都将进入人类作为共同认知主体的认知系统,成为个性化认知主体融入群体化认知主体的必要条件。”^[10]换言之,政治隐喻并非仅仅表现于外部形式,而是涉及人类认知的深层结构,具有规约性的特征。从语内维度的角度去审视政治隐喻认知的规约性与民族性,体现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哲学语境观,是政治隐喻翻译的重要考量对象。

原文: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7]418}

译文:This great triumph represented the rebirth of China, opened up bright prospects for the great renew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et our ancient country on a new journey.^{[8]347}

原文中“凤凰涅槃”出自于郭沫若先生的同名作品,原型出自我国元代文人杨维桢的《凤皇石》一诗。郭沫若先生所作诗歌《凤凰涅槃》中的凤凰,其实是指西方传说中的不死鸟菲尼克斯,虽然郭沫若先生将不死鸟菲尼克斯翻译为凤凰,但两者本质完全不同。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不死鸟被称为火鸟,据说可活500年。当即将死去的时候,火凤凰从芳香的树枝上筑起一个巢穴并点燃它,然后它在火焰中死去,死后三天会从灰烬中复活重生。在天主教文化中,天主教信仰将不死鸟视为死后生命的象征和耶稣基督的伟大复活。换言之,“凤凰”与“phoenix”同属隐喻的源域概念,但在各自的目标域中映射的内容不尽相同,这是由认知的规约性与民族性决定的。源域中的“凤凰”在目标域中映射的是“古老的中国”,“浴火重生”的内涵指涉的是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经历的艰难险阻,因此,“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映射的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是中国的“重生”。综上,源语与目标语同有“凤凰”的隐喻意象,但由于规约性与民族性带来的认知差异,译文不得不隐化了“phoenix”,用“reborn”打通两域的认知渠道,虽未达到最大相似,却实现了最佳关联。

(三)话语的机构性与规范性

《治国理政》是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其政治话语中充满着大量的政治隐喻,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意志,具有机构性的特征。此外,不同于其他文本类型,中央文献属于政治文本,政治话语的机构性决定了其规范性,因此,政治隐喻翻译也不是译者的个体行为,其具备的话语机构性与规范性是语内翻译的

重要组成部分。

原文:要坚持提升自身发展素质能力和加强区域合作“两条腿”走路。^{[7]401}

译文: It needs to follow a two - pronged approach, improving its own ability to develop while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8]331}

田海龙指出:“社会实践在一个社会实践网络中处于纵向的等级维度上,属于上位社会实践和下位社会实践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上位社会实践对下位社会实践的支配和规范。”^{[4]8}作为政治话语的旅行隐喻,也具有社会实践的属性,反映了社会实践的组织结构关系。“正是因为隐喻概念是系统的,我们用来谈论概念的语言也具有系统性。”^{[9]8}也就是说,概念系统与语言系统共同构成了作为社会实践的政治隐喻系统。在政治隐喻系统内,政治概念是隐化的、抽象的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语言则是这些概念的显化的、具体的载体。概念与语言互联互通,各自具有上位与下位的组织结构,体现其系统的支配性和规范性特征。在旅行隐喻中,既有统领全局的上位概念(道路隐喻),也有居于从属地位的下位概念(陆海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路线。在居于上位的总路线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要制定出各自的发展路线,此为对下位概念的支配和规范。在例句“坚持提升自身发展素质能力和加强区域合作‘两条腿’走路”中,“两条腿”在目标域中映射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自身素质能力提升和区域经济合作,这是新时期我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下位概念,译者将该隐喻译为“two - pronged approach”,体现了“四个全面”(Four - pronged Strategy)的支配性与规范性。

五、《治国理政》(第二卷)旅行隐喻翻译的语际维度

(一) 语境的明示性与推理性

关联理论^[11]从认知的视角进行语用研究,认为语言交际在本质上是一个“明示—推理”的动态过程,关联性的程度由两个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即认知效果和理解话语时付出的努力。简言之,认知效果越大,理解话语时付出的努力越少,关联性就越强。在语际转换过程中,将政治隐喻翻译认知过程表述为“推理—阐释”的交际过程,以认知语境与传统语境为核心,构建以交际者为中心的过程化认知翻译语境模型,可以客观形象阐述翻译过程中的

传统语境与认知语境以及译者与语境因素相交互的翻译认知过程,从而解释语境是如何在翻译认知过程中导致翻译产出具有多样性的^[12]。对政治隐喻翻译而言,源语与目的语中政治概念、政治体制、政治背景等都存在着大量的差异,需要译者通过翻译实践,实现其在目的语中的阐释,进而完成交际。

原文: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7]58}

译文: Today, the goal of our generation's long march is to attain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8]40}

原文: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7]59}

译文: There are still many snow - capped peaks that we must scale, many grasslands that we must cross, and also many Loushan Passes and Lazikou Passes that we must conquer. ^{[8]4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众志成城、披荆斩棘,过草地、翻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作为历史事件,长征为世人所熟知,但关于长征精神、长征故事、长征英雄等,却蕴藏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多次提到“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发扬长征精神”等,例句“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中,“长征”按照惯例被译为“long march”,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这是一个为他们所熟知的语境,旨在向受众明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在后句中,习总书记继而提到了“雪山”“草地”“娄山关”“腊子口”,长征取得的第一场胜仗便在娄山关,而“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说的便是红军长征中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腊子口战役,而这些长征故事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多是陌生的、不易理解的。对于这些专有名词的翻译,译者并没有采取深度翻译的翻译策略,而是在新的语境中构建了以交际者为中心的过程化认知翻译语境模型,也就是将“长征(Long March)—新长征(long march)”带入到语境之中,利用语境的明示性与推理性,揭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二) 文化的通识性与空缺性

作为政治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行隐喻蕴含

着大量表征文化概念、内涵、趣旨等具有普适性的共性特征,也囊括了许多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历史、人文、民俗等具有针对性的个性特点,两者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共同构成了跨文化间的交互关系。因而,旅行隐喻的翻译不仅要梳理语际转换中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共性,即文化的通识性,更需要打通源语作者与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差异性,即文化空缺性,从而获得受众在文化维度的接受与认同,也就是说,旅行隐喻的翻译既要呈现出表层的文化现象,更要以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诠释出深层的文化价值观。

原文:打通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7]96}

译文:Remove the last major hurdle to implementing poverty elimination policies.^{[8]72}

原文:处理好改革“最前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7]107}

译文:We must handle we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st kilometer” and “the last kilometer” [the initi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eliminate obstacles in between.^{[8]81}

“最前一公里”,指涉的是一项工作的起始阶段,具有开创性、引领性等特征;而“最后一公里”指涉的是一项工作的收尾与冲刺阶段,蕴含着紧迫性、节点性等内涵。在例句中,“打通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译者将“最后一公里”译为“the last major hurdle”,正是基于中西方文化的共性,帮助贫困人口走出贫困、实现脱贫是一场攻坚战,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脱贫,这“最后一公里”不仅意味着时间上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更重要的是,脱贫攻坚期面临的任务之艰巨、资源之紧张、难度之重大,因此,译者如果将此译为“the last kilometer”,无法准确传递源语的深层含义,而“the last major hurdle”频繁出现在目的语中跨栏赛跑的体育赛事中,参赛者需要在时间、体力、技能、战略等诸多方面统筹安排,跨越障碍竞赛的最后一个“栏”,从而才能完成比赛,这与“最后一公里”的内涵不谋而合,体现了文化的通识性。而在例句“处理好改革‘最前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中,译者将“最前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译为:“the first kilometer” and “the last kilometer” [the initi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用“initiation”和“implementation”补译了隐喻的内涵,喻指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处理好开局,又要做好收尾与冲刺,若按照前文译为

“the last hurdle”则会产生歧义,因为目标语中的hurdle多指障碍,不能诠释改革开端与尾声的全部工作内涵,这种文化的空缺性需要译者用直译加补译的方式予以填补,从而打通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

(三) 意识形态的杂糅性与互动性

Fairclough指出,“意识形态是世界各方面的表征,对权力、控制、剥削等社会关系的建立、维持、改变起作用。”^[13] Van Dijk则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认知的一种形式,为一个群体、阶级或其他社会组成的成员共享。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系列观念或态度,其社会认知的特征是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框架,控制着其他社会认知包括知识、意见、态度甚或偏见在内的社会表征的形成、转化和应用。”^[14]作为政治话语的政治隐喻具有意识形态呈递功能,揭示了话语群体的信仰、观点、态度和感情,是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共同选择的产物。在政治隐喻翻译语际转换中,源域的意识形态与目标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非独立的、静止的,而是互动的、动态的。跨域映射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化、语境,亦有意识形态间的杂糅与互动。

原文: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7]69}

译文:Through this conference, our Party aims to make it clear which cause we must champion, which path we should choose, which historic mission we should take on, how we should prepare for that mission, and which goals we want to achieve.^{[8]49}

在具有政治内涵的旅行隐喻中,旗帜与道路被广泛运用其中,然而,中西方的经济形态与政治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旗帜与道路的内涵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甄别源语中“旗”与“路”的具体所指,区别源语与目的语中意识形态的相通性与差异性。例句中,“举旗”的内涵实则指的是“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这是社会制度问题,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兴邦之基,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译者没有选择译文“which banner we must uphold”,而将此译为“which cause we must champion”,即我们为之所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避免了译文歧义的产生。而在后半句中“走什么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常规译法,译者处理为“which path we should choose”,既充分反映了源语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也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认知习

惯。

六、结语

《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行隐喻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政治隐喻翻译涉及语内和语际两个维度,不仅体现了语言层面上源域与目标域之间、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也反映了话语层面上上位社会实践与下位社会实践之间、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将政治隐喻翻译置于社会实践的网络中去考量,才能促使其以点成线、以线生面、以面代场,打破政治隐喻翻译的碎片化、个体化的藩篱,形成整体化、系统化的政治隐喻的场域翻译实践网络,催生其话语张力,从而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贡献出外语智慧。

参考文献:

[1] 陈勇,王伟杰. 美国政治隐喻的政治语用功能[J]. 武陵学刊,2016(1):124-128.

[2] Chouliaraki Lilie Fairclough Norman.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37.

[3] Bernstein B. 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Critiqu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4] 田海龙. 社会实践网络与再情景化的纵横维度: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课题及解决方案[J]. 外语教学,2017(6): 7-11.

[5] Charteris - Black J.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6] Pragglejaz Group. MIP: A Method for Identifying Metaphorically Used Words in Discourse[J]. Metaphor and Symbol, 2007(22): 1-39.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8] XI Jinping.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7.

[9] Lakoff G, Johnson Mark.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2-8.

[10] 隋然. 哲学语境中语言认知的规约性与交际性问题[J]. 外语学刊,2006(1): 1-5,112.

[11] Sperber Dan, Wilson Deirdre.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12] 郑剑委,彭石玉. 过程化认知翻译语境模型的构建[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8(5): 83-88.

[13] Fairclough N.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Routledge, 2003:9.

[14] Van Dijk T. Discourse and Power[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3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Mechanism of Political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ractice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ravel Metaphors in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I*

LIANG Na

(Center for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ianjin Sino - Germ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discourses, which intersects with each other on both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evel constituting the social practice network of discourse.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discourse practice, the intralingual and interlingual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metaphor translation constitute its micro social practice network.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ranslation mechanism of political metaphor. From the intralingual dimension, it analyzes the persuasion and affinity of rhetoric, the conventionality and nationality of cognitio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discourse; on the interlingual dimension, it explores the ostensivity and inferentiality of different contexts, the universality and vacancy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e hybridity and interactivity of different ideologies.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metaphors.

Key words: social practice network; political metaphor; translation mechanism; discourse interaction

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张 阳,孙晓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通过引入“核心竞争力”概念到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能力培养领域,在阐释核心竞争力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定位与办学模式等特点,提炼应用型本科教育与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能力要素,从就业竞争力与职业胜任力两个方面剖析核心竞争力内涵,从自我培养层面和面向社会需求的高校培养层面探索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有效路径,构建大学生核心能力提升的教育机制,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顺利进入职场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就业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18

中图分类号:G6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94-05

据教育部统计,2020年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同比增加40万人,人数再创历史新高^[1],毕业生就业压力不可小觑。高等教育教学的目的一方面在于促进学生能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于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其提供人才资源。高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不仅要具备从业的基本素质,还应具有与其从业相匹配的综合素质,即获得从事相应职业并能够得到持续发展的各种能力——核心竞争能力。

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研究,对于满足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需求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重要性分析

从实践层面讲,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利于解决就业困境。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有时不是“无业可就”,而是“有业不能就”。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少职业规划,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日常学习积累和培养,相应的应试方法及技巧欠缺等。高校毕业生对其职业生涯有明确的认识和准备,大学期间把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作为努力的目标,从而提高自己在求职时的主动性和成功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强起来要靠创新,创新要靠人才。”高校毕业生只有具备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所实际需要的专业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工作技能才能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因此,要求高校注重对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从理论层面讲,一方面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大学生核心竞争力深层次内涵。通过对大学生就业能力及能力培养方式的研究,着力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核心就业能力的概念内涵、结构维度、影响因素、培养机制等进行详细而综合地分析,探索提升应用型本科毕业生核心竞争力的有效路径,从而对学生创业就业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教学理论,创新教育培养方式。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研究,旨在通过用人单位需求人才的视野分析,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提出新的视角,从而有助于探索推进高等教育人才质量培养模式的改革。

二、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核心竞争力内涵及其构成要素

(一)核心竞争力内涵

早在1990年,著名经济学家C. K. 普拉哈拉德

收稿日期:2020-06-25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大中专院校就业创业研究课题“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研究”(JYB2019057)

作者简介:张阳(1964—),女,河南永城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教授和加里·哈默尔教授在其合著的《公司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正式提出“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并对核心竞争力作为竞争优势的源泉进行了描述和论证。核心竞争力指以企业的战略决策、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组织管理等整合而使企业获得持续竞争的能力^[2]。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就成为欧美企业界和管理学界的讨论热点。

从个体角度来看,个体和企业一样,在其成长过程中也需要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但不同领域内的个体对于自我的核心竞争力的认知并不清晰。需要对个体活动进行管理和运作,才能保证个体的自我发展和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因此,高校毕业生需要准确了解自我的定位和扮演的角色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价值。当企业中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与教育实践研究相结合,就产生了教育核心竞争力。教育核心竞争力既是核心竞争力教育的目标,又是核心竞争力教育的结果,当教育核心竞争力形成时,它又会成为一种教育资源而转化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教育的力量或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核心竞争力,从学历教育的阶段性成果来看,主要体现在学生的核心就业竞争力。从整个职业生涯发展和终身学习角度来说,则体现在未来职业岗位和成就保持的核心胜任力。

从竞争中的单个主体来看,核心竞争力是其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品质、处理问题的综合能力的体现,即核心竞争力是专业知识技能、可迁移技能、自我管理技能的有机协调和整合,若没有这些能力,学生就失去了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条件。从竞争中的双方甚至多方的相互比较而言,核心竞争力是个体相比对方具有的独特并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反映。个体独特性不仅使竞争对手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效仿,更体现在独特性培养的过程和途径与众不同。从竞争的就业岗位来看,核心竞争力就是个体成功获取就业岗位的能力;从竞争的结果来看,核心竞争力是个体获得理想职业并实现长久发展的能力。

(二) 核心就业竞争力

关于应用型本科生所具有的与获取职业相关的就业能力,我们称之为就业竞争力。具体包括职业规划能力、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自我推销能力、自我决策能力、自我保护能力等。

1. 职业规划能力

职业规划是对职业生涯乃至人生进行持续系统计划的过程。它是个人与组织相接合,在对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

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3]。职业生涯规划既对个体具有指导和调整的作用,又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它具有突破障碍、开发潜能和自我实现的作用。职业规划也有助于投放注意力,积聚能量。职业生涯发展有目标时,易集中所有的能量和资源去实现,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2. 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信息极大丰富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真实可靠与虚假失真并存,这就要求职者对其梳理和辨识,要求毕业生具备分析、处理、应用信息的能力。

3. 自我推销能力

高校毕业生面对“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个人的自我推销能力是基于自我综合能力基础之上的一种综合展现。能否有效展现个人能力,是决定其职业发展的关键环节。高校毕业生向用人单位推销自我时,既要盘查清楚自己所具备的能力,更要清楚对方要求的工作能力,有的放矢进行自我推销。

4. 自我决策能力

自我决策能力是高校毕业生作为决策者参与决策活动、进行方案选择的技能和本领。在就业过程中,体现为识别和理解问题的能力和如何抓住机遇,比较不同来源的数据,运用有效方法选择行动方针,采取行动来缩小实际能力与职业需求之间的距离。决策能力是一个多层面的能力体系。它是一种基本能力的展现,是进行决策活动应当具备的起码的技能和本领,包括学生的正常体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认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但也受制于专业能力。比如分析、综合、判断、组织、控制能力等。

5. 自我保护能力

自我保护能力是当自我稳定性受到威胁时,人们会采取自我保护手段来加以应对。在高校毕业生实现学生人到职业人转变的过程以及职业延续中,自我保护能力与毕业生法律意识、契约意识、维权意识、诚信意识、证据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若识别用人单位虚假信息能力不足,法律意识不强,阅历和社会经验缺失均会导致自我保护能力的丧失。

(三) 核心职业胜任力

胜任力是指工作绩效优秀者所具备的知识、技能、特质,是学生通过后天学习和练习而获得的保证其顺利择业并在未来取得职场成功的能力,通常表现为某种动作系统和动作方式。不同岗位对工作者的胜任力要求是不一样的。环境和教育为其提供了形成的外部条件,而实践活动就成为其形成和发展

的关键。职业胜任力一般是专业知识技能、可迁移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和成就能力的集合。

1. 专业知识技能

专业知识技能是通过教育或培训获得的知识或能力,其培养途径多样。专业知识技能的组合更重要,时代所需的复合型人才正是具有不同知识技能的人。专业知识技能是核心竞争力的原动力,也称之为基础层能力。它是核心竞争力建构并顺利实现的根基和前提。对于应用型本科来说专业知识技能包含基础理论、专业理论、专业技术及其操作等内容。基础理论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包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而专业理论是基础理论在一定专业范围内的应用,并随着研究专业的方向不断发展。专业技术及其操作是专业理论的实践化目标。基础理论反映的是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专业理论的基础。专业理论是专业技术应用的基础,专业技术实践则是专业理论的价值体现。因此应用型本科要在教学实践上合理调整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专业技术的比例。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不仅要关注不同职业对从业者知识结构的不同要求,更要注重不同职业对求职者的一些共性的要求,比如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广博精深的专业知识以及熟练的专业技能等。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因技术的相互渗透所形成的较为复杂的应用性问题。

2. 可迁移技能

可迁移技能主要是指可以在不同类别岗位上实现迁移使用的能力,不因职业或年龄的变化而改变。可迁移技能在工作内外、工作生活之间都能运用的,是个人最能持续运用和最能够依靠的技能。同时它更是职业岗位比较重要,深受用人单位关注的技能。专业知识技能的运用都是在可迁移技能的基础上。可迁移技能包含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影响他人的能力、冲突管理能力、领导力、推动变革的能力、学习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等。可迁移技能因其“可迁移性”让人们实现了现实能力的超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即使其未从事过某个职业,但只要具备从事该职业的相关技能,即可胜任此类工作。

3. 自我管理技能

自我管理技能是指受教育者依靠主观能动性按照社会目标,有意识、有目的地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转化控制的能力。对自我而言,它是对内的技能,体现的是个体在不同的环境下如何管理自己,做到慎独。专业能力、可迁移能力,这些内在的特质要

通过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是否具有自我管理能力对于整体能力提高至关重要。它包括自我评估、自我完善、自我管理三个阶段。如果能客观地认识自己,正确定位,查找不足,持续改进,扬长避短,就会日趋完善,实现自我评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科学评估自我,针对性地制定培养计划,就会不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管理。又称为自我控制。即利用个人内在的力量改变行为,通过自我约束,增加良好的行为,增强竞争力。

4. 成就能力

通过大学阶段学习,学生逐渐提升个人能力,集聚核心能力。这些能力在不断地提升中孕育着成就能力。成就能力体现在一个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综合能力实现某个竞争目标的能力,它是核心竞争力的外在显现,即外显力。求职过程就是毕业生核心竞争能力外显力的表现。

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的专业能力是核心竞争力的原动力,可迁移技能和自我管理技能是潜在力,成就能力则是核心竞争力的外显力。判断其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就是看其经过大学教育的培养和学习,是否具备以上四个维度的能力,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质。应用型本科生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体现在就业市场,毕业生拥有比竞争对手更能满足社会和用人单位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大学阶段培养的作为职业领域的持续竞争力的潜在能力。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核心竞争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一) 自我培养层面

首先,进行自我评估。借助于职业兴趣与性格测验,判断职业发展方向,确定职业选择、未来的发展目标,进行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然后制定合理的计划,认真执行并不断做出评价和反馈。其次,通过兴趣、性格、能力和价值四个维度来认识自我资源。在对四个维度的探索过程中,通过几个职业群的同类合并,得出一些相互交集的区域,产生与其匹配的最佳职业库。在此基础上了解、分析该职业的宏观发展趋势,获知具体职业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条件和待遇等,分析自己的专业与目标职业的关系,以及为了实现对目标职业的期待应该做出的选择。通过职业意识的更新,将大学的学习与未来职业紧密相连,为核心竞争力的培养明确方向。

2. 明确生涯选择

明确生涯选择,才能够更好的付诸行动提升竞争力。确立职业发展目标,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三点:

把理想的职业与所学专业结合起来;确立职业发展目标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毕业生,各职业对人才能力、个性的要求,职业供需状况,并能根据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对即将供过于求的职业寻找新的目标;要依据自身的职业兴趣、个性特点、个人的知识与能力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确立职业目标,不能盲目从众。

3. 培养创新精神,提升专业实践能力

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要不断巩固专业知识,主动掌握专业理论以及学习方法,练就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培养自身的专业创新精神,提高实践技能及创新意识,锻炼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二) 应用型本科院校和社会层面

1. 充分考虑培养模式与就业市场匹配度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殊性在于其服务于地方经济的特点,在培养模式上要充分考虑与就业市场匹配度,更好体现实践导向的课程模式。学科建设应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及时进行调整,根据需求变化设置调整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案^[4]。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广泛收集市场需求信息,以企业实际需要为前提设置专业与课程。因为新兴行业、企业的领军人物能够精准地把握市场对人才核心能力的需求,高校应邀请其参与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以及专业、课程的设置。通过共同研讨人才培养所需要的综合能力,并将这些能力进行提炼,逐步形成职业胜任力的模型,会更大程度提升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2. 核心技能培养与理论教学并重

(1) 进一步完善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机制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思想引领。当前社会价值越来越趋于多元化,必须加强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把立德树人纳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为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政治上的保障。同时,系统化的理论知识学习是大学生核心能力的基础。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强化学生基础理论与实践技能的学习和提升,为其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基础。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始终和社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才能把本专业最前沿的知识快捷地传递给学生,让他们及时了解当前社会需求现状,做到知识更新与社会发展的同步。

应用型本科院校更应该始终秉持“以社会需求为基础”的基本理念。因此,要丰富高校实习实践课程的内容。实习是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其将理论分析与解决问题相结合,将问题导向带

入实践,有利于大学生将专业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要重视高校实习实践课程的组织形式的改革,一定要凸显内容的针对性、实效性、组织性和规范性。应用型本科院校可依托相关实践基地开展实习实践活动。一方面,依靠校内实践基地,吸纳学生参与实践基地中的科研课题,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科研舞台,从而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校外实习基地打通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壁垒,有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为用人单位的储备了未来可用人才。同时要重视建设产学研合作基地。

(2) 加强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首先,充分利用高校的科研平台。把科学研究引进教学,吸引学生参与科研,增强创新理念。其次,充分利用创业实践公共平台,既提供物质支持,又要动态把控其创业过程,予以有效的指导。再次,营造学生成长的创业氛围,可参照国家创新创业大赛的方法在校内举办比赛,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激发学生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潜力。最后,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中,更要实施创业家进课堂讲创业,学习者进企业学创业的合作模式。学校可为此组建相应协会,联络校友、专业对口的企业的创业者以及与企业相关联的业务部门负责人,分享创业成长的经历,为学生的创业提供支持和帮助,以创业带动就业。

3. 深入开展校企合作

首先,有助于应用型高校能够根据企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应用型人才,提高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及教学水平,有利于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长远发展。其次,校企合作模式下培养人才,提前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提高企业活力。使学生在毕业后直接与岗位对接,可以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节约更多成本。再次,通过校企合作,学生在一线岗位接受专业性、职业性的指导与锻炼,实践能力、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个人素质得到较大提高。通过具体岗位的顶岗实习,深入了解企业的运作模式、行业的发展趋势、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导向以及本专业未来的职业发展状况。在自我与职业的探索中明确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缺少什么,锻炼什么,将职业生涯规划落到实处。

四、结语

在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形势,我们要抓住机遇,以更宽广的国际视野,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5]。新时代新形势对大学生培养有更

高要求。以核心竞争力提升为导向,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使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更具竞争力,这对于转型中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和向人才的培养具有有益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2020 届高校毕业生达 874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EB/OL].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5/12/c_1125974840.htm,2020-05-12.

[2] 王双年.论中国大学核心竞争力的理论基础和创新型制

度体系的建立[J].中国科技信息,2010(14):290.

[3] 焦勇.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大学生成才[J].中国就业,2009(6):18-20.

[4] 周鸣,潘红,张日新.大学生就业能力开发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6(20):87-89.

[5]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809/t20180910_348145.html.,2018-09-10.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Graduates
in Application – Oriented College

ZHANG Yang, SUN Xiaoyan

(College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core competitiveness” to the field of ability training for graduates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concept of core competitiveness,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cation – 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development positioning and school – running mode to refine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ability elements required for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It dissects the connotation of core competitiveness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occupation competence, exploring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graduates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from the level of self – cultivation and the level of college cultivating oriented to social needs, and build an educational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providing a reference and suggestions for graduates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to successfully enter the workplace.

Key words:application – oriented university; graduates; core competitiveness; employment

工程背景下特色课程思政建设的探讨与研究

刘 静,孙海玲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工程背景下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应尊重工科专业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课程教学要求,明确功能定位,使学科内容更具厚度和广度,才能达到育才育德,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相互促进的效果。本文对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工程背景下特色课程思政元素进行了挖掘与探索,提出了几点建议,对深入推进工程背景下特色课程思政建设的几个关键点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课程思政;工科;课程;特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19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099-05

2017年12月,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2017〕62号)中明确提出:高校要围绕课程思政开展探索与实践,实施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教学改革,建立学科鲜明的课程思政体系,让各类课程承载思政元素,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同时也是实现三全育人的关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中指出:课程思政要解决政治引导、育人引导、文化认同的同向问题,解决与思政课程的一致性、相互促进、发展共享的同行问题。这是新时代对高校教师能力本位的新要求,要求专业课教师不断提高课程思政的实施和设计能力,关注学生的成长需求,转变教育理念,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彰显系统的、全过程的课程改革目标。

工程背景下如何尊重工程教育规律,去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引领、能力提升,提高工程类课程思政的有效性,达到课程培养目标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呢?2017年4月国家公布的《“新工科”建设行动路线》中提出了学科基础厚、工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要求。工程人才的专业素养和价值观取向直接决定着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什么人的

问题。因而,工程背景下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应尊重工科专业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课程教学要求,明确功能定位,使学科内容更具厚度和广度,才能达到育才育德,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相互促进的效果。

一、课程思政要以问题为导向,关注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出现的新问题

育人首先要关注学生的思想状况和成长需要。高校大学生在万物皆媒的新时代,思想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针对这一研究,我们对郑州市属三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做了一次随机问卷调查。见表1。

调查显示的结果:

(一)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摇摆不定,对政治学习和思政教育表现出不热心、不主动、不积极。调查数据显示,很多大学生对未来没有较好的规划。有56.3%大学生表示对未来信心满满,但对努力方向感到迷茫;有2.7%的同学感觉目标不明确,精神无所依托;有57%的同学表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是为了通过思想政治课程的考试。

(二)在人生价值标准,所向往的生活方式,自我发展方面的调查发现,大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有些价值观被物质化,21.6%的学生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另有6.2%

收稿日期:2020-09-15

基金项目:2019年度郑州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ZZJGA9003)和校级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新建本科院校工程教育认证与‘新工科’协同建设的探索”(ZGJG2019016A)

作者简介:刘静(1970—),女,河南杞县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的同学追求安逸和清闲,有些崇尚“小确幸”“佛系文化”“宅文化”“丧文化”。

表 1 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统计表(部分)

调查项目	情况统计	所占比例
对未来人生的态度	对未来充满信心,但对努力方向感到迷茫	56.3%
	目标不明确,精神无所依托	2.7%
对政治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度	对思政课和学校安排的政治学习积极主动参与	30.6%
	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是为了通过思想政治课程考试	57%
在信息获取途径上花费时间最长的是	手机、网络	40.71%
	专业书籍	30.94%
大学生对碎片化学习方式的认知	喜欢碎片化学习方式的学生	42.58%
	愿意利用碎片时间进行碎片化学习的学生	52.58%
对碎片化学习中的伦理道德认识	碎片信息跳跃性大,阅读很多却印象不深	62.1%
	会充当信息的传播者、情绪表达者	57%
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的方式	认为碎片学习是否有利于对复杂事情深度思考	否占 19%
	通过“点赞”和“转发”等简单赞同和否定代表立场	63.1%
	通过看电视、期刊杂志	37.06%
	通过微信订阅号 微博	60.94%
你是否希望尽快证明自己的价值与优势	选择是的学生	66.9%
进入大学后有过浮躁期吗?	选择有的学生	58.3%
你是否经常不安于现状,总想做点什么	选择是的学生	49.1%
你是否会觉得自己现在很多条件比周围的人差而产生焦虑心态	选择会的学生	37.7%
你是否认为快速发展的社会会导致大学生心态不平稳	选择是的学生	57.1%
你认为周围的同学是否有浮躁心态	选择有的学生	66.3%

(三)通过大学生碎片化学习现状调查,发现大学生信息解读喜欢碎片化,追求“快”和“短”,对问题缺乏深度思考、缺乏从历史与现实,宏观和微观,国家和个人等多角度全方位去思考与分析问题,认识问题非黑即白的两极化。

(四)在面对大变局时代,大学生普遍存在浮躁情绪和三分钟热度,存在急于实现自身价值而又无所适从焦躁不安,易受外界影响。

(五)在对就业准备,未来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忽视个人职业发展愿景,就业能力和意愿不匹配,存在“活少钱多离家近”的就业观。从对创业的打算和创业途径调查显示大学生对创新创业认识也明显不足。

学生的成长需要特别是成长中的困惑是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依据,课程改革要将学生的满意和获得感作为育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根据新时代要求,不断改革课堂供给,持续满足学生需求,在充分了解学生所思所想基础上去引导和启发,摒弃教条式和一厢情愿地生硬嫁接,让课程思政更贴近社会,贴近学生,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在互动交流中同频共振,升华学生思想境界。

二、探索与挖掘工程背景下特色鲜明的课程思政元素

(一)结合国家及地区发展战略,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热情,结合专业历史成就,引发知识共鸣,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专业历史等,比如《建筑历史与文化》课程中我国古代建筑的灿烂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建筑业的辉煌成就,《超级工程》里的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着力培养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建立专业自豪感。还有港珠澳大桥、三峡工程等史无前例的工程奇迹,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工程建设的前沿技术,也增加文化认同、引发共鸣,激发专业学习兴趣。

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对专业人才和具有国际移动能力的跨文化人才的需求所蕴含的机遇,使学生了解行业的地位和发展空间,启发学生思考成为一个“社会人”的使命与责任,构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提高学习动力,鼓励学生提前做好生涯发展规划,建立知识储备,拥抱未来机遇。

(二)结合优质工程和“超级工程”案例,培养学生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增强责任担当。

工程教育要着力塑造工程人的职业素养,培养工程意识,这里包括质量意识、责任意识、团队意识、安全意识和创新意识等。土木工程的建设 and 施工涉及领域众多,建筑评价包含安全、实用、美观,经济、文化元素等,既要技术上科学又要经济上合理,施工过程要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因此培养学生科学系统思维模式、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全局观念是工程专业人才德育教育的基石。

工匠精神是工程人员的灵魂,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理念和职业态度,也是价值观、人生观的展现。

“超级工程”里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所蕴含的尖端科技与创新要素,大师人物的科学精神、工程人的“大国工匠”精神,都是感人素材,教师结合知识点融入工程人的故事,将工程质量和工匠精神相结合,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职业价值观,树立责任担当、人文情怀,激发学生勇于实践,创造卓越工程的源动力。

(三)结合工程事故,加强工程伦理道德教育,树立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

以建筑行业的“豆腐渣”工程、假冒伪劣的建筑材料、造假的科研数据作为反面教材,通过剖析对人民群众的安全、健康造成的危害,对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损失,引导学生树立工程人的伦理道德观,帮助学生树立法治法规意识、责任意识、道德意识、学术精神,明辨是非,扶正价值观。

结合自然工程灾害事故带来的危害,培养学生生命至上理念、生态文明意识、可持续发展观、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四)结合抗疫素材,讲好抢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故事,厚植“四个自信”的爱国主义情怀。

今年以来全民“抗疫”是课程思政的活教材,学生也是参与者和见证着,更容易产生共鸣。为了打赢武汉、湖北保卫战,有4万多医护人员“逆行”,还有4万多名建设者和时间赛跑,抢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创建了10天建成两个传染病医院的“中国速度”,展示了不畏风险,团结、奉献能打硬仗的“中国力量”,全国一盘棋抗“疫”的“中国态度”。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设计上大量基于5G和云平台信息化科学,技术上采用装配式建造、智慧建造、BIM建模等前沿科技,在“云监工”24小时的注视下,6000多个信息点位、36万米各类管线现场一次安装到位,上千道工序,数百家分包,4万余名工程人密切配合、统一协调,确保了各项资源无缝衔接,同步推进,“中国效率”充分展示了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工地上呈现了无数个有温度的故事,为了与“疫情”赛跑,工程人每天都处于极限作战状态,表现出来的高度行动力和凝聚力,充满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情怀,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中华文化内在凝聚力和先进性,是对学生价值塑造、引领“四个自信”的好素材,更生动地将我们的“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衔接,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小我”“大我”到“忘我”的人生境界。

(五)结合专业知识点,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讲述做事先做人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引领学生提高价值判断能力。

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是决定一个项目能否由计划转为实施的决定性环节,要求工程人秉承“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职业态度。一份信息收集详实,数据真实可靠、分析全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直接决定投资的经济效益及项目的社会效益,不能“为了可行而可研”,结合引以为戒的反面教材,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质。

在《工程施工技术》中融入生态文明发展观,《工程项目管理》中融入绿色管理理念,使学生认识到依照标准规范填挖,对采石场、弃土场做好覆盖,有效降低对环境损害的重要性,及时做好建筑垃圾的处理及回收应用工作,施工中选用合适的节能型新技术、环保型新材料,深入理解生态文明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观。

将工程全寿命周期费用分析与工程设计融合,培养学生用经济观点分析问题,在工程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建设期成本、工程使用后的养护维修成本的全周期成本。例如道路设计上避免出现最昂贵和最短寿命的道路并存,有效控制建设期成本和后期成本成为公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避免技术和经济上不合理而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引领学生树立以全周期最低总费用作为经济控制指标的科学经济观和可持续性发展观。

工程经济学中介绍机会成本概念时,引导学生分析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深刻理解时间价值概念和资源的有限性,选择即意味着放弃。机会成本是指由于资源的稀缺性,选择一种方案而放弃的另外一种最优替代方案的价值。我们选择上大学的收益是希望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毕业后更多选择工作的机会,放弃的是更早的走上工作岗位而获得的工资,也可认为是时间,这是选择上大学的最大单项成本。启发学生思考:我们放弃的和得到的是不是平衡或者带来了更大收益?对个人而言,机会成本表现为个人的时间价值,读大学可认为是一种风险投资,它的机会成本是变化的,每个人的机会成本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何在大学中里把握时间,做好学习规划和知识储备,把自己培养为可用之才,换取个人最大的时间价值,这也是大学独特的吸引力。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稍纵即逝,无法储存,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科学规划大学生活,习总书记说“青春是用来奋斗”,唯有奋斗,方能雄飞。

三、对深入推进工程背景下特色课程思政建设的几个关键点分析

(一)深入开展课程思政改革教师队伍是关键
一要提升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念、内涵、

实施路径的理解,通过多种途径如专题培训、研讨、观摩等,使教师掌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明确课程思政对于专业课程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一体化的作用,提升教师的育德意识。二要使教师明确自己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使命与责任。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战略举措之一;是突破思政课程教育“孤岛化”困境的教育教学改革;是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构建三全育人共同体、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教师作为课程思政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同,增进政治认同、情感认同,才能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地引导青年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做学生的引路人,达到“乐教”情感。三要提升专业课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和育德能力。通过常态化系统培训、思政课教师伙伴式、结对机制的助学模式,帮助专业课老师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科学逻辑,掌握思政教育的特征和方法,逐渐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素养和能力,达到“胜任”课程思政教学的能力和水平。四要在院系、教研室开展常态化课程思政的研讨。要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对接,需要教师开展充分讨论,凝练案例所蕴含的人文思想、思政元素以及实践意义,主动结合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的设计、教学活动的实施,促进开阔思政教学思路,激发职业情感,逐步建立课程思政案例库,修订开发教材,不断探索工程背景下特色鲜明的课程思政之路,同时要避免在课堂上不同教师重复引用同样的案例。

(二)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构建课程思政育人大格局,激发教师课程思政改革的积极性

一是在管理机制上,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相关部门合力推进课程思政改革的工作格局。通过学校制度设计和激励政策建立,建立“中央厨房”,整合优秀师资开设课程思政改革试点培养方案,提供高质量的课程思政教学支持和个性化服务,促进建立一批课程思政团队。二是开发“四史教育课程”,“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课程”等系列素养类课程,跨院系、跨专业开课,促进思政课教师、专业课老师、综合素养老师互助交流,借鉴和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经验和教学计划,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与其他专业学科老师协作互助机制,增强专业课程思政的供给,增强思政教育的系统性,建立优势互补与双赢合作模式,通过多学科深度协作,拓宽专业课知识领域,促进人才培养多维目标的达成。三是同类学科建立资源共享教学平台,整合资源库,充分利用各方资源,

发挥用科研项目引领教学的作用,通过项目团队成员协同备课,利用知识互补,交流提高,不断完善教学组织设计和管理,合作开发教材,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将课程思政深度融入学科建设中。四是定期开展教学比赛,观摩公开课的形式,树立典型和榜样,用先进带群体,用团队带全员,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全员化格局,思政教育从单一向多元转变。通过教学反思会,学生评价等手段,定期对课程思政教学中思政元素的使用、教学方法的组织、情景设计、学生参与主动性和获得感等方面展开反思研讨,及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不断促进教学效能提升。

(三)在教学设计层面,创新育人方法,采取浸润式多维教学结构,促进多维培养目标的达成

工科的课程思政更适合春风化雨的“润思政”,深入挖掘隐性思政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采用类比、启发思维、鲜活的案例、互动讨论等,触类旁通的导入问题,将价值引领自然融入专业知识点,将思政内涵深入浅出地分享给学生,启迪学生对社会角色的认知,实现课堂上讲解有亲和力,老师情怀有温度、思想有深度,教学目标达到视野有广度、内容有热度、政治有高度、融入有力度,实践有强度,收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能。

浸润法的关键:一是精心选材。课程思政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景设置或案例选取,老师根据课程知识点,经过大量阅读,萃取精华,选好素材。二是巧妙安排,寻找合适切入点,有逻辑地编入课程内容,润物无声,系统设计教学过程。三是有情有义地讲好故事、讲好案例,以现实、鲜活的信息传递给学生,达到春风化雨般的育人目的。“真正打动自己的,才能征服引领学生”。

按照工程类课程特点,结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内与课外、自主学习与小组协作、线下与线上结合的多维教学方式,课程思政贯穿于课上、课下各环节,以丰富生动的内容设计,满足学生获得多种能力的需求。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和多媒体的应用,促进深层次交流互动,对学生的情感反应及时收集反馈,引导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究式转变,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四)在思政元素的融入方面,工程背景下专业课程思政要凸显专业领域的特色性

专业领域的课程思政要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对于学生未来专业方面能力和综合素养发展方面的要求,结合专业课的内容,有差异地开展课程思政建设。除了人文精神、爱国情怀、核心价值观等通用元素,还要能反映学科门类的特定需要,比如工程背景下的工科

类课程所蕴含的学科发展史、工匠精神、学科创新精神、团队精神、工程伦理等思政元素的挖掘。

在课程建设中对思政元素融入点的设计、结合度是否合适,容量是否合适,分布是否合理都需要反复斟酌。给合专业课程群,更要优化系列课程思政元素的结构设计,着力解决“思政之盐”如何融入“育人之汤”的问题,避免思政元素和专业知识“两张皮”的现象,不做违背认知规律的牵强附会,要凸显立足本专业的课程思政亮点,做到对专业知识点的有力补充和解释,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

专业课程思政要关注学生专业纵向发展的成长需要,任何课程教学都包含价值观、情感、态度的思政元素教育诉求,专业课程思政可以基于这三个层面开展评价,并据此制定有关标准。比如在情感方面的目标,可以细分为学习主动性、课程的自豪感、勇于技术创新的动力、交流和合作意识、学科历史成就感等。专业教师思想认识上的破冰,是发挥教师课程思政建设主动性的的重要源动力。

四、结语

深化高校“课程思政”改革,教师要不断强化育人意识、提升育人能力,自觉地把立德和育人落实到言传身教中,把专业课程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去关注社会发展之大变局,成为具有人文情怀和责任担当的育人能手,不忘教育初心,贯彻

落实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全力打造三全育人共同体,培养出具有“工匠精神”的“新工科”高素质工程科技人才。

参考文献:

[1] 刘冰,秦晓宏,李梦东. 工科课程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教育[J]. 计算机教育, 2020(1): 12 - 15.

[2] 张烁.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 2019 - 03 - 19(1).

[3] 余江涛,王文起,徐晏清. 专业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逻辑及其要领:以理工科课程为例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1):64 - 66.

[4] 陆道坤,课程思政推行中若干核心问题及解决思路[J]. 思想理论教育,2018(3):64 - 69.

[5] 席燕辉,唐欣. 新工科背景下工科课程思政的探索与研究[J]. 科教导刊(中旬刊),2020(7):82 - 83.

[6] 邓小伟,王辉,查雪梅,等. 工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中育人元素探索:以《浮游选矿》为例 [J]. 高教学刊, 2020(8):163 - 166.

[7] 牛东红,汪桂玲,张宇峰,等. 基于新时代背景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2020(8):50 - 51.

(责任编辑 许峻)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LIU Jing, SUNHailing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cultivating abilities and morals, and promoting each other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e excav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under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should respect the cognitive law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and the teaching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clarify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make the subject content thicker and wider. New problems that arise in the thinking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was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characteristic courses under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were excavated and explored, and several suggestions were been put forward; Finally, several key point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courses under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are analyzed.

Key word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ngineering; curriculum; characteristic

对《环境保护概论》教材的几点思考

王双成¹, 孙浩冉^{2a}, 魏振枢^{2b*}

(1. 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镇人民政府, 河南 郑州 451450; 2a.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b.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 魏振枢主编的《环境保护概论》已经出版发行四版, 对该著作进行综合评述, 总结出著作中的一些特色, 与此时也对本著作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 环境保护; 教材; 环境意识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20

中图分类号: G63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0)05-0104-06

由魏振枢主编的《环境保护概论》从2003年7月出版第一版算起, 先后出版发行了2007年7月的第二版, 2015年5月的第三版, 2019年11月的第四版, 前后经历约16年。这本著作曾被评选为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优秀出版物教材奖一等奖, 评选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并经全国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共计发行20万册, 成为本领域畅销图书之一。

该著作顺应形势, 求新应变, 内容新颖, 颇得读者的厚爱。总结起来, 有以下几个主要特色。

一、根据网络信息发展现状, 顺应时代充实修订相关内容

由于互联网络还不够普及, 因此在前三版中配套了光盘阅读材料, 共约100多条, 内容包罗万象, 翔实全面, 使学生在学过程中能够随时看到拓展资料, 提高学习兴趣, 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学生还能够看到很多的知识竞赛题目, 以及各种实践环节的训练课题, 对学生学习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在第四版的修订中, 由于网络已经普及, 学生能够很方便地上网查阅相关资料, 特别是能够全面阅读“国家生态与环境部”的实时内容和最新标准、规范, 因此撤换掉了光盘阅读材料, 在相应的章节内容

里增加很多有关互联网站的网址和数据库, 更方便读者上网查阅。

二、从强化环境意识教育入手, 对学生加强党的环境政策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非常重视, 中央领导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全国环保形势和如何应对都提出了具体的科学要求。我们在对广大学生进行环境教育时, 就要紧跟中央部署, 宣传中央的精神, 重点是强化学生的环境意识, 深入理解党的环境政策的真谛和实质, 力求使他们今后走上社会, 成为坚强的环保卫士, 成为宣传环境保护的中坚力量。

在2003年第一版著作中, 重点讲述了党的环境保护政策产生、发展和现状, 特别是成立相关的组织机构, 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使全国人民都重视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 以及防治环境污染的重要性。提出实施“33211”环境治理工程, 并具体到相应的江河湖海中。要求尽快改善环境状况, 给人民提供一个优美的环境。2002年1月, 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上提出很多具体的环境治理指标和要求, 并有相应的监督检查机构进行检查落实。

在2007年第二版著作中, 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体会, 把我国的环境保护发展历程科学地划分为

收稿日期: 2020-06-28

作者简介: 王双成(1969—), 男, 河南中牟人, 化工工程师, 现为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镇人民政府技术干部。

通信作者: 魏振枢(1948—), 男, 河南镇平人,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

四个阶段,比较切合实际。特别是其中的第4个阶段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环境保护”,在当时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2005年10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在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了环保工作的目标、任务和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决定》提出七项重点任务:以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为重点,加强水污染防治;以强化污染防治为重点,加强城市环境保护;以降低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重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以防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重点,强化生态保护;以核设施和放射源监管为重点,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以实施国家环保工程为重点,推动解决当时突出的环境问题。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环发〔2005〕161号文件发出《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学习贯彻国务院文件精神,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下决心切实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

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主题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过去均称为会议)于2006年4月17日—18日在北京召开,一字之差,表明了我国环保工作站在历史性的新起点。会议指出,“十一五”时期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使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得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时期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由18.2%提高到20%。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要加快实现3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努力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提出在该时期需要着力做好四个方面工作。第一,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切实解决突出的环

境问题。重点是加强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防治。第二,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努力扭转生态恶化趋势。第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第四,加快发展环境科技和环保产业,提高环境保护的能力。

在2015年第三版著作中,大多内容延续了第二版的内容。但是,强调了2011年12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会议对“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工作提出许多更加具体和严格的要求。会议提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科学的环境保护道路,也必然是科学的经济发​​展道路。“十二五”时期,要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统一与高度融合。与此同时,在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新修订的《环保法》贯彻了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吸纳了各方面的共识,是当时阶段最有力度的环境法律。

2019年11月在最新修订的第四版著作中,强调说明在2018年3月国务院重组并新命名了“生态环境部”,相应网址进行了更改(www.mee.gov.cn)。同时2018年5月18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强调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更是为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出更具体和更高的要求,一定要宣传到每一个学生的心中。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生动形象、寓意深远,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标志性观点和代表性论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提出来自对实践

诉求的深层回应。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的深刻认识,正是源自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思考。20世纪80年代,他还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的时候,就提出了“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理念。在福建省工作期间,他五下长汀,走山村、访农户、摸实情、谋对策,大力支持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经过连续十几年的努力,长汀实现了从荒山到绿洲再到生态家园的历史性转变。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浙江省较早遇到了保护生态环境与加快经济发展的矛盾。当时,有两种发展思路:一种是继续发展“高速经济”模式,可以在“百强县”“亿元乡”的名单上登榜;另一种是寻找新出路,将生态经济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浙江省走在改革开放前列,在经济率先腾飞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破题的压力。此时,湖州市安吉县余村集体经济转型的“小切口”投射出了时代前行的“大问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的提出带来了源头活水。可以说,这一重要思想是习近平同志破解浙江发展难题、总结浙江发展经验的理性升华,是长期研究思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认识飞跃,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深刻反思的思想结晶,这正应验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对三个阶段的认识,反映了发展的价值取向从经济优先,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再到生态价值优先、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变化轨迹。保护生态环境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更好地发展。生态环境越好,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力就越强,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立足我国国情,把握未来趋势,既深刻揭示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又深刻回答了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加快推动绿色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路径化对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在人类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曾发生过大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事件,酿成惨痛教训。20世纪发生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没有绿水

青山,何谈金山银山?人类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有目的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提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蕴含和弘扬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中华民族传统智慧,开辟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穿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说到底是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既要温饱更要环保,既要小康更要健康。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是我们的目标,生活富裕但环境退化也不是我们的追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对民生内涵的丰富发展,体现了对群众期待的回应,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民生情怀。同时,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必须被群众所接受、所领悟、所欢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有思想的深刻性,又有语言的群众性,代表了人民的心声,顺应了人民的期待,容易转化为人民的自觉实践。

这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许多城镇的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村的环境要素也得到长足的提高,不少农村城镇的环境已经媲美城市,不少城市大众在休假时纷纷前往农村度假休养,既提高了农村群众的经济收入,也给城市民众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休闲场所。从全国来看,森林覆盖率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12.7%提高到22.96%,就是明显的佐证。这是一举两得的双赢效果,应该说在这个方面浙江省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应该在全国扎扎实实普及,脚踏实地落实,让广大农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我们开始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时,必须坚持党提出的最新理念,把党的最新的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和措施传递给学生,让他们能够深刻领会政策实质,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贯彻执行,为把我国建成水清山绿空气新鲜的宜居环境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让同学们能够认识到党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以及在各段工作中的要点,并从中悟出一些道理。这也许就是这本著作的精髓所在,也是编写这本书的初心。我们建议在这一部分教学中应该组织实践教学环节,组织同学们到当地(特别是农村)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发现自己身边环境的变化,以及一

些基层群众对居住环境变化的深刻体会,从而提高自己的认识。

三、中心城市规模及经济效益问题探析

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步伐,其目的主要是要为群众提供一个优美舒适、方便宜居的生活环境,在这种和谐的环境中,有工作岗位(群众可以就近就业),有方便多样的生活设施,有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的学校和机构,有方便老年人的敬老院和颐养中心,使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能够欢度幸福的晚年。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网络和交通使城市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速物流和信息流的传递,使之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城市还是高等教育的聚居地,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强大,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创造出众多先进设备和产品。例如郑州市目前有各类高校65所,在校大学生近百万人,构成了这座中心城市最活跃的一部分,增强了城市的创新意识和氛围,并提供了诸多的就业岗位,使城市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我国目前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少媒体过度渲染省会城市首位度的作用,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所谓首位度主要是指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这里的发展要素主要包括经济、交通、医疗、教育,等等。首位度也就是集中度,一个省份的经济是集中在省会城市有利于全省的发展,还是平均分布在该省各地级市更有利于全省的发展呢?不可一概而论。不少人现在过分强调省会城市首位度的重要性,主张强化省会城市的建设,把许多重点项目放在省会城市,忽略了本省内其他城市的发展;同时又过分强调参与全国城市人口和GDP的强弱对比中的不断递进,因此产生不少负面影响,且攀比之风越来越盛行。在城镇化过程中,各地片面地追求扩容城市规模,城市面积越来越大,拉郎配式的城市合并之风盛行,例如山东济南与临沂的实质合并,河南郑州与开封的融合,云南昆明与曲靖的合并,广东广州与佛山的合并,安徽芜湖与铜陵的合并,湖北鄂州与黄冈的合并等均在酝酿之中,都认为强化合并后,可以力争跻身成为国家级中心城市的行列,这是一种好大喜功的危险做法。

实际上在考察我国各省的发展状况时(以下除了说明外均以2019年等相关数据分析讨论),可以发现,处于发展良好态势的省份,省内多数城市的发展都很好,比较均衡。根据一座城市的商业资源聚集度、城市枢纽性、可塑性、活跃度等多个方面去进行综合评分,主要考察的是一座城市的发展潜力以

及综合实力,并不单一以GDP高低顺序排名。2020年在公布的中国最新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山东省二线城市就有2个城市入围(济南、烟台),三线城市更是有7个城市入围(潍坊、临沂、济宁、淄博、威海、菏泽、泰安)。其中,济南排名全国二线城市第6名,潍坊排名全国三线城市第1名,临沂排名全国三线城市第7名,可以说表现不俗。河南省新一线城市1个(郑州),三线城市7个(洛阳、商丘、南阳、新乡、信阳、驻马店、周口),以上两个省的排名说明,省域经济发展均衡,全面开花,形成多点增长极,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可用最大能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各地形成合力,促进省域经济的发展。四川省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615.82亿元,增速达到7.5%,位列全国第六位。2018年四川省只有成都一个城市入围全国城市经济百强,其经济首位度竟然达到了37.61%,同省第二城市绵阳的GDP只占到成都市GDP的15.02%,这不是好现象。然而在2019年结束后,绵阳市GDP对成都市的GDP占比已经提升到16.8%,绵阳也顺利入围全国经济百强市,同时成都市的经济首位度下降到36.49%,说明四川省内经济开始向均衡方向正态发展。

从全国整体来看,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沿海省份等,适合于全省各个地级市全面同步均衡发展。而对于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由于人口稀少且分散,缺水干旱,经济基础薄弱,更适合于率先发展人口较为集中和资源相对较易整合的省会城市,增强省会城市的实力,积攒资金和资源,再进一步带动全省其他城市的协同发展,这也是城市圈发展的基础。

数据只是寻找真相的工具,当前衡量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往往总喜欢拿GDP总量为参考标准,这实际上是一个欠全面的错误思维。首先,GDP作为工业时代的经济统计手段,在数字时代开始逐渐失效。传统GDP核算是用最后的结果数量减去开始的数量,然后得到一个增加值,就是社会创造的价值,这是一种粗放式的计算方式。其次,即便是用GDP来衡量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也不是看总量,而是要重点看人均GDP。从全世界范围看各国的GDP,2019年我国的GDP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人民币(14.14万亿美元),居于世界第2位,但是我们的人均GDP在全世界居于第65位,也只是处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大陆以外的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人均GDP都要比大陆高。所以,一定要意识到,我们的GDP数据目前确实不低,但是还需要继续努力,且不可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同时也不能妄自菲

薄,悲观无为。

国内重庆 GDP 总量(2.36 万亿)比杭州(1.54 万亿)多一些,但是有 3000 多万人口,这个数量是杭州的 3 倍多,所以我们总感觉杭州整体更富裕。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人均 GDP 水平处于第 9 位,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综合排名中相对较高。而作为中心城市进行比较,其 GDP 总量排名第 5 名,其人均 GDP 只占第 94 位。我们知道,河南省的经济总量这些年表现非常好,一直是排在全国第 5 名,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 GDP 总量竟然要排到全国的第 17 位,基本处于中下等水平,全省整个生活福利待遇还是很低的。全国 GDP 总量居于前五名的省份中,各省所拥有的“全国百强 GDP 城市”数目都很多,证明这些省份除了省会经济发展比较强劲外,其他很多地级城市发展也很好,比较均衡,后劲较足。GDP 排在后边的大多省份(如云南、山西、黑龙江、新疆、吉林、甘肃等)只有省会城市能够进入全国 GDP 百强城市,而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的省会(首府)城市均不在百强城市之列。

看看中国中部地区的 6 个省会城市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的水平情况。郑州市这些年经济增长快速,人口聚居速度也很快,2019 年全年 GDP 超过万亿,在全国雄踞第 15 位。但是与武汉、长沙相比,近代以来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解放初仅相当一个县城,而那时的武汉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之一,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武汉,长沙与之类似。再从发展后劲来看,武汉是国家级的科技创新中心,是新技术聚集地,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今后各种新技术有可能从此起步。而郑州的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相对滞后,欠账太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追赶上的。

GDP 是一个具体的数据,它只是探究事实真相的工具,这个数据并不能反映出许多领域的内涵。而目前人们往往要把 GDP 的总量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评价一个研究对象的层次和水平,这个认识非常片面,必须加以纠正。全面评价一个城市的水平,可以有多种指标,例如综合经济力、经济状况、教育科研与医疗、交通完善与通达、城建水平等,需要综合全面地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总的来说,一个城市要求生活富裕,收入水平高,但同时经济竞争力、自然生态环境、教育科研水平、居民的综合素质等都是需要考察的指标。

可以组织学生城市规模如何定位才科学、GDP 作用、所在城市的地位、对城市居住环境的评价等方面,进行大型的调研考察,每位同学可以得出自己所认同的结论,那么毕业后你会留在这个城市

就业创业吗?为什么?

四、关于建筑物的造型、高度、特色和改善居住环境的科学辨析

2005 年,中国规定,超过 10 层的住宅建筑和超过 24 米高的公共建筑及综合性建筑定义为高层建筑。目前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过分夸耀“楼王”的存在和作用。很多地方官员把“高楼林立”作为一种政绩加以追求,促使了这种现象的扩散蔓延。由于过分追求城市高层大楼和住宅,各地纷纷出现不同形式的楼王,追求建筑外观的高、奇、怪、帅,如马桶建筑、大裤衩建筑、大元宝建筑、圆形钱币建筑等。另一方面追求楼层高度,如上海中心大厦高度 632 米(武汉在建的绿地中心高达 636 米,可能会成为中国第一高楼,这也成为江城人民的骄傲)。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中国已经有着 23.5 万栋高层住宅,是全球最多的。

实际上在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就暴露出高层楼房不利于防疫的弊端。是高层住宅的建筑模式会加快各种疫情的扩散。中国大小城市和县城都是高层密集式居住为主,在进入室内的过程中,需要路过或接触很多公用设施,如公用电梯、过道、扶手、门把手、管道等,这些都是细菌病毒寄宿地。大型密闭式的楼宇中,中央空调系统可以很容易地把病毒和细菌通过通风管道迅速传播到各个房间去。因此过于密集的城市高层住宅楼一旦出现疫情时,不便于隔离,也不方便救治,且可能形成局部范围内更快的传染和扩散。二是高层住宅不利于宅家。疫情期间,大家都宅在家里面,高层住宅像一个鸟笼子一样,住在里边很不舒服,不接地气,出来透个气还得通过走廊和电梯才行。高层住宅的舒适性、安全性都存在很多问题,不利于人与人的交往。三是高层建筑的建筑成本比较高,电梯的交通成本远大于汽车公交的成本,垂直管线成本比水平管线费用高。楼层高增加很大危险性,高层住宅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之后,就会变得老旧,比如外墙破损剥落、管道老化,电梯故障,不仅会给住户造成不便,形成危险因素,而且不利于维修和养护,且成本会高出许多。如果发生火灾不能有效快速施救,目前我们国家救火车射程高度只有 140 米左右,而现在我们国家高楼建筑在 300 米以上的有很多。对于高层建筑,假如高空起火,救援起来非常麻烦,且效果很差。国家已经出台规定,从 2021 年起,100 米以上的高层住宅将会受到限制,要匹配消防救援的能力。按照每层 3 米左右来计算,33 层以上的高层住宅恐怕难以再得到批准。

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适合建设的用地比较少的实际情况,高层高密度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这既符合1平方千米1万人的城市规划的要求,也比较紧凑,居住起来也比较舒适。综合考虑容积率在1.5到2.0之间,4—6层,是最适合中国人居住的。如果长远考虑加装电梯的便利,可以考虑10—15层之间。北京大学某教授曾直言:高层住宅未来将沦为“贫民窟”,这个预言也许会成为现实。在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建筑年代比较久远,各类设施落后,需要改造的老旧小区应该受到当地政府的关注,加快进行更新建设,以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当前郑州进行旧城区和旧小区改造中,对于原有的建筑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旧楼房进行更新改造,加装升降电梯,充实公共服务设施,就能够实现老旧小区住房的便利化、智能化,成为小区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我们就读的大学校园环境和建筑有什么特色?有什么会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所大学留给莘莘学子的回忆一定是有一定纪念意义的东西,不可能是近些年来建成的毫无特色的火柴盒型的庞大建筑物。郑州大学虽然建校时间不长,但是文科综合楼就是初期所有文科生魂牵梦绕的神圣殿堂,河南大学东中轴线的古色古香建筑群和大气磅礴的大礼堂成了中国大学文化遗产传承的标志性建筑。广东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的中轴线上有一个由清华大学设计的“智慧门”,其寓意深刻,每年的新生都要从此门进入而成为这所学校一个成员,毕业时又要从这个智慧门逆行而出走上社会,牢记学校老师的辛勤教育培养,对学生们的教育意义很大,都非常重视这个庄严的仪式,这个建筑恐怕会成为一个被广为流传的典型的建筑物。18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在工业化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种建筑物形状丰富多彩,但却几乎没有超

高超大的突出建筑物。但是这些保留下来上百年的建筑物都有自己的建筑背景和一个令人心动的故事,一座建筑物就是一个博物馆,让人们产生无限的遐想。到过欧洲的人们都会说,到这样的街道上走一走,就像在历史中穿越。总之,代表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标志可以有多种,特色建筑物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代表。我们可以发现,能起代表作用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极具自身的特色,而非毫无特色和灵气的高楼。所以,建议同学们对学校的布局、建筑物、学校大门建筑规模等进行调研评价,大家可以畅谈,若干年后的追忆过程中,学校的什么建筑物会对你产生永志不忘的影响。

该教材通过近20年的使用,已经被广大读者认可和喜欢。实践证明,大学课堂教学中坚持环境保护知识普及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

我们更应该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思想认识,把最新最科学的知识教给学生,让他们能够在具体的实践中运用知识去解决一些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向人民宣传党的环境保护政策,坚持环境治理,使我们的祖国天空更蓝,河水更清,山峦更绿。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魏振枢. 环境保护概论[M]. 4版.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
[2]魏振枢,李靖靖,王炳君,等. 高等院校进行环境教育问题的探讨[J]. 中州大学学报,2004(1):106-110.
[3]郑毅. 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市场,2020(16):3-4.
[4]胡章明. 城市化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分析[J]. 现代营销(经营版),2020(7):80-8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ome Thoughts on the Textbook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roduction*

WANG Shuangcheng¹, SUN Haoran^{2a}, WEI Zhenshu^{2b*}

(1. Zhengzhou Zhengdong New District Baisha Town People's Government, Zhengzhou, Henan 451450, China;
2a.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b. Editorial Board,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roduction* textbook edited by Wei Zhenshu has been published in four editions, the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work, summarizes some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this work.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xtbook;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新型农村社区实施“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的研究

王书新

(郑州西亚斯学院体育学院,河南 新郑 451150)

摘要:为了积极应对城镇化和解决老龄化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实施“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对“体医结合”促进健康进行实证研究,探讨新型农村社区如何实施“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指出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实施“体医结合”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体医结合;老年人健康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21

中图分类号:D669.6;R1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110-05

随着城镇化发展,新型农村社区逐步形成,开展社区“体育+医疗”模式,促进老年人身体健康,积极应对和解决老龄化问题,改善老年人的生活。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我国人民在经历2003年“非典疫情”后又一次爆发性的传染疾病,目前全国已确诊病例七万多人,死亡人数近2000多人。在死亡病例分析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感染后死亡率较高,因为老年人机体功能衰退,伴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各种慢性疾病以及对病毒抵抗力。“体医结合”是一种能够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增强老年人身体机能,预防和缓解各种慢性疾病,延缓老年人衰老的积极有效手段。

一、“体医结合”促进健康的实证研究

钟南山院士已经84岁高龄,却依然坚持在抗疫工作的第一线,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之下依然坚持锻炼身体。钟南山院士说:“运动对于我保持身体健康起到了关键作用。”免疫学专家黄波表示:民众增强免疫力,对抵抗新型冠状病毒有一定帮助。从目前的确确诊病例中,死亡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年龄较大的老年人或者是具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而面对传染性极强的新型冠状病毒,目前还没有特效药治疗,只能靠人体免疫力。运动(movement)是增强人体免疫

力的主要方法之一,近年来欧美学者所提倡和推广的“Movement As Medicine(运动即是药物)”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广泛认同。有学者认为,老年人每周进行5次有氧运动,如慢跑、步行,每次持续45分钟左右,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功能,使老年人患病几率下降50%。冯蕾认为将体医结合融入日常生活,提升健身增进健康的效能,预防和延缓老年人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很直观地描述了运动健康观,近年来,体育界和医学界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越来越能验证“运动是良医”这句话。为了提高人民健康的水平,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体医结合”将成为实现人民健康的国家战略的重要措施。

针对非传染性慢性疾病的治疗与康复,除了传统的医疗干预以外,在循证医学模式下采用体育运动作为慢性疾病康复治疗的核心手段,对患者的身体以及精神功能障碍进行恢复从而达到治疗和康复的目的是体医结合发展的核心内容。本文以郑州市部分公立医院为研究目标,通过研究体医结合在郑州市公立医院各科室的实际应用探索体医结合对健康的实际促进作用。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随机选取郑州市公立医院3家:郑州市中心医

收稿日期:2020-06-28

基金项目:2020年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社会发展领域)项目“多元主体协同视域下的体医结合发展研究”(202102310651)

作者简介:王书新(1979—),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西亚斯学院体育学院副教授,郑州西亚斯学院体育科研创新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一般理论研究。

院、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上述三家医院的部分医生与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

访谈法:对郑州市部分公立医院医生进行访谈,了解体医结合在医院的实际应用情况以及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实地调查法:对郑州市需要研究的部分公立医院进行实地走访。

问卷调查法:主要针对部分体育康复适应适应症状进行研究,包含:呼吸系统疾病、运动系统疾病、消化系统三个层面。

本研究的问卷发放主体主要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郑州市三家公立医院的呼吸、运动、消化三个科室的医生进行问卷发放。其二是郑州市三家公立医院的呼吸、运动、消化三个科室的住院患者进行问卷发放。

通过对郑州市三家公立医院的呼吸、运动、消化三个科室的医生进行问卷投入发放 100 份,回收 100 份,所有问卷均具有研究价值,问卷合格率百分之百。通过对郑州市三家公立医院的呼吸、运动、消化三个科室的患者进行问卷投入发放 500 份,回收 462 份,去除没有研究价值的问卷后剩余 420 份,问卷合格率 84%。

(二) 研究结果

1. 郑州市公立医院科室对体育康复疗法应用现状调查

体育康复是近几年才逐渐走进大众视野的一个专业词汇,体育康复作为一种专业的医疗手段在医院医疗康复领域的运用情况如下表 1 所示。通过表 1 可以看到郑州市公立医院将体育康复运用到医疗康复领域的情况总体良好,在发放问卷的 100 人中有 46 人开设了运动处方,将运动疗法运用于医疗康复领域。

表 1 体育康复在郑州市部分公立医院运用情况		
是否开设运动处方	人数	百分比
是	46	46%
否	54	54%

体医结合的认同性是医务人员是否实施体育康复手段的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三家医院医生对于体医结合认同性调查如下表 2 所示。由表 2 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医生是认同体医结合在医疗健康领域作用的,由此可见体医结合的推进在郑州市公立医院中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结合表 1 数据分析,有将近一半的医生是认同体医结合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却并没有具体应用,通过走访得知,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运动处方的开

具应结合体育康复领域的专家联合实施。(2)就症患者较多,运动处方具有个体差异性,运动处方的开具相对于传统医疗处方耗费更多精力,且效果不能完全得到保障。

表 2 郑州市部分公立医院医生对体医结合的认同情况		
体医结合必要性	人数	百分比
有必要	92	92%
没必要	8	8%

体医结合是近年来才逐渐得到重视的健康干预手段,医生对于体医结合是否得到过专业培训也是关系到体育康复实践与运用的,郑州市三家公立医院医生体医结合专业培训情况如下表 3 所示。通过表 3 可以看到,实际接受过专业体育康复培训的医生占比相对较少,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如下:首先,体医结合是近年来才逐渐被人所广泛认知的一种健康干预手段,而当前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从医学院毕业的时间较长,在医学院期间并未接受过专业的体育康复方面的课程。其次,虽然郑州市近年来比较重视体医结合发展,也开展了很多体育康复专业医疗机构,但是相对于公立医院来讲体医结合的实践培训仍不到位,侧面反映了医疗干预仍是公立医院对疾病的主要干预手段。

表 3 郑州市部分公立医院医生体育康复专业培训情况		
是否接受过相关课程	人数	百分比
有接受	32	32%
没有接受	68	68%

体育康复手段并非是所有疾病都能所采用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在部分科室进行有针对性的实施,本文主要对于呼吸系统疾病、运动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来研究体育健康适应情况,如下表 4 所示。由表 4 可以看出,在开设过运动处方的 46 名医生中,运动系统疾病科室医生分布最多,达到 56%;消化系统疾病科室最少,为 18%。由此可见,在对于运动系统疾病的治疗与康复中采用运动处方干预情况较为普遍,分析为科室的专业情况有直接关联。而运动康复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与康复方面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受限于多种因素影响,在这两个科室中的运动处方开具普及性并不理想。

表 4 郑州市部分公立医院医生体育康复科室分布情况		
科室	应用人数	百分比
呼吸系统疾病	12	26%
运动系统疾病	26	56%
消化系统疾病	8	18%

2. 患者对于体医结合的应用现状

患者是体医结合发展的主要受益人,对患者对于体医结合的应用进行研究,了解患者对于体育康

复的态度以及体育康复在患者康复过程中发生的机制,是体医结合对健康促进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对郑州市三家公立医院的患者进行随机调查问卷发放,问卷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际探讨。

患者对体育康复的持有态度是体医结合发展的过程体现,也能从侧面反映了体医结合在终端受体-患者层面的切实体现。对于患者对体育康复的持有态度如下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到,郑州市公立医院参与点差问卷的患者中,有一半是对于体育康复完全缺乏认知的。目前我国多数人的健康理念仍停留在“治疗”阶段,出现疾病认为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是医疗干预,对于其他康复手段缺乏基本的认知。其中有11%的患者认为没有必要,说明有少部分患者对体医结合不够了解或者对体育康复不抱希望。由此可见,当前,郑州市在体医结合普及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表5 患者对体育康复的持有态度

体育康复的态度	人数	百分比
有必要	160	39%
没必要	50	11%
不清楚	210	50%

关于患者对体医结合的理解程度,我们在调查问卷上也予以体现,针对160名对体育康复持有积极态度的患者问卷中进行分析,其对于体育康复的理解如下表6所示。通过相关研究我们清楚,体育康复主要是基于医生开具的运动处方来实现的,通过对体育康复持有积极态度的患者问卷中我们发现,仅有13%的患者能正确的认识体育康复,占有49%的患者对体育康复认知出现片面化现象,还有38%的患者对体育康复手段不确定。由此可见,进一步发挥多元责任主体在体医结合发展中的职能效应,使社会各个阶层能正确理解健康中国战略的内涵,重新审视体育康复的实施手段是很有必要的。

表6 患者对体育康复的理解程度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单纯的运动	79	49%
医生开具的运动处方	22	13%
不确定	59	38

在回收的420份有效问卷中,我们对患者是否正在使用或者曾经使用过体育康复手段进行研究,研究数据如下表7所示。从表7可以看到,从未使用过体育康复手段的患者占比54%,使用过体育康复手段的患者占比46%。

表7 患者体育康复的应用情况

类别	人数	占比
使用过体育康复手段	196	46%
未使用过体育康复手段	224	54%

我们针对这196人使用过体育康复手段的患者做进一步调查,研究患者在应用体育康复手段后的实际情况,综合食欲、心情、病症、睡眠等多项因素进行研究,得出实际数据如表8所示。通过表8可以看到,仅有2%的患者在使用体育康复手段后出现健康情况消极状况,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有43%的患者在运用已于康复手段干预后健康情况出现持续性好转,有33%的患者在运用体育康复手段干预后出现阶段性好转,由此可见体育康复对于患者疾病恢复是存在积极意义的。

表8 体育康复手段对患者的健康干预情况

干预后情况	人数	百分比
感觉无变化	45	22%
变差	3	2%
阶段性好转	66	33%
持续性好转	82	43%

3. 实证研究结论分析

首先在医院层面,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郑州市三家公立医院的医生对于体医结合是普遍认同的,但是在实践层面却表现的不够积极,出现信而不用的情况;郑州市公立医院实际上接受过专业体育康复培训的医生占比相对较少,体医结合的实践培训在医院层面表现的仍不到位;基于此,体医结合在郑州市的发展应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针,在理论层面,加大在职医生的体医结合专业技能,重视体医结合对于健康促进的实际作用,培养出一批敢开运动药方,能开运动药方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其次在患者层面,多数患者仍对于体医结合不够了解,对于体育康复抱有怀疑态度,这不利于体育康复的推广应用,阻碍了体医结合在实践层面的发展;仅有少部分患者能正确认识到体育康复的真正内涵,了解体育康复绝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就可以实现,需要专业医生有针对性的开具运动药方。通过对体育康复手段对患者的健康干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可知体育康复手段对于患者疾病恢复是切实有效且存在积极意义的。

二、新型农村社区实施“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的措施

(一)制定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体医结合”相关政策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通过“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等方式,来提高全民身体健康。各级政府应响应国家的号召,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制定有关“体医结合”相关政策并加以实施。新型农村社区“体医结合”实施政策应由当地镇政府来制定,当地镇政府应该积极推动相关

政策完善和落实,并且要参与其中,努力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实施“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的项目的开展,促进成立本地区“体医结合”机构,培养本地“体医结合”人才。当地镇政府应该制定出台《新型农村社区开展“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的实施方案》《新型农村社区“体医结合”工作专业人才管理和激励办法》,明确工作目标和措施要求,选择一个新型农村社区为切入点,以点带面,示范带动,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广到更多的社区开展“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的活动。逐步完善“体医结合”制度,着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体医结合”工作专业人才队伍,通过几年的努力,建立起适应社会管理和满足群众服务需求、具有当地特色的“体医结合”发展模式。

(二) 身体健康评估 + 运动处方融合发展

老年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基地由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中国老年保健研究会共同管理。各级政府应引进智能软件公司和当地高校作为共建单位,参与和搜集社区老年人健康医疗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搜集数据进行整合、评估,了解社区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老年人身体机能主要表现在活动能力的降低,心肺机能下降,神经系统退化,机体免疫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老年人的锻炼目标主要是改善心肺系统功能,减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改善并保持体能,维持平衡协调能力,降低跌倒发生骨折的风险;改善情绪,缓解不安的心态,预防老年痴呆等心理疾病,以达到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因此,在为老年人制定运动处方,一定考虑老年人身体承受能力,老年人心理接受能力及适合的运动项目和运动强度。比如适合老年人的运动项目有步行、健身跑、气功、太极拳、太极剑等。运动时间每次持续时间为 30—60min,运动频率为每周运动 3—5 次,注意运动前一定做好准备活动,运动结束要做整理放松活动。整个锻炼过程中可以配舒缓放松心情

的音乐,让身心完全舒展放松,达到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目的。

老年人通过适量的运动能延缓衰老、预防老年痴呆、增加生命活力,但是具体到每一位老人,进行什么运动,运动多久,每周运动多少次,什么情况下不适合运动,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果不进行科学的运动,对身体反而造成伤害。因此,社会体育指导员应该依据掌握的社区老年人身体健康实际情况,一对一制定科学合理的运动处方。运动处方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一样,根据每一位老人的体质和身体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运动方案。运

动处方正是“体医结合”的中间媒介,运动处方将健身机构和医疗机构,健身指导员和医生连在一起。

(三) 完善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体质健康检测体系

自 2009 年开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开始启动,到了 2017 年 2 月,形成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以下简称《规范》)。《规范》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居民提供免费、自愿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参考依据。《规范》包括 12 项内容,其中一项是老年人健康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医务人员负责为社区老年人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给老年人发放健康档案信息卡,并为了保障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身体健康,切实让老年人享受到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和了解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因素。

根据《规范》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应该时刻关注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定期为老年人提供免费体检。每年都要对社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免费健康检查活动。体检应包括视力(重点老年人眼睛白内障)、血压、血脂、肝功和肾功、血常规和尿常规、心电图等项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医务人员应借助体检机会,给社区老年人发放老年人健康手册、慢性病防治手册等,并为老年人发放“慢性病管理登记册”,方便老人今后就医和健康咨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应专门为老年人开展健康咨询活动,保障老年人对自己身体疾病有所了解,生活中注意锻炼和保护。定期举办老年人健康知识讲座,引导社区老年人学习、掌握健康知识及必要的健康技能,促进社区内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三、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实施“体医结合”的影响因素

(一) 社区老年人“体医结合”意识淡薄

“体医结合”需要体育锻炼和医学治疗结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才会更好地促进健康。新型农村社区很多老年人都觉得他们在庄稼地里干了一辈子的农活,不需要参与运动健身,健身意识非常薄弱。社区老年人群体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对体育锻炼与健康的关系不清楚,误认为体育锻炼是年轻人的事情。老年人因为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在减弱,身体出现疾病,就去医院看医生。他们愿意吃药治病,吃药防病,但是不愿意依靠体育锻炼来治病、防病。因为体育锻炼预防和治疗疾病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坚持一段时间才会有效果,所以导致老年人参与健身以促健康的意识不强。

(二) 缺乏“体医结合”的专业人才

“体医结合”在国外已经兴起了好多年,在国外,医生可以给患者开运动处方,健身指导员依据医生开的运动处方来指导患者如何锻炼身体,锻炼后身体各项指标的变化回馈给医生,真正做到了体医结合。在我国,“体医结合”刚刚开始,目前国内没有“体医结合”专业人才的培养,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国内知名体育院校设立的运动康复、运动人体科学等专业,尽管是运动和医学、康复结合起来的,但是主要针对的是运动训练损伤及康复,这些专业人才很难适应大众“体医结合”所需。

社会体育指导专业人才在培养过程中,大众健康和医疗课程也是相对薄弱,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基本没有和体育有关的专业课程。目前,我国人才的培养模式渗透性、融合性不强,要想把“体医结合”做强、做大,真正让“体医结合”起到促进全民健康的作用,各大体育院校和医学高校必须合并、融合发展,设立专门的“体医结合”专业,培养专业人才,并投入到大众“体医结合”工作中来,才能真正做到“体医结合”。

(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医疗人员配置不足

新型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是以农村社区为范围,以家庭为单位,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残疾人为重点,面向居民开展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现阶段新型农村社区生服务中心(站)的人员编制,原则上是每万人社区居民配置13—15名医务人员。医务人员要包括全科医师、公共卫生医生、中医类别执行医师。目前很多新型农村社区都是刚刚规划建成的,虽然社区规划得很好,

村民也住进了新社区,住进了新房子,但是社区配套设施很多还没有配齐,卫生服务中心还是原来的每个行政村配一个诊所、一名医生,医疗条件和技术满足不了社区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

四、结语

实践证明,运动是良医,运动能增强人的免疫力。在新型农村实施“体医结合”,首先必须出台相关政策,依据政策开展老年人身体健康评估并开出运动处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社区老年人体质健康检测体系,做到运动和身体健康监测相辅相成;其次要加强“体医结合”的宣传力度,改变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增加“体医结合”专业人才的培养,配置足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医疗人员,共同促进社区老年人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 [1] 向红玉. 面向老年人群体的社区“体医结合”路径研究[D]. 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9.
- [2] 朱晓东,刘炎斌,赵慎.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的“体医结合”实践路径研究:基于现代医学模式视角[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9,35(4):33-38.
- [3] 卢文洲. “体医结合”模式下我国老年健康促进的路径研究[J]. 当代体育科技,2019,9(22):215-218.
- [4] 冯蕾. 体医融合:从新视角重新认识运动[N]. 中国体育报,2019-07-25.
- [5] 张庆勇. 临沧市社区体医结合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D]. 西安:西安体育学院,2019.
- [6] 叶春明,于守娟,杨清杰. “体医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及策略[J]. 体育文化导刊,2019(1):7-10,53.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in New Rural Communities to Promote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WANG Shux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engzhou Sias University, Xinxing, Henan 45115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urbaniza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aging,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mplement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in new rural communities to promote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e article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by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explores how to implement it in the new rural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points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in the new rural community.

Key words: new rural community;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山药中6种金属元素

姚虹, 李领川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分析测试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运用微波消解-石墨炉原子吸收法对不同产地山药中的铅(Pb)、锰(Mn)、镉(Cd)、砷(As)、锌(Zn)、铬(Cr)6种金属元素进行测定。选择微波消解仪的功率为1000 W, 进样酸度为1%的硝酸体系。结果表明:6种元素标准品的标准曲线相关系数 $r \geq 0.9967$, 方法检出限低至1 ng/mL。加标回收率在95.7%~107.3%, RSD范围为0.76%~2.84%, 满足测量要求。根据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中薯类中元素含量限量标准, 检测结果表明大部分山药中重金属元素含量在标准范围内, 但部分山药中Cr和Pb两种重金属元素超标, 对居民的身体健康构成潜在的威胁。

关键词: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微波消解;山药;金属元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22

中图分类号: O65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0)05-0115-04

山药为薯蓣科多年蔓生草本植物薯蓣的根茎, 是一种传统的药食同源植物, 其功效被记载于多本中医药名著之中^[1]。山药不仅能健脾和胃、益肺固肾, 还具有增强免疫力、抗衰老、抗血脂及抗突变等功能, 在中医临床经常被用于肺虚咳嗽、肾虚精少等疾病的辅助治疗^[2]。此外, 山药中的微量元素含量也十分丰富^[3-4], 其中所含的锰元素和锌元素均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5]。锰对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6], 当人体内缺少锰元素时, 会出现生长停滞、抽搐、运动失调等现象, 显著影响人体机能的正常发挥。锌是人体内众多生物酶的组成成分和活性剂, 现已知体内有200多种酶与锌有密切关系^[7], 锌缺乏会导致人体生长发育迟缓, 增加食物中锌的摄入可以降低人体对铅的吸收。近年来, 由于工业和农业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含有重金属元素的废物或副产物不断被排放到环境中,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河流和农田的污染^[8-10]。这些重金属元素通过富集作用^[11]被植物吸收, 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山东、河南以及河北等地种植山药较多, 是山药的主产地, 其中河南是铁棍山药的传统产区。受遗传基因、土壤、气候以及施肥方式不同等因素的影

响, 不同品种山药中微量元素和重金属的含量存在差异^[12]。本文采用微波消解方法, 利用原子吸收光谱仪石墨炉原子化法对7种不同产地山药中的部分微量元素以及重金属元素进行检测。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

选取7种山药作为样品, 分别为: 山东新城细毛山药, 山东泰安牛腿山药, 山东菏泽水山药, 河南温县铁棍山药, 河北蠡县菜山药, 河北保定小白嘴山药以及云南昆明金秤砣山药。

1.2 仪器与试剂

TAS-990 原子吸收光谱仪: 北京普析通用公司; MARS 6 全自动微波消解仪: 美国 CEM 公司; BHW-0920 赶酸电热板: 美国 CEM 公司; ME204 电子天平: 瑞士 Mettler-Toledo 公司; MillQ 超纯水装置: 美国 Millipore 公司。

Mn, Zn, Pb, Cr, Cd, As 标准储备液: 1000 μg/mL, 来自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 浓硝酸: 优级纯; 超纯水: 电阻率为 18.2 MΩ·cm。

1.3 实验方法

1.3.1 标准溶液的制备

准确吸取标准储备液, 用 1% HNO₃ 分别配制

收稿日期: 2020-07-26

作者简介: 姚虹(1969—), 女, 河南卫辉人, 硕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分析测试中心副教授, 研究方向: 食品分析与检测。

浓度为 0,5,10,20,40,80 ng/mL 的 Mn,Zn,Pb,Cd,As,Cr 混合标准溶液。

1.3.2 样品处理

将 7 种山药洗净、去皮,然后进行烘干研磨处理:分别称取一定量试样,恒温 80 ℃干燥 8 h,研磨,过 80 目筛,密封保存备用。山药样品烘干前后质量变化见表 1。

表 1 不同品种山药烘干前后质量变化			
山药品种	烘干前质量/g	烘干后质量/g	烘干前后质量比
铁棍山药	100.03	33.32	3.00
牛腿山药	100.01	17.81	5.62
小白嘴山药	99.95	21.08	4.74
细毛山药	100.03	32.12	3.11
菜山药	99.98	19.58	5.11
水山药	100.02	10.00	10.00
金秤砣山药	100.01	22.91	4.37

分别准确称取上述山药粉 0.5000 g(每个样品平行 3 份),置于洗净的聚四氟乙烯消解罐中,加浓硝酸 8 mL,盖好盖子,同时制作空白对照溶液,放置

表 3 6 种元素的线性回归方程及检出限				
元素	线性范围/(ng/mL)	线性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检出限/(ng/mL)
Pb	5 ~ 80	y = 0.0048x + 0.0031	0.9967	2
Mn	5 ~ 80	y = 0.0183x + 0.012	0.9987	2
Cd	5 ~ 80	y = 0.0866x + 0.0049	0.9997	2
As	1 ~ 40	y = 0.0019x - 0.0004	0.9988	1
Zn	10 ~ 80	y = 0.0044x - 0.0022	0.9994	5
Cr	1 ~ 80	y = 0.0047x + 0.0116	0.9984	1

2.2 精密度实验

取河南温县铁棍山药样品连续进样 6 次,记录其吸光度和浓度值。结果表明,RSD 范围为 0.76% ~ 2.84%(其中 Mn 为 2.54%,Zn 为 2.84%,Pb 为 1.66%,Cd 为 0.76%,As 为 2.21%,Cr 为 1.84%),说明本次实验所用方法精密度良好。

2.3 加标回收率实验

表 4 样品加标回收率				
元素	样品含量/(ng/mL)	加标量/(ng/mL)	总测得量/(ng/mL)	回收率/%
Mn	21.225	20	42.782	107.3
Zn	101.209	100	207.345	106.1
Pb	10.244	10	19.873	96.4
Cd	0.047	0.10	0.145	95.7
As	0.342	0.50	0.854	103.5
Cr	2.220	2	4.137	96.3

2.4 样品测定

按照上述仪器条件分别对 7 种不同产地的山药进行 6 种金属元素的检测,其中每个样品做 3 组平

过夜。

将处理好的样品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按表 2 中微波消解程序进行消解。消解完成后取出消解罐,小心打开盖子,将其放入赶酸仪中,于 160 ℃赶酸至溶液近干,然后取出消解罐冷却至室温,用超纯水将溶液定容至 50 mL 容量瓶中备用。

表 2 微波消解程序				
步骤	爬升时间/min	温度/℃	保持时间/min	功率/w
1	12	120	2	1000
2	8	150	2	1000
3	10	180	25	1000

2 结果与讨论

2.1 标准曲线

在优化的实验条件下,对 6 种元素系列浓度标准溶液进行测定,以吸光度值为纵坐标,以浓度(ng/mL)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同时对样品空白溶液连续测定 6 次,得到方法检出限。6 种元素的线性回归方程及检出限见表 3。表 3 显示各元素在线性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取已知浓度的河南温县铁棍山药样品 6 份,分别加入 6 种不同元素不同浓度的标准溶液,然后检测加标后混合溶液的吸光度值,得到加标溶液对应元素的浓度,从而计算出其加标回收率,结果如表 4 所示。实验得出 6 种元素的加标回收率在 95.7% 到 107.3% 之间,表明本次实验所用方法准确度较高。

行实验,计算出不同品种山药中所含金属元素的含量,结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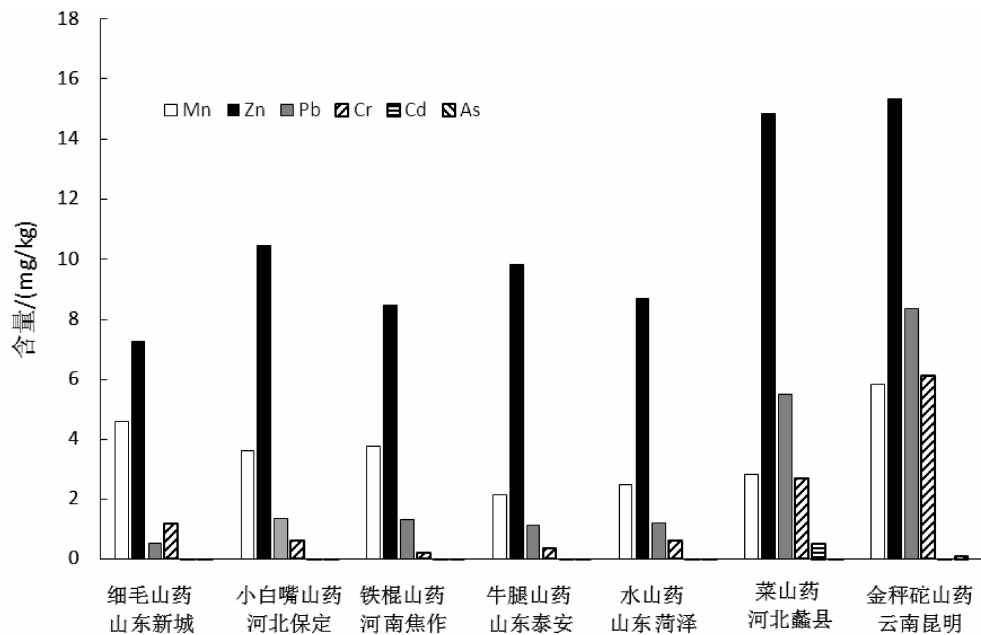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品种干燥山药中6种金属元素含量对照图

根据表1中不同山药烘干前后其质量的比值, 表5所示。计算出6种金属元素在新鲜山药中的含量,结果如

表5 新鲜山药中6种金属元素含量

单位:mg/kg,n=3

山药品种	Mn	Zn	Pb	Cr	Cd	As
细毛山药	1.483	2.332	0.172	0.383	0.004	0.008
小白嘴山药	0.761	2.207	0.286	0.132	0.012	0.004
铁棍山药	1.252	2.824	0.344	0.064	0.005	0.005
牛腿山药	0.383	1.75	0.199	0.064	0.004	0.003
水山药	0.248	0.869	0.120	0.062	0.001	0.001
菜山药	0.550	2.903	1.073	0.523	0.096	0.011
金秤砣山药	1.331	3.509	1.911	1.396	0.002	0.017

由表5数据可知,新鲜细毛山药和铁棍山药中的Mn含量分别为1.483 mg/kg和1.252 mg/kg,较奶及其制品(0.5 mg/kg)、蛋及其制品(0.65 mg/kg)、鱼类(0.95 mg/kg)、禽类(0.55 mg/kg)等的Mn含量高^[13]。测定的7种山药中Zn含量均较丰富,细毛山药和铁棍山药中的Zn含量分别为2.332 mg/kg和2.824 mg/kg,较常见的蔬菜和水果中Zn含量高^[14]。总体来说,7种山药中Zn和Mn两种微量元素的含量较丰富,说明山药可以成为人体Zn和Mn元素的日常补充来源之一,可以补充人体内的这两种微量元素。

根据国家农业行业标准(NY861-2004)中薯类中元素含量限量标准^[15],Pb,Cd,As和Cr的含量应分别小于0.4 mg/kg,0.2 mg/kg,0.2 mg/kg和0.5 mg/kg,本实验7种山药中的Cd和As两种金属元素含量均在规定范围内;菜山药和金秤砣山药中的

Pb含量均超过规定标准,分别达到了规定限度的2.5倍和近5倍;金秤砣山药中的Cr也超过规定标准。从品种分析,细毛山药、小白嘴山药、铁棍山药、牛腿山药和水山药5个品种中重金属含量均在规定范围内,菜山药中Pb超标,金秤砣山药中Pb和Cr两种金属元素都严重超标,说明市售山药大部分合格,但是有少数山药存在重金属污染。

3 结论

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7种不同产地山药中的6种金属元素含量,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产地山药中金属元素含量差异较大,分析原因主要有:不同品种山药基因遗传不同,造成其对金属离子有不同的富集能力;不同生长环境例如土壤、水源、空气等中金属元素含量有差异,造成山药生长条件不同;农药的不当使用以及施肥等其他因素也对山药中金属元素含量有影响。

参考文献:

- [1] 神农本草经:黄奭辑[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2:49.
- [2] 高学敏. 中药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505.
- [3] 陈婷,杨明容. 山药饮料研究进展[J]. 农产品加工,2020(7):63-65.
- [4] 陈艳,姚成. 怀山药及其种植土壤中微量元素的测定[J]. 广东微量元素科学,2004,11(2):49-52.
- [5] 汪开源.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新资源食品中锰含量[J]. 食品安全导刊,2019(4):74-75.
- [6] 王亚斌. 原子吸收光谱法在食品检验中的应用探讨[J]. 现代食品,2018(7):100-101.
- [7] 姚汉亭. 食品营养学[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2:48-49.
- [8] 刘春早. 湖南省主要流域土壤重金属污染及潜在风险评价[D/OL]. 河北保定:河北农业大学,2011[2020-07-18]. <https://www.doc88.com/p-7933356855030.html>.
- [9] 郭朝晖,肖细元,陈同斌,等. 湘江中下游农田土壤和蔬菜的重金属污染[J]. 地理学报,2008,63(1):3-11.
- [10] 蔡雄飞,段志斌,王济,等. 高速公路两侧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及评价[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20,47(1):103-108.
- [11] 高焯煊,李晔,李东明,等. 鞍山某铁矿区植物对重金属的富集作用研究[J]. 河南科技,2019(16):150-153.
- [12] 周丽,史新敏,唐忠厚,等. 微波消解-FAAS测定山药中的5种元素[J]. 光谱实验室,2011,28(5):2276-2279.
- [13] 赵道辉,林国斌,金玉铃.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食物中锰[J]. 现代科学仪器,2000(2):46.
- [14] 闫桂甫,徐慧琴. 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常见食品中微量元素锌的含量[J]. 广东化工,2010,37(11):157-158.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NY861-2004[S/OL].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2020-07-21]. <http://www.docin.com/p-221671589.html>.

(责任编辑 吕志远)

Determination of 6 Metallic Elements in Chinese Yams by Graphite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YAO Hong, LI Lingchuan

(Center of Analysis and Test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graphite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six metallic elements of lead (Pb), manganese (Mn), cadmium (Cd), arsenic (As), zinc (Zn) and chromium (Cr) in Chinese yams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with microwave diges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wer of microwave digestion was 1000 W, and the acidity of sample was 1% nitric acid system.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standard curve of the six elements was ≥ 0.9967 , and the detection limit was as low as 1 ng/mL. The standard recovery rate was 95.7% ~ 107.3%, and the RSD range was 0.76% ~ 2.84%, which met the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the content of heavy metals in most yams was within the standard range, but Cr and Pb in some yams exceeded the standards, which may pose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health of residents.

Key words: graphite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microwave digestion; Chinese yams; metallic elements

异斯特维醇及其衍生物抗肿瘤活性研究进展

刘从军, 刘盼萍, 柯 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异斯特维醇是天然产物甜菊苷水解得到的四环二萜化合物, 具有降血压、降血脂及抗肿瘤功效, 尤其是通过 D 环、19 位羧基结构修饰引入活性亚结构单元, 其抗肿瘤活性显著提高, 因而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综述近年异斯特维醇及其衍生物的抗肿瘤活性研究进展, 以期为此类化合物的抗肿瘤新药开发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异斯特维醇; 衍生物; 抗肿瘤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4.023

中图分类号:R9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4-0119-06

异斯特维醇 (isosteviol) 是由天然产物甜菊苷在酸性条件下水解得到的四环二萜类化合物, 分子结构如图 1 所示。早期研究发现, 该化合物具有降血压、降血糖等药理功效。近年来, 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 大量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被设计和合成, 一些新的性能也被开发, 如: 抗肿瘤活性、小分子催化性能、超分子自组装性能等^[1]。尤其是部分衍生物展现出比其自身更好的抗肿瘤功效, 促使研究者更进一步设计新型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以期在抗肿瘤新药开发领域有更深层的突破。基于此, 本文综述异斯特维醇及其衍生物在抗肿瘤活性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以期为此类化合物的抗肿瘤新药开发研究提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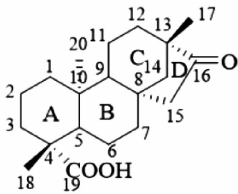


图 1 异斯特维醇结构

1 异斯特维醇抗肿瘤活性

2006 年, Wong^[2] 首先报道了异斯特维醇通过改变活性氧的生成来抑制血管收缩素 - II 诱导的细

胞增殖, 从而推论出异斯特维醇具有抗肿瘤细胞增生的能力。

2015 年, Al - Dhabi^[3] 利用不同浓度的异斯特维醇作用于 Vero 和 MCF7 细胞, 结果显示: 异斯特维醇对两株肿瘤细胞的抑制呈现出时间和剂量的依赖性, 对 Vero 和 MCF7 细胞的 IC₅₀ 值分别为 2.18 μg/mL 和 2.50 μg/mL。

2016 年, 王小侠^[4] 考察异斯特维醇对骨肉瘤细胞 U - 2OS 生长的影响, 结果显示: 异斯特维醇对骨肉瘤细胞 U - 2OS 的抑制呈现出时间和剂量依赖性。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 异斯特维醇通过促进活性氧的产生, 降低细胞膜电位, 破坏细胞膜完整性, 上调 Bax 的表达和下调 Bcl - 2 的表达而促进 U - 2OS 细胞的凋亡。

2 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肿瘤活性

异斯特维醇自身的抗肿瘤活性吸引了研究者对其衍生物的进一步开发, 以期获得抗肿瘤性能更好的新型衍生物。在研究异斯特维醇抗肿瘤活性过程中, 研究者通过微生物转化、电化学法、化学合成法等对异斯特维醇的 D 环、19 位羧基进行重点结构修饰, 获得了大量的、结构新颖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并评价了部分新型衍生物的抗肿瘤活性, 一些作用

收稿日期: 2020 - 07 - 06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新型杂环衍异斯特维醇衍生物的合成、抗肿瘤活性及 QSAR 研究”(20B350009)

作者简介: 刘从军(1983—), 男, 河南周口人, 博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新药研发。

机制也被进一步探索。

2.1 D 环修饰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肿瘤活性

2009 年, Wu^[5] 首先以异斯特维醇为原料, 重点对其 D 环进行结构修饰, 经酯化、还原、羟醛缩合、康尼查罗、1,3-偶极环加成等反应, 合成出单羟基(1)、双羟基(2)、四氢异噁唑环(3)和吡唑环(4)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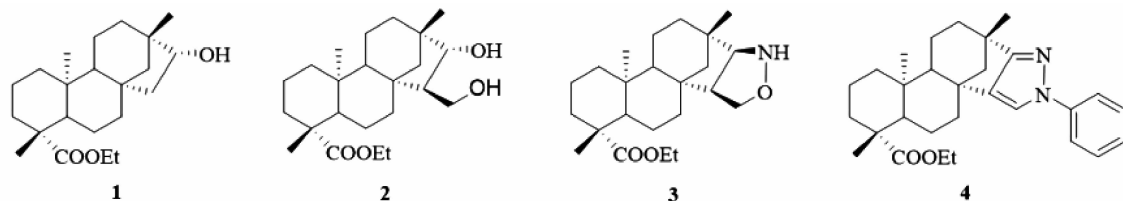


图2 D 环修饰的羟基、杂环衍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1-4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2012 年, Zhang 等人^[6] 继续在异斯特维醇 D 环上引入羟基, 合成出新型双羟基(5,6)、氨基醇(7,8)衍异斯特维醇衍生物(图3), 评价了它们对 EC9706, Eca109, PC-3 和 HCT-116 四株肿瘤细胞的抑制活性, 结果显示: 含有多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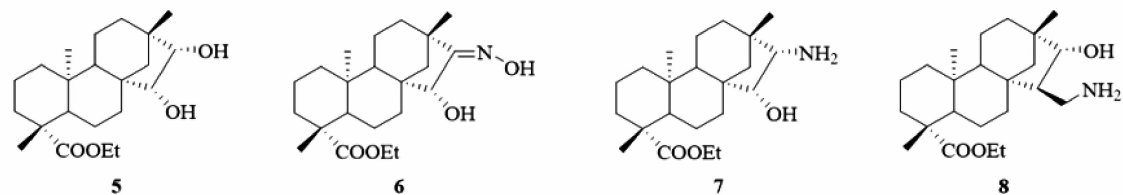


图3 D 环修饰的羟基、氨基醇衍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5-8

基于 D 环修饰的氨基醇衍异斯特维醇衍生物具有较好的抗肿瘤功效, 2016 年, Liu^[7] 对异斯特维醇 D 环继续结构修饰, 合成了与化合物 8 结构类似的化合物 9 和 10, 同时, 对氨基醇亚结构单元又进一步改造, 将一系列硫脲结构引入到氨基上(图4), 评价了它们对 HCT-116, HGC-27 和 JEKO-1 三组肿瘤细胞的抑制活性, 结果显示: 含有硫脲结构片段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表现出比前体化合物 10 更好的抗肿瘤效果, 尤其是化合物 11 对 HCT-116 细胞的抑制活性 IC_{50} 值达 $1.450 \mu\text{M/mL}$ 。

2013 年, Zhu^[8] 重点将活性杂环亚结构单元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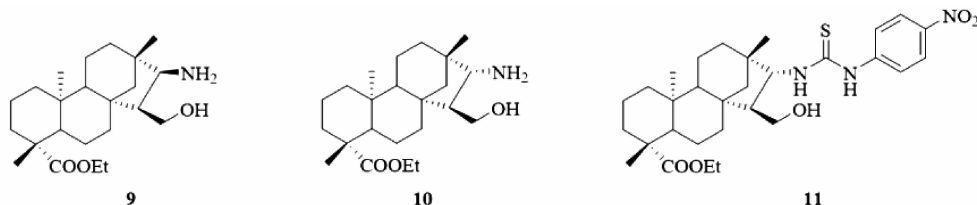


图4 D 环修饰的氨基醇、硫脲衍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9-11

2014-2016 年, Khaybullin^[9] 和 Liu^[10] 等人分别对异斯特维醇 D 环羰基和羟甲基进行结构修饰引入叠氮基; 随后, 利用“Huisgen click”反应将 1,2,3-

异斯特维醇衍生物(图2), 评价了它们对 B16-F10 黑色素瘤细胞的抑制活性, 结果显示这些化合物均表现出较好的细胞毒活性, 尤其是化合物 3 和 4 对 B16-F10 黑色素瘤的抑制浓度 IC_{50} 值分别达到 $15 \mu\text{M/mL}$ 和 $19 \mu\text{M/mL}$ 。并提出在异斯特维醇分子骨架上引入羟基或杂环能提高其抗肿瘤活性。

基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对四组癌细胞表现出中等的抗肿瘤效果, 而含有氨基醇亚结构单元的衍生物 8 表现出突出的抑制活性($IC_{50} = 4.01, 5.02, 15.31$ 和 $12.25 \mu\text{M/mL}$), 并详细分析了羟基、氨基醇衍异斯特维醇衍生物结构与活性间的构效关系。

入到异斯特维醇的 D 环区域, 首先通过异斯特维醇酯化、Tollens 反应, 氧化、开环、缩合、环合等反应, 将吡唑啉、吡唑和异噁唑环引入到异斯特维醇 D 环上, 随后又将不同取代的苯环(12,13)、苯基硫脲(14)亚结构单元引入到杂环结构上(图5), 合成出 100 多个新型衍生物, 测试了衍生物对四株肿瘤细胞 SGC7901, A549, Raji 和 Hela 的抑制活性。结果发现这些化合物对 Raji 细胞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 尤其是 2,4-二氯苯基吡唑取代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对 Raji 细胞的 IC_{50} 达到 $1.09 \mu\text{M/mL}$ 。

三氮唑结构单元引入到异斯特维醇的 D 环区域, 合成了 20 余个 1,2,3-三氮唑衍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评价了 16 位羰基修饰的 1,2,3-三氮唑衍异斯特维

醇衍生物对 MDA - 231, A - 549, ASPC - 1, PC - 3, HCT - 116 和 HeLa 肿瘤细胞的抑制活性,其中化合物 15(图 6)对 HeLa 细胞的抑制效果最好,IC₅₀ 值达 (29.62 ± 1.52) μM/mL。15 羟甲基修饰的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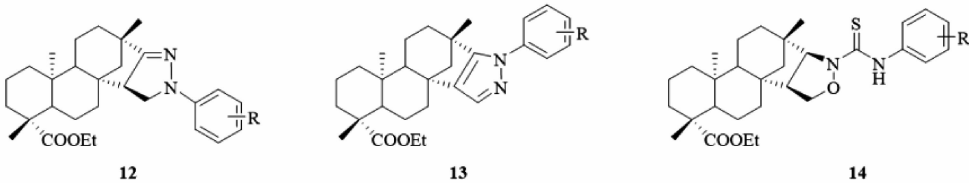


图 5 D 环修饰的吡唑啉、吡唑和异噁唑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12 - 14



图 6 D 环修饰的 1,2,3 - 三氮唑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15,16

D 环区域引入 α,β - 环外不饱和酮、酯等亚结构单元也被证实能够提高其抗肿瘤活性。自 2011 年以来,Li 研究小组^[11]相继在异斯特维醇 D 环上引入 α,β - 环外不饱和酮、酯等结构单元合成出 10 多个 α,β - 环外不饱和酮、酯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图 7),其中抗肿瘤活性较好的化合物 18 对 MDA -

3 - 三氮唑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抑制 HCT - 116 和 JEKO - 1 细胞的作用结果显示:化合物 16(图 6)对 HCT - 116 细胞的抑制效果最好,IC₅₀ 值达 (2.987 ± 0.098) μM/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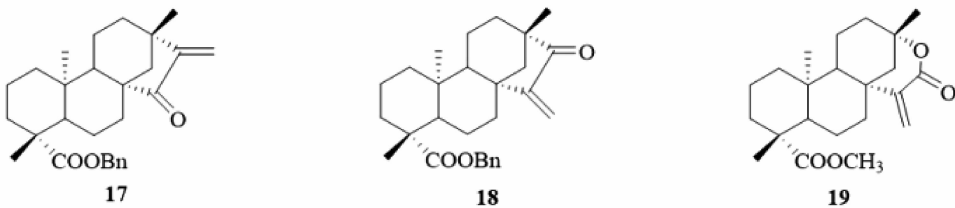


图 7 D 环修饰的 α,β - 环外不饱和酮、酯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17 - 19

Liu^[12]发现在异斯特维醇 D 环区域引入氮氧化物结构片段也能提高其抗肿瘤活性。该小组通过多步反应,合成出了系列新型 D 环修饰的氮氧化物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评价了其对 HepG - 2, B16 - F10, HCT - 116, Huh - 7 和 SW6 - 20 细胞的抑制活

性,结果显示,化合物 20 和 21(图 8)对 B16 - F10 细胞生长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从进一步的构效关系研究中发现,化合物分子中的 NO 释放量与化合物的抗肿瘤效果呈现正比关系,说明氮氧化物亚结构在其抗肿瘤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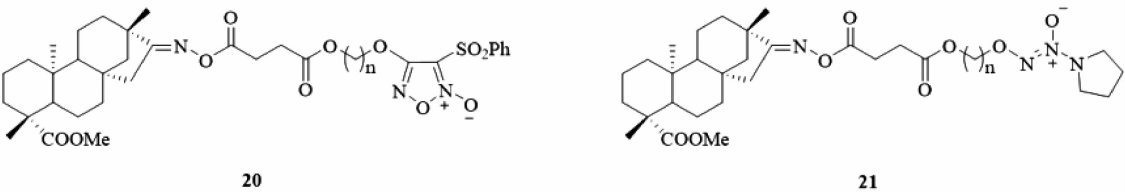


图 8 D 环修饰的氮氧化物骈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20,21

D 环开环也能够提高异斯特维醇的抗肿瘤活性。2013 年, Das^[13]从毛茛科草本植物白头翁(Pulsatilla nigricans)中提取得到异斯特维醇 D 环开环产物 22(图 9),其抑制 HeLa 细胞的 IC₅₀ 值为

50.8 μg/mL。进一步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化合物 22 促使 HeLa 细胞细胞核固缩和核小体间 DNA 断裂,从而导致癌细胞的凋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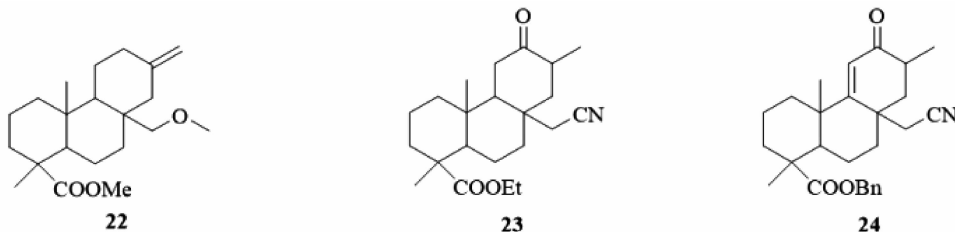


图9 D环开环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 22–24

2016年,刘燕^[14]以异斯特维醇为原料,经酯化、肟化、开环、氧化、选择性还原、脱氢等反应,合成得到10余个异斯特维醇D环开环的衍生物,并评价其对HepG2, HCT116, Huh7, SW620四株肿瘤细胞的抑制活性,结果显示:化合物23(图9)对四株肿瘤细胞具有较好的抑制活性,IC₅₀值均低于10 μM/L,化合物24(图9)选择性抑制HCT116细胞,其IC₅₀值达3.57 μM/L。

2.2 19位羧基修饰的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肿瘤活性

异斯特维醇19位羧基处于A,B环组成的凹型区域,同时,20位甲基和D环的空间效应给19位羧基也带了一定的影响,致使19位羧基表现出一些特殊的性能,如19位羧基反应活性相对较低,与醇形成酯后结构比较稳定性,在强酸、强碱下均不宜水解等。这些因素导致早期的异斯特维醇结构修饰主要发生在其D环区域。然而,随着对异斯特维醇研究

的深入,发现19位羧基的修饰在异斯特维醇生物活性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3年,Ukiya^[15]通过多步反应将19位羧基还原成羟基,与取代的羧酸反应合成了一系列19位羧基修饰的酯类化合物。对HL60, A549, AZ521和SK-BR-3肿瘤细胞研究结果显示:化合物25(图10)对四株肿瘤细胞抑制作用较为显著,IC₅₀分别为(6.6 ± 2.1), (5.7 ± 1.6), (4.2 ± 0.6), (25.2 ± 0.5) μM/mL。2017年,Malki研究小组^[16]利用相似的合成方法得到了系列酯类化合物,其中化合物26(图10)对肝癌细胞的抑制活性最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该化合物导致癌细胞凋亡的主要阶段发生在细胞分裂的G1期。2019年,郭永泰^[17]保留19位处的羧基,将羧基酰氯化后与醇反应生成相应的酯,评价对Colo-16和A549的细胞毒活性,结果显示,化合物27(图10)对Colo-16细胞的活性最好,IC₅₀为(53.03 ± 0.0343) μ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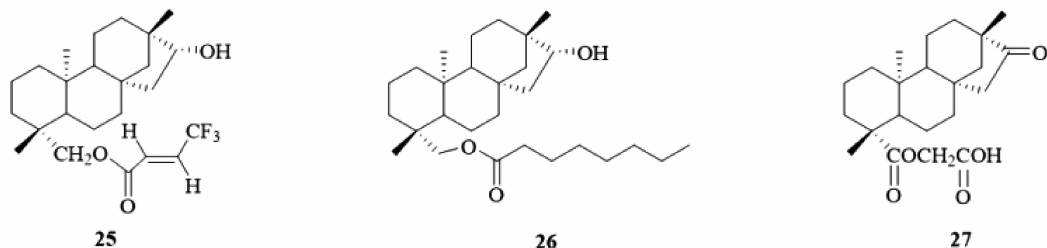


图10 19位羧基修饰的异斯特维醇酯衍生物 25–27

2019年,Strobykina^[18]重点对异斯特维醇19位羧基进行结构修饰引入酯基,随后进一步在酯基上引入磷/磷酸酯亚结构单元,通过调节磷原子与19位碳间的脂肪链长度,相继合成了2个系列19位羧基修饰的磷/磷酸酯衍生物(图

11)。抗肿瘤活性结果显示:抗肿瘤效果较好的化合物28对M-HeLa, MCF-7和WI-38细胞的IC₅₀分别为(14.2 ± 1.1), (37 ± 3.1)和(37 ± 3.2) μM/L;化合物29对M-Hela, MCF7和Chang liver细胞的IC₅₀均为60 μ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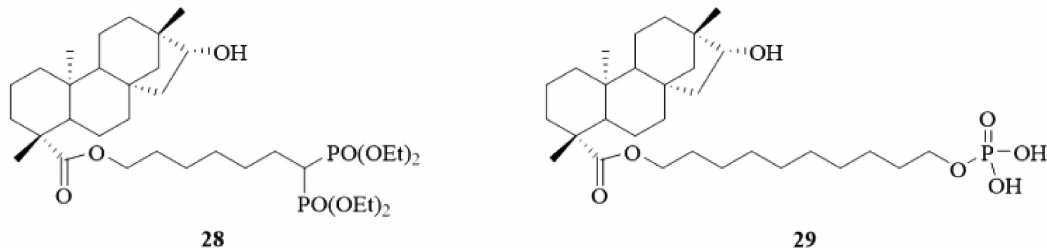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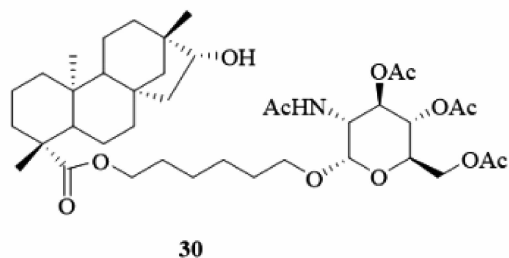


图11 19位羧基修饰的磷/磷酸酯衍生物 28,29

此外,该小组^[19]利用相同的方法,合成了2个系列19位羧基修饰的糖苷异斯特维醇酯衍生物(图12)。抗肿瘤活性结果显示:化合物30对MCF-7, Hep G2, Panc-1, PC-3, Wi-38和Chang



liver 细胞具有中等的抑制能力,而化合物30和31对M-Hela细胞效果较为显著,IC₅₀分别为(10.0 ± 0.7) μM/L和(13.0 ± 1.0) μM/L,均优于阳性对照他莫昔芬(28.0 ± 2.5) μ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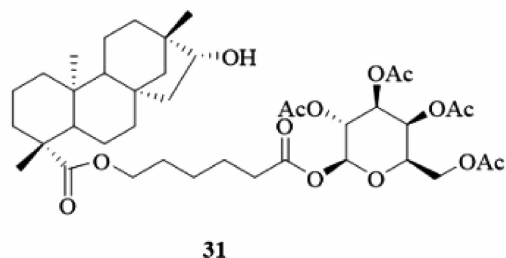


图12 19位羧基修饰的糖苷异斯特维醇酯衍生物30,31

通过对19位羧基修饰,引入杂环亚结构单元,有利于提高异斯特维醇的抗肿瘤活性。2017年,Liu^[20]通过19位羧基酰氯化、亲核取代、亲核加成、环合反应合成出23个19位羧基修饰的噁二唑糖苷异斯特维醇衍生物,抗肿瘤活性结果显示,化合物32

(图13)对HCT-116和JEKO-1活性较好,IC₅₀分别为(5.00 ± 0.6) μM/mL和(3.73 ± 0.3) μM/mL。进一步定量构效关系研究发现,噁二唑环对抑制HCT-116细胞活性具有积极的正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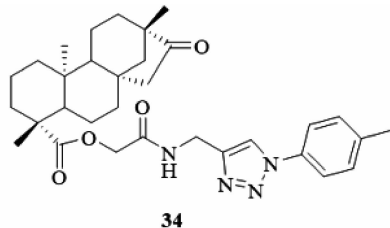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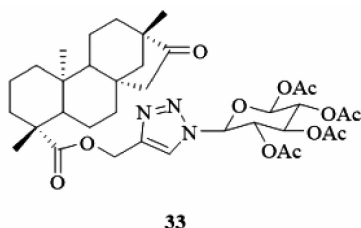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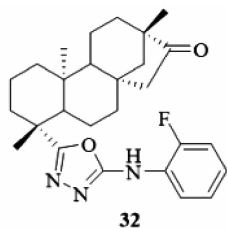


图13 19位羧基修饰的杂环糖苷异斯特维醇酯衍生物32-34

2016~2018年,Liu^[10]和Luan等人^[21]分别对异斯特维醇19位羧基修饰,将炔基引入到19位羧基上,然后通过“Huisgen click”反应分别合成出系列19位羧基修饰的1,2,3-三氮唑糖苷异斯特维醇衍生物。肿瘤活性结果显示:化合物33(图13)对HCT-116细胞活性最佳,IC₅₀=(19.310 ± 0.818) μM/mL,而化合物34(图13)对HCT-116, BEL-7402和HepG2细胞均具有较好的抑制活性。

制以及临床试验研究,从而开发出高效低毒的异斯特维醇抗肿瘤新药。

3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异斯特维醇具有抗肿瘤作用,尤其是利用化学合成方法,对异斯特维醇D环和19位羧基进行结构修饰,引入羟基、氨基醇、硫脲、α,β-环外不饱和酮、磷/磷酸酯、糖基以及杂环等活性结构单元,得到的新型异斯特维醇衍生物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抗肿瘤功效。此外,尽管目前合成了大量的衍生物,并进行了抗肿瘤活性试验,但结构修饰主要集中在异斯特维醇的D环和19位羧基处,A,B和C环区域改造涉及相对较少;抗肿瘤活性研究主要是体外细胞毒活性评价,相应化合物的临床试验研究依然缺乏。因此,在丰富异斯特维醇衍生物结构类型的基础上,后期重点开展构效关系、抗肿瘤作用机

参考文献:

- [1] ULLAH A, MUNIR S, MABKHOT Y, et al. Bioactivity Profile of the Diterpene Isosteviol and its Derivatives. [J]. Molecules, 2019, 24: 678.
- [2] WONG K, LIN J W, LIU J C, et al. Antiproliferative Effect of Isosteviol on Angiotensin - II - Treated Rat Aortic Smooth Muscle Cells [J]. Pharmacology, 2006, 76: 163 - 169.
- [3] AL - DHABI N A, ARASU M V, REJINIEMON T S. In Vitro Antibacterial, Antifungal, Antibiofilm, Antioxidant, and Anticancer Properties of Isosteviol Isolated from Endangered Medicinal Plant Pittosporum tetraspermum [J]. Evidence - 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2015, 11: 164261.
- [4] 王小侠, 张珏, 李建, 等. 异甜菊醇对骨肉瘤细胞U-2OS生长的影响[J]. 中国癌症杂志, 2016, 26(3): 230 - 237.
- [5] WU Y, DAI G F, YANG J H, et al. Stereoselective synthesis of 15 - and 16 - substituted isosteviol derivatives and their cytotoxic activities. [J].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009, 19: 1818 - 1821.
- [6] ZHANG T, LU L H, LIU H, et al. D - ring modified novel

- isosteviol derivatives; Design, synthesis and cytotoxic activity evaluation [J].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012, 22: 5827 – 5832.
- [7] LIU C J, YU S L, LIU Y P, et al. Synthesis, cytotoxic activity evaluation and HQSAR study of novel isosteviol derivatives as potential anticancer agents [J].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2016, 115: 26 – 40.
- [8] ZHU S L, WU Y, LIU C L, et al. Design and stereoselective synthesis of novel isosteviol – fused pyrazolines and pyrazoles as potential anticancer agents. [J].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2013, 65: 70 – 82.
- [9] KHAYBULLIN R N, ZHANG M, FU J J, et al.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Isosteviol Triazole Conjugates for Cancer Therapy [J]. *Molecules*, 2014, 19: 18676 – 18689.
- [10] LIU C J, LIU Y P, YU S L, et al. Syntheses, cytotoxic activity evaluation and HQSAR study of 1,2,3 – triazole – linked isosteviol derivatives as potential anticancer agents. [J].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016, 26: 5455 – 5461.
- [11] LI J, ZHANG D Y, WU X M, et al.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evaluation of novel exo – methylene cyclopentanone tetracyclic diterpenoids as antitumor agents. [J].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2011, 21: 130 – 132.
- [12] LIU Y, WANG T T, LING Y, et al. Design, synthesis and cytotoxic evaluation of nitric oxide – releasing derivatives of isosteviol [J]. *Chemical Biology & Drug Design*, 2017, 90: 473 – 477.
- [13] DAS S, DAS J, SAMADDER A, et al. Dihydroxy – Isosteviol Methyl Ester from *Pulsatilla nigricans* Induces Apoptosis in HeLa Cells: Its Cytotoxicity and Interaction with Calf Thymus DNA [J]. *Phytotherapy Research*, 2013, 27: 664 – 671.
- [14] 刘燕, 王婷婷, 陈莉. 异甜菊醇衍生物的合成及抗肿瘤活性 [J].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2016, 47(1): 48 – 53.
- [15] UKIYA M, SAWADA S, KIKUCHI T, et al. Cytotoxic and Apoptosis – Inducing Activities of Steviol and Isosteviol Derivatives against Human Cancer Cell Lines [J]. *Chemistry & Biodiversity*, 2013, 10: 177 – 188.
- [16] MALKI A, EL – SHARKAWY A, SYAED M E, et al. Antitumor Activities of the Novel Isosteviol Derivative 10C Against Liver Cancer. [J]. *Anticancer Research*, 2017, 37: 1591 – 1601.
- [17] 郭永泰, 侯熙彦, 郑昌吉, 等. 新型异甜菊醇衍生物的合成、表征及生物活性研究 [J]. *有机化学*, 2019, 39(12): 3532 – 3541.
- [18] STROBYKINA I Y, NEMTAREV A V, GARIFULLIN B F, et al.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Activity of Alkane – 1,1 – diylbis(phosphonates) of Diterpenoid Isosteviol [J]. *Russian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 2019, 55: 17 – 24.
- [19] SHARIPOVA R R, BELENOK M G, GARIFULLIN B F, et al. Synthesis and anti – cancer activities of glycosides and glycoconjugates of diterpenoid isosteviol [J]. *MedChemComm*, 2019, 10: 1488 – 1498.
- [20] LIU C J, ZHANG T, YU S L, et al. Synthesis, cytotoxic activity, and 2D – and 3D – QSAR studies of 19 – carboxyl – modified novel isosteviol derivatives as potential anticancer agents [J]. *Chemical Biology & Drug Design*, 2017, 89: 870 – 887.
- [21] LUAN T, CAO L H, DENG H, et al.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C – 19 Isosteviol Derivatives as Potent and Highly Selective Antiproliferative Agents [J]. *Molecules*, 2019, 24: 121.

(责任编辑 姚虹)

Progress on Antitumor Activity of Isosteviol and Derivatives

LIU Congjun, LIU Panping, KE Ming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etracyclic diterpene isosteviol, obtained from the hydrolysis of a natural stevioside, shows the effects of antihypertension, antihyperlipidemia and antitumor. Especially,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isosteviol derivatives with active substructural units, chemically synthesized by the modification of D – ring and 19 – carboxyl group,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us, isosteviol has attracted an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antitumor activity of isosteviol and its derivatives in recent years are reviewed so that they will provide benefi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ntitumor drugs.

Key words: isosteviol; derivatives; antitumor

高速铁路用 40m/1000t 级箱梁建造技术的研究

刘向明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为了解决高速铁路采用 40m/1000t 箱梁制造中存在的质量安全关键问题,结合郑济高速铁路建设,对箱梁预制、装备研制、智能化和绿色建造进行技术研究,在提高桥梁布置的灵活性和建设工效、保证施工质量安全、大幅降低高铁修建成本、节省工程用地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关键词:高速铁路;箱梁;建造技术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5.024

中图分类号:TU3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5-0125-04

1 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高速铁路普遍采用 32 m 箱梁,为适应更高速度、更大跨越能力以及高墩条件下高速铁路标准梁桥建造需求,郑济(郑州至济南)高速铁路首次采用 40 m 箱梁制架技术,这是根据高速铁路建设、综合试验和运维实践经验而提出,其建造技术在世界上尚无先例,为解决钢筋预扎精准定位、内模变径断面直收、预应力孔道橡胶棒抽拔高速反弹、成品束钢绞线自动平衡同步张拉问题,确保建造质量和安全,开展技术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2 40m/1000t 箱梁制造和运架中关键问题分析

郑济高铁郑州黄河特大桥引桥为公铁两用桥梁,分上下两层设计,下层为四线铁路,上层为 32.5m 宽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铁路设计时速 350km,无砟轨道 40m 简支箱梁,全长 40.6m,计算跨度为 39.3m,支座中心距 4.4m,梁高 3.235m,顶板宽度 12.6m,底板宽 5.4m。单孔箱梁混凝土数量为 370m³,梁重约 925t。与传统 32m 箱梁相比,铁路 40m 箱梁明显跨度增长、高度增高、体积增加、重量增大和预应力增强,并采用了单排大锚具设计技术,目前尚没有成熟的制梁工艺和制架设备。40m 简支箱梁横断面设计图见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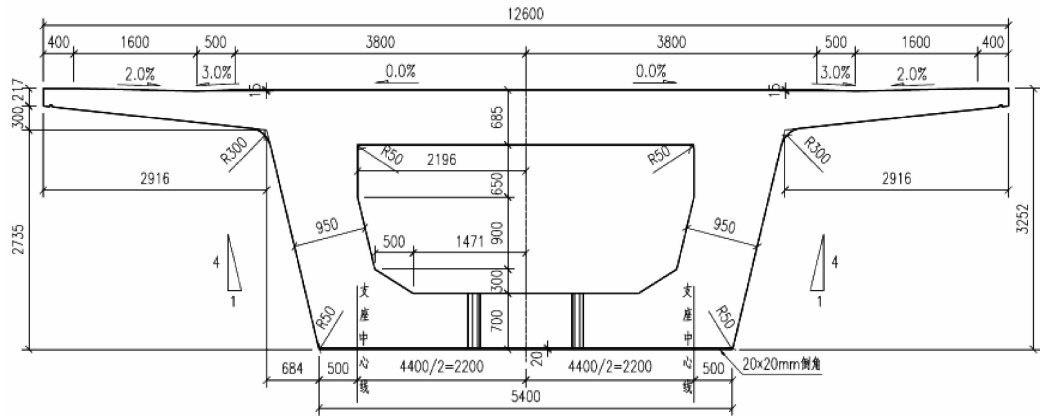


图 1 40m 简支箱梁横断面设计图

传统的箱梁内模系统采用龙门吊吊装入模或卷扬机拖拉出模的施工方式,内模变径无法一次成型,

收稿日期:2020-08-07

作者简介:刘向明(1970—),男,山东淄博人,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建设部部长,长期从事铁路工程建设管理,研究方向为高速铁路施工技术、施工组织。

需要耗费大量人工成本,且施工质量安全不易控制。一方面原有箱梁钢筋预扎采用人工搭设支架方式,分阶段搭设,结构整体刚性不强,钢筋定位受制于支架结构限制,人工不易操作,钢筋定位不准,严重影响了工程质量及施工安全,且工效不高。另一方面传统箱梁建造管理、梁场布局设计采用人工计算方式,受人员管理水平、经验程度影响较大,造成建造管理粗放,梁场布局不科学,加大了临时用地,更缺少绿色施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而 40m 箱梁首次采用成品束钢绞线,原有采用千斤顶对称张拉,中间各级临时锚固后,重新安装千斤顶,再分级张拉方式,伸长测量积累误差不断加大,无法满足高质量建造要求。郑济高速铁路跨黄河特大桥采用高铁双线和市域铁路双线并行设计结构,且 40m 箱梁较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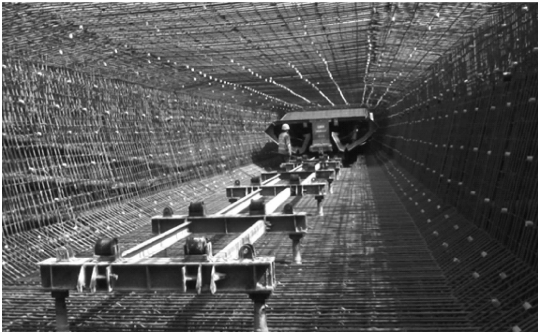


图2 箱梁自驱式内模进出筋笼和梁体施工

- 3.1.2 研制和使用箱梁钢筋预扎自动升降内架
- 箱梁钢筋预扎自动升降内架,采用电力驱动齿轮箱实现自动升降,具有结构整体性好、刚度大,钢筋定位更准确等特点,使用该装置对于保证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和提高工效具有明显作用。
- 3.1.3 研制和使用预应力孔道橡胶棒抽拔台车
- 后张梁链式拔管穿束台车采用两对条形轮,夹紧、旋转抽拔橡胶管,出孔后仍继续夹紧,完全避免了高速反弹的安全风险,并减小胶管损伤,延长了橡胶管的寿命。
- 3.1.4 研制和使用预应力成品束钢绞线穿束台车
- 针对 40m 箱梁首次采用成品束钢绞线,研发和使用了预应力成品束钢绞线穿束台车,该台车配套链条卡瓦式穿束装置,保证钢绞线束穿束过程顺直,钢绞线与锚孔一一对应,确保预应力束张拉时单筋受力均匀。其工作状态见图 3 所示。
- 3.1.5 研发和使用箱梁混凝土自动养护系统

箱梁混凝土自动养护系统,通过手机 APP 或控制面板输入梁号信息后,喷淋养护系统进入工作模式,控制供水系统向台座喷淋管路供水,选取喷淋覆盖范围、喷射旋转角度、喷射高度适合的喷头对箱梁

32m 箱梁高度、重量都有较大增加,原有运架设备无法满足施工需要。

3 技术措施研究

3.1 加大自动化设备及工装研制,全面采用机械化制梁

3.1.1 研制和使用箱梁自驱式内模系统

箱梁自驱式内模系统,内模采用龙骨结构,整体性强、变形小,并设置自驱装置自行进出模型,实现了变径断面直收、自动移位、液压系统摇控操作功能,方便快捷,避免了传统的龙门吊吊装入模或卷扬机拖拉出模的施工方式,节约了人工,降低了施工安全风险。自驱式内模进出主梁钢筋笼和梁体工况见图 2 所示。



顶板、腹板、内箱、底板进行自动喷淋养护作业。养护数据自动定时上传至铁路梁场综合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自动流转。



图3 预应力成品束钢绞线穿束台车

- 3.1.6 研制和使用预应力筋自动张拉设备
- 预应力筋自动张拉设备由动力子系统、传感子系统、控制子系统、数据子系统和辅助子系统组成,可进行参数预设,一键启动张拉,自动完成整个张拉全过程。该设备自动平衡同步张拉,自动控制持荷时间、力值、位移值显示及存储,自动计算张拉结果并打印完整的张拉记录表。张拉数据无线传输至梁场服务器,可远程传输至铁路工程管理平台,见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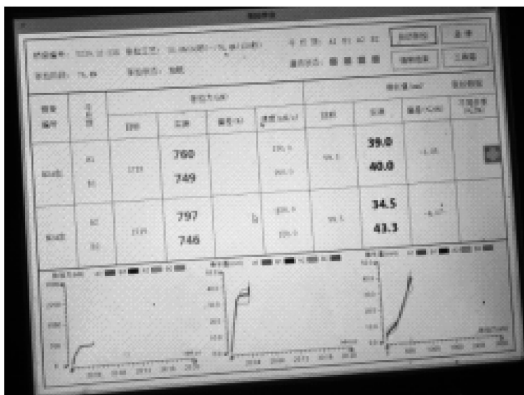


图4 预应力筋自动张拉设备

3.1.7 研制和使用预应力管道自动压浆设备

孔道压浆采用 TGZY 型铁路桥梁预应力自动压浆系统,系统主要由真空泵、高速搅拌桶、低速搅拌桶、压浆泵、传感器、平板电脑等组成,集抽真空、制浆、压浆功能于一体,一键启动自动进行抽真空、制浆、压浆、保压过程,支持远程传输至管理平台。

3.1.8 研发和使用箱梁自动静载系统

箱梁载荷试验自动加载系统由自动加载系统和自平衡式静载试验架组成(见图5)。静载试验加载模块根据主控模块指令为静载试验提供加载动力,通过预设程序实现自动控制,并根据实时检测数据调整千斤顶加载速度,确保加载同步准确和平衡稳定。静载试验数据实时采集,可自动生成“静载试验报告”。



图5 箱梁自动静载系统

3.2 研制和使用成套运架施工设备

3.2.1 研制和使用 40m /1000t 箱梁搬运机

研制了世界上首套 40m/1000t 级箱梁搬运提架

施工设备,该搬运机跨度 48m,净跨 43.5m,起升高度 13m,自重约 675t。该设备支腿结构不再沿用传统的“人字形”而改为“门形”,并将其横向位置设为宽窄可变的技术方案,其爬坡能力 2%、可原地 90°转向,适用于铁路 40m、32m、24m 双线整孔箱梁的起吊、运输、转移等工作,并满足双层存梁的要求和具备为运梁车装梁的功能,确保箱梁运架施工安全可靠。

3.2.2 采用两台同型门式跨线起重机组组合抬吊工作方式

郑济高速铁路跨黄河特大桥高铁双线和市域铁路双线并行,采用跨度参数相对较小的正位提梁上桥方式,箱梁提升上桥采用两台同型门式跨线起重机组组合抬吊,单台最大起重量为 500 吨,跨度 36m、起升高度 30m,减小了提梁机安装拆卸和使用安全风险。

3.2.3 使用 40m/1000t 箱梁运梁车

YLS1000 型运梁车采用多轮轴、小轮胎设计方案,悬挂轮组采用双胎并置结构型式和宽基小轮胎方案,有效降低整机高度。使用该车可实现“整升整降”和“单点升降”功能,满足了运梁车自动调平和喂梁时精确对位要求。

3.2.4 使用 40m/1000t 级箱梁步履式架桥机

JQS1000 型架桥机采用双主梁五支腿结构,跨一孔简支梁,额定起重量达 1000t。使用该车架设首末跨、曲线梁和变跨梁十分方便,可快速实现桥间转移或掉头作业,在 R2000m 的曲线线路上正常架梁,30‰大坡道架梁安全可靠。箱梁架设作业见图 6 所示。

3.3 采用信息化管理,推行绿色建造技术

3.3.1 大力推行 BIM 技术在箱梁设计和施工中的应用

采用 Bentley 平台 ProStructures V8i,根据二维设计图纸创建 40m 预制梁高精度 BIM 模型(见图

7),模型包括梁体、桥梁附属设施、普通钢筋、预应力、支座和防落梁预埋件等,实现可视化技术交底,并可以进行钢筋碰撞检查(见图8)。



图6 40m/1000t 级箱梁架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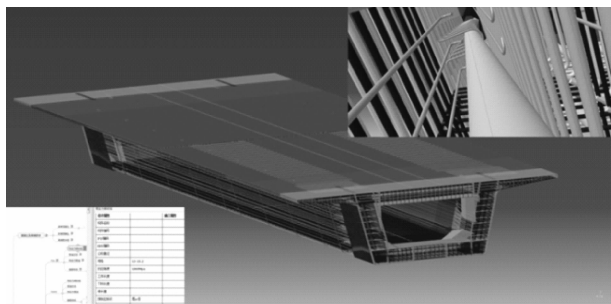


图7 40m 箱梁 BIM 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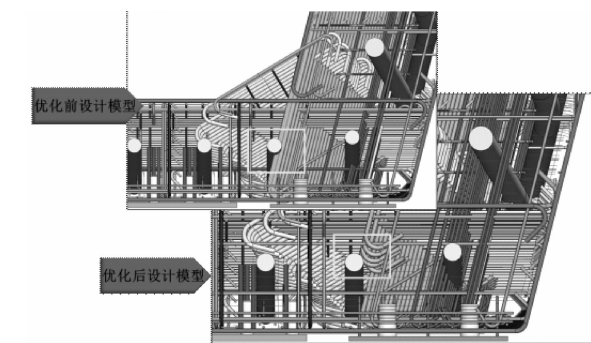


图8 钢筋碰撞检查

3.3.2 BIM 技术应用于梁场规划

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梁场可视化 BIM 模

型,进行施工过程模拟分析、场地虚拟漫游、工程量精确计算,辅助进行场地布置方案的论证及调整。管理者直观了解场地布置情况,并通过场地模拟,合理规划场地,减少临时用地,实现绿色施工。

3.3.3 梁场全面采用节能减排环保技术

拌和站、制梁养护区和洗石区设置多级沉淀池,实现水资源回收利用,施工污水经处理达标排放。采用雾炮消尘器和洒水车降尘,减少扬尘,开展生产生活区绿化建设,优化场区布置,增绿降污,大量采用太阳能、空气能等新能源或低能耗设备,全面落实绿色施工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总之,针对当前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在解决线路平顺性方面推广整体道床、新型轨枕板、CF 基桩地基处理、大量采用桥梁等新技术的现状,结合郑济高速铁路 40m/1000t 箱梁首次的工程化应用,围绕铁路 40m 箱梁新结构、新工艺的特点,开展箱梁建造机械化作业,箱梁自驱式内模、钢筋数控加工、钢筋预扎自动升降内架、预应力孔道橡胶棒拔管台车、预应力成品束钢绞线穿束台车、预应力自动张拉、预应力孔道自动压浆、箱梁自动静载等自动化设备和工装技术研究,能够确保 40m/1000t 级箱梁预制施工质量更好、生产效率更高,施工安全更有保证,为高速列车的平稳高速运行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 Q/RC 9603 - 2015. 高速铁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规程[S].
[2] Q/RC 9123 - 2017. 铁路架桥机架梁技术规程[S].
[3] Q/RC 9202 - 2015. 铁路建设项目现场管理规范[S].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udy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40m/1000t Box Grider for High Speed Railway

LIU Xiangm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China Railway Zhengzhou Bureau Group Co., Ltd.,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key problems of quality and safety existing in the manufacture of 40m/1000t box girder for high - speed railway, combi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 speed railway from Zhengzhou to Jinan, the technical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box girder prefabrication, equipment development, intelligent and green construction , which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improving the flexibility of bridge layout and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ensur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safety, reducing the construction cost of high - speed railway greatly and saving engineering land.

Key words: HSR; box girder; construction technology